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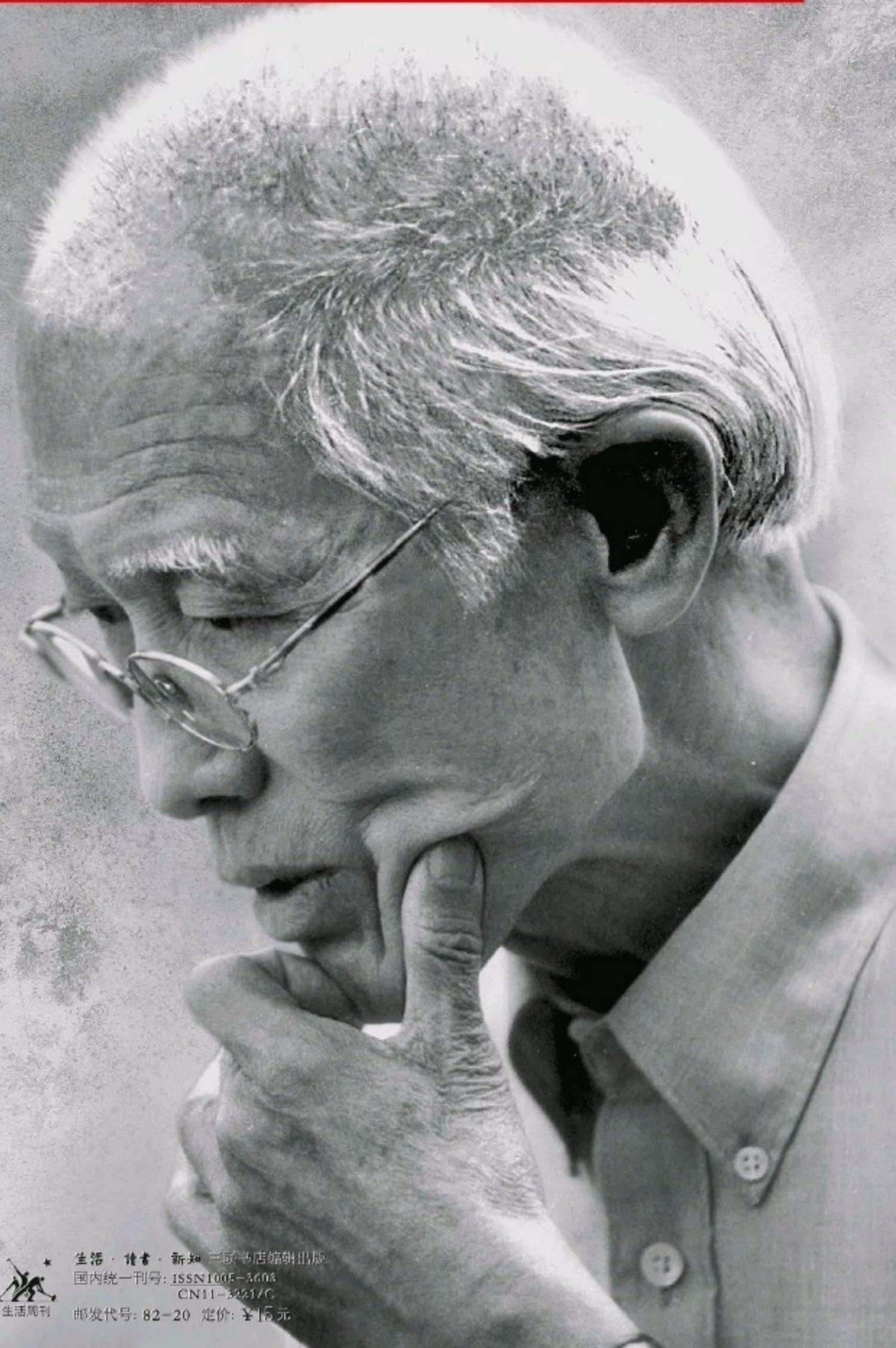
三联

生活周刊

2018.1.1
2018年第1期
www.lifeweek.com.cn

乡愁和家国

余光中何以点燃一代华人



969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 ISSN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 82-20 定价: ¥1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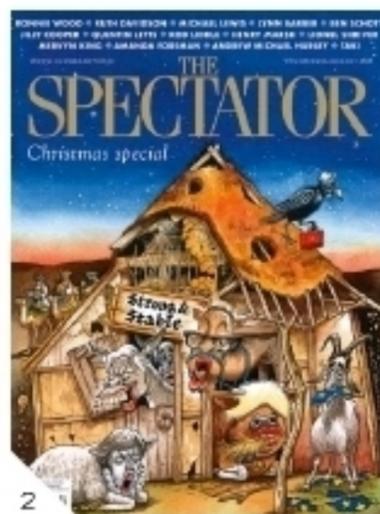
《新闻周刊》(美国) 2017.12.28

特朗普与德意志银行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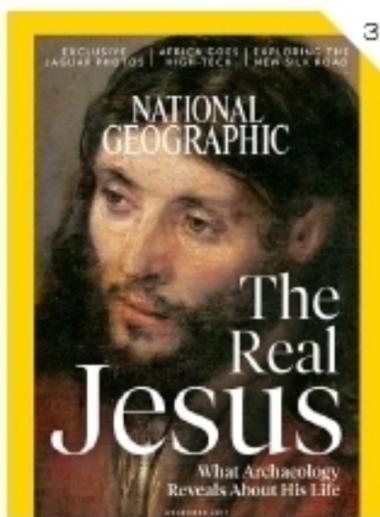
近期，特朗普被曝出与德国银行巨头德意志银行之间存在不法的财务往来，美国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正在就此事展开深入调查。特朗普的贷款并非德意志银行唯一的非正常行为，几年前，德意志银行已涉嫌在俄罗斯境内洗钱，最终被欧美监管机构惩罚。穆勒很好奇，特朗普是否隐瞒了与俄罗斯的金融联系？如果是的话，莫斯科又是如何勾结特朗普政府的？



1



2



3



4

《时代》(美国) 2017.12.25

1 / 2018 年最值得期待的奇幻之旅

《时代的皱纹》是美国作家玛德琳·恩格勒的科幻小说，创作于1962年，也是多年来美国最受欢迎的青少年读物。2018年3月，这部小说将第一次被搬上大荧幕，由迪士尼拍成电影，曾执导过《冰雪奇缘》的詹妮弗·李再次操刀打造，并邀来一众实力派演员加盟。主创团队希望这部影片是“给年轻一代人创造出的新‘绿野仙踪’”。

《国家地理》(美国) 2017.12

3 / 考古学为我们建构了一个怎样的耶稣？

世界上大约有20亿人信仰上帝，但怀疑论者始终认为耶稣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虚拟偶像。研究耶稣的学者亦分为两大阵营，一些人相信福音书中的耶稣就是真正的耶稣，一些人认为必须通过福音书之外的历史研究才能更确切地解读耶稣，而这两派都声称考古学是他们最重要的“盟友”。考古学家克里斯汀·罗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试图更明确地以考古学的视角来勾勒耶稣及其真实性。

《旁观者》(英国) 2017.12.16

2 / 脱欧的历史意义

历史学家罗伯特·图姆斯认为，历史通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看待事物，但就脱欧问题，人们还是得咬紧牙关，直面令人沮丧的现实。脱欧意味着在面对所有危险和不确定性的时候，英国选择走一个国家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决定也是当下分歧的根源。它留给英国两个巨大的任务：一是努力恢复和加强本国的团结，二是联合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维护民主主权。

《新科学家》(英国) 2017.12.23

4 / 树懒的慢生活

18世纪中叶，法国博物学家布封认为当时新发现的美洲大陆充斥着很多“低等”物种，短腿的树懒迟钝又愚蠢，是非常低等的动物，“如果再有什么缺陷，那么这个物种将不存在”，这种认知一直影响到现在的普遍观点。然而，近年的科学研究表明，树懒的这种迟缓反而是其良好适应性的体现，让它们在艰苦多变的环境中存活了3000万年之久，可以称之为物种进化的另类杰作。





阿拉善SEE

SOCIETY OF ENTREPRENEURS & ECOLOGY

一起用  写意碧水蓝天



创绿家

有行动，就有支持
做环保公益创业团队的天使投资人
7年已支持207家初创期环保公益机构
不缺好苗子，只需一双呵护的手

阿拉善SEE

以环保公益行业发展为基石，聚焦荒漠化防治、绿色供应链污染与防治、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三个领域。成立13年来，已支持450多家中国民间环保公益机构或个人的工作，是中国本土颇具影响力的环保公益组织，期待您的参与和支持！



扫码支持阿拉善SEE



P30

封面故事

余光中何以点燃一代华人？

乡愁和家国

- 34 蒲公英的岁月：余光中与那一代乡愁
- 42 “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
- 50 诗与歌，太平洋吹来的风
- 56 笔底波澜：文学江湖背后的威权台湾
- 62 余光中的香港时代
- 66 乡愁在西方：诗、批判与救赎

P92

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P124

《国家宝藏》火爆背后，博物馆与综艺娱乐



社会

- 热点：杭州保姆纵火案辩方律师退庭：一场不计后果的拷问 72
- 热点：“黑社会”家庭讨还财产记 77
- 调查：一场大火之后再看北京疏解：空间策略与空间权利 82
- 调查：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92

经济

- 市场分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看点 70
- 商业：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 98

文化

- 艺术：丁乙：关在格子里的理性与情感 104
- 艺术：安仁，从当代艺术中“观看”历史 114
- 戏剧：《如梦之梦》何以照进现实 118
- 文化：《国家宝藏》火爆背后，博物馆与综艺娱乐 124
- 话题：《双面格雷斯》，难以接近的真相 130
- 音乐：在阿姆斯特丹跳舞 133
- 收藏：博物馆和政治：从4.5亿《救世主》到阿布扎比卢浮宫 136
- 设计：一只苹果引发的设计方法论 140

- 时尚：无时尚不运动 144

专栏

- 邢海洋：减税的潜力在哪里？ 16
- 苗千：从光的本质到真实之辩 148
- 袁越：喝酒会长胖吗？ 150
- 卜键：康熙的雅克萨之“算”：要害在雅克萨 152
- 张斌：球队中的牧师 154
- 宋晓军：特朗普还会让美军“再忍耐”吗？ 155
- 朱伟：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 (11) 156
- 朱德庸：大家都有病 158

(封面图片：石一 摄 / 视觉中国供图)

环球要刊速览	2	声音	21
读者来信	8	生活圆桌	22
天下	10	好东西	26
理财与消费	18	个人问题	160
好消息·坏消息	20		

2018年第1期，总第969期，2018年1月1日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本刊文字及图片。
 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www.lifeweek.com.cn

主管 / 主办 Published by

主管：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出版：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总编辑 Publisher

路英勇 Lu Yingyong

副总编辑 Deputy Publisher

常绍民 Chang Shaomin

主编 Editor-in-chief

李鸿谷 Li Honggu

副主编 Deputy Editor-in-chief

李菁 Li Jing 李伟 Li Wei

主编助理 Associate Editor-in-chief

吴琪 Wu Qi 曾焱 Zeng Yan

采编中心 Editorial Center

资深主笔 Senior Editor

邢海洋 Xing Haiyang 谢先凯 Xie Xiankai 袁越 Yuan Yue
蒲实 Pu Shi

主笔 Editor

钟和晏 Zhong Heyan 薛巍 Xue Wei 陈赛 Chen Sai
葛维樱 Ge Weiyang 贾冬婷 Jia Dongting 徐菁菁 Xu Jingjing
杨璐 Yang Lu 曹玲 Cao Ling

主任记者 Senior Reporter

李翊 Li Yi 李晶晶 Li Jingjing 蔡小川 Cai Xiaochuan
何潇 He Xiao 黑麦 Hei Mai 丘濂 Qiu Lian
吴丽玮 Wu Liwei 俞力莎 Yu Lisha 王丹阳 Wang Danyang
张雷 Zhang Lei 苗千 Miao Qian

记者 Reporter

孙若茜 Sun Ruoxi 杨丹 Yang Dan 张月寒 Zhang Yuehan
张星云 Zhang Xingyun 艾江涛 Ai Jiangtao 宋诗婷 Song Shiting
孙璐璐 Sun Lulu 王海燕 Wang Haiyan 王梓辉 Wang Zihui
刘周岩 Liu Zhouyan 刘畅 Liu Chang 王珊 Wang Shan

特邀撰稿人 Overseas Feature Writer

鲁伊 Lu Yi 赵潇 Zhao Xiao

摄影记者 Photographer

于楚众 Yu Chuzhong 黄宇 Huang Yu

视觉设计中心 Vision Design Center

视觉总监 Visual Director

邹俊武 Zou Junwu

执行图片总监 Executive Photo Director

陈晓玲 Chen Xiaoling

设计总监 Design Director

王小菲 Wang Xiaofei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黄罡 Huang Gang 刘畅 Liu Chang

图片编辑 Photo Editor

覃柳 Qin Liu 陈喆 Chen Zhe 韩雅丽 Han Yali

编务总监 Coordination Director

程昆 Cheng Kun

发行中心 Circulation Center

执行总监 Executive Director

周旭 Zhou Xu

区域经理 Regional Manager

杨雪梅 Yang Xuemei 潘海艳 Pan Haiyan 张富伟 ZhangFuWei

发行服务 Circulation Service

李卫红 Li Weihong 刘琳瑶 Liu Linyao 王霄 Wang Xiao
王荻 Wang di 金宇迪 Jin Yudi 姚贺梅 Yao Hemei

读者服务经理 Reader Service Manager

朱静 Zhu Jing

行政管理中心 Administration Center

行政主任 Office Manager

高媛 Gao Yuan

行政助理 Assistant

刘蓓 Liu Bei

财务总监 Financial Director

郝大超 Hao Dachao

财务执行总监 Financial Executive Director

袁玉兰 Yuan Yulan

出纳 Accountant

张宇 Zhang Yu 李明洋 Li Mingyang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商务推广合作电话：(010) 84681038

联系人：连华伟

E-mail: lianhuawei@lifeweek.com.cn

采编中心热线电话：

(010) 84681030 84681029 (传真)

E-mail: letter@lifeweek.com.cn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

(010) 84050425/51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印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 59011318

物流总代理：北京双禾物流有限公司

电话：(010) 61256299

广告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063号

期刊登记证号：ISSN 1005-3603 CN11-3221/C

邮发代号：82-20

定价 Price：¥15.00 \$8.00 港币 20.00

本刊为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
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机上阅读刊物

如何购买 《三联生活周刊》

读者朋友，购买本刊请登录官网商城
shop.lifeweek.com.cn

或到当地邮局办理，本刊代号：82-20

也可直接向本刊读者服务部咨询

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另外，本刊在下列城市经销商的联系电话：

上海：上海汇敦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021) 63769858

成都：四川尚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028) 86667805

重庆：重庆弘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3) 86359776

南京：南京星与火文化有限公司 (025) 83327129

杭州：杭州华鸿图书有限公司 (0571) 88256120

广州：南方都市报广州发行部 (020) 87376490

武汉：武汉春秋书店 (027) 85493562

西安：陕西五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29) 87427853

昆明：昆明尚云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71) 64122816

沈阳：新中山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24) 23883566

哈尔滨：志诚远大书刊公司 (0451) 88341879

青岛：盛世飞龙图书有限公司 (0532) 83840608

济南：山东前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531) 82903395

长春：吉林九歌图书有限公司 (0431) 82752206

大连：大连渤海书店 (0411) 84609410

南昌：江西省邮政报刊零售公司 (0791) 88820509

太原：山西鑫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351) 7065397

贵阳：贵阳尚和图书报刊有限公司 (0851) 5661974

兰州：兰州大漠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0931) 8521090

郑州：河南大河书局有限公司 (0371) 67647337

天津：天津天智书店 (022) 23683854

河北：石家庄远大书店 (0311) 83993043

安徽：合肥皖新书店 (0551) 64252409

新疆：乌鲁木齐市纵横文科书刊有限公司 (0991) 5582981

内蒙古：呼和浩特融联书店 (0471) 6263358

深圳：深圳市新宏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755) 22203426

长沙：湖南国闻书局书报刊配送有限公司 (0731) 82253036

本期广告目录

封二~扉1 · 宾利

3 · 阿拉善

17 · 三联全媒体

33 · 生活周刊

91 · 松果生活

123 · 三联中读

151 · 周刊20年

159 · 三联书店

封三 · 熊猫爱茶研究所

封底 · KEF



拍摄二维码直接
下载客户端



新浪微博 @三联生活
周刊或扫描二维码



微信搜索 Lifeweek
或扫描二维码



扫描二维码下载
松果 APP

手机报订阅：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8000，电信用户发送短信 SLZK 到 10659000。包月 8 元，
周一至周六每日一期。

网络支持



新浪网官方微博：<http://weibo.com/lifeweek>

腾讯网官方 QQ:800033183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三联生活周刊》 全媒体广告与商务运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

中电发展大厦B座

邮编：100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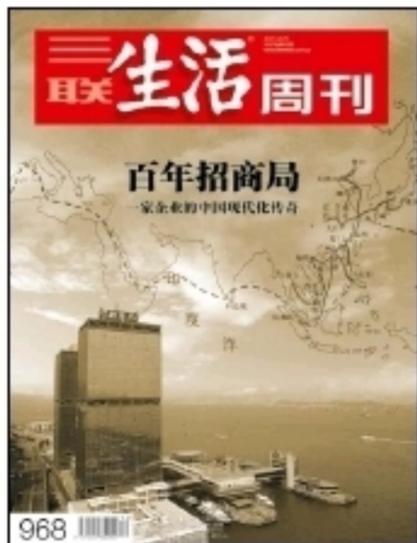
电话：+86 10 84681038

传真：+86 10 84681396

电邮：jingying@lifeweek.com.cn

网址：www.lifeweek.com.cn

三联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百年招商局

作为一个投身航运界的人，从东南亚到南亚，再到红海，这一线的港口都知之甚详。这些港口也大部分与当年郑和下西洋停驻的节点相吻合。今日我国提倡“一带一路”，历史在这里选择了相同的一条路线，但当年郑和是为了宣扬国威，今时今日，更多地却是寻求一条各国合作共赢之路，这也是新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再看百年招商局，它不仅见证了一个企业，更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之路。

(@韩溪茶客)

关注《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lifeweek)，回复您对封面故事的评论，精彩留言将刊登在下一期杂志中。

出租屋

我居住在北京国贸 CBD 附近的一间一居室内，我是一名租客。

因为贪图一人居住的自在和上班的便利，外加房租还出人意料地划算，我在这儿一住就是两年。当然，这一切居住优势的背后是有代价的——那就是房屋本身。这是一幢只有三层的老式居民楼，虽然被冠以“公寓”的头衔。一层被改造成集体宿舍，供在 CBD 万达公司工作的员工居住，二楼和三楼则以独户对外出租。室内的设计是标准的廉价快捷酒店的模式，20 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放着所有生活必需品，散发着霉霉的味道。

我辛苦挣扎着适应这个狭小的空间。热水器水箱盛的热水是有限的，每次洗澡“啪”地一开水龙头，我便开始了与时间的赛跑，脑中响起《敦刻尔克》里滴答滴答的钟声，眼睛死死盯着热水器一格一格不断下降的指数，一边用沾满泡沫的双手在身上一通狂抹。在几次实践和摸索后，现在可以完美地在热水器跳完最后一格的时候，心平气和地冲干净最后一缕头发。也曾经因为自己并不娇小的身躯，在房间里跳健美操时一个高抬腿，把瓶子鞋柜电线连着桌子腿一并撂倒，现在呢，也可以巧妙灵活地避开各种高高低低横七竖八的障碍物了。

即便活得如此尴尬，我还是花了很大心血努力把这个房间打成一个可以称之为家的地方。种肉植、贴壁纸、买各式喜爱的收纳箱，希望在这种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的环境下，生活可以有最大程度的温暖和舒适，争取在从别人手里租来的空间里尽可能多地填充上自己的色彩，给自己一种“属于我”的感觉。

但终归，自己拥有的只是使用权。在房东和租户权利不可同日而语的当下，租户只能凭着股机灵劲儿，走好维护自己权益和搞好与房东关系的平

衡木，步步惊心，如履薄冰。

前台的管理员是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她是我与房东接触的第一联系人。其地位相当于慈禧身边的李莲英，老佛爷身边的晴格格，握有大半个“生杀大权”。平时对她毕恭毕敬客气有加，那自不必说，这样能保证我作为租户可以第一时间有人来修缮漏水的水龙头和没有信号的电视。如果平时出差再带给她一些当地特产的话，甚至会因为这月修缮屋顶而造成的不便免我一个月的房租或者一个月的有线电视费。

我常常观察一楼那些年轻的万达姑娘们，她们总是在下班或者周末的闲暇时间，穿着款式新潮但廉价得脱了线起了球的衣服，香水红唇，背着印有巨大双 C 标的包包，三三两两去淘衣服吃街边摊，享受大城市提供给她们的实惠娱乐和消遣，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一些因屋小人多而产生的磕磕碰碰的不愉快。

在不久前的“清退”行动中，我们这里也不幸中枪。万达姑娘们一夜间不见了，只有门口堆放着七零八落的衣服撑子和没有吃完的醋瓶子。在我要搬走的前一晚，窗户上的铁丝网已经卸掉，窗户大开，没有灯火，像野兽张开的口。

不久后，这里将被夷为平地，前台的姑娘忽然从我的利益对立面变成了利益共同体，说话的语气变得柔和，甚至哀伤，言语间透着“认识你这么久了都还没跟你聊过天”的遗憾。我们互相鼓励了一下，祝福对方，不管在北京还是外地，都能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北京 王梦迪)

“卡片升级”的背后

“这回换卡比上次又涨了 20 元，是 80 元。”从医院取药一回到家，妻子便向我发着牢骚，脸上也写满了气愤。

为了解决诸如糖尿病、心、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的慢性疾病患者长期用药导致家庭困难的问题，国家推出了慢性病或特种病的救助制度，凡是患有该类疾病的患者，均可享受门诊购买相应药品给予一定比例报销的优惠政策。妻子取药的县医院，是我们当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定的慢性病定点报销医院。在此医院购买药品，患者可以仅支付自己承担的部分药费，其他大部分则由医院方与人社局年终核算。

对于家庭的每项开支，妻子都有记录的习惯。据妻子的家庭收支记录显示，从2015年到现在，这样的就诊卡已经更换了六次，其中，2015年更换一次，2016年更换两次，而2017年竟然更换了三次。当然，更换这样的卡片是需要收费的。从记录上看，从2015年到现在，不光每年更换就诊卡的次数在增加，而且，每次收费标准也在不断提高。对于换卡问题，也有人提出质疑，但医院方面给出的解释是“更换卡片是为了配合电脑系统升级”，当然，不更换卡片的患者，则不能享受慢性病报销的优惠政策。至于“升级更换”这样的就诊卡片，是否确实属于工作需要，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就诊卡，与普通就诊患者就诊时所持的价值一元钱的“一卡通”完全一样，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知道我对这样的“换卡”满腹狐疑，一位曾在医

院工作多年的朋友偷偷告诉我：“频繁换卡，只是医院的一项收入罢了……”

“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在论及既要增大缴纳税款的额度，又要不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应，制定税收政策必须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这一问题时，说出的一句具有讽刺意味而又颇耐人寻味的一句话。

慢性病患者用药的报销比例高达80%左右，与可以享受到的上百元甚至更高的报销费用比起来，区区几十元的换卡费这些“鹅毛”，实在微不足道，因此，尽管有人对此感到憋屈，但人们还都很痛快地办理了换卡手续。

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有效避免了不少家庭因病致贫的问题，是一项让广大群众拍手叫好的惠民政策。然而，该医院却瞒天过海，以国家的惠民政策这块大招牌做掩护，增加收入，实在不敢恭维。

（山东临清 卢长平）

为师者诚惶诚恐

其实我算不上真正的老师，只是大学时曾经做过半年兼职英语老师。而如果让我选一个词来总结那半年的心情，那只能是“诚惶诚恐”。

我的班级里都是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这个年龄的孩子对老师的信任和热爱几乎是无条件的，甚至是盲目的。他们总觉得你无所不

知，而我却因此备感惶恐。毫不夸张地说，课堂上的我每一秒都是惶恐的。我常常害怕讲错了语法，害怕发音不标准，害怕拼错了单词。我每时每刻都在担心，担心不小心误导了孩子，担心失去他们的信任。

有一节课我印象最深。那是堂外教课，我唯一要做的就是临近下课时给孩子们分发作业。当我进教室时，外教正讲到自己最喜欢的口香糖口味是“mint”，也就是“薄荷”。孩子们听不懂，便把我当作救兵：“老师老师，这个单词是什么意思呀？”可我的大脑却忽然死机，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词义。那一刻，我羞愧难当。那些热情的目光像是质问的利剑，凌迟着我傻掉的脑子。我的腿生了根，不能挪动丝毫，手中的作业变得沉重，身体也开始僵硬，似乎只有脑子在飞速转动，试图寻找一个找不到的答案。

大概是我沉默的时间太久，外教一脸纳闷地看

过来。我只得扯出一个端庄的微笑：“老师不能告诉你们，你们得自己去查明白呀。”“噫，老师你真不够意思！”孩子们纷纷叹息，转身继续和外教交流去了。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瞬间，老师只是不想太轻易给他们答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最难堪的一瞬间，无知让我深感羞愧。

三年多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件事，我依然觉得异常难受。“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者，虽是“孰能无惑”的普通人，却必须要有为学生解惑的能力。而那一刻的我，没有这种能力。

那半年的时间里，当老师的我总因害怕不能解惑而诚惶诚恐。可也正是这份惶恐，督促我每天兢兢业业地备课，在教材上标满了音标和语法点，熟记每一段对话和每一课练习，期待成为更称职的老师。

幸而惶恐，得以进步。

（中读用户 洞烛）

公示

根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开展新闻记者证核发情况自查工作并重申有关规定的紧急通知》（【2009】299号）、《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关于2014年换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关于期刊申领新闻记者证的有关通知》、《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单位申领新闻记者证的通知》要求，我单位（《三联生活周刊》）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我单位已领取或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2018年1月1日~1月8日。举报电话为（010）84681039。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王海燕

本期截稿时间：2017年12月25日19时

本栏目欢迎来信，投稿请发信到：letter@lifeweek.com.cn

罗马尼亚 | 圣诞节

12月21日，罗马尼亚军队士兵的子女参加在国家军人俱乐部举行的圣诞派对。







英国 | 冰上起舞

(右图) 12月19日, 英国真人秀节目《冰上起舞》拍摄2018年节目宣传照。



土耳其 | 纪念鲁米

(左页上图) 12月17日, 旋转舞者参加苏菲旋转舞蹈创始人、神秘主义诗人莫拉维·贾拉鲁丁·鲁米逝世744周年纪念日。鲁米出生于呼罗珊境内的巴尔赫, 逝世于今日土耳其境内的科尼亚。他一生主要以波斯语写作, 也有少量以阿拉伯语、希腊语写的作品。他的作品拥有广泛的影响,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诗集《玛斯纳维》突破语言的障碍而流传于世界各地。

澳大利亚 | 乐高

(左页下图) 12月21日, 被称为“砖男”的乐高玩具组装大师麦克诺特在悉尼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乐高作品展, 共38件乐高作品展出。麦克诺特耗时4500个小时、使用150万块乐高积木搭建完成这些作品。图为麦克诺特在会场给“悉尼歌剧院”的乐高模型搭上最后一块积木。

日本 | 狗年来了

(右图) 12月20日, 两名清洁工人穿上狗和公鸡的动物装束在东京龙名馆酒店外清洗窗户。明年为农历狗年, 他们以这种方式迎接新的一年。

巴勒斯坦 | 抗议

(下图) 12月20日, 巴勒斯坦人聚集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马拉, 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图为一名巴勒斯坦抗议者向以色列军队扔石头。





减税的潜力在哪里？

文 / 邢海洋

4月到2017年底，特朗普的减税计划终于落地，美国的企业所得税从35%降到了21%，个人所得税率也有所下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除此之外，企业承担的社保缴费也远高于国际水平。全球降税的声浪中，我们是否会跟进呢？

其实早在美国之前，中国政府就致力于为企业减负了。“五险一金”中有一种99%的人从未有幸领取过的失业保险金，缴费比例一度高达工资的3%。因为领取率低，该保险金曾年年巨额结余，在2015年开始的企业减负中首当其冲，至今已经降至1%。至于不断发出“入不敷出”警报的养老社保，对尚有余力的如养老金累计结余可支付的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份，单位缴费比例已经由20%降至19%。多次调整后，我国企业缴存的“五险一金”费率中位数从44%降至40%以下，约降低了4.5个百分点。相对于约70%的企业综合税率，相当于降低了6.4%。当然，这和美国大刀阔斧一下子将企业所得税免去了一小半比，显得微不足道。并且，中国的减税，最容易的部分降下去以后，又到了一个瓶颈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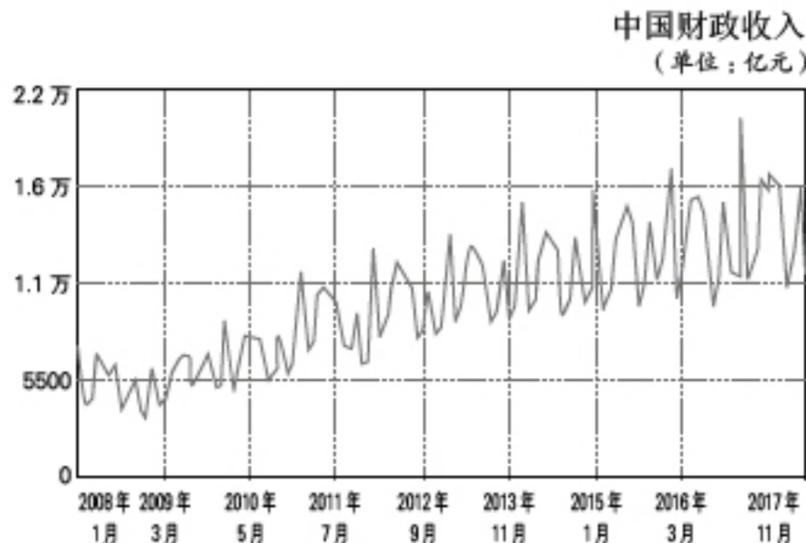
美国减税之所以“四两拨千斤”对周边国家形成了虹吸效应，在于美国的税负体系中企业所得税只占很少的部分，这就给予它较为灵活的操控能力。虽然美国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公司，但是公司所得税只占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10%左右，而个人所得税占比达到48%。以直接税为主导的西方国家，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林林总总的围绕纳税人收入的税种“层层包围，处处设卡”，将个人的各种收入都纳入到税收体系。而相对于个人，企业作为创造价值、追逐利益的现代经济的直接参与者，对税收体系最为敏感，

却不是纳税的主体，而是价值传导的“二传手”。当今的全球经济体系，商品流动的自由度远胜于企业迁移的自由度，企业的自由度又远胜于个人在国家间的迁徙能力，在收入流向的终端，也就是个人处征税，也就有了最稳定的税基。又因为征税于终端，挣得多的多缴，挣得少的少缴，除了“养活”公务人员、为公共服务付费，税收对收入二次调节的“副作用”也发挥了出来。

我们以间接税为主导的税收体系，一大半的税收“隐藏”在商品之中，最后由消费者买单。而富人消费少，穷人购物却是刚需，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体系无疑是向穷人征集了重税。扭转这一税负失衡，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由之路。这条改革路径，在个人所得税的调整中已见端倪。在2006年至2011年的5年间，国家曾连续3次上调了个税起征点，从800到1600到2500再到3500元。可最近的6年时间，曾经紧锣密鼓的个税调整彻底哑火，于是乎个税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2016年突破万亿大关，增速竟达到17.1%。我国的个税税率分为七档，刚过3500元起征点还只有3%的税率，可很快税率阶梯就“陡峭”起来，一旦应纳税部分超过4500元就是20%的税率，超过9000元就是下一个25%的阶梯，对于城市中勉强生存的所谓“中产”，几乎无一例外都会触碰到四分之一收入来纳税的高收入。也就是说，生活在一、二线城市的国人，已有相当比例与西方国家居民的税负看齐了。

减税的另一个重头戏流转税也在下降，2016年启动的营改增一年共减税7000亿元。但最高档增值税率仍为17%，远高于海外消费税的税率。当然流转税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并非企业的真实税负。

最终，企业的真实税负还是高在了“五险一金”等人工费率上，即使下降了，我国企业缴费养老金比例为19%，是美国的3倍，也高于福利国家瑞典的11.9%、老龄化国家日本的7.7%，而企业减负的潜力也正在此。一些省份养老金亏空，是1992年退休金由企业向社会转制的结果，巨量国企收益理应用于弥补这个亏空。▣



订阅邢海洋

《给投资小白的100封理财信》

加入中读·老邢的财商分享微信群

攀登财富的阶梯，其实并不难



生活在碎片时代



生活在碎片时代，
不能像碎片一样生活。

三联生活周刊



松果

节气

中读
ZHONGDU

新知
WISSEN

三联爱乐 PHILHARMONIC



栏目插图 | 范薇

史上最严监管年

盘点 2017 年，堪称史上最严监管年。证监会开出行政处罚 206 单，罚没款金额 73.24 亿元，是去年全年的 1.7 倍；市场禁入 36 人，禁入人数创新高。其中对慧球科技“1001 项议案”、鲜言操纵“多伦股份”案、九好集团与鞍重股份“忽悠式重组”案、山东墨龙内幕交易案等大案“打老虎、拍苍蝇”，对证券犯罪形成高压。资本大鳄兴风作浪，上市公司内外勾结、拉抬股价非法牟利等市场乱象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中科招商之退场

12 月 15 日，风光一时的中科招商被新三板宣布“退市”，宣告了它“壳”战略的彻底失败。2015 年新三板有两家万众瞩目的股权私募公司，九鼎选择了金融控股路线，中科招商则盯上了上市公司的壳。从 2015 年 7 月 9 日到 8 月 24 日，中科招商逆势举牌了 16 家上市公司，耗资 34.4 亿元。可惜，随着壳资源的贬值，中科招商的投资帝国风雨飘摇，其在新三板融到的百亿资金基本赔光。

港交所的“同股不同权”

曾因“同股不同权”拒绝阿里上市的港交所迎来了 20 多年来最重大改革，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公司主板上市。随着 A 股 IPO 堰塞湖的疏堵，香港市场不仅要和海外市场竞争，还面临着内地市场的竞争。一旦 A 股的上市等候期变成 6 个月，那么香港市场的时间优势就会变得很微弱。在新经济公司的上市浪潮中，港交所可谓提前布局，把难题抛给了上交所和深交所。预计香港市场 2018 年集资额有望达到 400 亿美元。





破发

自11月底步长制药和天能重工相继跌破发行价之后，三角轮胎和赛托生物又加入进来。2016年IPO新规实施之后上市的656只A股中，4只破发，且有4只距发行价只有一个跌停板的距离。同样有着“业绩下滑+解禁压力”的还有日月股份、贵广网络、博迈科、常青股份、华达科技、世运电路、恒林股份、道道全等。通常，破发程度越深，破发后反弹强度越高。经验老到的股民们密切关注着“破发”带来的机会。

人民币的小幅升值

美国国会通过减税法案，人民币反而大涨。2017年，人民币汇率扭转了过去三年逐年渐进加深的贬值态势，波动弹性有所增强，呈现逐渐走升的态势，截至12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超5%。在美联储加息，并传递2018年还会加息三次信号的背景下，随着国内经济趋稳，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中性偏紧，下半年可能加息一次，预计明年人民币小幅升值概率较大，将在6.55元至6.65元区间波动。

清仓莱特币

2017年莱特币上涨75倍，12月20日创始人李启威(Charlie Lee)宣布清空所有持币。受到比特币的启发，李启威于2011年创造了莱特币，目前总市值约为170亿美元，位居所有数字加密货币总市值第五。李启威曾表示，比特币最安全，交易起来自然会花费更多，而莱特币的交易成本会相对低些，所以莱特币将更多地用于付款，而比特币将被更多地用于存储。



集成电路

2016年全球半导体产业整体销售额在3400亿美元左右，受益于DRAM和NAND闪存市场的激增，2017年全球半导体产业预计将增长20%。总投资128.1亿元的合肥晶合，历时两年的建设已实现量产，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专注于面板驱动芯片的制造商。在国家大力支持、国产芯片替代进口以及人工智能、无人驾驶、可穿戴设备等新兴产业推动下，集成电路产业即将进入爆发期，可关注相关上市公司：兆易创新、士兰微、长电科技和三安光电等。



低处的聪明

尽管“谦恭”“开明”和“推己求人”常常被当成中产阶级的道德标签，但根据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心理学研究小组发表在《英国皇家学会会刊B辑》上的最新研究结果，身处底层的人反而在这些方面更擅长。针对 2145 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对 299 人的观察实验表明，虽然经济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白领阶层在面对单纯考察智商的任务时表现更好，但一旦涉及到人际合作，马上便输给那些出身背景较为低下的蓝领阶层。后者更能理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决定对周围人群的影响，更容易听进不同意见以促进资源共享，在冲突发生时也更倾向于做出让步以谋求共同进步。

好消息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小孩子挑食、一见西兰花、芦笋就皱眉怎么办？美国布法罗大学的儿科学小组在《肥胖综述》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关键在于父母的坚持不懈。虽然孩子的口味受母亲孕期饮食的影响很大，但在学龄前阶段重复让他们尝试开始时可能不喜欢的食物，大部分偏食问题可以得到纠正。



运动戒烟法

总是戒不掉烟瘾？试试出去跑两圈吧。伦敦圣乔治大学的研究小组在《英国药理学杂志》上指出，针对实验室小鼠的研究显示，即便是像慢跑这样中等强度的体育运动，也能激活大脑中的 $\alpha 7$ 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提供与吸烟类似的快感，从而令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

坏消息



酒后生色心

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学的研究小组调查了 49 名青年男性的酒后反应后发现，酒精的影响会加重男性物化女性的倾向。两杯酒下肚之后，实验参与者对异性面部的注意力停留时间显著缩短，而对胸部和腰部等体现性征的部位则会长久凝视。当对方容貌娇好时该变化尤为明显。



病从口生

对 1622 名英国老人进行长达 3 年的跟踪调查后，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小组在《美国老年医学学会杂志》上发出警告，糟糕的口腔健康可能是令老年人身体格外虚弱的重要原因。牙齿数目少于 21 颗或全口牙缺失、口干、进食困难和牙敏感的人体弱多病的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为了避免手机在电池电量还剩 30% 甚至 40% 但出现用电高峰时突然关机，苹果公司 2016 年对 iPhone 6 等手机进行了系统设置，以使手机顺利挺过用电高峰。这样手机在运行一些大程序时速度就会变慢。

——法国《论坛报》报道，苹果承认刻意让老款 iPhone 变慢

有很多现代的管理和领导方式建立在迷信、轻信和盲从之上。如人祭：重组和裁员是安抚诸神的现代仪式（只是没有了群落聚在一起欢庆一下的好处）。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安德鲁·希尔

我拒绝把梦视为疯子或学校女生的恶习。但我也拒绝现实，或者相反，它拒绝我；我不能确定这是由于我的无能，我的颓丧，或我不能理解它。没有一种欢乐的形式适合我——现实之吻不适合我，想象的爱抚也不适合我。

——佩索阿，《坐在你身边看云》

旅游业的发展实际上把那些被认为赶不上时代的当地人民从历史街区中清空了。到处都是一样的招牌，一样的店面，免得让现代游客们过于不习惯。大众旅游变成了一支全球化占领军，对当地居民设立法典，让他们要么屈服、要么滚蛋。这支军队走街串巷，展示着自己的雄威。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小队伍觉得自己是在游览，实际却是脚下踩着同样的节拍、耳机里放着同样的音乐在全球一圈圈地转悠。

——加拿大社会学家马蒂厄·博克-科泰



（新华社图）



人的缺点是改不了的。不，也许能改，但如果改正缺点要花费 15 年的时间，就不如花一个月的时间来开发自己的优点更合适了。人如果想要改正自己的缺点，就需要付出很多辛苦，并且肯定收效甚微。

——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心灵晴雨图》

+/-

数字

11

万公顷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野火烧过的面积已经超过 10 万公顷，成为 1932 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规模最大的野火。从 2017 年 12 月 4 日起，已经烧毁 11 万公顷的地域，烧毁 1063 栋建筑，造成 1.7 亿美元的损失。

30

万吨

在日本，随着水质改善，海水中的营养成分出现不足，海苔生长恶化，产量正在下降。日本养殖海苔的产量从 1994 年的 48.3 万吨降至 2016 年的 30 万吨，减少了近四成。

45.8 : 1

东京上野动物园 2017 年 6 月出生的大熊猫宝宝“香香”于 12 月 19 日与日本民众见面，动物园采取了提前抽签的方式，19 日的中签比例约为 45.8 : 1。19 日开放日当天的访问量达到 115.663 万次。

酒有别肠，甜食也有

文 / Harps
图 / 谢馥飞



动物学家和爱吃牛杂或毛肚火锅的人都知道：反刍类动物有四个胃，有的胃负责储存，有的胃负责消化。遇上什么难得的美味，人类也会一边吃一边想如果能像牛羊一样，一下子吃好多，以后再反刍着慢慢品就好了。把自己的肉体发展出打包功能是适应环境的生存需要，不是感官享受的需要。人类吃的食物相对于牛羊的草料太过精细，反刍上来恐怕已经不堪品味了。即使是牛，也不能放任它们吃太多甜美的草料如苜蓿类。牛吃了太多湿苜蓿，在储存的胃里发酵胀气又排不出，可能会挤压心肺，造成生命危险。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农民要把防止胀气的除泡药拌进饲料里。危急时刻，甚至需要用刀刺穿牛的腹壁来排气。

虽然健康指南规定了每日摄入食物的比例和分量，但几乎没有人的生理和心理能忍受遵循那种高不可攀的指示，每天严格地吃同样分量的某类食物。我们的胃有时可以膨胀成一个集装箱，有时能缩成一个袖珍手提袋。换句话说，人可以精神上忽然多长出来一个胃，并实现物质功能。成语有“酒有别肠”，说的是喝下去的酒能储存在另外一副肠胃里，所以能喝酒的人不必个子大。用喝酒做例子其实不太恰当，因为人喝酒的能力取决于自身酒精代谢能力，并不取决于肠胃的容量。

甜食吃下去，倒真的好像另有一个肚子。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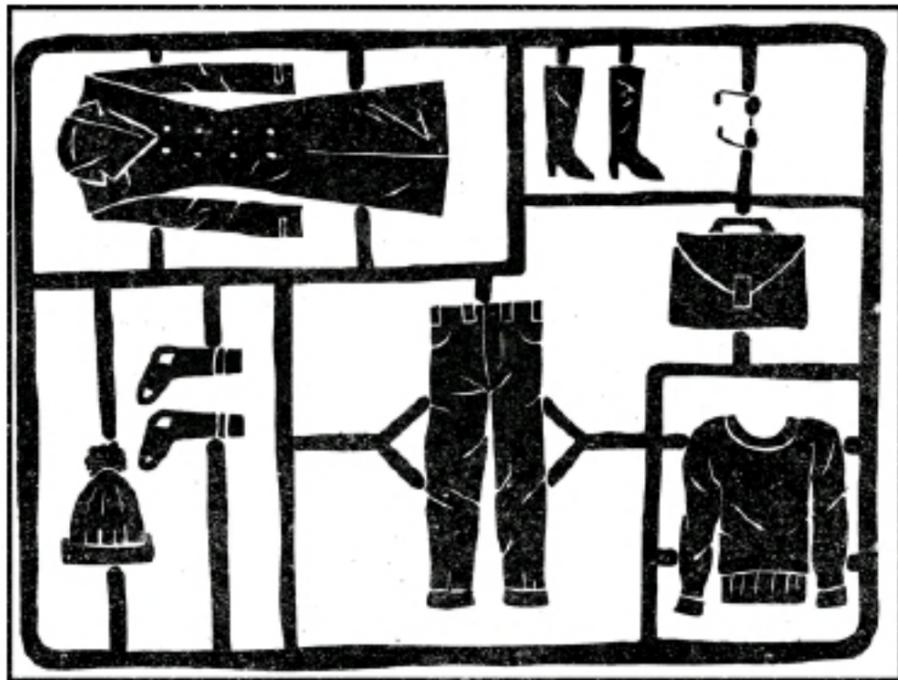
朋友大宴小聚，即使之前已经吃了一肚子的鸡鸭鱼肉，众人都说饱得不行了，一碗桂花汤圆或一大块提拉米苏出现，还是可以引起欢呼和此起彼伏的踊跃匙箸。果戈理的《死魂灵》里，憨厚好客的俄国乡间绅士劝客人吃饭时说：“教堂有时也挤得满满，可是市长来的时候依然有地方。这块东西和市长一样。”奇奇科夫在热情的劝说下，只好一直吃一直吃，吃得肚皮像一面鼓，“什么市长也进不去了”。

有一次跟几个朋友玩桌游，做东的是一对德国学生。他们做了很浓的红菜汤拌稠厚的酸奶油、墨西哥辣牛肉煮豆子、小块的土豆煎饼，伴着各式面包来吃。在所有的菜尤其是酸奶油和红菜汤被一扫而空之后，男生又端出来一块硕大的奶酪蛋糕。这个奶酪蛋糕朴实无华，形状一看就是自己做的，却出奇地好吃。它甜得恰到好处，稍微有点酸味，细腻又结实，质地隐隐有筋骨，可是并不让人吃一口就噎得慌。大家一直吃到为甜食准备的另一个胃也完全填满，蛋糕一点也没剩下，才想起来问这叫什么蛋糕。男生说，这是在东德地区很流行的“俄国蛋糕”，他曾经问过俄国人，但俄国人都表示没听说过。他离开家去上大学的时候，他妈妈教会了他如何做“俄国蛋糕”，确保他有能力每年给自己过生日。从此以后我就记得，每次去他们家做客，会确保多带上一个胃好装“俄国蛋糕”。■

怎么才算会穿

文 / 欧阳宇诺

图 / 谢馥飞



好友娜问我，怎样才能提高衣品，穿着有格调。我建议她多翻翻时尚类杂志，吸取经验。一周后，我们约饭。她戴着柠檬黄羽毛耳环，上身穿枫叶橙高领毛衣，下身是黑色破洞牛仔七分裤，外加一双白色真皮穆勒鞋，披着一件脏粉色厚呢外套，像一棵装饰鲜艳的圣诞树在餐厅内出现。的确，她身上的每一件单品都是时尚类杂志推送的“最火单品”“季度热卖”“本季最值得拥有”，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她显得那么没有品位呢？

她说：“我可是认真听你的话，啃了十几本时尚类杂志，欧美的、日系的都有，怎么样，我看起来是不是很时髦？”她一边捏起一根薯条往嘴里送，一边得意扬扬地对我说。可是，吸取经验并不等于照搬。面对着这样一位智商很高，但衣商很低的闺蜜，我该如何劝诫她，才不会伤她的心呢？

我们不能完全照搬时尚类杂志上的穿搭，首先是因为，平常人大多不具备模特的完美身材。有一则笑话说，为什么球星喜欢和模特约会，因为他们都是靠身体吃饭。模特不仅有着先天的身材优势，她们往往还具备超于常人的维持身材的坚强意志。节食加运动，这是她们生活中的日常。

其次，虽然时尚类杂志存在的意义中有“指导常人穿搭”这一项，但这并不是它存在的主要意义。著名时装设计师乔治·阿玛尼曾说：一切都是生意。所以，想明白这件事情了吗？一切都是生意！时尚类杂志有专业的团队，摄影师、灯

光师、造型师……合力为读者们创造出一张张精美绝伦的大片。读者们合上杂志，恨不得马上冲向商场，将喜欢的单品买下归为己有。读者大概会觉得：这辈子要想活得精彩，我必须要买下这件或那件东西。于是，时尚类杂志盈利了，品牌获利了，你的钱包空了。你将新买的单品穿戴在身上，照照镜子，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于是，有些沮丧的你为了安慰自己，转身拿了块高热量的巧克力塞进嘴里。

最后，要考虑时尚类杂志上的穿搭是否适合你的生活情境。杂志上偶尔会介绍，寒冷的冬天也不能丧失美丽，可以光腿穿长裙，外面套件薄呢外套，就能实现时尚与保暖的统一。还有，快到年底了，想在公司的派对上闪闪发光吗？那么，一定要穿这样或那样的小礼服。但是，读者们要认真考虑一下，你所生活的城市冬天的温度可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而你每天要在寒风中步行一段时间赶往办公室。如果你的智商够用，那么，光腿穿裙子的确不是一项太明智的行为。而且，你真的需要为了一场年终派对，花五位数去购置一条一年只穿一两回的奢侈品牌礼服吗？

结论就是，时尚类杂志当然是要看的，但要用理性的头脑挑选适合自己的单品。所谓适合，大概包括：身材条件、实用程度、生活情境、使用频率、经济状况……然后，你会发现，穿着有格调，其实并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健身难题

文 / 贝小戎

图 / 谢驭飞



一个多月前，我办了健身房的卡，买了私教课，开始健身，主要是想减脂和改善腰疼，我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觉得健身教练们没必要再跟我强调，要把健身变成爱好、变成习惯。

教练还说：“我们的身体跟机器不一样，机器用得多了就会坏，身体却是越用越灵活，所以你要常来。”对这个说法我将信将疑，因为听说汽车老放着不开会放坏，所以机器也要经常用，而且机器能长期连续工作，身体却是需要休息和休整的。但是说身体需要运动也没错。英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兰姆登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人体很复杂。它的无数个系统——从神经、心血管到肾上腺——相互协作，使我们能够有效地运行。人体细胞需要锻炼来刺激分解和再生。移动和运动是活着所必需的。”

教练经常跟我说要常去，我都说没问题。但没想到刚坚持了一个月，我的健身就暂时中断了。一个月来，我每周去两次，每次一个小时的力量训练、一个小时的放松拉伸，有时间的话还会在跑步机上跑步。上节课，给我安排了一次拳击课，教练开始推销拳击课程，说拳击比跑步更有趣、对体能的消耗更大，还能防身，然而我已经承担不起更多的私教课的开销，再加上刚适应了目前的健身模式，实在不想这么快就走出舒适区。再加上脚踝肿了，健身卡不见了，我已经一周没去了。

有时候我也想，真的要特地去健身房锻炼吗？

身体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总归没问题，为什么要专门锻炼背部和腿部的某一块肌肉？这大概主要是因为现代人过得太舒服了。兰姆登说：“现代人已经习惯了按需服务、按一下按钮就能操作的技术以及欲望立刻得到满足，这是不健康行为的三个源头。经常锻炼能够提高认知能力、增强记忆力和专注力、改善睡眠和精神健康。但健康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60%到70%的人开始健身后9个月内就会放弃。为什么明知健身有那么多好处，我们仍坚持不了呢？人类行为理论早已发现，我们更渴望马上而不是将来能获得报偿的付出。我们都希望迅速、利索、高效、以最少的努力把事情做好。而锻炼本质上就是不舒服的。”锻炼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天生都想让自己舒服一点，比如做推拉动作的时候，放回去的速度要放慢一半，这样锻炼才有效，但人们的本能是利用惯性迅速把它放回去。

心理学家说，要想鼓励自己常锻炼，开始时少量多次，简单、可持续的改变最有效。可如果健身房离家太远，你就很难做到高频率。有研究显示，去健身的路途不要超过6公里，这样每个月能去大约5次，超过8公里的人平均每个月只去一次。但如果健身房很高级、会员费很贵，这个半径可以再大一点，因为怕浪费钱，所以会多去。每次去锻炼，健身房给你一点积分，到年底有奖励。我甚至想跟服务员说，我常来可不是为了积分，而是因为离家近。■

测验来了

文 / 夏兰
图 / 谢馥飞



我儿子上一年级，他近来的数学测验中有一道题是：在一个队伍中，从前面数小明排在第五，从后面数他也是排在第五个，问这个队伍一共有多少人？答案是9。我后来琢磨了一下，计算方法是5加5再减1，之所以要减1是因为两次数的时候，小明被算了两次，而他只是一个人，所以要减1。我到这个年纪才弄明白这种题。有人说上过课外辅导班的孩子都会做这种题。它不见得难，但测验题目的难度是相对的，有人觉得难，而有人可能觉得很简单。这也是测试好玩的地方之一：对于你会的题，你做了会有成就感；你不会的题，做了之后你能增加知识。

英国人喜欢各种知识竞赛，英美媒体上几乎都有各种关于新闻的测验。比如《经济学人》2017年底的圣诞特刊上有一套有奖测验，答对的人有望被抽中，获赠一册该刊的测验书《游戏提问》。科技类的问题有：“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第八代（以及最新一代）的名字是什么？”我搜索了一下，答案是“奥利奥”，前一代叫“牛轧糖”。关于中国的问题有：“哪一种最早的进食工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戏曲(xiqu)在世界其他地方叫什么？”“哪个朝代在公元960年开始掌权？”中国读者一看这个问题的配图也能猜出答案来：画了一个戴着官帽的人，像是教科书上宋朝皇帝赵匡胤的头像。记得《金融时报》的年度测验奖品更丰厚，是一瓶或是一箱葡萄酒。

《卫报》网站上也经常出测试：比如问哪个

社会主义团体是以一位罗马将军的名字命名的？答案是费边社，它是以古罗马名将费边作为学社名称的，用意是表示要学习他著名的渐进取胜的策略。

关于事实的题目叫测验，你用搜索引擎能够解决；只需要动脑子就能解决的是谜题，这种题不需要去搜索，甚至搜了也搜不到。比如中国传统的谜题：一个人带着一匹狼、一只羊和一些白菜如何过河的问题。

数字类的题目都属于这一类，如匹诺曹的鼻子长5厘米，他每说谎一次鼻子就变长一倍。说谎9次之后，他的鼻子长度相当于：A. 多米诺；B. 网球拍；C. 桌球台；D. 网球场；E. 足球场。反正这种翻番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一本谜题集的编者说：“最好的谜题就像一首诗，优雅，简短，能激发我们的兴趣，点燃我们的好胜心，检验我们的机智，有时还能揭示普遍的真理。好的测试不需要专门的知识，只需要创造力、机敏和清晰思维。测验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唤起了我们理解世界的冲动。最重要的是，测验让我们沉浸于智力游戏中。它们很有趣，表现了孩子般的好奇。”在我国，供大人玩的谜题很少，也许是年纪大了之后没工夫玩，更喜欢直来直去——不要测了，直接告诉我事实或者答案就行了。■

本栏目投稿邮箱更改为：roundtable@lifeweek.com.cn



环保储水设施

水滴状外形的 Raindrop 是一个储水设施。它可以安装在雨水排水管上，只要下雨就能自动蓄水，拦截原本会直接流进下水道里的雨水，上部嵌入的水壶可以拿来浇花，下部安装的水龙头可以接上水管来洗车。



猫咪搁架

猫家具品牌 Square Cat Habitat 的猫咪搁架，可以轻松地安装在家里的任何墙壁上、窗台下。它允许猫咪在上面进食饮水，也可以休息玩乐，提供高达约 23 斤的重量支持。可选的饰面和颜色能够匹配不同家庭的家装风格。



颜控测量工具

XYZ 系列测量工具由纯金属打造，外壳磨砂亚光，点状的矩阵 LED 显示屏不只能显示测量数据，还可配合手机 APP 储存测量信息并交互引用。四款常用工具：游标卡尺、激光测距、圆规、卷尺，每个都有一个几何图案作为标识，配合性冷淡式的包装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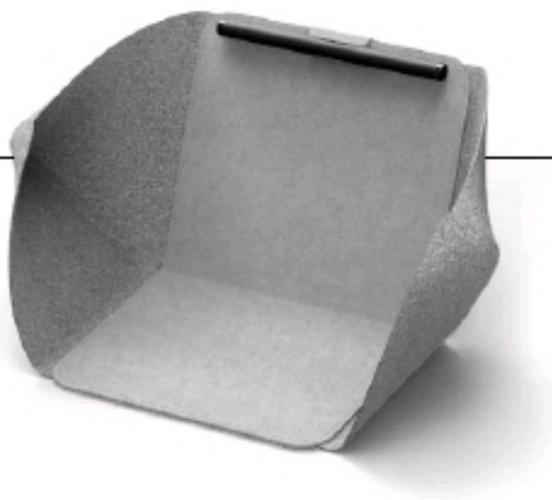


航空复刻表

浪琴大眼飞航表复刻了航空繁荣年代的计时码表。饰有 SuperLuminova 夜光时标的半镜面黑色表盘配上 9 时位置的小秒针盘、6 时位置的 12 小时计时盘、3 时位置的大尺寸 30 分钟计时盘。该设计在 2017GPHG 日内瓦高级钟表大赏中获得了“最佳复兴奖”。

移动工作站

移动工作站 Alcove 可以快速折叠成笔记本电脑外壳的样子，打开便能隔离掉部分噪声和视觉干扰。此外，它还内置了一个工作灯，有助于减少在低照度环境下阅读或书写时的眼睛疲劳。



功夫袜靴

“上下”和陈漫联名设计的中国风功夫袜靴，整体针织面料紧致地裹住脚踝和小腿，穿感体验更加亲肤。侧面和鞋后的葫芦元素设计细节，寓意“福禄双全”。



磁性蜡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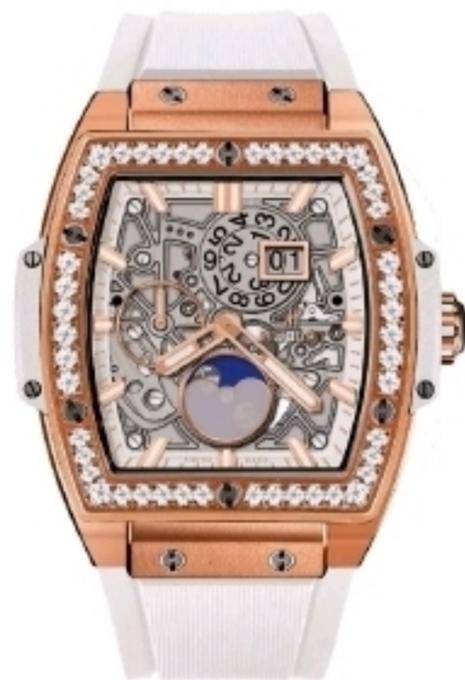
“磁性蜡封”ALUMA 允许用户在多个刻印头设计之间快速切换。ALUMA 这个名字来自于其灰色的细长坚实的铝质手柄，这个实用又有趣的设计改变了传统的蜡封形式。





金银文具

巴黎银器品牌 Puiforcat 与建筑师约瑟夫·迪兰德 (Joseph Dirand) 合作的 Bureau d'Architecte 办公文具系列包括书架、胶带切割器、拆信刀等九件产品，以金银材质凸显简约线条与轮廓的纯净感。



月相腕表

宇舶表 Big Bang 系列王金密镶女表，42 毫米酒桶形表壳搭配镂空表盘，喷砂月相盘位于 6 点钟位置，每两个朔望月完成一次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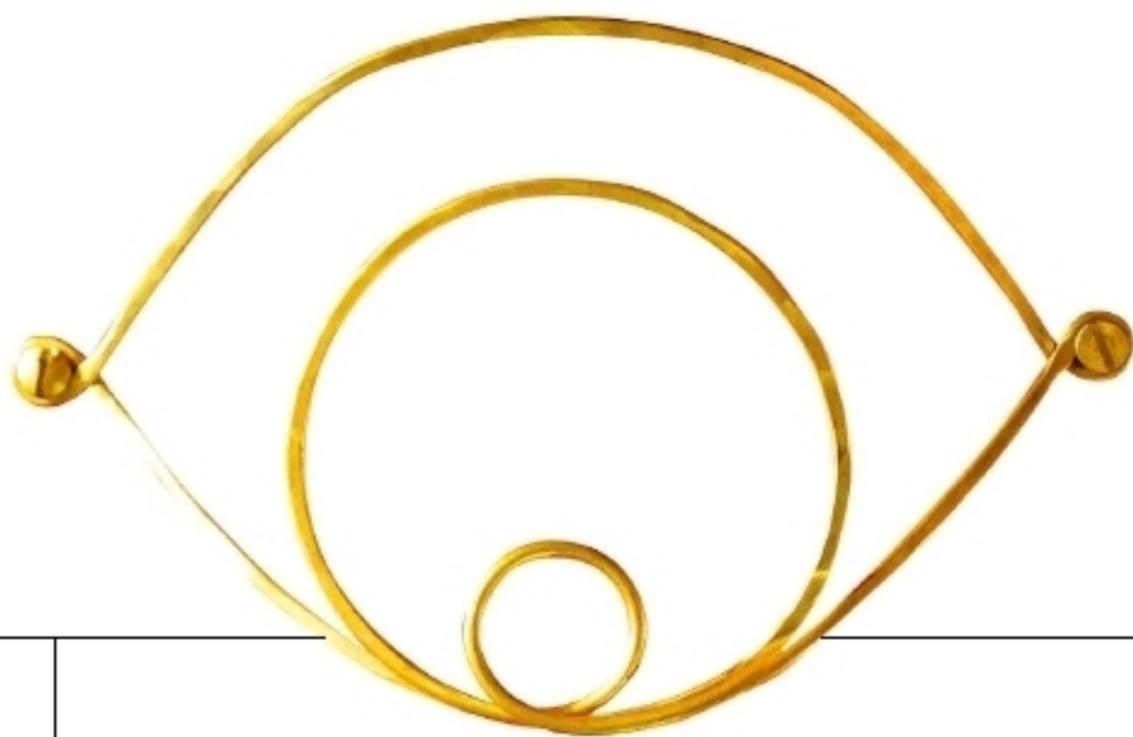


金属质感

采用金属质感皮革制成的宝格丽 Serpenti Forever 翻盖肩包，手袋上以浮雕工艺呈现星辰图案，磨砂质感皮革经过 16 道染色工序形成“nuvolato”云灰效果。

黄铜壁挂

Sentou Edition 品牌的 Silhouettes 系列壁挂，黄铜细线勾勒出一只眼睛或者蜂鸟、巨嘴鸟的精致轮廓，上面可以悬挂钥匙、包袋等物品，也可以用作墙上雕塑。



晚香玉香水

Aerin 品牌的“晚香玉”系列淡香水分分为日用和夜用两款，分别以不同时间采摘的晚香玉为主调，基调中还包括了佛手柑、依兰、檀香木和琥珀等芳香。

不对称耳环

伦敦珠宝设计师特莎·帕卡德 (Tessa Packard) 的“拼图游戏”系列耳环，无论红色石榴石还是镀金吊坠都是采用不对称造型，重点在于突出几何线条之美。



六角形边桌

Hay 品牌的 Slit 边桌如同将折纸转化为一件金属家具，作为底座的平面向下折叠，形成六角形的桌面。



(林良摄影/视觉中国供图)

2004年8月18日，诗人余光中回到故乡泉州永春参加活动

乡愁和家国

余光中何以点燃一代华人？

文 / 曾焱

《乡愁》写于1972年，但直到1974年才收入余光中先生的个人诗集：《白玉苦瓜》。台湾民歌手胡德夫记得，出版没多久，他就读到了这本书和这首诗。那年他24岁，在台北的哥伦比亚咖啡馆驻唱，那是个在文艺圈很受欢迎的场子，胡因梦、张艾嘉和杨弦等人都在那边混。胡德夫出生在台东，土生土长，但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却记得《乡愁》三十几年前是怎样刹那间从他心上拨过：“自己从小11岁（时）就北漂到台北，对那种乡愁的感觉深有体会。再加上小时候我的村庄里有很多老兵，他们在我父亲的农庄里过他们最后的日子。很多老兵非常疼爱我，这些老兵很多后来都成了我的姨丈、姑丈，成为亲戚。所以从小就会听他们讲到故乡，讲到故乡生活的丰美，讲到故乡的人，以后都没有机会见面了。他们都是十六七八岁来的。我看到这首诗就会想到小时候看到他们那个眼神，那种无奈和空洞。我的姐夫在开放探亲的前一年就去世了，有些人更早去世了。他们站在海边往对岸看的样子我从小就看到过。”胡德夫所叙述的场景，对那个年代长大的台湾人来说，不陌生。

樊善标对《乡愁》的记忆，属于更晚一辈，差异就比较大。樊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余光中的研究者。1983年他考入港中文，大二上过余的现代文学课（余在1974年至1985年间任教于港中文），他印象中是本科期间读到了这首诗。香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台湾很不一样。樊善标祖籍广州，但长在香港，父母也在香港生活。他很小的时候，大约“文革”期间，就有机会回老家广州看望祖父祖母和叔叔。“我最牵挂的人其实在香港，所以我就没有乡愁。我觉得跟我背景差不多的人，也不会对《乡愁》这首诗有很强烈的感觉。我的意思是，台湾跟大陆有很强烈的感觉，而且海外的华人也有，但香港不会特别强烈。”

从诗文学角度，樊印象更深刻的是《与永恒拔河》。在他和同伴们眼里，余光中这本诗集和《白玉苦瓜》一样，“技巧成熟，很有法度”。他印象中并没有跟其他朋友讨论过《乡愁》，“因为的确没有很强烈地为这首诗触动”。至于《乡愁》在80年代中期传入大陆后，会那么轰动，形成那么深久的流行现象，“我完全没有想到”。

《乡愁》在大陆公开出版物上发表，则是1982年。余光中于2017年12月14日去世后，四川老诗人流沙河曾被各路记者追访数日，以致严重失声，沙哑不能言，只好由其夫人来负责向本刊核正他和余光中的交往细节——1982年，正是流沙河在大陆《星星》诗刊上所写一月一篇的专栏，将以纪弦等为代表的12位台湾老诗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给了大陆读者。其中第三位诗人就是余光中。这些文章第二年由重庆出版社结集为《台湾诗人十二家》出版。但此时若说“余光中热”还为时过早。虽然流沙河个人对余的诗十分喜爱，这从他选取的诗歌数量可以看出（12人中，唯有余光中和痖弦被收录了20首作品），但在余光中20首里，流沙河于文章中较多评说的，是另一首《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 / 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 我便坦然睡去，睡整张大陆 / 听两侧，安魂曲起自长江黄河 / 两管永生的音乐，滔滔向东……”

1928年出生的余光中，21岁离开大陆，写这首诗的时候则是1965年，正受聘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英文系担任教职。《当我死时》的“古香古色的国调”，至少从那篇文章看起来，那个时候是比《乡愁》更为吸引流沙河的。而一位大陆重要诗人更为坦率地和我聊起，80年代，他们这代青年开始写诗的时候，所仰慕的台湾诗人并非余光中，而是痖弦和商禽。也许在他们心里，痖弦的《深

渊》等诗所标程的“精神体量”，才足以和大陆诗人食指在1968年沉吟而出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相信未来》对峙。

1983年，还有一件对于两岸文学界来说算得上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当时，两岸关系尚未正式“破冰”——直到四年后的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才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同年10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至此，两岸才打破自1949年以来长达38年的冰封期——而新加坡那次，作为台湾代表的诗人洛夫日后回忆，大陆仅有艾青、萧军和萧乾三位老作家出席，“这可说是两岸作家首次正式在一起开会”。艾青曾是洛夫青年时期的现代诗歌偶像，但洛夫对其作品的印象，一直停驻于1949年，他渡海时携带的那本艾青诗集。两岸几十年隔绝，一方面造成文化人对于彼此作品相当陌生，因为鲜有渠道可以读到。另一方面，大陆当时的大众诗歌土壤经过“文革”，已经和“五四”时期的新诗传统断开日久。有个细节应该被注意到，即在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曾出版过一本《台湾诗选》，书首的“出版说明”中写道：“本书收入台湾省作者的诗作90余首，都是从台湾出版的报刊、书籍中选的。这些作品，有的抒发怀念家乡、盼望亲人团聚、要求祖国统一的强烈情感；有的歌颂劳动，赞美爱情，描绘自然风光，反映人民生活……”但我对其目录检索再三，却没有在这90首诗歌中发现余光中的《当我死去》《乡愁》，较为熟悉的名字，只找到了蒋勋。台湾早在60年代中期即评选出了“台湾十大诗人”，后来流沙河说，他的“台湾十二大诗人”即主要依据于此名单。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本诗集中，和未来我们所熟悉的台湾诗人几乎没有交集。直至1987年，《人民日报》台湾专栏刊登了《乡愁》，虽然只有豆腐块大小，但在两岸关系刚刚破冰的时刻，其影响是超过了诗歌本身的。之后，随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在节目中对这首诗的朗诵，余光中的名字开始在大陆广为传播，“余光中热”逐渐形成，“乡愁”也符号化了。

如果只论诗坛，在两岸诗人重新面对彼此的七八十年代，也正是两岸的诗歌都相当兴盛的时候。大陆以诗人北岛、舒婷等为代表的“朦胧诗派”成为一代青年偶像，台湾诗坛同时段崛起的两脉思潮

是“乡土文学”和“回归传统”。余光中在“回归传统”一派中确为走得很远的代表人物，《乡愁》是他这一阶段的创作里面，流行度极高的作品。余光中的乡愁，并非他一个人的乡愁，而是台湾那一代文化人的乡愁。五六十年代后期，台湾现代诗坛最有影响力的诗社，现代派和蓝星，实际上都是由大陆渡海去台的已经有创作经历的诗人组成，虽然他们在诗文学方面各有主张甚至于辩论中剑拔弩张，但近似的人生际遇，实则让他们未来几十年走了许多相似的心路。同时期的台湾诗人如痖弦、洛夫等人，和余光中一样，终其一生都在追求“现代化的中国诗”，即将中国传统诗学和西方现代主义融会而创生中国现代诗。如果要追溯乡愁母题的由来，部分可说起源于此。整个台湾诗坛在70~80年代，不断有这类乡愁主题的诗作诞生。比如洛夫，1979年诗人第一次到香港，站在落马洲边界，远望相别30年之久的中国内地，他写下了同样广为传诵的《边界望乡》，“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

但是，自80年代以来，为什么这些人里面，却只有余光中以“乡愁诗人”的形象，在大陆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声誉和影响力？我们这组封面文章，即想脱离为名人立传的视角，而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历史资料的梳理，来呈现一个人、一首诗的影响力如何从文学领域向更为复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延伸。或者换种表达，我们希望能够完成对一个特定历史时代和政治环境下的诗人其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多重叙述。

记者王丹阳、艾江涛、刘怡、宋诗婷和鲁伊，将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探寻个体和时代的关系，以及个体何以以诗歌点燃一代华人的乡愁和家国之情：余光中诗歌在70年代背景下台湾的发生和传播，如何抵达大陆，并为大陆文化所接受？各个时期台湾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整个台湾社会心理的根本变化，如何促使余光中那一代文化人由完全西化，转而向华人文化寻求滋养？他们以及他们下一代的“在岛屿写作”，如何形成传承、反对和超越？

诗人洛夫曾将乡愁诗分为大乡愁和小乡愁，小乡愁抒个人心绪，而大乡愁抒的是家国情结——这也就是余光中后来在大陆访问时反复谈到的，华人群体所不能舍弃的，其实是一种“文化乡愁”。在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之下，它可能看起来日益脆弱且令人困惑，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断不了的一根血脉。■

阅读之美

喧嚣时代
给灵魂一个栖息之地



绘画：阿梗

在这里，有杂志有书籍
还有各种美好的趣味

扫码订阅2018年度《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

扫码订阅





（于慧众摄）

纪州庵位于台北同安街107号。过去此一带为余光中、王文兴住所，故亦具有文学价值，吸引无数文人墨客。随着纯文学、尔雅、洪范、远流等出版社的聚集，此处文学气氛日渐浓厚。台北市政府在这里开辟为首个以文学为主题的艺文空间“纪州庵文学森林”

蒲公英的岁月：余光中与那一代乡愁

记者 / 王丹阳

余光中去世后的几天，台湾著名画家、诗人罗青给我发来了一封回邮，他正好把为余老撰写的行状与挽联寄到了高雄，以便印发讣闻。翻开台湾地图，余光中早年落脚的台北和最终归土的高雄赫然点缀在宝岛的南北两端，它们之间的距离多么微不足道，几乎与那道浅浅的海峡等长，但在余光中自喻的“蒲公英的岁月”里，那种飘零感却凌驾于所有地理距离之上。

这位余光中的晚学之辈也已年届七十，我问他到底什么是余老的乡愁，罗青很是激动地给我摘出他最近一篇悼文里的段落，其中一句是：“余光中的乡愁，不是对某时某地某人你的怀念，而是对‘文化地理’的眷恋，对‘历史传承’的牵挂，他笔下的长江黄河、千岩万壑、风流人物，全是‘文化中国’大观园中的殿堂长廊、栋梁石柱、水木庭院的化身。”

厦门街的《乡愁》

1972年，旅美的夏志清写了一篇《余光中：怀国与乡愁的延续》的论文，在香港发表，专门分析了诗坛正当红的余光中：“他所向往的中国并不是台湾，也不是共党统治下的大陆，而是唐诗中洋溢着‘菊香和兰香’的中国。”那年的余光中正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是个典型的“学院派”加“桂冠诗人”的融合体，他以“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自居，除了诗歌和散文，还兼顾翻译和评论。

70年代初的台湾文化界，正是“副刊”的爆发时代，在罗青的记忆里，全球的华人知识分子都在台湾那些副刊上竞相亮相，发表有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文章，宛若一个小型的新文化运动。1971年，他的朋友、文化大学的学生高信疆，他嘴里的那个“愣头青”对他扬言，“我要去《中国时报》做编辑，大干一场”，于是《人间副刊》在他手上诞生了。6年后，《联合报》不屈人后，聘来现代诗巨匠痖弦（王庆麟）创办《联合副刊》。“副刊高、副刊王，每天都在对决，那时打开报纸，首先看副刊。”罗青说。

“文化中国”的概念就在那时逐渐建立起来，余光中身在象牙塔，却笔耕不辍地向塔外扔出他的现代诗评论。1972年是他从美国丹佛城回到台湾的第二年，十多载旅美任教的岁月告一段落，在台北厦门街的日式旧居里，他一边听着后院里幽沉的蛙噪和低沉的狗吠，一边编纂着《大学英语读本》。距离名噪一时的诗《莲的联想》已经有11年，那是他告别现代主义诗歌的生硬堆砌，从“虚无”走向新古典主义的11年。

当时的大陆正值“文革”的巅峰，台湾属于重点监控对象，在消息闭锁、音讯渺茫的台北街巷里，会有那种途经香港，转道而回的眷村老人，从老家包一包泥土，给排着队的老乡们每人分一小撮。有的老人颤颤巍巍中将土抖在地上，于是哭了，那就再补给他一点。就在1972年年头上的一天，余光中在厦门街写下《乡愁》，挥笔就在20分钟间，后来他说，写这首诗的时候，的确是人心惶惶，他“担心再也回不了大陆了”。

邮票、船票、坟墓、海峡，四个颇具乡土风味的意向借助不到100字，概括了一代人的一生。这首诗在余光中的诗作里比较浅显，他不是没有写过乡愁，在他五六十年代的诗作里，它以另外一种造

句出现：“渡我的梦回到大陆 / 在那淡淡的月光下 / 仿佛，我瞥见脸色更淡的老母”（《舟子的悲歌》，1951）；“就这样回到东半球 / 但好不兴奋 / 虽然我们的怀乡病渐有起色”（《多峰驼上》，1961）；“四方城的城门朝四方 / 我的窗却朝北 / 让零落的七星 / 饰我长方形的乡愁”（《四方城》，1961）……

应该说，1950年渡台伊始的余光中，就在他有结构魅力的诗作里滔滔不绝地表达着对故土的思恋，《乡愁》更是以精致的小令式的短小篇幅把乡愁浓缩成88字，阙阙是乡愁。对于那一年刚从大学毕业，欲赴美深造的罗青来说，这首诗并没有给他一种特别大的冲击。他说：“我们早就习惯了上一辈，以及

上图：台北厦门街113巷8号，余光中曾经的住所早已改造成楼房

下图：在纪州庵文学森林举行的社区活动





台湾当代画家、诗人罗青，认为余光中的乡愁的背后是“文化中国”

上上辈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情绪。”如今，他在电话里向我分析到他为止的那三代“外省”文人：“第一代是19世纪90年代左右出生的胡适、叶公超、罗家伦那一代老派知识分子；第二代就是余光中、纪弦、痖弦、周梦蝶这些出生于上世纪一二十年代的，他们是战乱的一代，在青年时期渡台。这两代人的乡愁意识非常浓烈”；第三代也就是他这一代，生于长于台湾，乡愁就比较淡了，成长几乎与台湾的经济腾飞同步，基本没有断裂和脱节。

曾经复杂的心态

70年代初，台湾文坛的繁盛如日中天，但政坛却处于风雨飘摇的当口。1971年8月，美国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并在翌月向联合国提出两项关于中国代表权的提案，10月25日，联合国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驱逐台湾”的提案。在有200万大陆眷属的岛上，舆论一时哗然，蒋介石落泪，疾书告同胞书：“命运操之在己，不惑不摇……必可能快到达彼岸，光复大陆。”但是海峡

对岸的车轮势必脱缰而去，就在联合国投票的翌日，基辛格再度访华，登上长城。

《乡愁》写完的十天后的元月3日的《中国时报》，登着基辛格和一群洋人站在长城下的照片。“而季辛吉（基辛格），新战国策的一个洋策士，竟然大模大样地站在龙背上，而且褻渎的笑着。”那天，余光中以第三人称为视角，写了一篇记叙散文，那种在中美关系复苏下，一个不能回“国”的“局外人”居于孤岛的复杂心情跃然纸上。

余光中在书桌前闷坐半小时，他决定写一封信“慰问长城”，一口气用完两张信笺，落款是“一个中国人”。走到天街小雨的外面，问邮局小姐，应该贴几张邮票？却被反问：“这怎么行？地名都没有。”“这就是地址。”他指指正面的四个大字“万里长城”。“告诉你，不行，连个区号都没有一个，何况根本没这个地名……”

这篇诙谐中带苦涩，苦涩中带酸涩的小文中，余光中表达了自己复杂的情感：“一回头，太太的梳妆镜叫住了他。镜中出现了两个中年人，两个大陆的月色和一个岛上的云在他眼中，霜已经降了下来，在耳边。‘你问大陆知道的’，大陆会认得这个人吗？

20年前告别大陆的，是一个黑发青昧的少年啊！”

此刻的余光中经历了整个60年代以一种“他者”的身份闯荡美国，踏过了28个州。他写过一篇诗，叫作《我之固体化》，那是他初临爱荷华大学，在“国际写作班”上读硕士时写下的。“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但中国的太阳距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60年代的台湾有句口号：“来来来，来台湾；去去去，去美国。”在和美国的蜜月期里，美国市面上充斥着“made in Taiwan”的产品，在出口顺差的主导下，虽然结汇制度规定每人只能携带3000美元离台，但赴美深造着实成了一种气候。

余光中生平第一次见到电视机是在西雅图机场入境时，后来他撰文表示，在中国人行路难的时代，“我竟何幸，作异域的逍遥之游，事实上这场逍遥游并不是想象中那么逍遥”。余光中自认自己是个在国际文坛上的“无脸人”，他错觉自己成了“全部的中国”。这种情形下，香港成了他继台湾地区、美国后的第三站。1974年，他受聘到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成了教中国现代文学的教授。

九广铁路的“脐带”

香港在70年代可谓是一个华文文学交叉碰撞的窗口地带，台湾在50年代后一直处于“动员戡乱时期”，香港与大陆的文学作品进不了台湾，但是台湾的作品却可以被带到香港。香港本身的文学气候是小报小刊的天下，方块割裂的豆腐干文章充斥报端，中文教育一直不振。余光中在香港待了11年，虽然纵观他整个创作生涯，这11年的产量并不算丰厚，但被认为是其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自己也说过，若不是越海西来，《与永恒拔河》这部诗集必然面貌不一样。

在沙田山居，他不但研读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等，体认那些民国散文里的文白流转之妙，更是每天沉浸在古典诗词中。由于教学生涯从外文系转到了中文系，他自认，直接乡愁国难的东西减少了，代之以对历史文化的探索。所以“香港时期”的余光中被评论家认为有一种为中国文化造像的野心。他说自己是“对中国的执着趋于深潜”了。

港中大宿舍楼那火柴盒般层层垒垒的白色小楼出没在山色中，从校门口盘旋步行到他住的第六苑，足有一公里，当大片楼宇被山阶上的脚步遗落而下，

人越来越接近景物稀落的青天，吐露港就跃入眼帘。对他来说，这犹如“文明的末站，诗的起点”。台北来的航空件在空中只要飞一小时，到他的信箱却要一个星期。他的书斋有一个朝北的阳台，而正北的八仙岭背后，山岭绵延，通向大陆，“一抬头就照面苍苍的山色/咫尺大陆的烟云”。

那时，《明报月刊》总编潘耀明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主持着一本叫《海洋文艺》的民间刊物，他第一次读到余光中是一篇叫《噢呵西部》的散文，一篇写落基山脉的文章，却读到这样的结尾：“有一条海船在洛杉矶等我，东方，有一个港在等船。九命猫。三窟兔。五分尸。因为我们不止生活在一个世界，虽然不一定同时。因为有一个幼婴等待认她的父亲，有一个父亲等待他的儿子。因为东方的大蛛网张着，等待一只脱网的蛾，一些街道，一些熟悉的面孔织成的网，正等待你投入，去呼吸一百万人吞吐的尘埃五千年用剩的文化。”

“就是那只蟋蟀”

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一场谈话，使得香港主权移交的序幕正式拉开。

上世纪80年代时的在港台湾人，看待《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与香港本地人也有视角上的差异。后来，香港一些“余学”评论家翻出他当年的一首《鱼市场记》，内中悲切的情绪油然而见。他先是在市场上看见一条砧板上的鱼，见到它赫然身首异处，一半被卖走，却能比附到自己撕心裂肺的离情：“我的心也猛地一抽/感应你无头的绝望/远来的江湖客啊/你再也回不了故乡/已经剖腹又断肠/痛心你的恨事/血淋淋无可隐藏”。此时的余光中，对于大陆的印象比较刻板，政治时局的改变令他内心惶惑。他追寻抽象的“祖国母亲”和“文化中国”的理念未变，但是对于具体的时局，秉持的仍然是作为台湾人拘谨的传统立场。

同一时间的中国成都，一位刚刚年过五旬的诗人回到了四川省文联已经有三年，那就是从“反右”运动开始做了20年锯木匠的流沙河。那时他的《星星》诗刊复出了，他每天看稿选稿，但他实际上已经20多年未碰新诗。社会上还是传颂着艾青、郭沫若等正统派的爱国诗，朦胧派萌芽了流沙河还戏谑过，那“两三新秀诗友”，言必称艾略特，言必引现



(李江树摄/FOTOFEST)

左图：1977年，
诗人流沙河(右)

右图：2008年
10月7日，余
光中在夫人的
陪同下回母校
南京五中(原青
年会中学)与校
友们交流

代派，“又爱用我从未听过的新名词，跳跃、移情、通感、默示”，“我们的诗人都是饭桶吗？”

流沙河在1983年的一本《隔海说诗》里讲过，有个跟风现代派的人跟他讲起台湾诗，他听了反感。他的旧作在香港《天天日报》的副刊上连载，一位叫刘济昆的编辑也来信，劝他读一读台湾诗，顺便给他寄了些在港出版的台湾诗集。那本《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介绍的第一位，就让他蹙眉，那就是台湾现代诗“宗师”纪弦，他也是民国时期在上海活跃过的少数现代派诗人之一“路易士”。流沙河当然不知道这些，当他读到“载着吠月的犬的列车滑过去消失了”，不禁扑哧一笑，“写的是什么哟！”

后来的他就掩卷不看了，只是刘济昆多次从香港来信总是谈到余光中，“他言之谆谆，我听之邈邈，总不相信资本主义罪恶环境能孕育出大手笔”。再翻开那本集子，是从成都至南昌将近52个小时的列车上，邻座婴儿的索奶哭叫、车棚下的广播相声中，他一下子翻到余光中，是一首写于1966年的《当我死时》：“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此刻的流沙河应未及想到，这是一个彼岸诗人当年在密歇根大学做英语系

副教授时，对中国刚开始的“文革”的一种空谷回音。

“其深沉的故国意识抓住了我，使我开始明白彼岛的诗并非都是‘琐碎不足观’。”翌年，流沙河开始在《星星》诗刊上每月开一个专栏，介绍台湾诗人，一年凑足十二家，汇编成《台湾诗人十二家》。这本集子现在看来，其中的评论语境也颇有违和感，他把十二家冠以各种称号，纪弦是“独步的狼”，洛夫是“举螯的蟹”，痖弦是“忧船的鼠”，但是余光中却是“浴火的凤”，他在附录里收录了包括《乡愁》在内的20首诗，超过了多数诗人，可见他对余光中的青睐。

他评价余光中的诗有种古色古香的国调：“他不赞同泯灭自己的传统于欧风美雨，不赞同台湾现代诗之‘横的移植’。”这份评论寄到了余光中手里，流沙河收到了回信，他记得，信中的钢笔字方正不苟，其中说道：“我们的社会背景不同，读者也互异，可是彼此对诗的热忱与对诗艺的追求应该一致。无论中国怎么变，中文怎么变，李杜的价值万古长存。”余光中信上还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应和着余光中的那首《蟋蟀吟》，流沙河隔空写了一首《就是那只蟋蟀》，至今还是一段佳话，也开启了两人的30多年的友谊。



（中新社/视觉中国供图）

就在1983年底，已经在四川大学中文系执教的青年诗人干天全，收到了这本流沙河亲笔签名的《台湾诗人十二家》，当时，这位青年诗人能接触到的西方诗歌也就是海涅、普希金、叶赛宁，其时直承西方现代派的朦胧诗派正在走向衰微，慢慢有了“令人气恼的朦胧”的说法，若是普罗大众，能读到的就是艾青、郭沫若，偶尔有几首何其芳的早年诗。他读到《乡愁》后，这首诗就刻在他脑海里了。

如今已是教授的干天全向我回忆，他当年的确也看到过一些来自洛夫和纪弦的回应，大意就是“流沙河不懂诗”。隔着30多年再回首，他认为这也是意识形态所致的评价语系上的差异问题。

隔岸无妨动心弦

也是80年代初，在厦门海边的厦大校园里，刚

研究生毕业的中文系学生徐学被分配到刚成立的台湾研究所。从白城的海滩东望，30多公里海路之外的金门岛被烟雾笼罩得若有似无，他听了30年的大喇叭广播，天天对阵喊话，这边是“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台湾”，彼端是“一定要反攻大陆”。但是1979年叶剑英的《告台湾同胞书》，实在是两岸关系史上的一阵春雷，也促成了中国第一个对台研究机构的成立。

徐学的第一个研究对象就是余光中，现在他已是厦大台湾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教授。他并不是十分推崇《乡愁》，往后余光中频繁来大陆，徐学总是和他朝夕相处，也邀请身边的文学圈朋友参加。“有的朋友就想到了《乡愁》，说那只是统战的工具，我再把余光中别的诗寄给他们，他们一看才说的确厉害。我常说，你如果只读《乡愁》，就等于读李白只读‘床前明月光’。”

台湾是在1987年7月取消戒严的，三个月后，国民党通过开放探亲决议，登记回大陆探亲犹如洪潮。1988年2月底，在台湾红十字会登记的探亲人数已经超过10万，每天平均800人前去排队，到10月，已有20万人从中国香港、菲律宾、泰国、新加坡和日本涌向大陆。余光中住在中山大学的学生宿舍，南部的风光多了木棉和鹧鸪，他住的四层红砖小楼，阳台外可见“桅樯密举”的高雄港，是一派明丽的漆彩。流沙河的信到了，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探亲。

真到了那一刻，他的心态是复杂的，从他作答的一首诗里可见一斑：“乡情怯怯，只怕一下子 / 五千年和十万万 / 从东山半岛到天山 / 甸甸都压上肩来 / 承受得起吗 / ……只怕是 / 找得回蒲扇也找不回萤火 / 找得回老桂也找不回清芬”。直到1992年，他回到了大陆，第一站给了北京，在68岁时首次登上长城。从这一年开始，余光中觉得自己的创作就进入了中国游阶段，就像古人天涯题遍影墙字，他也是每到一处都游兴盎然，要留下墨迹。

余光中曾说，旅行也好，定居也好，这个地区你还没有写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就不是你的。就像三峡属于杜甫，黄河属于李白一样，所以写作对他来说像是把那些地理乡愁收入彀中，“就像打喷嚏，却凭空喷出了彩霞；又像是咳嗽，不得不咳，索性咳成了音乐”。有人评论他驱遣文字犹如开车，刚猛迅速中带着风度翩翩。

大陆的“余光中热”：“《乡愁》遮住了我”

一生留下千来首诗的余光中，并不乐意大陆读者言及他必称《乡愁》，他曾经这样对媒体说：“《乡愁》就像我的名片，这张名片大到把我的脸遮住了。”他觉得在大陆，他几乎和《乡愁》画上了等号。潘耀明曾说，他的诗里乡愁无处不在，那是指《乡愁》之外的乡愁，正如很多“余学”研究者所寓意的“乡愁的第二层境界”，那就是文化乡愁。余光中有一个喜好，那就是画地图，他收藏了一幅1948年带去台湾的残破的地图，“就像凝视亡母的旧照片一样”，后来打开老地图，发现当年四川一条客运铁路都没有，只有运煤的轨道。地图和经典是他的乡愁诗的两条脐带，缺一不可。他说，这几年他不写乡愁了，写还乡。

但是“余光中热”从90年代后逐步达至顶峰。到了2000年以后，余光中和一些港台学者来到西安，

被一位随行记者用万字记录下来他受欢迎的程度：“出机场后，金圣华感到非常吃惊，闪光灯对着余光中照个不停，‘我想着，只有那位来自星星的都教授才会有这样的待遇’。”

2000年时，余光中首度回到出生的地方南京，从文字里看，那种疏离是深刻的：“胡教授左顾右盼，为我指点街景与名胜，不断问我以前是什么样子。他问的我大半答不出来，一切都在真幻之间，似曾相识，可惊又可疑。”绕过雨花台、跨过秦淮河，身为南京之子，处处相顾两茫然，当玄武湖“回过脸来”，刹那惊艳，“有如童年跟我捉了半世纪的迷藏，遍寻不见，忽然无中生有，跳出来猛跟我打个照面。一惊，一喜，一叹，我真的是回来了”。

在高雄的西子湾畔，余光中度过了生命最后的32年。“高楼对海，长窗向西”，穿过一个寿山的隧道，20分钟就到了市中心。他喜欢开车，在中山大学里有他的车库，80多岁了还独自开车上下课。据说，2016年中山大学的校长郑英耀投其所好，赠送了《速度与激情7》里的Lykan Hypersport模型车，余光中非常喜欢。有一位友人开保时捷911家族的经典款Carrera跑车接他兜风，他兴奋地回忆起在德国高速路上飙车，速度开到160迈。

余光中后期的作品里，屡次出现过速度与高速公路。台湾在80年代中期进入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的环境污染和社会病开始涌现，正如他描述的“日渐浇薄的社会和迅趋憔悴的自然”。这时，他的一支劲笔犹如蜜蜂的蜚刺，不断在各种现代的物象之上回转停留，但是他总能思接八荒、贯通古今，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古典主义的磁场。罗青说，总的来说他糅合了现代派、浪漫派和古典派，纵观余光中一生的创作，这也是他风格演进上的脉络，当现代文明的洪水猛兽真正卷向台湾社会，他能够在其中出入自如，很快地找到苏辛李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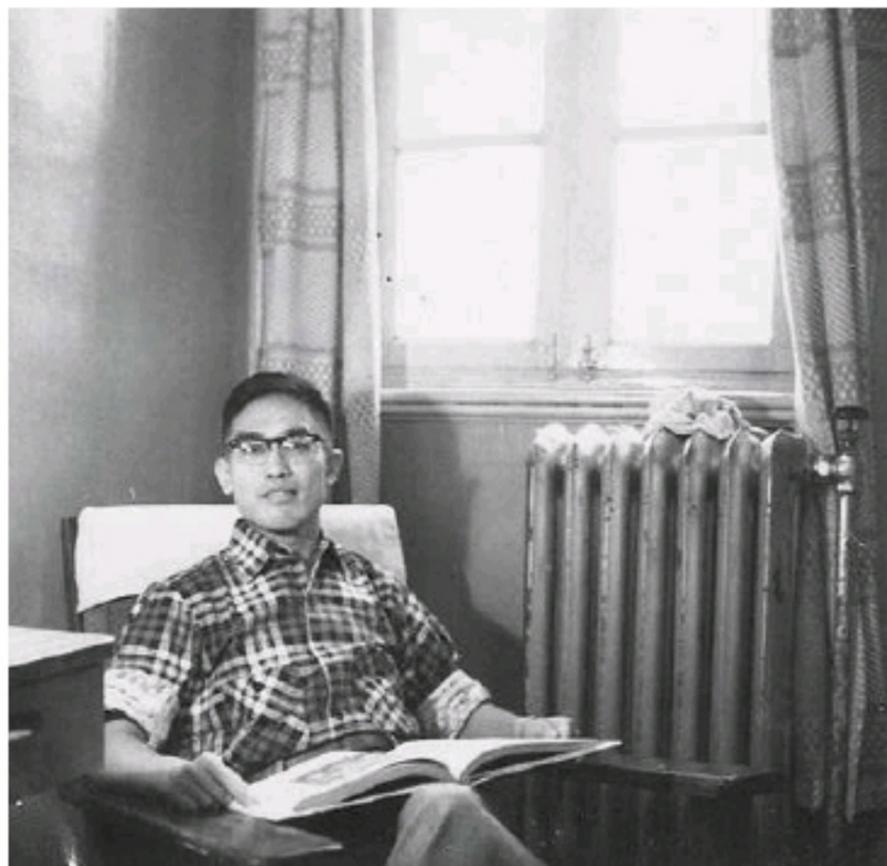
余光中说过，流亡、迁徙、移民或者长期旅行和侨居，都不能说是本国文化的流失，而是本国文化的扩大、延伸。他的乡愁和他对地理文化的热衷是相辅相成的，而最终使他立足于学术圈的，是“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曹雪芹所刺绣的中文”。■

（本刊记者傅婷婷对本文亦有贡献。参考文献：《余光中全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浴火的凤凰，恒在的缪斯》，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望乡的牧神：余光中传》，团结出版社，2001年）



(新华社 摄, PHOTOE 供图)

1987年，浙江舟山。72岁的台湾退伍老兵回到故乡



左图：1958~1959年余光中曾在爱荷华大学进修一年，图为其在爱荷华大学宿舍



右图：1951年，到台湾不久的余光中与父母合影

“乡愁”之前：“西潮”与“后土”之间

记者 艾江涛

“当时台湾大部分诗人都在盲目西化，写作超现实等别人难以看懂的诗歌。可余光中回归中国的抒情传统，当时台湾还在联合国有席次，有文化中国的底蕴在，所以余光中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只能说风靡一时。镜头全部照在他身上，大概就是在《莲的联想》之后。”

“后土”难离

1949年春，为了躲避内战的战火，金陵大学外文系大二学生余光中，不得不转学到厦门大学。几个月后，他跟随家庭辗转香港避难。这样的逃难经历甚至路线，对21岁的余光中来说，并不陌生。1937年底，南京陷落日寇之前，余光中便跟随母亲逃回常州外婆家，随后一路迂回到上海法租界，在那里渡过一段寄人篱下的日子后，在1939年夏天经香港、越南，历经艰辛，才到重庆与父亲团聚。

不同于还能在厦门大学插班就读，香港一年是在无学可上的苦闷中渡过的。1962年，刚刚在台湾

获得年度“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的余光中，应《自由青年》杂志之邀撰文自述写诗经过，回忆起那段日子：“面临空前的大动乱，生活在港币悲哀的音乐里，我无诗。我常去红色书店里翻阅大陆出版的小册子，我觉得那些作品固然热闹，但离艺术的世界太远了。我失望，我幻灭。我知道自己必须在台湾海峡两岸，作一抉择。而最苦恼的是，我缺乏一位真正热爱文学的朋友。有一位朋友劝我回大陆，不久她自己真这样做了。我没有去。最后我踏上基隆的海船。那是1950年的夏天，舟山撤退的前夕。”

隔着十多年的时光，当初的赴台成了更多出于艺术考虑的某种抉择。只是，余光中没有想到1949年夏天于甲板上回望的那片大陆，从此犹在梦中，一别就是近半个世纪。而在梦的彼端，则是二十多年在华山夏水中度过的日子与点滴记忆。写诗，用余光中日后的话来说，如同叫魂与祷告。

但在20多岁离开大陆，而不是更年轻，对他来说则是一种幸运。2002年，74岁的诗翁余光中，在为即将在大陆出版的九卷本余光中集序言中写道：“因为那时我如果更年轻，甚至只有十三四岁，则我

对后土的感受就不够深，对华夏文化的孺慕也不够厚，来日的欧风美雨，尤其是美雨，势必无力承受。”显然，这块被他称为“后土”的大陆，已为日后的诗人打下最初的积淀。

在国民政府侨委会任职的父亲余超英，本身具有相当古文水平，一有机会便为余光中阅读讲解《东莱博议》《古文观止》中的道德文章。1939年，余光中在四川江北悦来场的南京青年会中学就读，曾做过小学校长的远房舅舅孙有孚也逃难到附近，并带来大量藏书，这些线装本古籍很自然地为他打开古典文学的大门。初三之后，国文老师换了一位前清拔贡戴伯琼，在他的指点下，余光中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从而打下扎实的古文基础。而早在上海法租界时，余光中便有幸接触到英文，在中学他又遇到出身金陵大学的英文老师孙良骥，高一便崭露头角，一举夺得英文作文第一名，中文作文第二名，英语演讲第三名。

1945年8月，抗战结束后，余光中随父母回到出生地南京。1947年，余光中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其时内战的硝烟已经蔓延北方，在母亲的劝阻下，他最终选择了金陵大学外文系。

刚读大学时，尽管班上已有几位同学在热烈地写着新诗，但余光中颇看不惯他们那种诗意淡漠的分行散文，他最初的兴趣还在五七言古诗之中。后来接触到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诗集《凤凰》还有新月派诗人臧克家的诗集《烙印》，又在一本批评文集《诗的艺术》中读到卞之琳和冯至的诗歌，再加上对英国浪漫诗人及惠特曼的原文阅读，余光中开始写作新诗了。多少有些幸运的是，在厦门大学的短短数月内，他竟在当地报纸副刊接连发表了六七首诗作。

这种幸运一度延续到渡海之后的台大时期。一次，同班同学蔡绍班擅自将余光中写作的一叠诗稿拿给梁实秋看，没想到余光中不久便收到梁的一封鼓励有加的回信，后者自此也成为他在文学上最重要的引路人。1952年，即将毕业的余光中出版首部诗集《舟子的悲歌》，不出意外，梁实秋不但为他写了序言，还亲自撰写书评称“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尽管处女诗集没有带来幻想中的轰动，但已足以使余光中成为声名鹊起的年轻诗人。据台湾诗歌史研究者刘正伟讲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空气紧张、文化寥落的台湾，能够出诗集的人很少，某种程度上，也正因此，比他年长十几岁、有台湾现代“诗坛三老”之称的覃子豪、钟鼎文（另外一位为纪弦）后来才会亲自找上门来，拉他共组蓝星诗社。

“诗是必然，诗社却是偶然”

台湾现代诗歌运动滥觞于《自立晚报》的《新诗周刊》。1951年11月5日，《自立晚报》总主笔钟鼎文创立《新诗周刊》版面，并与纪弦、葛贤宁、覃子豪、李莎等人轮流主编，为战后台湾新诗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发表园地。之后，由于与同仁诗歌观念不同，纪弦脱离《新诗周刊》，独自分别于1952年8月创刊《诗志》、1953年2月创办《现代诗》。不同于之后成立的蓝星诗社，现代诗社是“先有刊，后有社”，纪弦持续在刊物上主张“新诗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提倡主知路线排斥抒情的诗歌，并很快拉了115人的盟友加入，一时之间声势极为浩大。

而这显然让覃子豪、钟鼎文这些主张抒情传统的人感到紧张。于是，1954年3月，覃子豪、钟鼎文两位诗坛前辈专门跑到余光中位于台北厦门街的家中看他，表示想另组诗社与纪弦抗衡。不久，在一个初春的晚上，在诗人夏菁家中的餐桌上，蓝星诗社成立，最初的成员包括覃子豪、钟鼎文、邓禹平、余光中、夏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在1986年出版的蓝星诗人诗选《星空无限蓝》的序言中，被余光中总结为“诗是必然，诗社却是偶然”。

余光中去世后，与他同岁的蓝星诗社后期重要成员向明不禁陷入不知所措的失落之中。目睹蓝星诗人渐次凋落，他依然清楚记得诗社成立时的情形：“因当时也是从大陆来台的诗人纪弦先生正成立现代派，要将在西方流行的现代派诗作横的移植到中国来，并且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导向，这对诗的认识有所本的蓝星诗人言，一直是以秉承诗以抒情传统为己任，承袭固有的抒情风格写诗，非常不以为然，是以蓝星的这时结社有点像是对纪弦现代派的一个反动。然蓝星诸君子对英美诗及法国象征诗亦各早有涉猎，认识其优劣取舍所在，故并不排除吸收西方诗所具有的现代营养，故后来亦有将蓝星以‘温和的现代主义’相称。”

用刘正伟的说来说，台湾现代诗歌的三个球根，分别是大陆跑到台湾来的新月派、现代派，以及在1920～1930年代日据时期受日本影响而起的本土现代主义。蓝星诗社、现代社与创世纪社、笠诗社，便是这三个球根上生长出来的产物。不过，1954年10月在高雄左营成立的以军旅诗人张默、洛夫、痖弦为代表的创世纪诗社，起初以“新民族诗型”对抗现代社，后来因服膺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而走向更为激进的现代诗歌路向，引发现代诗内部论战，甚至令纪



蓝星诗社后期重要诗人向明，曾任《蓝星诗刊》主编

弦一度要宣布取消现代诗的概念，则是后话了。

与其他诗社不同，蓝星诗社的组织异常宽松自由。这种沙龙式的同人聚合，正如余光中在1973年所写的回忆文章《第十七个诞辰》中所说：“一开始，我们似乎就有一个默契，那就是，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

蓝星最初的阵地，是由当时在粮食局任职的覃子豪在《公论报》副刊商借而来的一个约三批宽的版面，所创刊的《蓝星诗周刊》。1950年代初，台湾教育非常不普及，当时为了满足求知若渴的军中青年，中华文艺、军中文艺、中国文坛等函授学校应运而生。

“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电视，主要通过通信与杂志学习，老师把讲义寄给学生，学生再把作业寄给老师批改。距离近的一些熟悉的人一起到台北聚聚。这些学员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军中青年，当时主要有国文识字班、小说班、散文班、诗歌班这样四个班。”刘正伟说。

蓝星诗社前期的核心人物覃子豪便长期担任这些函授班的老师，向明、痖弦等人正是在覃子豪的班上被培养挖掘而出。由于办函授班，办杂志，为

学员提供发表园地，帮助诗人出版诗集，蓝星诗社的影响很快得以扩张。

蓝色星空下的变奏

诗社成立后，大家经常在台北市万国戏院的咖啡室或中山堂的露天茶座聚会谈诗。那种相与激励的诗歌氛围，在余光中的记忆中，天真可爱，也许幼稚但并不空虚，一度他甚至觉得那就是一个小的盛唐。另一方面，梁实秋对台湾诗坛的肯定与奖掖，也让他志得意满：“梁实秋先生说目前台湾的新诗要比中国以往的新诗进步得多，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情！数十年内，中国将会涌现一群伟大的诗人，其盛况将可比美盛唐，其光辉将可照耀千古！让我们为他们开路！”

不过，对余光中个人来说，在诗社成立的最初两年里，他仍然深受新月派格律诗的影响，写下大量诸如“我向高空射枝箭，/ 飕飕落在云后边。/ 当时天阴风雨紧，/ 云深箭渺看不见”那样不古不今的“豆腐干体”。走出新月派的余绪，迈入更为现代的写作实践，始于1956年。

这一年，余光中翻译完了《梵高传》，同时着力

美国诗人艾米丽·迪金森诗歌的翻译，还与表妹范我存结婚，在综合的灵感刺激下，余光中宣称自己诗的现代开始了。另一间接的因素还来自当时诗坛的论战，余光中回忆道：“先是联合报上有人写一连串批评的文章，我也是受攻击的目标之一。尽管其人骂得并不很对，却使我警惕了起来。然后是五六、五七年的现代化运动的全盛期，许多优秀的新人陆续出现。现在我仍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个接一个认识了夏菁、吴望尧、黄用，以及他们周末在我厦门街的寓所谈诗（或者争吵）的情形。我一面编‘蓝星周刊’与‘文学’‘文星’的诗，一面投入这现代化的主流，其结果是《钟乳石》中那些过渡时期的作品……”

1958年，30岁的年轻教师余光中，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进修一年，在那里选修了现代艺术课程。在1956～1960年，这一后来被研究者所划分的“现代化时期”，除了《钟乳石》，余光中还写作了诗集《万圣节》。即使是这一时期的诗作，大概也只能称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现代诗”，即富有现代精神的作品，而非狭义上合乎现代主义理论的现代诗，与洛夫等人不同，余光中从未服膺于某种主义或流派，始终游走在传统与现代、主知与抒情之间。所谓改变，以他自己所举的例子便能看出端倪，由于在新大陆受到现代画趋于抽象的启示，他渐渐在写作中扬弃装饰性与模仿自然，追求一种高度简化后的朴素风格，比如“常想沿离心力的切线 / 跃除星球的死狱，向无穷蓝 / 作一个跳水之姿”，是抽象化的“无穷蓝”，而非“无边的蓝空”。

很快，苏雪林、言曦等人发起对现代诗的攻击，批评当时的台湾新诗，不过是象征派的余绪，以艰涩掩盖空虚。余光中在内的许多诗人纷纷起来撰文保护现代诗。这次论战的结果，虽然巩固了现代诗的国防，却也再次显出现代诗内部的分化。1961年余光中在《现代文学》第8期发表长诗《天狼星》，洛夫随后发表长文《天狼星论》，批评其从主题到意象，不符合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原则，注定要失败。在反批评文章《再见，虚无》中，余光中认为台湾多数现代诗已冲入晦涩与虚无的死巷，宣布自己要告别虚无。

从此，余光中更多从对传统的认识与挖掘入手，进入所谓“新古典主义”写作时期，代表作正是从《莲的联想》到《白玉苦瓜》的一系列诗集。这种转折，与他后来1964～1966年、1969～1971年的两次赴美教学也不无关系，在异国他乡，萦绕心头的儿时记忆与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自然地浮现出来，汇聚成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当时台湾大部分诗人都在盲目西化，写作超现实等别人难以看懂的诗歌。可余光中回归中国的抒情传统，当时台湾还在联合国有席次，有文化中国的底蕴在，所以余光中提出新古典主义的诗歌，只能说风靡一时。镜头全部照在他身上，大概就是在《莲的联想》之后。”

尽管如刘正伟所说，新古典主义诗歌令余光中风靡一时，但这依然不足以概括诗风多变的他。1986年元旦，余光中在第8本诗集《敲打乐》新版序言中写道：“不错，我曾经提倡过所谓新古典主义，以为回归传统的一个途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新古典主义是唯一的途径，更不能说我目前仍在追求这种诗风。”

事实上，1971年从美国回来后，震撼于当时在美国风起云涌的摇滚乐，余光中格外注重探索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随后在台湾兴起的民歌运动中，余光中的许多诗歌被改编成音乐，他还直接写了合曲而作的诗歌。1967年在台湾苗栗出生的刘正伟回忆，少年时代的自己，正是一边听着杨弦等人谱曲的《乡愁四韵》、《在雨中》等歌，一边在课堂上读着余光中的诗。

不愿被提及的论战

余光中曾把1959年到1963年称为自己的“论战时期”，那也是围绕现代诗论争的国防时期。年轻时喜欢论战的余光中，中年之后便无心恋战，原因正如他后来所说：“年轻的时候我多次卷入论战，后来发现真理未必愈辩愈明，元气确实愈辩愈伤，真正的胜利在写出好的作品，而不在喋喋不休。与其巩固国防，不如增加生产。”

然而，围绕现代诗的论战并未结束，余光中在1970年代现代诗论战和其后的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似乎也并没有随着他晚年的自陈而被忘却。其时的台湾，历经保钓运动、国际孤立，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意识形态陷入困境，台湾内部陷入苦闷“与彷徨之中。伴随着对台湾自我身份的追问，在一些人看来，1960年代以虚无主义、反工业文明、反立法体制、存在主义达到对戒严体制反抗的现代文学（诗），也便有了再检讨的必要。1972、1973年，曾参加过北美保钓运动的文学评论家唐文标接连发表《先检讨我们自己吧！》、《什么时代什么地方什么人》、《诗的没落》等文章，对现代主义诗歌提出批评。对这一震动文坛的事件，余光中显然没有沉默，在《诗人何罪》一文中，他将论争对方视为“仇视文化，畏惧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一切独夫和暴君”的同类。

不久，台湾发生日后影响深远的乡土文学论战。继《“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将批评矛头指向乡土文学代表作家和理论家王拓、陈映真、尉天骢等人，还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的余光中，在1977年8月20日《联合报》发表《狼来了》一文，影射台湾乡土文学是大陆的“工农兵文艺”。由于文章中提到的“狼”和“抓头”的动作，显得寒气逼人，以至于陈映真多年后都难以释怀，认为这对当时的乡土文学界是一个政治上取人性命的、狰狞的诬陷。事实上，新儒家代表徐复观在不久后发表的文章中表示过类似的忧虑：“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国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所幸的是，在胡秋原、徐复观还有郑学稼等国民党营垒中开明人士陆续出面说话后，对乡土文学作家迫害的恐怖阴影逐渐散去。

如果说《狼来了》与余光中反共的政治立场有关，那么后来所披露的余光中向军方“私下告密”的行为，则更让他陷入了争议的漩涡。2000年，陈映真在与陈芳明的论战中，提及后者在《死灭的以及从未诞生的》一文中公布的余光中在70年代后期给他写的一封密信片段：“隔于苦闷与纳闷的深处之际，我收到余光中寄自香港的一封长信，并附寄了几份影印文件。其中有一份陈映真的文章，也有一份马克思文字的英译。余光中特别以红笔加上眉批，并用中英对照的考据方法，指出陈映真引述马克思之处……”陈映真在文章中表示，自己多年以前已由郑学稼亲口告知，这份材料被直接寄给了其时权倾一时、人人闻之色变的王昇将军，而在那个阴森的年代，这是足以置他于死地的一封信。

2004年，九卷本《余光中集》在大陆刚刚出版，余光中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一时间备受瞩目。面对当时的“余光中热”，北京学者赵稀方发表长文《视线之外的余光中》，详尽披露余光中在乡土文学论战中的表现，感叹大陆对台湾历史的无知，并对余光中的人品提出质疑。

这篇文章的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相关论争文章也很快以专辑“余光中风波在大陆”刊载于同年秋天出版的台湾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爪痕与文学》中。在这些文章中，有对赵稀方表示佩服并提出“余光中热”难以接受的台湾学者吕正惠，也有陈漱渝、陈子善等以持中的观点认为追问并非求全，这样的批评也是对研究者不够了解台湾文学史的提醒。台湾佛光大学教授黄维樑则写了长文《抑扬余光中》，为其辩护，

核心观点在于《狼来了》中虽有意气的话，但余光中反对的是工农兵文艺，并非乡土文学；关于“告密”一事，余光中曾亲口对他说：绝无此事。王昇最近也亲自以书面声明：绝无“告密”一事。

在舆论的发酵下，余光中事实上已不得不正面回应，这就是后来公开发表的《向历史自首？——溲夏答客四问》。在这篇文章中，余光中坦承《狼来了》是一篇坏文章，缘于自己初到香港大受左派攻击之后，情绪失控之下的意气之作，并非受任何政党所指使。而对于“告密”一事，余光中表示自己绝未“直接寄材料向王昇告密”，只是将这份来自友人的材料作为朋友通信，从香港寄给了彭歌，自己还在信中说明“问题要以争论而不以政治手段解决。”

事实上，余光中在写作此文前，曾通过自己的学生钟玲，与陈映真取得联络，并在私人通信中对陈映真一再表示道歉。只是这份公开答复并未让陈映真真正谅解，他认为将材料交给彭歌的性质与直接告密并无多大区分，而私人通信中那些道歉的好话的消失以及标题中的问号，都让他感到寂寞、怅然和惋惜。

其时，论战已然过去几十年，两岸文化政治语境截然不同，令陈映真与余光中两个“统派”共同感到怅惘的，自然是在台湾日益崛起的台独话语。学者古远清对两人都比较熟悉。古远清回忆道，2005年8月，他在长春开会期间遇到陈映真，谈及这段公案时还劝他“你和余光中的恩怨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要记得那么清楚，宜粗不宜细，你们两个都主张统一，当然一个左统，一个右统，应该团结起来。”陈映真当时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2009年，古远清在《传记文学》发表《余光中的“历史问题”》，讲述当年这段公案，并在之后出版的余光中传记中将这篇文章列为专章。传记出版后，古远清第一时间将其寄给余光中，据说他看后很不高兴。古远清说，由于此事，之前与他多有交往的余光中，再没有见他。

无疑，对向来以美为追求的诗人余光中来说，对此多少有些讳莫如深。余光中曾说自己从不写日记，也不写自传，因为作品就是最深刻的日记，而“我的艺术思想、人文价值，都在我的评论之中。我的情操与感慨，都在我的诗文散文里，我在母语与外语、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出入顾盼，左右逢源，不但可见于我所有的作品里，也可见于我所有翻译的字里行间。”

（本文写作参考《余光中传：茱萸的孩子》，傅孟丽著；《余光中诗书人生》，古远清著；《爪痕与文学》，台湾人间出版社等书）

台湾现代诗派三大诗社及其代表人物

文 / 张从志



纪弦



1962年3月30日，与蓝星诗社同仁宴请菲律宾文艺访问团，摄于台北中国观光饭店。前排左起：覃子豪、蓉子、范我存；后排左起：周罗蝶、罗门、余光中、向明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催生了风行一时的现代派文学。在这个遥望大陆的孤岛上，社会笼罩在压抑、挫败甚至绝望的气氛中，仿佛罹患上一种难以治愈的精神创伤，这种情绪投射到文学作品中，与战后西方世界的现代文艺思潮遥相呼应，为台湾文坛的现代主义实验提供了土壤。而在敏感的诗人笔下，台湾现代诗歌在逆境中走向繁荣，成为那个时代台湾文学中一颗璀璨的明星。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诗坛相继成立了三个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社——现代诗社、蓝星诗社和创世纪诗社，这三大诗社聚集了大批诗人，通过创办诗刊、举行诗歌活动等方式，在而后的数十年间牢牢占据着台湾现代诗的话语权，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为日后台湾诗歌的全面绽放奠定了基础。

围绕现代诗的内容和形式，三大诗社有各自不

同的主张，在不同发展阶段亦有不同的追求，加之每个诗人的风格、志趣各异，因此，诗社之间常常爆发各种规模的论战，此类大小论战也在上世纪后半叶成了台湾文坛活力的明证，同时注解出台湾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的成长脉络。

尽管存在分歧，但在某些时期，以三大诗社为代表的台湾现代诗歌创作仍然表现出了共同的特征，比如强烈的“表现自我”，反理性的、潜意识的抒写，追求繁复驳杂的意象，求新求变的艺术追求等等，从诗人们的诗篇中也可挖掘出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印迹。

现代诗社

1953年2月，纪弦率先创办了现代诗季刊社，并发行《现代诗》诗刊。1956年1月15日，纪弦、叶泥、郑愁予、罗行、杨允达、林泠、季红、林亨泰

等九人于台北市民众团体活动中心举行“现代派诗人第一届年会”，宣告“现代派”与现代诗社正式成立。

诗社的主张是纪弦提出的“现代派六大信条”，即“现代派”是“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的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明确提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认为新诗是“诗的新大陆之探索，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把“诗的知性”“诗的纯粹性”“拥护自由和民主”作为追求目标。

上述主张一经提出便遭到猛烈抨击，被批为全盘西化，试图割断中国的文学传统。不过，从现代诗社出版的《现代诗》杂志上可以看出，纪弦等人并没有严格遵守这一信条，而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容纳了不同风格与形式的诗作，这对推动现代诗歌的创新和新人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代表诗人：纪弦、郑愁予

纪弦（1913～2013），原名路易士，祖籍陕西，1913年出生于河北省清苑县。1929年开始发表诗作，1933年毕业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自编《易士诗集》。1936年东渡日本，回国后与戴望舒等创办《新诗》月刊。抗日战争爆发后流转于汉口、长沙、昆明、香港等地，曾任“国际通讯社”日文翻译，主编《诗领土》。抗战胜利后始用纪弦笔名写稿。1948年赴台，在台北市成功中学任教25年后退休。1953年创办并主编《现代诗》季刊，1956年组建现代诗社。1976年移居美国，直至2013年在加州家中逝世。

纪弦是台湾诗坛的三位元老之一（另两位为覃子豪与钟鼎文），在台湾诗坛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不仅创作极丰，而且在理论上亦有建树。他是现代派诗歌的倡导者，他主张写“主知”的诗，强调“横的移植”，诗风明快，善嘲讽，乐戏谑，且注重创新，令后学者竞相仿效，成为台湾诗坛的一面旗帜。

郑愁予，原名郑文韬，祖籍河北宁河，1933年生于山东济南。童年时期，郑愁予随军人父亲走遍大江南北，抗战期间跟母亲转徙于内地，避难途中在母亲教导下开始细读古诗词。

1949年，随父至台湾。毕业于新竹中学。1956年参与创立现代派诗社。1958年毕业于台湾中兴大学。1968年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1990至1992年任台湾《联合文学》总编辑。

郑愁予诗作以优美、潇洒、富有抒情韵味著称，

意象多变，温柔华美，自成风格。他的《错误》《水手刀》《小小的岛》《如雾起时》等诗使人陶醉，常被称为“浪子诗人”。

蓝星诗社

1954年3月，蓝星诗社创立，发起人是覃子豪、余光中、夏菁、钟鼎文、邓禹平等。同年，借《公论报》版面开辟《蓝星周刊》，每周刊出一次，由覃子豪主编，161期后交由余光中接棒，直至1958年8月停刊。

1957到1960年，先后创办《蓝星诗选》（1957）、《蓝星诗页》（1958）、《蓝星季刊》（1960），由覃子豪、余光中、夏菁、罗门、向明等诗社成员轮流主编，但这些刊物起伏不定，在断断续续的停刊与复刊之间延续了数十年。80年代以后，《蓝星诗刊》和《蓝星诗学》继承了诗社办刊事业。

蓝星诗社在三大诗社中最具活力和向心力，但它自始至终未有固定理论和绝对信条，其组织亦十分松散，成员来去自如，更像一个具有沙龙精神的同盟，它对现代诗的追求更多地体现在其所刊载的诗作之上。在《第十七个诞辰》一文中，余光中曾回顾蓝星诗社的创社目的：“我们要组织的，本质上便是一个不讲组织的诗社。基于这个认识，我们也就从未推选什么社长，更未通过什么大纲，宣扬什么主义。大致上，我们的结合是针对纪弦的一个‘反动’。纪弦要移植西方的现代诗到中国的土壤上来，我们非常反对。我们虽不以直承中国诗的传统为己任，可是也不愿贸然作所谓‘横的移植’。纪弦要打倒抒情，而以主知为创作的原则，我们的作风则倾向抒情。”

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蓝星”变动虽繁，但一直保持了民族抒情的风格，展现出现代主义温和的一面，对相对激进的“现代派”和后来的“创世纪”起了制衡作用，对台湾现代诗在“民族”与“现代”的融合中发展也有积极贡献。

代表诗人：覃子豪、罗门、向明

覃子豪（1912～1963），四川省广汉人，与纪弦同属从大陆去台湾的老一代诗人。1932年就读于中法大学，1935年东渡日本进入东京中央大学，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接触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马拉美的作品，受象征主义影响，开始创作现代诗，30年代回国，组织文海诗社。

到台湾后与纪弦、钟鼎文、葛贤宁等人，借《自立晚报》的版面创办《新诗周刊》。后纪弦创立《现代诗》季刊，成立“现代派”，遂与钟鼎文、余光中、邓禹平、夏菁等人发起创立“蓝星诗社”。

覃子豪主张诗应蕴蓄人生的意义，并能与读者作心灵的共鸣，重视实质的表现及表现的完美，寻求诗的思想根源，在准确中求新的表现，而以自我创造的完成作为风格的表现。他早期的诗作走抒情路线，移居台湾后则转向现代主义风格。诗作主要有《海洋诗抄》《向日葵》《画廊》等诗集，另有《诗的解剖》《论现代诗》等诗论集。

罗门（1928～2017），原名韩仁存，1928年生，海南省文昌人。1948年进入杭州笕桥空军飞行官校，次年，随学校前往台湾。1954年，处女诗作《加力布露斯》在《现代诗》上发表。1955年，罗门加入创立不久的蓝星诗社。

罗门的诗专注人的心灵探索，强调诗人创造的是异于第一、二自然的“第三自然”，并惯于采取心灵的广角镜，探索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洞察诸如人性、战争、死亡、都市文明等人类生存的层面。主要诗集有《第九日的底流》《死亡之塔》《隐形的椅子》《旷野》等，诗论集《心灵访问记》《时空的回声》等。

向明，原名董平，1928年生于湖南长沙，军事学校毕业，曾任军职多年。1949年赴台，后加入蓝星诗社，曾任《蓝星诗刊》主编、台湾诗学季刊社社长等。其为人低调，在台湾素有“诗坛儒者”之称。

出版诗集有《雨天书》《狼烟》《五弦琴》《青春的脸》《向明自选集》《水的回想》等，诗话集《客子光阴诗卷里》，童诗集《萤火虫》。向明以生活作为诗的矿源，不追求在语言和意象上炫奇，而力图在生命的意义上有所探索，在严肃的问题上有所坚持，是一位进而介入现实，出而批评人生，兼顾文学与社会使命的诗人。

创世纪诗社

创世纪诗社由洛夫、张默和痖弦等台湾军中诗人于1954年发起，成立后开始出版《创世纪诗刊》。洛夫、张默、痖弦三人号称“创世纪铁三角”。《创世纪诗刊》的出现，团结了一批台湾诗坛的现代诗人，形成了“创世纪诗群”诗歌流派。

在前期，创世纪诗社提出“新民族诗型”的创作路线，要求排除纯理性、纯情绪的呈现，主张写诗要有民族风味。但不久，它推翻了原来的创作主张，展现出极其前卫的姿态，宣传超现实主义的诗观，并在60年代成为超现实主义的集聚地。

包括洛夫、痖弦在内的“创世纪”诗人倡导纯粹经验的美学，强调诗的“世界性”，把现代诗推向极端，对台湾新诗中“虚无”“晦涩”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

代表诗人：洛夫、痖弦

洛夫，原名莫洛夫，1928年生于湖南衡阳乡下，1938年举家搬迁至衡阳市。1948年考入湖南大学外文系。1949年国民党军队在湖南招考青年入伍，洛夫随军队抵达台湾。后入读军校，毕业后被分至左营海军陆战队。越战后期奉命参加驻越军事顾问团担任英文秘书，其间发表了作品《西贡诗钞》。返台后，就读于淡江文理学院，1973年毕业，并在同年8月中校军衔退役。1996年移居加拿大温哥华迄今。

洛夫笔耕不辍，著作颇丰，出版诗集《时间之伤》等37部，还有大量散文集、评论集和译著。他的名作《石室之死亡》广受诗坛重视，1982年长诗《血的再版》获中国时报文学推荐奖。1999年，洛夫诗集《魔歌》被评选为台湾文学经典之一。2001年，三千行长诗《漂木》出版，震惊华语诗坛，同年被评选为台湾当代十大诗人之一，名列首位。

痖弦，原名王庆麟，祖籍河南南阳，1949年在湖南加入国民党部队，并随之抵达台湾。1953年进入复兴岗学院影剧系，翌年毕业，后被分配至左营军中广播电台工作。1962年痖弦回到母校复兴岗学院任教，讲授“中国舞蹈史”及“艺术概论”。1966年以少校军衔退伍，并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访问两年；1976年再度赴美进修，获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研究硕士。次年起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达21年之久。现移居加拿大。

痖弦的作品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并具有音乐性，经常表现出悲悯情怀，以及对于生命甜美之赞颂，还有对现代人类生命困境之探索。代表作有《痖弦诗抄》《深渊》《盐》等诗集。☐（参考资料：《台湾现代派诗的崛起、论争、回归与反省》，马德俊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六期；《论〈蓝星及其主要诗人〉》，翁光宇著；《暨南学报》1991年第一期）



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剧照

诗与歌，太平洋吹来的风

记者 / 宋诗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局与时代的震动不仅局限在台湾文学界，它也成为那个时代共同的情感牵连。台湾的本土文化起于当时的文学，却以流行音乐和电影的形式传播，至今影响着整个华人世界。

逍遥游

几年前，中国台湾目宿媒体筹划拍摄“他们在岛屿写作”系列纪录片，项目组找到了导演陈怀恩。“他们问我对谁有兴趣。”陈怀恩拿着对方提供的作家名录一路看下来，郑愁予、周梦蝶、王文兴、痲弦……“我不是搞文学的，名字都知道，但作品不熟悉”。

最后，陈怀恩的目光停留在“余光中”三个字上。“我不大读书，但喜欢听歌。余光中的很多诗被写成歌，这应该蛮好拍的吧！”和很多受台湾民谣运动

影响的文艺爱好者一样，陈怀恩所认知的余光中是流行文化中的余光中。

“真的开始去筹备才发现，这件事有点麻烦。”从流行文化切入，陈怀恩和他的团队进入了余光中的文学世界，“1000多首诗，包括散文集在内，50本著作。民歌？那只是他文学创作里很小的一部分”。陈怀恩花了几个月时间了解和梳理余光中的文学作品，作家本人的创作风格和他文学界的定位，最后，交出了一份拍摄大纲。

导演毕竟不是搞学术的，他们需要影像，需要接近真实的余光中。“见面之后又发现，问题更麻烦了。”余光中不是陈怀恩想象中的作家风格，他很忙，总有大大小小的活动，面对媒体也轻车熟路。“一开始，余老师能配合我们的时间并不多。”陈怀恩说，常接受媒体访问的余光中以为这又是一个普通的访谈节目，只愿意给他们两小时时间，这让整个剧组

都慌了神儿。

好在经过一番沟通，余光中默许了陈怀恩更为复杂的拍摄计划。在近两年的纪录片制作过程中，陈怀恩和团队多次跟随余光中走进课堂，参加各地大大小小的演讲、讨论会，也为他策划了一次故地重游。

随着相处的深入，陈怀恩眼中的余光中越来越难以捉摸。

在创作和学术上，他是个严谨到执拗的人。就像纪录片里提到的，在台湾，一个诗人70岁之后还在出书，还在写诗，这已经不是新闻，而是一个事件。“他对一切写着字的东西都很敏感。”陈怀恩还记得，与余光中第一次见面时，他带去了一张DVD，DVD盒上有些文字介绍。余光中看到，拿起盒子，认认真真看上面的文字，还挑出了些措辞和语法错误。在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陈怀恩也采访了一些与余光中有过接触的人，其中就包括余光中传记《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的作者傅孟丽。“作者说，那本传记本来是要在余老师七十大寿时出版上市的。但书稿在余老师手里校对了一年，他71岁时才校对完成，错过了计划出版的时间。”纪录片拍摄时，余光中已经八十出头，但在教学上依然毫不怠慢。“我们看到他给学生批改的作业，他写的字有时候比学生写得还要多。”陈怀恩回忆。

余光中对文字的锱铢必较让陈怀恩很忐忑，“纪录片要有旁白，要有采访，我们很怕做出来的东西不被他接受”。为了在文学和文字运用上踏实些，陈怀恩找来台湾新生代女诗人罗任玲做文学顾问，请她帮忙采访余光中。“我听说，她是唯一一个写余老师没有被她本人改过一个字的人，其他访问并让他看稿的人下场都不太好。找罗小姐，我们成功的概率可能大一点点。”

在文学和教学之外，余光中不是一个很好接近的人。摄制组每次上门拍摄，开门的都是余光中的夫人范我存。“辛苦了，来来来，今天我们拍什么……”师母寒暄一番后，余老师才走出来，感觉像个明星。”陈怀恩说，当年完成余光中的拍摄后，他的团队还拍摄了另一位诗人痖弦，痖弦和余光中完全不同，喜欢和年轻人聊天，人很亲切。“坦白讲，拍余老师，我们跟他并不亲近，没办法靠近他。”

不仅在沟通上没办法靠近余光中，陈怀恩希望捕捉到一些感性的瞬间，这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余光中的浪漫和感性似乎都藏在诗里，现实生活中，

他是平静的，甚至有些刻意的冷漠。《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里，摄制组随余光中游览了他出生的地方——南京。诗人兴致很好，登上了当地著名的栖霞寺。陈怀恩在余光中的传记里看到过，他的母亲临产前一天还去登了栖霞寺，于是，回到台湾后，陈怀恩整理了当时游览栖霞寺的照片，送给余光中，还和他提起了母亲临产前登寺请愿的事。“愚昧，无知，哪有人怀孕还去登山的。”余光中一句话，瓦解了陈怀恩对于浪漫诗人的想象。

游览徐霞客故居也让陈怀恩感到挫败。少年余光中曾梦想成为地理学家，所以尤其仰慕徐霞客。在江阴参加活动，他特意请主办方帮忙安排参观徐霞客故居。在著名的徐霞客镇，余光中与少年时的偶像相遇。他站在坟墓前合十双手，闭目默念了很久。陈怀恩用摄影机记录下了这个时刻。回到台湾，陈怀恩在访问中提到了余光中与徐霞客神交的那个瞬间。本以为诗人有情要抒，谁知余光中不以为意：“你们太吵啦，叽叽喳喳叽叽喳喳，我安静下让你们停下来。”

摄像机很难捕捉到浪漫诗人的感性一面，却总能遇到他争强好胜的一面。余光中经常会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学生论坛。来的学生都锋芒毕露，提的问题很尖锐。一个学生站起来问他，怎么看诗人纪弦。“余老师一副没听懂的样子，轻飘飘问，哪个纪弦？”陈怀恩一度觉得场面尴尬，纪弦是台湾现代诗开山鼻祖式的人物，余老师显然在挑衅。紧接着，他就听到后者话里有话：“你是说写现代诗的那个纪弦吗？九十几岁了吧？人在美国还是哪里？70岁就没有再写诗了。他早期写的还可以看一看。”

文人相轻，自古如此，余光中只是更锋芒毕露一些。他渴望被认同和被接纳，即便在七八十岁的年纪也是如此。纪录片团队随余光中出席过一个凡·高作品展的活动，余光中站在台上，手里抱着一个袋子。“我当时就觉得很奇怪，其他人都两手空空，怎么只有这个80多岁的老人提了个袋子，没有人帮他拿一下吗？”余光中就那样抱着袋子在台上坐了几十分钟。活动快结束时，马英九上台致辞，致辞一结束，余光中就一个健步冲上去，把袋子交给了马英九。“后来才知道，袋子里装的都是余老师的书，亲笔签了名，送给马英九。这个细节很小，但你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他非常在乎。”

纪录片前前后后拍摄了一年多，直到拍摄结束，

陈怀恩都觉得自己从未真正走近过这位文学大家。他曾尝试寻找诗人的深情、骄傲，甚至虚弱，但现实生活中都没有任何着力点。最终，一切只能回到诗歌里。“我的副导演花几个月时间翻了他的诗集，他发现，余老师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其实都藏在诗里。我们后来用《逍遥游》作为纪录片的标题，其实也是在打一个问号。那本书发表在1964年，当时余老师正要去美国，唯一的儿子刚出生就夭折了，他在文学领域的论战也争议很大。他真的逍遥吗？也许未必。但他把诗集起名《逍遥游》，这做法太余光中了。”

文人的时代

在为《他们在岛屿写作：逍遥游》的采访中，陈怀恩所遭遇的困境不仅来自于余光中本人，还来自与余光中有关的作家、学者。“想要采访一些人聊聊余老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岛内的一些作家、学者都蛮忌讳谈余老师的。他的诗很感性，很浪漫，但本人个性强，太好斗了，不同时期与不同文学阵营都有过论战，这可能让一些人觉得有些敏感，不敢招惹。”陈怀恩说，虽然大家对余光中的文学成就都是认同的，但涉及出境访谈，很多人都拒绝了。

或许，这些戒备和隔阂要归于从上世纪50年代起余光中参与过的几次文学论战。50年代的台湾还处于戒严期，物质生活也并不丰富，但那却是个文学蓬勃的年代。除了实用主义的“战斗文艺”，诗歌是当时最受青睐的文学形式。在五六十年代间，台湾最著名的诗社有纪弦成立于1953年的现代诗社，覃子豪成立于1954年的蓝星诗社和由张默、洛夫发起的创世纪诗社。三大诗社都秉承现代主义的精神，却又各有主张。余光中属于以学院派为主的蓝星诗社。他早期所卷入的论战也大多为诗社而战。在诗风温柔敦厚的蓝星诗社，余光中是一把锋利的刀，刺出去总能伤敌，而且他本人韧性极强，在论战中极少主动缴笔，也少有求和的意思。在那场与学生的讨论中，余光中刻意轻视纪弦，也是因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就与这位诗坛前辈有过数轮关于现代诗和现代主义的论战。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是拥抱西洋文学的年代，拥抱西方现代主义的时代。当时，台湾与美国正处于蜜月期，知识青年读外文系，去美国留学就成了一条通往世俗成功的康庄大路。在文化界，这条定律依然成立。余光中、郑愁予、痖弦、王文兴、白先

勇等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都有过留洋经历，甚至早早就定居海外。即便没有真正留美，很多人也为此做足了准备，早已将自己的文学眼界和抱负投向了欧美文学。

从中国古典诗词直接衔接西方现代主义，这是台湾所走的路，也是台湾现代文学走过的路。余光中的台大师弟、作家王文兴说，他与余光中这位老学长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近代白话文没有兴趣，他们更倾向于古典诗词和西方现代主义。“从高中开始，我就几乎只读英文小说，即便是19世纪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作品，我也找英文译本来看。”在王文兴成长的那个时代，他不是个例。

除了诗社，五六十年代也是大学生和文学青年办杂志刊物的好时候。王文兴就曾与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等人一起创办《现代文学》杂志，这本杂志继承了前身《文学杂志》的精神，大量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和理论批评，是当时推动现代诗和现代派小说发展的文学重地。“当时，余光中还在台大教书，我们经常讨论古典诗词和现代主义作品。”王文兴说。

后来，70年代末那场将余光中推向风头浪尖的“乡土文学论战”王文兴也曾卷入其中。70年代是台湾政治和文化风向转变最快的年代，钓鱼岛事件、台湾退出联合国、尼克松访问北京……一连串的政治重创让台湾青年一代陷入了失落和迷茫。当时的文学与艺术也随政治局势一起，渐渐收起了向外延伸的触角，开始低下头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脚下的这片土地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这样的氛围下，乡土文学势力变得强大起来，乡土文学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辩论也愈发激烈。

当时，余光中刚刚结束又一次留洋，经历了美国文学和流行文化的洗礼，他对现代主义的态度更坚定，因此，他与陈映真等乡土文学主力打得不可开交。

而当时，王文兴也出版了自己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变》。无论从题材还是文体上来，《家变》都是西洋文学的儿子。“争议很大，左右夹攻，保守派、国民政府内部反对，本土派也打击这本书。”当时，王文兴也发表了题为《乡土文学的功与过》的演讲，后来被改动过的版本登在报纸上，引起轩然大波。“本来我同时受聘于台湾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那场风波之后，中文系把我解聘了。”

尽管争端不断，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确是台

湾文学与文化的一段黄金期。当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文学与文化发展几乎停滞,而香港正在纸醉金迷,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无疑是当时华语世界的中心。

随着大陆“文革”的结束,大陆与台湾开放往来,无论是现代派诗歌、现代派小说还是乡土文学,那批在特殊时期诞生的台湾文学作品都滋养了一代大陆文学青年。影响还不止局限于文学,像余光中的《乡愁》一样,有些文学作品成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

诗与歌

上世纪70年代,时局与时代的震动不仅局限在台湾文学界,它也成为那个时代共同的情感牵连。文学内部现代主义与乡土派的争论不止,但下沉到普通大众中间,流派并不重要,直击人心、抚慰伤痛才是文学的力量。当时,年轻人找到了他们自我解救的良药,余光中、罗门、周梦蝶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成了台湾文学和文艺青年排解苦闷与寻找自我的精神寄托。

影响台湾流行文化至今的那场“台湾民歌运动”就是从诗歌开始的。70年代初,后来“民歌运动”的核心成员胡德夫已经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学,为了生计,他白天打两份工,晚上就在哥伦比亚咖啡厅唱歌赚钱。那个时代的台湾,年轻人还是极度崇拜美国文化的,所听的音乐也大多是美国流行歌曲和摇滚乐,再夹杂些“旧上海”风花雪月的歌曲,以及日本的小情小调。胡德夫也不例外,他早期在哥伦比亚咖啡馆唱的也大多是外文歌。因为在淡江中学组过蓝调四重唱的关系,他倾向于唱黑人音乐,唱美国民谣,最能被鲍勃·迪伦的作品打动。

那时的哥伦比亚咖啡馆像是年轻人和穷学生的明星咖啡馆(台湾五六十年代文学地标),胡德夫、李双泽、杨弦,音乐界的老大哥李泰祥、人称“小张大千”的画家张杰、胡德夫的前妻潘小姐,还有后来走红的胡因梦、张艾嘉,大家都常年混在哥伦比亚咖啡馆里无所事事,那是一段大家回忆起来都觉得阳光明媚的日子。

胡德夫还记得和李双泽的那次不打不相识。当时,胡德夫正像往常一样在台上唱歌,李双泽突然挑事。“你不是卑南族的吗?会不会唱你们自己民族的歌?”胡德夫被问傻了,只得回答,“我想想,想想看”。李双泽没理会胡德夫,径直走上台,他向胡



1976年,杨弦(中)和同伴在电视台文艺节目演唱《回旋曲》

德夫借了吉他,连唱了两首老一辈台湾民谣歌手陈达的歌。“还好我没被他考倒。”胡德夫绞尽脑汁,想起一首小时候爸爸常唱给他的歌,“歌词记得差不多,勉强能唱完整。”从站在台上,唱出母语的那一刻起,胡德夫就觉得整个哥伦比亚咖啡厅的氛围都不同了。以往,他的歌声和音乐只是咖啡厅的背景音,没有人认真听他究竟唱些什么。但那天,他一开口,整个场子都安静了,音乐第一次成了咖啡厅的主题。“一首歌唱完,李双泽第一个站起来鼓掌,大家都手舞足蹈。”胡德夫说,那首歌后来有了个名字,叫作《美丽的稻穗》。《美丽的稻穗》首演那天,坐在台下的不仅有李双泽,还有另两位民歌运动的重要发起人杨弦和陶晓清。

胡德夫与李双泽不打不相识,两人很快成了好友。从那次上台抢吉他事件之后,胡德夫也开放了自己的表演舞台,李双泽、杨弦、胡因梦等人经常上台唱歌。一时间,那间小小的咖啡厅成了这些年轻人展示自己的舞台。

唱过《美丽的稻穗》之后,胡德夫不再甘于只唱过去那些英文歌,也不甘于只有这一首拿得出手的民谣歌曲。他开始和自己的同族前辈、伙伴学习,也尝试学习阿美族、布农族等其他民族的歌曲。从民族视角切入,为台湾少数民族发声,这也成了之后几十年胡德夫的音乐创作主题。

杨弦是李双泽的高中同学,经常和李双泽、胡



胡德夫

德夫一起混迹咖啡厅那些日子，他还在台大读研究所。和胡德夫、李双泽一样，杨弦也喜欢鲍勃·迪伦、Peter, Paul&Mary、约翰·丹佛（John Denver）、Neil Young 等欧美音乐人的作品。大学时，他曾加入过合唱团，练了一年合唱，就觉得合唱团的风格太保守，并不适合自己，于是，转而学习吉他和作曲。1974年，余光中的诗集《白玉苦瓜》问世。这本诗集中收录了《乡愁四韵》《乡愁》《民歌手》等诗歌。“给我一张铿铿的吉他，一肩风里飘飘的长发。给我一个回不去的家，一个远远的记忆叫从前……”这些浅显又忧伤的诗句深深触动了杨弦，让他有了为诗歌谱曲的冲动。

《白玉苦瓜》是余光中从美国丹佛归来后出版的诗集，诗风明显受到当时美国民谣和摇滚乐的影响。“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答案啊答案，在茫茫的风里。”《白玉苦瓜》集中诗歌《江湖上》的写法就明显借鉴了鲍勃·迪伦的歌曲《blowing in

the wind》。在那首歌里，鲍勃·迪伦曾写道：“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答案啊，我的朋友，它在风中飘。答案，他在这风中飘。）余光中的诗与鲍勃·迪伦的歌异曲同工。

哥伦比亚咖啡厅和胡德夫被一首《美丽的稻穗》捧红，那之后，他上过电台和电视节目，也陆续演唱了很多台湾少数民族歌曲，但生活还是老样子。有一天，他突然看到李双泽在画演唱会海报。“我们要给你办一场演唱会，在篮球馆里。”胡德夫觉得李双泽疯了，那个年代，大明星都在歌厅里唱歌，没有人办过演唱会。李双泽坚持要办，前前后后忙活了很久，还招揽了当时文化界的很多人出席演唱会。

胡德夫筹划演唱会的同时，杨弦已经完成了自己第一首“以诗入歌”的歌曲《乡愁四韵》的创作。他和胡德夫、李双泽商量着，在胡德夫的演唱会上发表这首歌曲。

就这样，1974年，胡德夫在台北国际学舍举办了人生中第一场演唱会——美丽的稻穗。在那场演唱会上，杨弦的《乡愁四韵》也第一次登台亮相。“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的歌声一出，弥漫于上世纪70年代台湾人心中的乡愁终于找到了发泄的出口。而歌词的原作者余光中也正坐在台下，见证着自己的诗歌以音乐的方式传播得更远、更悠扬。

演唱会结束之后，杨弦与余光中有过简短的交流，他征得了余光中的同意，打算将更多对方的诗歌谱曲入歌。与此同时，胡德夫也在思考“以诗入歌”的可行性。和余光中相比，他更喜欢周梦蝶的作品和老先生的为人。在台大外文系念书，以及后来在咖啡厅唱歌期间，胡德夫经常走去位于西门町附近的明星咖啡馆看望摆书摊的周梦蝶。“当时的西门町，台北最热闹的地方，明星咖啡馆里文人墨客的名利场，周公就在那么车水马龙的地方摆书摊，他就像他诗中写到的一棵菩提树，买书，写书，一晃几十年。他可以让人静下来。”于是，他选了周梦蝶的诗作《菩提树下》入歌，唱过几次，没有录制专辑，也没有正式发表。

胡德夫的首场演唱会结束一年后，杨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演唱会。1975年6月6日，小雨，杨弦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一次性发表了《乡愁》《民歌手》《江湖上》《乡愁四韵》等八首改编自余光中诗歌的作品。演唱会当天，杨弦还邀请余光中上台，朗诵了他的代表作《乡愁四韵》。

演唱会结束两天后，杨弦、胡德夫、李双泽、陶晓清，以及滚石唱片的段宗谭、黄宗柏受邀到余光中家中小聚。当场大家就决定了一件大事：将杨弦创作的八首歌曲录制成专辑发表，而专辑名就定为《中国现代民歌集》。

没过多久，杨弦就在当时的和丽风唱片公司完成了专辑录制。后来，这张成本只有5000块的专辑被视作“台湾民歌运动”的开端。

太平洋吹来的风

《中国现代民歌集》面世后，杨弦又很快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西出阳关》。在那张专辑里，罗青、张晓风、杨牧等人的诗也被杨弦谱曲演唱，与此同时，杨弦也自己动手，尝试创作了几首诗作为歌词。

两张专辑之后，杨弦毅然离开了台湾，到美国读书。“音乐只能是业余做的事。”这是理工科出身的杨弦一直信奉的原则。1979年底，李双泽因救人在海边溺水身亡，留下了《美丽岛》和《少年中国》等歌曲被人传颂，很多年后，胡德夫把这两首歌收录在自己的专辑里。

三人中只有胡德夫在继续登台演唱，但好景不长，80年代初，因为致力于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胡德夫被当局限制演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没能在公开场合登上舞台。

“但没关系，这颗民谣的种子已经种下了。”在胡德夫看来，那场“台湾民谣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今天，它为歌坛和台湾流行文化带来的新气象依然有影响力，“非科班出身的文化青年开始有机会写歌、唱歌，那种独立的创作方式在现在的乐坛依然有延续”。

这种影响力甚至早就跨过海峡，传到了中国大陆。“我们开了个头，真正让台湾民谣在华人世界有影响力的人是李泰祥。”胡德夫说，当年，李泰祥也是哥伦比亚咖啡馆的常客，“那样一位古典音乐家、小提琴大师，开始关注我们年轻人乱搞的东西，那是非常难得的”。李泰祥不仅关注，还亲自参与了那场运动。在他的组织和创作下，更多诗人的作品被用来“以诗入歌”，那首他作曲、三毛作词、齐豫演唱的《橄榄树》也成为华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越来越多年轻的创作者卷入了这场运动，罗大佑、侯德健等一批音乐人将这场运动变得更通俗化，也更流行化。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文革”后的一段文化爆发期，《乡愁四韵》《橄榄树》《龙的传人》《童年》等歌曲随《白玉苦瓜》《盐》《台北人》等文学作品一起传入中国大陆，成为几代人传唱的经典。

当年混迹在哥伦比亚咖啡馆的胡因梦、张艾嘉后来都进入了电影圈。前者成了红极一时的明星，后者不仅在香港出道，成了邵氏时代的电影女主角，还成了上世纪80年代那场“台湾电影新浪潮”的重要参与者。

2017年，胡德夫在台湾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时光》。收录的作品大多是他在上世纪70年代演唱过的歌曲。其中就包括那些只唱过几次、因没钱录制而来不及发表的周梦蝶诗歌。对胡德夫来说，这张专辑是68岁的自己与20岁自己的对话，也是对那个诗与歌的时代最朴实的致敬。■



笔底波澜：文学江湖背后的威权台湾

文 / 刘怡

威权时代的台湾文坛，由于受到国民党当局自诩的“文化正统性”左右，以及民间社会长期被特务机构监管的扭曲生态，更近似诡谲怪诞的江湖，而缺少象牙塔的出世气息。对余光中以及那一代台湾文化人的理解，同样无法脱离纸上笔墨背后的千里沟壑、万丈波澜。

赴美国新泽西州任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远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之时，王鼎钧已是53岁“高龄”，沉浮台湾文海超过28年。由于担心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他并未向此前任职的幼狮

文化事业公司（上级机关是蒋经国一手创建的“中国青年救国团”）实际负责人宋时选辞行，而只单独拜会了相交20余载的《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获赠盘费5000美元。据王鼎钧回忆，西东大学的聘书其实早在1975年就已寄达台北的“中国文艺协会”；但由于协会总干事要对他这位拒绝加入国民党、长期饱受特务骚扰的外围“匪嫌”（匪谍嫌疑人）耍弄威风，故一度扣押聘书达半年之久。待到1978年秋天最终成行前，他仍须亲赴“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对特务唱了一番支持国民党、称颂蒋经国才干气度的高调，这才领到了象征万事大吉的出境证。

在1978年这个多事之秋前后，主动或被动地



逃离台湾的文化界人士远不止王鼎钧一位。《台湾日报》董事长傅朝枢由于长期置喙政治民主化问题而触怒蒋经国，被迫在1978年8月将报纸以1.8亿元新台币的价格出售给“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管理的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傅朝枢本人于1980年出走香港，另创《中报》。197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后未获续聘的哲学学者陈鼓应，在1978年11月宣布以个人身份参选台北市“立法委员”，旋即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不得不于次年远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求自保。与陈鼓应同时宣布参选“国大代表”的《中国时报》女记者陈婉珍，先是被调离省政报道岗位，次年赴美转司体育报道后又“安全局”列入入境黑名单，不得踏足台湾达10年之久。而执掌“总政战部”的蒋经国心腹王昇，凭借其1979年创建的秘密机构“刘少康办公室”，将势力扩展到党、政、军、特四大系统，一度被视为蒋氏潜在的接班人。

同样是在1978年，12月27日，美国副国务卿

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飞抵台北，就美台“断交”一事向蒋经国做当面说明。在此之前的12月15日，卡特总统已经签署《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当克里斯托弗和美国“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一行乘坐的汽车驶出松山机场大门时，由“青年救国团”和“总政战部”工作人员组织的上万名抗议民众包围了车队，向其投掷油漆、鸡蛋和石块。克里斯托弗的座车被逼停近半小时之久，前后挡风玻璃均被打破；副国务卿的眼镜被一记重拳击落，玻璃碎片划伤了面部。20多年后，台北圆山饭店的工作人员依然能津津乐道地回忆起，当天克氏送洗的西服前襟沾满了蛋液和番茄汁，“裆部尽湿”。而这一年民间传唱最广的歌曲，是政治大学学生侯德健有感于“断交”而创作的《龙的传人》。

左图：1979年12月11日，“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门前仍然聚集了一两百人，议论纷纷。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群众进行示威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保障人权并实现政治民主化

右图：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傅朝枢先生

2009年，已经定居纽约的王鼎钧在台湾出版了他的文坛回忆录，题曰《文学江湖》。他在自序中坦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文学也是一个小江湖，缺少典雅高贵，没有名山象牙塔，处处‘身不由己’，而且危机四伏”。对亲身经历过的乡土文学论战，他称之为“70年代台湾文学版图的地标”；但也慨叹，在风波升级之后，亲国民党的外省籍作家和台湾本土写作者相互攻讦的重点已经变成了“谁更热爱台湾”，本末完全倒置。回忆至此，王鼎钧不禁反问：“我完全相信大家都会爱台湾，可是又有谁热爱文学？我觉得十分悲凉。”

所有这些看似怪诞的波澜，动因都可指向“戒严时期”国民党政权独特的统治逻辑。在军事上偏安东南一隅的蒋氏父子，却将其统治合法性建筑在“反攻大陆”的虚妄前景以及自诩的“文化正统性”基础之上。从政治宣传到日常生活，战时动员状态深入到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自由思考与表达的空间则迭遭横逆。另一方面，体量狭小的台湾在冷战大势下又无法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俟其政治盟友美国在联合国席位以及“断交”问题上两度抛弃台北，蒋氏父子便只有重提“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高调，以进一步强化对社会文化的控制来应对冲击。乡土文学论战的逆转以及1978年的种种风波，都是政治



王鼎钧

情势变化直接导致的映射。

然而漫无边际的战时状态终究无法永久维持下去。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以本省人为主体的党外运动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矛盾变得彻底无法调和。1984年，“江南案”震惊海外，蒋经国的权力交接安排遭到美国政府的直接质疑。屹立近40年的“戒严”铁幕终于走向崩塌，台湾政治和文学的江湖都进入了新阶段。

“匪谍就在你身边”

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战败迁台，到1987年蒋经国着手开启民主化转型，这期间长达38年的威权统治历史，在台湾有一个特殊的称谓——“戒严时期”。1949年5月19日，时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诚以“便利战时管理”为由，宣布在台湾省全境实施长期戒严。与之相配合的一系列法令相继规定：在戒严时期，严禁“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一切新闻、杂志、图书、标语以及相关出版品的内容须经保安司令部审查，有不合规定者将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应聘公务人员以及其他公私职位者须有人提供担保，一旦被认定存在“匪谍”（中共情报人员）嫌疑，担保人亦受连坐惩罚。被指控为“匪谍”或涉嫌“叛乱”者，不得由一般司法机关审判，一律经军事机关从快、从重处理，最高可判处死刑。

讽刺的是，这套令人闻之色变的戒严令体系，本身的正当性却相当可疑：陈诚颁布戒严令之时，蒋介石在南京已经下野，代理总统的李宗仁并未向立法院提起这项法令的追认程序。待到蒋介石在台湾不明不白地“复职”之后，同样涉嫌程序不正当的戒严令遂一路延续了下去。在此之前的1948年5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即到1992年为止从未改选过的“万年国大”）已经以“宪法”附件的形式，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宣布“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拥有不受“宪法”限制的紧急处置权。至1960年，《临时条款》又以增补案的形式解除了“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蒋介石父子遂得以借助战时状态的日常化，在台湾行使其威权统治。

戒严所针对的群体，不仅是“二二八”事件以来已经被打入另册的本省籍精英群体，同样包含了自大陆辗转来台的120万外省籍人士（含军人）中的“异己分子”。在蒋介石看来，国民党之所以输掉内战，并非由于给予民众的自由不够充分，而是组织凝聚力

不够、对军队和社会的控制尚不强硬的结果。要实现“反攻大陆”，就必须“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全面强化对执政集团内部以及民间社会的多维度控制。是故从50年代初清洗国民党元老陈立夫（CC系）、吴国桢（政学系），到1955年软禁有“兵谏”嫌疑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再到1960年借《自由中国》事件整肃为国民党奔走驱策30余年的雷震，一旦其对“领袖”的忠诚受到怀疑，即使是军中名将、党国耆宿，也立即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生杀予夺之权，完全系于最高当局个人，并且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据曾任“国防部情报局”高官的谷正文回忆，1951年，第一位台籍黄埔生、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李友邦的夫人由于与中共情报人员相识而遭逮捕。蒋介石因为坚信“太太是奸匪，丈夫就一定是奸匪”，竟在省党部大会上亲自下令羁押李友邦，随后处以死刑。另一位出身黄埔一期的原总统府参军徐会之，经军法审判应处15年徒刑，也因为蒋介石的一纸批示，立遭枪决。

为培养足够数量的特务人员，以遂行其“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攻”战略，1951年7月，蒋经国在台北复兴岗设立政工干部学校（今“国防大学政治作战学院”），以亲信王昇为校长，毕业生分配到基层部队的排一级，由下而上地建立严密的监控网络。在大陆时期一度权倾朝野的“中统”和“军统”，迁台之后陆续遭到边缘化，其职权转移到“国防部”下属的“总政治作战部”，实际上与军令系统处于平行状态，仅对“国防部长”蒋经国及其代理人王昇负责。特务机关对行政和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逐渐达到前所未见的水平。

1949年前后，中共的确曾派出情报人员赴台潜伏，以为将来解放台湾打前站。但在1950年台湾省工委被破坏后，成批打入国民党内部的行动在事实上已经终止。然而蒋氏父子出于建立威慑、强化控制力的考虑，几乎将对“匪谍”的提防推进到了神经质的程度。“总政战部”在各学术机构、新闻媒体以及大学广布眼线，频繁要求知识分子撰写自传、“交代”思想，私拆其信件、窃听其电话，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与特务结下私怨者，往往被强打成“匪谍”，以严刑逼供将罪名坐实。重压之下，知识分子之间彼此不敢信任，皆担心被密友出卖。王鼎钧回忆，60年代文坛诸人闲暇聚会时，一旦发现有人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反应便是此人做了特务。一位作家曾与他讨论“台湾的前途不知怎样”，王随即担心此人乃是特务的线人，意在“引蛇出洞”。

戒严时期的台湾，近至台北闹市，远到金门离岛，处处可见耸人听闻的宣传标语：“当心！匪谍就在你身边！”高压之下，自由写作与表达几乎成为奢望。1954年，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四组（实际行使宣传部职能）与“中国文艺协会”联合发起“文化清洁运动”；凡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的作家与学者，无分政治倾向，其著作一概作为“匪书”查禁。金庸所著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只因标题与毛泽东诗词“只识弯弓射大雕”暗合，在台湾发行时不得不改书名为《大漠英雄传》。甚至连前“立法院”院长、国民党中常委张道藩竭力鼓吹的“战斗文学”（以反共为主旨）也遭殃及——既要与“匪”战斗，自然须提及“匪事”、出现“匪语”，而审查人员或视其为变向为“匪”宣传，或认为有影射国民党当局之嫌，索性一概查禁。

及至70年代中叶，国民党退居台湾已经超过1/4个世纪，“匪谍妄想症”乃至因“匪嫌”而兴起的政治迫害依然甚嚣尘上。台大哲学系事件中，仅仅因为陈鼓应等教师拒绝在期末判卷中给与王昇关系密切的“空降学生”冯沪祥（曾任蒋经国的秘书）及格分，就被指控为“迫害学生”、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最终失去教职。现代诗论战以及乡土文学论战中，同样出现了乱扣“红帽子”、借政治之力行打击论敌之实的情况。诚如王鼎钧所言，此举与“爱文学”已经毫无关联。白色恐怖对台湾社会乃至文坛的渗透，于此可见一斑。

敌乎？友乎？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不仅反映在国民党政权强化对台湾社会的控制上。蒋氏父子的“反攻”大计，在文化领域同样有所呈现。1950年冬，历史学家钱穆在台北获蒋介石接见，后者允诺自“总统府”办公费下每月拨出3000港元，支持钱穆、张其昀、唐君毅等人兴办新亚书院（今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嗣后张其昀曾入台出任“教育部长”，云集有钱穆、唐君毅、徐复观等传统思想家的新亚书院一港中大则隐隐成为“文化反攻大陆”的前哨。1958年，四位与国民党关系匪浅的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极言中国文化不仅有历史价值，在现实条件下同样可以焕发新生，对中国大陆推崇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胡适等人倡导的欧美自由主义则不无贬损。这一论调与蒋氏父子在台湾鼓吹的“传统文化复兴”“中

国文化本位”，可谓不谋而合。尤其是新儒家宣扬中国文化“并无专制传统”，在吸纳西学的基础上，当可发展出具备本土特色的民主政体，又恰似在为蒋氏的威权统治缓颊。1967年钱穆赴台后，蒋介石专门拨款在东吴大学校园内为他修筑素书楼，钱穆亦恭维蒋氏“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

1949年之后，国民党政权得以在台湾站稳脚跟，与冷战的历史背景以及美国政府的庇护自是不无关联。但在内心深处，蒋氏父子对美国人始终抱有不信任感。1943年出版民族主义气息浓厚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时，蒋介石就将英美自由主义置于与共产主义同等的受批判地位，认为两者“均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迁台初期，他又频频翻老账，认定“失去大陆”与杜鲁门、马歇尔等人偏颇的对华政策具有直接关联。蒋氏暗中聘用由旧日本军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对美国政府青睐的吴国桢、孙立人等中生代军政精英则予以预防性废黜，防范之心一目了然。即使是到了台湾经济逐步复兴、美台军事同盟也趋于稳定的60年代，蒋介石依旧担心美国会基于现实主义原则，抛弃国民党政权。为求自保，1967年，台湾当局秘密启动了核武器研发项目。

这种对于“被抛弃”的悲观预感，在尼克松上台后最终获得了确认。1971年7月15日，在丝毫未向台湾当局透露一点风声的情况下，尼克松突然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自己将于次年2月访问北京。部分是基于已有的消极判断，部分是为显示其“处变不惊，庄敬自强”的姿态，国民党当局仅仅做出了有限的抗议。到了这年9月，形势继续急转直下：在美国政府已经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诺恢复其联合国代表权的前提下，台北得到的仅仅是一项不确定的“双重代表权”承诺，并且在联大投票中未获通过。为了宣示“主权尊严”，在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就中国重返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做出表决之前，台湾代表周书楷宣布主动“退出”联合国。与此同时，人在华盛顿的“驻美大使”沈剑虹居然是从电视新闻中才知晓噩耗，足见其已被美方彻底孤立。

对蒋氏父子而言，统治台湾的正当性大部分来自关于“反攻大陆”的期许——“万年国大”和立法会不曾系统改选，“戒严时期”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原因全在大陆不曾“光复”；一旦“反攻”成功，局面自当为之一新。从这个角度说，“反攻”既是信仰也是神话，一旦破灭，心理崩溃势将不可避免。尽管从1963年起，国民党当局已经将“反攻大陆”的口号默默变更成了军事色彩较淡的“光复

大陆”；但只有在联合国席位被公开剥夺、中美正式建交已经列入日程的情况下，彻底丧失期许的台湾社会才会将积蓄数十年的不满彻底倾泻到国民党当局头上。1975年蒋介石本人的最终病逝，也便成为神话破灭、动荡再度兴起的分水岭。

只有从这个角度，方能解释1978年前后发生在台湾的一系列反常风波。在美国政府已经给出了对台“断交”时间表的情况下，以“处变不惊”自诩的蒋经国一方面要继续和华盛顿讨价还价，争取美方继续履行对台湾的安保承诺，另一方面则要收拾人心，唤起民众对当局的信心。软硬两手因此都被抬了出来：以王昇执掌的“总政战部”为工具，一方面将王鼎钧、傅朝枢、陈鼓应之类与当局离心离德的文化人“流放”域外，以清除杂音，另一方面则要通过反美示威、袭击克里斯托弗车队等激进但不极端的举措，重绘当局的民族主义本色。美台断交成为既成事实之后，蒋经国在电视演讲中坦言：“由于现实的需要，我们不得不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坚忍勇敢，来处理当前变局。”虽仍嫌高调，但与其父空泛的“庄敬自强”相比已是彻底的现实主义。

终是那一段乡愁

不可否认，尽管在内涵上不无歧异，但威权时代台湾的“中国文化本位”“外省人中心主义”以及“反攻大陆”的愿景之间，存在深刻的逻辑关联。由于仅视台湾为暂厝之地，国民党当局及其认可的“正统”文化的基调，始终是要在弹丸之岛孕育出“再造中华”的思想资源。是故无论是蒋介石对新儒家的借重，还是70年代文坛笔战中右翼中国国族主义的活跃，每每带有一种与现实截然相反的宏大感。甚至于“戒严时期”“动员戡乱时期”这类充满临时性色彩的坚硬术语，也在暗示迟早会有一种惠及全体中国人的长远安排。然而随着“退联”、断交接踵而至，神话破灭的震惊很快发展为“亚细亚的孤儿”式的迷茫，继而彻底另起炉灶。

有研究者称，1977～1978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乃是“台湾战后历史中一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学的总检验”；论争虽起于文坛，却导致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与台湾本土主义两派的倡导者齐齐亮相，分歧一览无余，进而上升到官方意识形态与反官方意识形态的正面对决。在70年代前期因为蒋经国有挑选地栽培本省籍精英而沉寂下去的本省—外省人之争，随着社会控制的重新强化（时人称之为“王昇



1978年台湾街头

日日升”)而再生变数。当文坛论战方兴未艾之际,政坛的街头运动也渐次勃兴,国民党萧规曹随的威权统治陷入了一场全面危机。

1977年11月19日,由于国民党当局在桃园县长选举过程中舞弊,数百名愤怒民众包围并捣毁桃园县警察局中坜分局,造成“中坜事件”。1979年1月22日,为声援因主张两岸和平统一而遭当局以“匪谍”罪逮捕的前高雄县长余登发,30余名要求政治民主化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县桥头乡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史称“桥头事件”,是戒严30年以来第一次非当局组织的政治性示威活动。同年12月10日,由本省籍党外政治活动家运营的《美丽岛》杂志,借纪念世界人权日之机,在高雄发起千人级规模的示威游行,遭到警备总部的强行弹压,爆发激烈冲突。包括黄信介、施明德在内的8名首要组织者被警备总部军法处以叛乱罪提起公诉,最终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其余7人分获12~1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沉默的年代,至此彻底告终。

以“美丽岛事件”为催化剂,此前仅仅存在于文学圈内的认同意识论战,进一步深入思想和文化

界。从1979年到1984年,陆续爆发了台湾民族主义论战和“台湾结VS中国结”论战,台湾的党外民主化运动,最终被定位在了本土主义的基调上。与此同时,因为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而备感压力的蒋经国在1983年将王昇调职,特务统治接近了尾声。1984年“江南案”爆发之后,蒋经国最终决定拆分已经尾大不掉的特务机关,并承诺既不会延续家族统治,也不会建立军人政权。1987年7月14日,他以“总统令”宣布解除历时38年又2个月的戒严令,次年1月又正式开放党禁。随着蒋氏父子时代的终结,台湾最终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而在纷纷扰扰的政治纠葛远去之后,余光中以及台湾中华文化认同者们的那一段“乡愁”,终于摆脱了江湖气息,恢复为纯粹的精神和文化意象。当基于意识形态的党同伐异最终告一段落,诗人和作家们不必再以纸笔承载“反攻”“复兴”的宏业,尽可以回到他们由衷热爱的缪斯世界中。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毕生富于家国情怀的余光中,在他生命的晚年,终于复归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故国山河之中。可以无憾矣。☑



余光中的香港时代

文 / 傅婷婷

香港时期，余光中作品里的“乡愁”主题，慢慢淡了下来。

1974 到 1985 年 11 年的时间里，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任教。

来到香港时，余光中在文坛已经有了很大的名声。在香港中文大学传统的“古典文学”课程之外，余光中教的课程是“现代文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樊善标曾在余光中香港时代的后期修读他的“现代文学”课，也是余光中作品的研究者。他说：“当时中文系的文学史课程是从先秦到清代，所以现代文学的课程补足了前面古代文学史课程设置的不足。”余光中的课吸引了大批学子，而这些学生中，有很多也是余光中的读者，黄秀莲就是其中之一。

香港作家黄秀莲早在中学时代就是“余光中迷”，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余光中成为她考入中文大学的一大动力。她仍然记得在 1977 年第一次见到余光中时的场景。当时，余光中一头白发，气质格外沉静，半低着头给选课的学生签字。黄秀莲回忆：“1977 年，我选了余老师的课，由于白发较多，他看起来年纪比较大，和我中学时看到的他作品里放的年轻时满头乌发的照片不太一样了。”40 年后，2017 年的 12 月 8 日，黄秀莲从香港启程去给台湾的师母祝寿，得知余老师中风住在医院，便把归期延后，陪余光中直到他去世前一晚。

对于余光中来说，香港时代也是他认为自己生命里最安宁的时期。余光中去世后，台湾文学圈对他的评价比较复杂，褒贬不一。很多人认为，余光中的散文创作很好，但诗歌不能称作一流。和台湾相比，香港一些和他在教学和创作领域打过交道的

人,对他则多为推崇的声音。对此,樊善标教授认为:“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不同地方对他的熟悉程度存在差异。因为熟悉,所以有很多意见;因为不熟悉,所以就比较简单。”

作为余光中“香港时代”早期的学生,黄秀莲仍然记得当时余光中讲“现代文学”课的情景:“本来课程的学生名额是40人,但当时选这门课的有120多个学生。”她每次上这门课都会提前20分钟来到教室,坐在第二排的中间。黄秀莲回忆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让她有一种参与了余光中的诗歌创作的感觉:“有一次香港的雾特别大,余老师一进教室就说,雾真大。没过多久,他就发表了诗作《雾失沙田》。”后来,她和很多同学都和老师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她还提到了余光中和学生们之间一段有趣的对话:“后来我们有些同学,请余老师做证婚人,余老师就说,我最乐意做售后服务的。还说,女婿是 son-in-law,儿媳是 daughter-in-law,那学生的另一半,应该就是 student-in-law 了。”

香港著名翻译家金圣华是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同事,现任香港翻译学会荣誉会长,经常在文化活动和翻译领域和余光中有交集。在金圣华看来,余光中在作家身份之外,常常被忽略的是他的翻译家身份,余光中在翻译领域很有成就,翻译了《凡·高传》《老人与海》、王尔德的戏剧等作品。金圣华说:“在翻译上,我很赞同余光中的主张‘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不能丢掉中国文学中古典的美感。余光中比很多翻译家的成就要高很多,他不但能够翻译诸多文类,能够中英双向翻译,也可以把自己创作的诗歌翻译成英文。他是六译并进的,他做翻译、谈翻译、教翻译、改翻译、评论翻译,还推动翻译,他办的梁实秋文学奖发掘了很多翻译界人才,如彭镜禧教授等。”

在金圣华的记忆里,余光中在与人相处时,语言上“双关语”的幽默细节随处可见。“有一次我主持一个翻译学术研讨会,请余光中来发言。开会的时候是4月1号,一直开到4月3号。余光中就说,这个会开得真好,我们从愚昧一直辩到清明。原来4月1号是愚人节,我们开完会那天是清明节。”2006年端午节期间,王蒙请金圣华和余光中去青岛的海洋大学开讲座,在前往青岛途中,三个人闲谈聊起了王尔德。聊着聊着,余光中说:“王尔德是同志们的先烈。”

1971年,金圣华还在温哥华进修时,常泡在图

书馆,看到余光中写的书时,就会拿出来看,对她来说,余光中的作品令温哥华的寒冬好受一些。“翻译和写作是很奇怪的事情,有时候需要一些说不出的灵感,也需要抛开自己眼前的小天地,到繁花盛开的外面走一走。我在翻译我的第一本译作《小酒馆的悲歌》时,看了很多余光中的作品,才产生了一种状态,那是文字贴近心灵的感觉。”

在香港,余光中的住处楼下是山,山下是九广铁路的中途。这段时间,余光中创作了很多关于香港的诗和散文,多见于《与永恒拔河》《青青边愁》《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中。樊善标认为:“相对台湾来说,香港和大陆的距离更近,可以让他遥望大陆,知道更多关于大陆的消息,所以他在心理上,和大陆的关系相对近了。在这段时期,他作品里的‘乡愁’主题,慢慢淡了下来。”

左图: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合一亭,余光中与金圣华

右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樊善标



樊善标：余光中笔下“文学的香港”

文 / 傅婷婷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中文大学在行政区域划分上，还属于沙田区。余光中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开启了他的“沙田文学”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85年，余光中离开香港时，发表了诗作《别香港》：“如果别离是一把快刀 / 青锋一闪而过 / 就将我剖了吧，剖 / 剖成两段呼痛的藕……”余光中对香港的情感，和对大陆和台湾的区别是什么？

樊善标：余光中先生是个很自觉的作家。在《春来半岛》的前言《回望迷楼》里，余光中回顾了他在香港的生活，他说在香港这么多年，好像是把香港当作一个眺望大陆的看台，当他离开的时候，才发现他忽略了脚下这个地方。这段戏剧化的自述，变成好多人对他香港时期的概括，认为余光中来香港本来是为了接近大陆的母体，所以80年代开始有“香港”认同感的一些人觉得很不是滋味，也以此批评他。但是余光中很早就在作品中表现出对香港的风光很有兴趣，他在香港的早期有一篇《沙田山居》，把香港中文大学写得很漂亮。

其实，在70年代，香港还没有“身份认同感”的思潮。到了80年代初期，中英谈判的时候，香港才有了一个主体意识，把香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此前，住在香港的人不太会有命运共同体的感觉。所以，余光中当时没说对整个香港有兴趣，只是对香港的某些地方感兴趣，直到快离开香港时，他才明确说香港作为一个整体对他很重要，这也是很自然的。

在言谈之间，可以感觉到他蛮喜欢香港的。后来去了台湾高雄以后，也常常回来，他对香港政府的效率和一般人的公民意识，都很认可。而他的身份认同感，综合了大陆、台湾和香港。香港的身份他一般很少提到，但是在离开香港前的文章里，他都点出过。

三联生活周刊：从文学创作上来说，香港对余光中有什么特殊性？

樊善标：香港为他提供了一些跟台湾和大陆不同的可能性。

台湾和大陆都是很中国化的地方，但香港人之间的互动，跟大陆和台湾有很大的不同。余光中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大陆。在台湾，他有很多文坛上的交往，但是在香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会是很强烈的互动，起码表面上不会。初到香港，余光中的人际关系有待重新建立，他可以比较自由和宁静地写东西。所以他说，香港时代是他生命里最安宁的时期。

一方面，香港比较靠近大陆，所以他的心理上跟大陆的关系近了很多。初来香港时，他写诗，听着火车北上南下的声音，就觉得跟他过去很挂念的地方有一种很直接的关系。我猜想，这种心理感受给他带来了写作的气氛，让他常常产生写作的冲动。

另一方面，香港跟大陆的距离比台湾近，很多消息很流通，跟他在美国和台湾听到的信息不一样，消息量也多很多，所以他对大陆情况的理解也比较复杂。因此他作品里面的“乡愁”主题，在美国和台湾时期比较多，到了香港以后，慢慢淡下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余光中曾经说，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你如何解读他把香港比作“情人”这个比喻？

樊善标：我没有问过他，但是你的这个提问让我产生了一些猜想。我个人的诠释是，情人和妻子不同的地方在于，夫妻是一种伦理关系，其间有很多责任，而情人很刺激，关系视乎双方的感应。妻子有点像到达目的地的感觉，而情人则常常在动态里。

香港对于余光中来说，应该是一种比较“刺激”的情况吧。第一点是，余光中在“文革”还没结束时来到香港，他的朋友刘绍铭跟他说过，他在香港会受到很多攻击，结果他真的受到很多政治上的批评。第二点是，他出身于外文系，到了香港担任中文系教授，而且来的时候职衔很高，所以任教古典科目的老师会观察他：外文系的人究竟有没有资格在中文系教书？

但是，余光中能够把这些刺激化为创作和学术

方面的推进因素。比如，到了香港以后，他的创作题材里有很多中国文化的元素，比如曹操、苏东坡、中国古代的游记、重评五四时期的文学。如果他一直在外文系，大概不会开发这些方向。

三联生活周刊：余光中过世以后，整体上说，香港对于余光中的情感主要是推崇怀念，而台湾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推崇，也有批评。

樊善标：余光中直到去世之前跟台湾社会各个方面关系很密切，比如，他参与台湾的教育体制讨论，主张课程里不能减少文言文的投入，这是会牵动当地社会的反应的。在他们的评论里，余光中是复杂的，与很多事情有关。

我觉得，这个现象的关键，在于这个地方对他的熟悉程度：因为熟悉，所以有很多意见；因为不熟悉，所以就比较简单。

三联生活周刊：比起余光中的诗歌，你似乎更偏爱他的散文。和大陆读者整体上会被《乡愁》触动所不同，余光中的哪些作品引发你作为一个香港人的共鸣？

樊善标：我最初喜欢他的60年代《逍遥游》系列的自传式抒情散文，后来70年代《青青边愁》里的比如《高速的联想》，我也喜欢。但我作为一个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人，在感情上最喜欢的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里的那篇《飞鹅山顶》。

三联生活周刊：《飞鹅山顶》是余光中香港时代的一个作品。创作背后的理念是什么？

樊善标：这要从60年代说起。余光中有一篇参与散文论战的文章，叫《剪掉散文的辫子》（1963），主张“现代散文”需要锻炼出一种强而有力的语言，推倒朱自清、冰心风格那种小品文。

当时余光中为了表达很强烈的感情，常常把现代诗的语言用法引进散文里，打破语法规则，但在《听听那冷雨》（1974）之后，他的语言实验已经成熟，就不需要再大规模的破坏语法。《飞鹅山顶》就是运用这种成熟的语言，但加上了很多像顾问一样的起伏照应，非常细腻，我认为这是他散文作品里技巧最高超的一篇。而文章末尾，把大陆、台湾、香港用一个很长的句子连在一起，表达他对这三个地方有同样深厚的感情，更令我从内心产生共鸣。

三联生活周刊：在香港文学圈，在风格上，一度有余光中的“余派”和也斯（梁秉钧）的“也派”之分。他们的创作观念区别是什么？

樊善标：这是80年代后期产生的一种说法。

其实，余光中和梁秉钧没有真的笔战过。他们二位对后学都很提拔，所以像是有两帮人壁垒分明地对立，但这种情况早就过去了。

余光中经常表示对语言的美感有强烈的要求。梁秉钧则强调要看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什么东西，所以主张对事情的看法和视野比用怎样的语言来写更重要。

但是，他们的作品其实比他们的主张丰富很多。例如余光中的《剪掉散文的辫子》没有谈结构，但创作散文的时候在结构上下了很多功夫。梁秉钧虽然不喜欢用成语和那些很古典的意象，但他对语言仍是有要求的，他的语言是提炼过的生活语言。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提到，余光中对于大陆文学观中的郭沫若、闻一多、戴望舒这些五四经典人物，有不同而独到的看法。他在《青青边愁》和《分水岭上》有写。在课堂上，你是否听到过余光中讲这方面的观点？

樊善标：这些应该他讲课的心得，而且他在课堂上讲过的作家不止这些。有一点，余光中在文章里写得很清楚，即他对一个作家的语言运用特别重视，所以他评价那些作家的优点和缺点也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去看待。比如，他说何其芳的散文有很多语病，但诗歌往往有很好的句子，尤其是在开始和结束的地方。他又指出了朱自清一些有语病的句子，我都很同意。当然后来我也发现朱自清的文章还有他没有谈到的优点。总体来说，他的学问是在五六十年代奠定的基础，他本来读的外文，所以欧美新批评对他的影响很大，他那一辈的很多学者的学问都是这种根底。

回头再说他对这些五四经典人物的批评，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把这些作家放在整个中国，或者整个世界来讨论，用古往今来的殿堂作家，来跟这些五四的所谓重要作家来比。比如，徐志摩的诗、朱自清的散文，能不能跟韩愈的散文、杜甫的诗来比较？他是从这个角度进行批评。

余光中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其实是在两个高峰之间的低谷，前面的一个高峰是中国古典文学，后面的高峰就是台湾发展得更好的现代文学，五四那几十年的语言还没有达到很好的地步，所以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永恒的模范。

如果五四是一种断裂，把中国的现代跟古典断开的话，余光中的立场其实是重新把现代文学跟古典文学连上，我觉得这是余光中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乡愁在西方：诗、批判与救赎

文 / 鲁伊

英文中几乎可以和“乡愁”完美对译的名词 *nostalgia*，本身是个外来词。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1688年，就读于瑞士巴塞尔大学的约翰尼斯·霍费尔（Johannes Hofer）——一个身在异乡为异客的19岁法国大学生——从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借来了 *nostos*（漂泊返乡）一词，拼接在意为“疾病、苦痛”的希腊文词根 *algos* 上，在毕业论文里用以描述当时在欧洲四处征战的瑞士雇佣军中十分流行的思乡病。染上这种病的原本健康的小伙子，听不得牛铃的声音，更受不了一首名为 *Khue-Reyen*、被瑞士挤奶工常年哼唱的传统民谣，一经入耳，便会立时神魂颠倒，茶饭不思，斗志全无，恨不得肋生双翅，马上飞回到阿尔卑斯山下的青青牧场。

很显然，虽然大英雄奥德修斯的乡愁——“一心渴望哪怕能遥见从故乡升起的缥缈炊烟，只求一死”（王焕生译）——1000多年中一直是欧洲精英阶层汲取灵感和勇气的源泉，而作为英国乡愁文学经典之一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第30首——

“当我传唤对以往事物的记忆，出庭于那馨香的默想的公堂，我不禁为命中许多缺陷叹息，带着旧恨，重新哭蹉跎的时光”（梁宗岱译）——此时也已经在英伦乃至欧洲大陆被传诵多年，但出现在这些地位并不太高也相对小众的平头百姓（除了瑞士雇佣军，还有被送至乡下抚养的孩童、背井离乡的女佣和年轻的学徒工）身上的乡愁，当时仍是不受欢迎的。

鸦片酊、水蛭放血、鞭打乃至活埋，都曾被用作戒除乡愁的“妙法”，而在瑞士军队中，胆敢哼唱 *Khue-Reyen* 和携带牛铃、煽动乡愁情绪的人，甚至会被威胁当即处决。当然，也有极少数幸运者，得到宽仁的上司或医生的许可，终于能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故乡，虽然自此要背负“意志软弱”的恶名。不过，从后面这一实践中，也可依稀看见，那个时代对乡愁的理解，依然停留在“空间”的层面上——仿佛只要能够实现从他乡到故乡的地理转换，乡愁便能烟消云散。

然而，真正为西方大众文化中的乡愁传统打下基础、奠定基调的，却是同样发生在1688年的另一件事：英国光荣革命。作为这场“不流血革命”最重要的成果，《权利法案》除了对专制王权进行全方



1. 电影《小杜丽》剧照

2. 电影《误会》剧照

3. 13世纪的丁登寺，丁登寺位于英国怀河河畔。1798年华兹华斯重游此地，感慨万千，写下诗歌《丁登寺旁》

位的限制，更从立法上对圈地运动予以支持，这就为其后轰轰烈烈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从此开始，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远走他乡，在陌生的城市里暂寄居、讨生计。与此同时，在新兴资产阶级和新教权贵的步步紧逼之下，传统的封建大贵族渐渐不复昔日的尊荣显耀。人数上占压倒优势的前者，和依然牢牢掌握着文化和审美话语权的后者，同时深切体会到了与往日割裂所带来的尖锐的伤痛，而这便构成了令乡愁的藤蔓恣意生长的富饶土壤。

事实上，无论是始自18世纪的英国感伤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还是19世纪30年代到晚期的维多利亚文学传统，乡愁都是其中举足轻重、几乎被每一个代表诗人和作家涉猎过的主题。时代加诸个体的伤痛借每一个可能的出口发声，只不过有的是抒情小调式的浅吟低唱，有的却有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之音。一个最有意思的例子，是恨不得成为进步主义和个人奋斗代言人的查尔斯·狄更斯，却也写过《小杜丽》(Little Dorrit)这样一本以一个满怀乡愁，时时渴望回到童年、回到故乡的女子为主角的小说。可狄更斯实在高产，风格变化多端，作品的平均水准又都极高，于是反不以乡愁这一隅显。倒是常被拉出来作为英国乡愁文学代表人物的湖畔诗人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和塞缪尔·柯勒律治(Samuel Coleridge)，倘若不为尊者讳地平心而论，则未始没有中年后诗才枯竭、不断自我重复于是形成招牌风格的嫌疑。

然而即便如此，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Tintern Abbey)，仍然是我个人读过的抒写乡愁的最优美的文字，没有之一：

这些美好的形体
虽已久别，倒从来不曾忘怀，
不是像盲人看不到美景，
而是每当我孤居喧闹的城市，
寂寞而疲惫的时候，
它们带来甜蜜的感觉，
让我从血液里心脏里感到，
甚至还进入我最纯洁的思想，
使我恢复了恬静：——还有许多感觉，
使我回忆起已经忘却的愉快，它们对
一个良善的人最宝贵的岁月
有过绝非细微、琐碎的影响，
一些早已忘记的无名小事，
但饱含着善意和爱
.....

而现在，依稀犹见昔日思想的余光，
带着许多模糊朦胧的记认，
还多少有一点怅然的困惑，
心里的图景回来了；
我站在这里，不仅感到
当前的愉快，而且愉快地想到
眼前这一刻包含了将来岁月的
生命和粮食。至少我敢这样希望，
虽然我无疑已经改变，早不是
我初来这山上的光景
.....

(王佐良译)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在这首诗中作为乡愁的另一重维度被引入，从而令乡愁成为一种事实上无法抵达的彼岸：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归来的你，已经不再是离去时的那个你。既然如此，那么这种向后的寻觅，也就只有在能够为“将来岁月”提供“生命和粮食”的意义上才有价值。

但或许是无心，或许是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故意，当左派社会学家和政治学者从19世纪中期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审视“乡愁”时，这一点却被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也随之成为“反动浪漫主义”的批判标靶。

正如美国文化社会学家弗莱德·戴维斯(Fred Davis)在1979年出版的《渴慕昨日：乡愁的社会学》(*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中指出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种十分个体化的情绪，但乡愁本质上深深地扎根于一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自然也就有着它的阶级性。

不可否认，借助后工业革命时代大众媒体广泛传播的乡愁，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乡愁——被向往渴慕的岁月静好，即便真的曾经存在过，也仅仅属于极少数的特权阶级。于是，在19世纪以降的英国和欧洲左派知识分子看来，那些有意致力于推动社会公正的人，如果把目光聚焦于这种虚假的往昔，实际上便是在追求一个开历史倒车的、不那么公正和理性的世界，搭建一个过去式和平行空间的乌托邦，编造一段消除了罪恶感的伪历史，于是不啻为一种政治犯罪。而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比较文学教授马科斯·纳塔利(Marcos Natali)在《乡愁的历史与政治》(*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中则表示，马克思的名言“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本意并不是见死不救甚至加速死亡，而是劝那些在旧有秩序里被压迫、被掠夺的喑哑无声者，不要把得来不易的话语权虚掷在无益的抚今思昔中，与此同时，也给真正的遗老遗少吟唱属于他们自己的乡愁的空间与自由。

然而，知识分子的舞文弄墨、纸上谈兵终究是容易的，但即便是出于最良善意愿的温柔忠告，一旦主动或顺从地被权力绑架，成为权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便难免成为压迫的力量之一。乡愁固如此，反乡愁亦如是。这话题谈起来，不是一两篇文章所能了结，但2013年，台湾金马奖50周年时，担任评审团主席的李安曾受邀与余光中座谈，讲至自己对《理性与情感》的理解时，提出过一个颇有意思的观点：在实际生活中，当遭遇危机时，看上去最感性的人，往往会做出最理性也是自我牺牲的选择，而总是把理性放在嘴边、内里暗藏一个控制狂的庞大自我的人，实际上成了那个最听任自己感性而坐收渔利的人——于是构成了真正的悲剧，但却又埋在皆大欢喜的快乐表象之下。虽然他说的不是乡愁，但其中义理，却正是一致。

事实上，当从新与旧、阳光与阴影、向前看与向后看的二元对立范式中跳出来，近年来对乡愁的

一系列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为审视乡愁提供了另一种角度。比如美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克雷·劳特里奇(Clay Routledge)在其2015年出版的《乡愁：一种心理学的慰藉》(*Nostalgia: A Psychological Resource*)中，便列举了众多乡愁有益身心健康的临床证据。

劳特里奇指出，虽然做出一种转头向后的姿态，但乡愁由始至终都是立足当下的，总是由眼前的恐惧和焦虑所激发，反映了一个人在试图扮演新角色时所体会的紧张、失望、内疚与羞愧。而当面临那些不遂人意又难以凭己力改变的生活事件时，用重构过去的方式消解痛苦、向昔日与他处寻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即便本质上是一种徒劳和虚妄，但依然有助于达成人格和心理的自洽。从这种意义上看，乡愁便闪耀出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明亮光芒，类似于信仰，或者是哲人的“寻找月亮”。

在这本书中，劳特里奇援引了中山大学的周欣悦和高定国2008年发表于《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上的一项涉及民工子弟、大学新生和流水线工人的研究。研究者发现，这些骤然来到陌生的大城市、极其孤独甚少社会支持的年轻人，却能在乡愁(“怀旧”)中汲取力量、信心和希望，与更糟糕的彻底无意义和抑郁消沉相比，这无疑是一个更能伸展向未来和远方的方向——虽然，应当把它当成一座桥而不是一条路。

余光中逝世后不久，莫言在珠海开讲座，接受采访时说，“这(乡愁)是人类持续的情感，什么地方都会写下乡愁”——这自是一个见过自己、天地和众生之后的写作者的中肯之言。全球化的汹涌大潮之下，每个人都被卷裹着不由自主地奔腾向前，否则就要冒着与泥沙俱沉的风险，但究竟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这样一定便能带来自己期待的现世安稳——于是瞻前顾后，首鼠两端，最勇猛精进的人，也最容易被乡愁所感染。

然而，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剧作《误会》(*Le Malentendu*)中，离家多年、满怀想象中的乡愁与责任感归来的哥哥，与困守在真实的故乡、绝望到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别处的生活的妹妹，同样的勇敢与坚定，却因为对当下的刻意回避，在误会中上演了一出手足相残的悲剧。

我想，他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或许就是——乡愁正如西西弗背上那块沉重的巨石，是负担，也是意义，但真正的救赎，只能发生在行走于苦难与阳光之间的每一步里。■

封面引荐

曹景行：乡愁，是父亲的海水化成了我的酒

2017年12月14日，余光中离世的消息引爆了朋友圈集体抒怀的狂潮。曹景行的“80后”“90后”朋友们集体上阵，高声喟叹：诗人已去，乡愁仍在；大师已去，再无大诗！

一派和谐气象之中，曹景行倒是有别的话要说。

“40后”读《乡愁》，没有情怀的滤镜。于曹景行而言，《乡愁》使他想起父亲，写下了“海水悠悠难化酒”而终老他乡的父亲。

于曹父而言，自己正如同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笔下《灯塔看守人》中的主人公，乡愁就是对灯塔的隔海守望。1950年，现代文学家曹聚仁先生在上海挥别妻儿，赴港写作，在时代大变局中寻找生存以及养家的途径。这一去，便再没回到浙江老家兰溪。

海水悠悠难化酒，乡愁便是隔海相望却回不去的故乡——余光中如此，曹聚仁依然如此，尽管时代将他们推向了不同的海岸……

曹景行

前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现为上海东方卫视及全国多家广播电视台的特邀评论员。

▼
Q 关于余光中，最近您和朋友都聊了些什么？

A 我们“40后”评文学成就，断历史功过……

Q 朋友圈里的海外朋友怎么理解《乡愁》？

A 有一种乡愁叫作痛心……

Q 关于乡愁和家国，您推荐看点什么？

A 电影《内布拉斯加》。



欲知详情，扫一扫二维码，听曹景行为你道来“非一般的乡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新看点

主笔 / 谢九

2017 年底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引人关注的一个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意味着政府未来对于 GDP 的增长速度将会淡化处理，转而追求更有质量的增长。按照惯例，每年 3 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都会制定一个年度经济增长目标，在今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新的表述之后，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会如何展示增长目标将会是一个新的看点。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所以对经济增速做淡化处理，一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继续维持高增长目标已经并不现实。2011 年，我国经济增速首次跌破 10%，从此告别两位数的高增长，2012 年“破 8”，2015 年破“7”，在这样的背景下，最近几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不断下调增长目标，2015 年将年度增长目标下调至 7% 左右，最终实际增速为 6.9%，2016 年首次将增长目标确定为一个区间，6.5%~7%，实际全年增速为 6.7%，2017 年将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 6.5%。另外，淡化经济增速目标，还可以为经济改革和转型留出更多的空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 3 年的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这些都需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才可能实现。

政府每年事先设定一个经济增长目标，某种程度上还是带着计划经济的色彩，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这样的做法并不常见。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过去对于经济增速的追求，主要压力在于失业率，政府希望将经济增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以此避免经济减速带来大规模失业。

过去以国企投资为主的增长模式，对于拉动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不是很强，因此需要很高的经济增速才能维持一个相对满意的就业弹性。过去很多年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经济增速必须维持在“7 上 8 下”的水平，才能确保一个相对充分的就业市场。但是随着中国经济逐步转型，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越来越高，2016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已经超过了 50%，很多

新兴行业都具有极强的创造就业的能力，比如电商、快递等等，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的就业压力。最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持续放缓，但是就业能力并没有随之下降，最近连续 4 年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都超过 1300 万人，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另外，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逐渐逼近，劳动力过剩的程度也开始大大下降，甚至在很多行业处于相对短缺的局面，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就业的压力。最近几年虽然因为“去产能”在一些传统行业带来了下岗压力，但总体而言，就业市场的压力和过去相比已经大大缓解。也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我国的就业指标反而提升，2014 年之前，我国每年的城镇新增就业目标大概是 900 万人，2014 年~2016 年新增就业目标是 1000 万人以上，2017 年上调至 1100 万人以上。从最终实际就业人数来看，其实每年新增就业都远远高于预期目标，最近 4 年的城镇新增就业数量都超过 1300 万人。

在淡化了经济增长目标之后，预计 2018 年稳增长力度将会有所下降。在过去强化经济增长目标的年代，政府通常会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来增加市场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最典型的就是当年的“4 万亿”刺激计划。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变化，就是没有再出现“扩大总需求”之类的字眼，从最近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比来看，可以更加明显地看出这种变化。2015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当时还是以扩大需求为主线，而供给侧改革为辅，到了 2016 年，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变为“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可以看出供给侧改革已经跃升为主线，而需求侧管理退居其次，2017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扩大总需求”已经只字不提，只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

在对需求侧管理弱化处理之后，2018 年的财政赤字如何安排也就成了一大悬念。2015 年以来，供给侧管理虽然开始逐渐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线，需求侧管理逐渐被淡化，但是这几年的财政支出并未因此减少，赤字其实反而创出新高。2015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

在2016年3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当时这样的赤字规模创下了1949年来的新高，赤字率也是首次触碰到3%的国际警戒线。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赤字率拟按3%安排，财政赤字2.3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000亿元”。依然保持了扩张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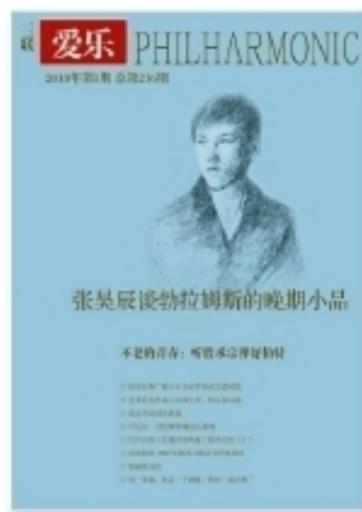
2017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虽然不再提及扩大总需求，但是财政政策并未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对重点领域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压缩一般性支出，切实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预计2018年财政赤字可能还会保持扩张的趋势，一是因为政府虽然不再过度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再提及扩大总需求，但是并不意味着对于经济增长完全没有目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表示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因此，财政开支并不会出现大幅压缩，更多的只是政府投资的结构调整，一般性支出会出现压缩，但是重点领域和项目，比如“铁公基”等传统优势项目依然会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另外，在美国大规模减税的压力之下，中国也会以不同程度的减税来予以应对，减税带来短期之内的财政收入减少，也需要足够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率才可以弥补缺口。因此，预计2018年的财政赤字依

然会在2017年的基础上保持适度增长，赤字率还会维持在3%的水平。

对于2018年的货币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定调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和2017年一样，稳健中性依然是2018年货币政策的关键词，从实际情况来看，2017年的货币政策其实是稳中偏紧，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下降，市场资金利率明显提升，2018年的货币政策应该不会比2017年更紧。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来看，2018年要“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和去年的表述“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相比，其实已经出现了更加积极的变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后3年的三大攻坚战，其中头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目前我国最大的金融风险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带来的潜在风险，而房地产市场带来的风险其实来自两个极端，一是过度宽松的金融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二是过于紧缩的金融政策刺破房地产泡沫，在金融市场引发更大规模的危机，当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如此。对于当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言，如果金融政策过于收紧，有可能因此刺破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进而引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大家都来听一点古典音乐



邮购部电话：
010-64050425 010-64050451
E-mail: aiyuetougao@foxmail.com
《爱乐》杂志官方微博 @ 三联爱乐

《爱乐》2018年第1期要目

封面话题

张昊辰：“勃拉姆斯是一位收藏者”

- 声音** 聆听空气中的现场
每月康塔塔
- 专栏·恒常变奏** 寂静：准古典音乐杂谈开篇
- 专栏·斑斑说乐** 布里顿：关于英国音乐的随想
- 话题** 再次苏醒的阿里奥多特
- 笔记** 录音中的费尔曼和卡萨多
- 早期音乐** 艺术是为普通人而诞生的：柏辽兹访谈
- 现当代音乐** 《海边的卡夫卡》中的舒伯特
- 专栏·浮生碎乐** 虚构采访：切尔卡斯基的无名记忆
- 专栏·藏苑爱乐** 从洛可可到曼海姆乐派
- 作品之眼** 回声与噪音中的《偏狭的1960》
- 歌剧物语** 不老青春：听曼承宗弹舒伯特
- 人物** 灯下漫记一二三
- 文萃** 亨德尔的管风琴协奏曲
- 资料库** 20世纪西方歌剧物语
- 唱片** 倡导建立中国艺术歌曲的规则：范克马的国风游歌
- 书房** 丹尼尔·巴伦博伊姆论瓦格纳
- 乐边** 舒伯特与德莱格尔兄弟：浪漫主义的黎明
- 往事** 比贝尔的《玫瑰轻奏鸣曲》版本比较
-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1960年版练习曲录音所想到的
- 诗人之乐：评《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
- 宝琳特自传
- 每一首歌，就是一个拥抱：我的“前古典”

《爱乐》2018年订阅须知

2018年《爱乐》月刊，每期160页，全年12期，零售单价：20元，全年定价：240元。
2018年《爱乐》邮同发行，邮发代号：82-24，读者可到各地邮局直接订阅，也可汇款至杂志社订阅。

银行汇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燕莎支行
户名：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账号：0200012709201646336

邮局汇款：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邮编：100125
收款人：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网上支付：www.lifeweek.com.cn

网络购买方式：天猫旗舰店、官方微信



天猫旗舰店



官方微信

杭州保姆纵火案辩方律师退庭：一场不计后果的拷问

记者 刘畅

12月21日，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庭审只持续了不到半个小时，便因被告辩护律师的退庭中止。在辩方律师党琳山破釜沉舟的拷问下，人们发现，案件调查的全部真相以及告慰逝者的公正，仍要等待多时。



被告辩护律师党琳山

戛然而止的庭审

杭州冬至时有扫墓的习俗，冬至这天，林生斌前往距家20多公里外的墓园吊唁妻儿。高架桥被拥挤的车流填满，平日30多分钟的路程用了两个多小时。林家人爬上半山腰，来到故人的墓前。孩子的爷爷、奶奶最难抵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楚，围着墓碑放声恸哭，而林生斌蹲在每一块碑前，默默抽泣。这次来探望妻儿，他本来可以向他们多汇报一些的。

此前一天，林家终于盼来对纵火凶手的审判，审判地点在杭州中院，恰好离他家不远。开庭日期本来定在一个月前。但开庭前两天，杭州中院突然告知林生斌要延期三个月。林生斌心里刚做好漫长等待的准备，他在12月17日又接到消息，法院重新决定开庭。庭审的消息一出，大量媒体重新聚集到他面前。即使开庭前一天，他仍带着记者拍摄蓝色钱江被烧毁的家，在镜头前一遍遍回忆半年前的噩梦。林生斌始终沉浸在那里。平时接待媒体，同律师商量正事，他都是彬彬有礼的神情，只有拿出妻儿的照片，向他人讲述拍照的地点，每个孩子的个性，不论痛哭还是微笑，他的眉眼才活起来。

保姆莫焕晶夺走了他的一切，林生斌不会原谅。“莫焕晶罪该万死，我对她只有恨。”庭审之前，林生斌和律师放弃追究莫焕晶的民事责任。他告诉本刊，他们对莫焕晶的期待只有死刑。当我提及莫焕晶8月曾在看守所写的道歉信时，他不想看，也不会看。“上面的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我不想听到她的任何一个字。”

莫焕晶此时也已得知开庭的消息，在看守所里恐惧地等待审判的来临。她已经知道庭审的流程和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她的律师党琳山在12月19日下午，细细地给她讲了五个多小时。她结结巴巴地应着，却似乎仍懵懵懂懂，尤其是律师让她“扛住”的话，直到在法庭上与审判长面对面，她并不能想象那意味着什么。莫焕晶只是心怀愧疚地畏惧死亡，她最能确定的是，她将再次面对被自己害惨的雇主林生斌。

12月21日上午9点4分，被告人莫焕晶被押进法庭。早在今年8月21日，她因放火罪、盗窃罪，被杭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四个月出现在法庭上的莫焕晶散着长发，特意穿着黑衣，被法警架着胳膊带到被告席上。林家先她进来，林生斌仍是一袭黑衣，作为受害方的诉讼参与人，坐到公诉席上。他的哥哥、嫂子，以及大舅子朱庆丰坐在旁听席上。我作为记者，在法院通过影像看不清双方的表情。这一天的法院如临大敌。早上8点出头，法院大门前便已聚集一二十家媒体，门口的警察和法院工作人员一道，查验记者的身份。媒体无法进入第二法庭，经过两道安检，被安排在新闻发布厅通过影像观看庭审全程。

人物的面容在屏幕里并不清晰，坐在莫焕晶右前侧的林生斌一直面朝前方，似乎从未侧头看她。而莫焕晶的神情虽然模糊，但她的声音和回答透露出她的紧张。她刚一落座，便被审判长叫起来回答问题。她颤抖着回答自己的基本信息。问到籍贯时她一停顿，似乎没有听懂，问居住地时，她才回答上来，又接连说错了拘留和被逮捕的时间。

虽然磕绊，但也算顺利，莫焕晶回答基本信息完毕。按照接下来的程序，审判长询问双方是否要求合议庭成员回避。没有想到，这个程序导致了庭审的停滞。轮到莫焕晶时，她表示不懂审判长的意思，要求辩护律师替他回答。党琳山在法庭上第一次获得发言的机会，他把问题引向法院的管辖权，认为杭州中院违法审理，要求停止庭审。而审判长依据犯罪地的法院有管辖权的法律，裁决杭州中院可以管辖，宣布继续审理。复进入审理流程后，党琳山便又申请停止审判。

“不要回答任何问题！”经过四个回合的拉锯，审判长决定直接进入下一程序后，党琳山宣布以退庭抗议，随即向莫焕晶大喊，之后拂袖而去。审判长立即询问莫焕晶，是否另要其他辩护人。被告席上站着的莫焕晶被旁边的法警扶住，她终于知道了“扛住”的意思，带着哭腔说道：“我就要党律师。党律师会给我辩护的。”审判长随后宣布庭审延期。

莫焕晶离庭，一场似乎即将告慰死者的审判，却以看似闹剧的形式中止。

破釜沉舟的一场戏

“时间从一天一天地临近，变为一小时一小时地迫近。我就感到铡刀即将降下。”庭审“闹剧”的主角党琳山律师是前一天夜里才下定的决心，他说自己情非得已。拿到律师资格证已将满10年，党琳山非常清楚退庭不是小事，他知道必有处罚，预料事后被吊销律师执照的可能最大，甚至还设想会因扰乱法庭秩序被判刑。但他在事后接受本刊采访时说，他还是决定非如此不可，“我不能配合他们‘杀人’”。

开庭一早，党琳山进入法庭前就已十分不满，辩护律师没有换衣间姑且不论，他拿着律师服进入法庭时，安检员还拿仪器扫了他两下。“辩护律师是不需要安检的。但我不在意了，大戏还在后头。”前一晚夜里两点做出决定后，他连夜写就辩词，没工夫打出来，就存在电脑里。电脑已先他一步，放在辩护席的桌上，他开庭后对着念即可。

他连应对之策都准备好了。审判长向他问话后，他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6条，认为浙江省高院和最高法院有管辖权，可以另外指派杭州市其他法院审理此案。当他打算继续陈述观点时，审判长扼要地问他，是否在申请异地审理。他便拉出早已想好的说辞，搬出领导讲话，逼迫审判长继续听完他的讲话。接着，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真正理由，案件调查证据不足，申请关键证人出庭又未得准许，如此仓促审理，于人于理都不公。

党琳山告诉我，因为一直口腔溃疡，庭审时他的上堂还肿着，发言稿又写得仓促，他只是担心自己的表述不清。因为他的发言其实既是案件调查、审理中的问题，也是自己近半年来种种挫败的回顾。

7月1日，莫焕晶被拘捕，即将面临公诉。当莫焕晶的弟弟四天后找到党琳山，想请他做辩护律师时，党琳山干脆地应下。保姆的家人找他前，他在网上了解了整个事件，认为它具有社会意义。“这



(杨子健摄/视觉中国供图)

2017年12月21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杭州保姆纵火案，受害人家属林生斌抵达法院，走进审判庭

不光是保姆放火，死了四个人，然后把保姆杀了那么简单。它牵涉到物业和消防的问题，我希望在还原事实真相，厘清各方的责任之后，这个案件能够推动物业、消防的改善，也能推进人们的消防意识。”

在拿到警方提供的案卷前，党琳山已经对救援过程有了自己的疑问。“蓝色钱江小区离消防中心直线距离不到500米，如此现代化的城市、如此高端的小区，超过300平方米的豪宅里过火面积50平方米，灭火却用了两个多小时？”他期待在案卷中寻找答案。8月10日，他接到杭州市公安局的电话，莫焕晶将于次日移交检察院。转过一个周末，他立刻赶赴杭州，到检察院拿取案卷的电子复印件。虽然之前料到案情调查可能会有疏漏的地方，但打开案卷，他仍然大吃一惊。案卷前后混乱，没有页码，且充斥大量重复但不十分重要的信息。

“当时天已经亮了，有许多人报警，连江上打鱼人的报警记录，他们都收录进来。”而与之相反的是，消防救援部分极其模糊，2000多页的案卷，消防员的证言只有一页多，提供口供的消防员只有两

名，还是第二批进入火场的队员。检察院提供的资料中，也没有事故责任鉴定报告。不但之前的困惑难以解答，又生出越来越多的疑问。

党琳山说，通话录音的记录显示，朱小贞曾在报警中明确告知自己在屋中的位置。“这说明屋中有人，但消控室的报警记录显示，消控人员说‘没有人’，是谁告诉她没有人的？”被告的辩护律师独自取证的空间极其有限，他怀揣这样的问题，期待检察院的调查。被告人移交检察院后，在检察院提起公诉前，是检察院的审查取证阶段，辩护律师有权提交法律意见书，要求检方对证据不足之处再做调查，若有必要，要把案卷退回公安部门重新侦查。这个时间的期限是一个月，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如果需要补充侦查，可以补充两次，每次最长一个月。

“但像这样影响重大的案件，一般审查取证会比较迅速。我拿案卷时，检察院告诉我，这个阶段半个月到20天之内就会结束。”尚有半个月时间，党琳山正细细地书写律师意见书，却突然接到8月21号已向莫焕晶提起公诉的通知。“从移交检察院

到提起公诉，只有10天之间，当中还有两个周末，审查时间只有5天，简直是闪电办案。”

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党琳山能做的便是在法庭上还原真相。8月29日，他到法院查阅纸质的案卷和证据，发现消防部分的内容仍然模糊。他拍照取证，又着手向杭州中院提交《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既然报警记录证明屋中有人，为什么最后救援的时候没有发现人，现场到底是如何指挥的？”他告诉我，在《申请》中既有指挥救援的指挥员和第一时间进入火场的消防员，也有那个报警说“屋中没人”的消控室工作人员。这一次《申请》顺利寄出，但他从9月一直等到在11月初，在庭前会议上，他提出38名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中包括19名物业人员、9名消防人员、5名邻居，还有5名社区主任等其他方面的人，但被法院全部驳回，理由是“没有必要”。

辩护律师对于法院认为证人没有必要出庭的决定，并没有过多的申辩方法。“一审的证人都出不了庭，二审时就更困难了。”党琳山认为本案受到当地的司法干扰，便想到了异地管辖的办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6条，上级法院可以指定下级法院将案件移交其他法院审判。”党琳山也知道，之前没有这个先例。但“法不禁止即可为”，他看到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涉黑涉腐的大案为排除司法干扰，上级法院指派异地审理是常见的措施，他仍抱有一线希望。“上级可以指派，我为什么不能申请？”

开完庭前会议，他向最高人民法院邮寄了《管辖申请书》，恳请指定浙江省外的法院审理。最高人民法院显示收到他的申请书后，他将此信息告知杭州中院，并向法官、陪审员呈上亲笔信，要求在没得到最高法院明确答复前不要开庭。“我已经在亲笔信中给他们打了预防针。”他把亲笔信的照片发给本刊，上面写道：“我下定决心，哪怕此生只办这一个案件，此后再不当律师，我也要竭尽全力办理本案。”

12月17日，他突然接到四日后开庭的通知。这次与以往书记员律师商量开庭时间不同，法官亲自打来电话，直接告知他开庭时间。原本党琳山在21日需要出庭另外的案子，他把另一个案子的开庭时间推迟，火急火燎地赶到杭州。直到此时，检方提供的证据也几乎只有莫焕晶的口供和死者的死亡鉴定报告，退庭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但他仍没有下定决心，会见莫焕晶时，仍详细地把审判流程告

诉她。不过他也知道，一旦自己决定退庭，尚不足以中止庭审，若法院当庭指派辩护人，莫焕晶也接受，审判仍能继续。“如果当庭给你换律师，你就骂他！”他告诉莫焕晶要死命扛住，“这世上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了。你本来就面临死罪，换了律师，你就是死路一条。”

休庭的下午，他来到看守所打算再与莫焕晶见一面，让她顶住。这一次他没料准，“我证件齐全，莫焕晶又没有解除委托，按理说不能不让我见。但看守所说杭州中院已经告知他们，我已经不是她的辩护律师，死活不让见”。党琳山只得作罢离开，莫焕晶也许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物业消防责任不明，审判遥遥无期

“为什么庭审延期了半年，受害者家属一句话没说就结束了？”庭审当天，莫焕晶离庭后，一直低着头的林生斌从公诉席上站起，质问法庭工作人员。在家属“不服”的吼声中，新闻发布厅的庭审信号中断。朱庆丰休庭后对我，他们既为自己没说完话觉得憋屈，也对法庭没有准备充分感到恼火。对他们来说，莫焕晶纵火行为已足以判处死刑。“这是典型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林生斌的律师何向阳向我介绍庭审如果正常进行，他们将陈述的理由。“从动机上来看，她是故意纵火，而且社会危害重大，后果严重。”

莫焕晶的纵火行为已经调查得比较清楚，6月22日清晨4点55分，她在客厅点燃书本，扔在沙发上，引发屋中大火。“她只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没有对抗侦查的经验，口供一直很稳定。”党琳山告诉我，案卷中她的口供与自己找她谈的内容基本一致。不过他觉得莫焕晶的动机和行为仍有可商榷之处。“她是在女主人快起床时点的火，而且是在客厅点的书本，说明她不是故意纵火杀人。她还报过警，

“如果当庭给你换律师，你就骂他！”他告诉莫焕晶要死命扛住，“这世上没有比死更可怕的了。你本来就面临死罪，换了律师，你就是死路一条。”

出事后也很后悔。”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大火救援中物业与消防的责任如果调查清楚，则可能形成“多因一果”的局面，“主次责任分清楚，虽然死刑的概率仍很大，但或许还有一些减刑的概率”。

党律师能想到的，林家的律师何向阳也已想到。但何向阳认为即便承认“多因一果”的事实，单单纵火就足以判处死刑。“纵火本身就是重罪。它危害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很多纵火案不是一家着火，往往都是整栋楼都着火，死伤无数。”

林家也自始至终表示，真相本身就是还在还家属公道，其他环节的责任也必须追究。“这就好比有人在自来水厂投毒致人死亡，投毒的人固然有责任，但如果自来水厂在水质监测时发现问题，及时截断水源，可能也不至于造成死亡。”林生斌看到案卷后，曾两次向杭州市消防局申请调取事故调查报告。“其中应当包括，起火场所概况、起火经过和火灾扑灭情况、火灾造成的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统计情况、起火原因和灾害成因分析，以及防范措施。”他认为，依照公安部颁布的《火灾事故调查规定》，这个报告必须提交。但杭州市消防局在给他的回信中表示，该案已定性为刑事案件，已经移交刑侦部门调查，他们只是提供技术支持，并未制作调查报告。

“为什么四年前的案卷中就有，这次就没有？”党律师了解到林生斌提出申请受控，向我举出2013年元旦萧山纵火案的例子，那是一起公司女员工为报复仓库班长，引燃仓库内的纸箱，导致仓库起火、消防队员救援时牺牲的案件。“那个案件也是在杭州中院审理的，案卷中就有事故调查报告。”

相比于单枪匹马又肩负被告方辩护人身份的党琳山，林生斌的律师团队在取证时渠道更多，他们在悲剧发生不久便开始取证。“我们去找物业要证据，等于是去拿他们的把柄，他们始终消极应对。物业的问题本身就需要通过相关部门的调查来认定。”没有事故调查报告，他们梳理警方提供的案卷、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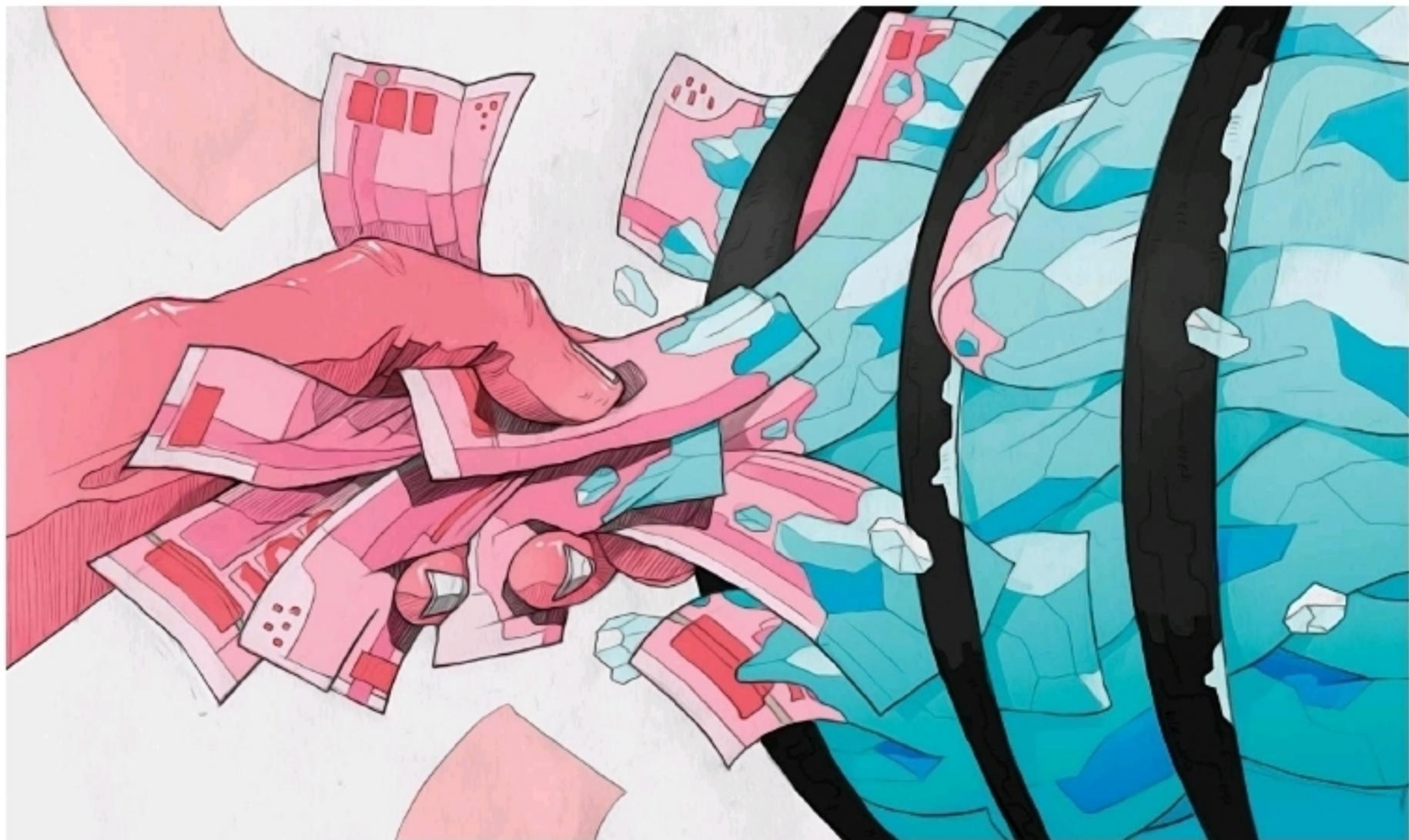
证言的录音，搜集媒体的报道、邻居的证言、视频，并向杭州市规划局要来蓝色钱江小区的规划图，试图来明确物业的责任。何向阳告诉我，规划图上显示，小区南侧本有个水泥的登高台，物业把那里改成花坛。草坪支撑不住消防车的重量，导致无法搭起云梯直达火场。因尚未庭审完毕，他不便向我透露更多的疑问。

不过，本刊透过党琳山揭露的信息，发现从报警到救援似乎都疑点重重。“物业的问题在案卷中已提及，他们自己的工作人人员说，他们5点40分才去启动消防泵。”党琳山在阅读案卷后发现，他对消防队出警的安排十分疑惑，消防队5点4分接警，当时天刚蒙蒙亮，路上几乎没车，结果消防车5点16分才到达小区门口。“最终现场来了14台车，只有1台是喷水的消防车，反倒来了4台泡沫车。他们到底知不知道是什么性质的火灾？”

党律师提及的情况，林家一方在案卷中也能看到。“我们与绿城物业是合同关系，要追究他们的民事责任。消防救援属于公共服务，他们的问题是行政的问题。”何向阳告诉我，林生斌要分开追责。莫焕晶的刑事案件结束后，他们打算向绿城物业提起民事诉讼。已有的案卷和消防部门的判定，物业确有责任，但责任的大小、赔偿的多少，仍需要调查报告提供依据。消防的问题需要另外的部门调查，而事故的调查报告能反映消防人员是否渎职。“现在看来，林生斌肯定要一追到底。”何向阳向我诉说时，难掩疲惫，他们如今仍在筹备莫焕晶的刑事案件和针对绿城的民事诉讼。对于可能向消防局提起的行政诉讼，还没有放上日程，那对于他们来说太遥远了。

党琳山的退庭把这份期待又推远了一分。“我对林先生感到十分抱歉。但本案复杂，一定要按法律规定来还原真相。我希望他身边的律师能够劝导他。”我与党琳山见面时，正是广州司法局发出对他立案调查消息的时候，他尚未接到任何通知。采访期间，朋友和网友发来的问候接连不断，他一一表示感谢。只有在与妻子、母亲的电话里，他表现出些许不耐烦，以此来冲淡她们的担忧。他告诉我，没有法院“视为”他拒绝辩护的说法，他不会主动拒绝辩护，而只要莫焕晶不解除委托，他就为她辩护的权利。而如果他的律师执照被吊销，辩护的资格消失了，他也留了最后的方案。“我倒下了，还会有律师顶上。”

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大火救援中物业与消防的责任如果调查清楚，则可能形成“多因一果”的局面，“主次责任分清楚，虽然死刑的概率仍很大，但或许还有一些减刑的概率”。



（插图：老牛）

“黑社会”家庭讨还财产记

记者 / 王海燕

辽宁“黑老大”袁诚家依然在狱中，但无论其申诉脱罪是否成功，根据法院判决，其合法私人财产都应该依法返还，这是袁诚家可以提出天价国家赔偿的法律基础。

袁诚家，辽宁本溪人，2010年11月被逮捕，名下所有财产同时被查扣，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其众多家人和亲属。2015年，辽宁高院以“涉黑社会”等6项罪名判处袁诚家有期徒刑20年，但部分财产应予返还。这意味着，无论袁诚家“涉黑”罪名能否申诉脱罪成功，袁家的大部分财产都来自合法经营所得的合法私人财产。

但法院判决生效后，袁家向辽宁省公安厅讨回

财产的路途却遥遥无期，因为企业已遭拍卖，部分财物也不知去向。最终，2017年，依然深陷牢狱的袁诚家和刑满释放的妻子谢艳敏向辽宁省公安厅提出37.3亿元国家赔偿。2017年9月，辽宁省公安厅做出赔偿决定书，决定返还袁诚家被扣的各项财产以及相关利息共计6.79亿元。目前，袁诚家已经向公安部提出复议申请。

不曾谋面的采访对象

4个多月前，我乘坐高铁准备去见谢艳敏，她是袁诚家已经刑满释放的发妻。火车开出沈阳站后，我跟她电话约定在本溪市火车站见面。从沈阳坐高铁沿着东南方向往本溪，车程只有一个小时，但地形变化巨大，一望无际的辽河平原渐渐走到尽头，

消失在起伏的山岭当中。这些连绵的山岭爬向长白山支脉，物产不丰，却是中国最丰富的金属矿石资源集中地之一。因此，和毗邻的鞍山一样，本溪也是东北著名的钢铁基地。

20年多前，普通马车夫袁诚家就是从这里起步，乘着矿石市场飞涨的东风，成为本溪当地数一数二的富商，先后当选本溪政协委员、鞍山市人大代表，被评为本溪慈善助学先进个人、辽宁抗震救灾捐赠突出贡献个人，又紧接着成为“黑社会”，几乎和全家一起深陷牢狱之中，数十亿家财尽失。

曾以“虚开发票罪”被判刑3年6个月的谢艳敏早就刑满释放了，我去见她时，她正在张罗向辽宁省公安厅申请国家赔偿的事，申请金额共计37.3亿元，已被受理。这不仅是中国首例服刑人员提出国家赔偿被受理的案例，也是目前个人向提出申请国家赔偿金额并被受理的最大一笔。随后，2017年9月7日，辽宁省公安厅决定返还袁诚家被扣的各项财产以及相关利息共计6.79亿元。但谢艳敏没能在家中接到返还决定书，我也没能在火车站见到谢艳敏。根据我在本溪市公安局看到的材料，就在火车站等着与我碰头的前10分钟，谢艳敏再次被刑事拘留。

1965年出生的袁诚家，是辽宁省本溪市南芬区思山岭村人，1985年到本溪南芬的桥头砖厂当工人，与工友谢艳敏结为夫妇。两人结婚时，家里还一把椅子都没有。随后，袁诚家买了一辆二手老“解放”货车，在工地搞运输，渐渐成立车队，后来又做起了生产钢球的生意，算是进入了矿石行业，因为钢球是铁矿石厂磨矿粉的必需品。

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因为钢球生意，当时一家名叫本溪偏岭第一铁选厂的小型国营企业在低迷的矿石市场里持续亏损，欠下袁诚家上百万元货款。在当时国有企业改制的转型浪潮中，偏岭镇政府组织竞标，欲将铁选厂承包出去，标价260万元。袁诚家在无法收回欠款的情况下，举债承包下了这座铁矿厂。根据公安机关《询问笔录》，时任偏岭镇镇长王兴、同时参与竞标的高振海和投标后却放弃竞标的陈广运气的证实，当时铁矿市场行情低迷，一吨铁粉成本60多元，市场价100多元，扣除税费并无利润可言。

但袁诚家获得这座矿厂后，铁矿粉行情逐渐好转，2002年起，铁精粉价格上升，最高时达到1600元一吨。袁诚家发了，渐渐扩大事业，走出本溪，到

2009年，光其名下的鞍山金和矿业就拥有5个矿，11家企业，员工上千人，生产力达到每天3000吨铁精粉，而此时铁精粉的价格仍处于每吨千元以上高位。

谢艳波说袁诚家发家，主要是运气好，“行情好起来，干什么玩意都好，基本上就是这么回事。他有挣钱的命，干嘛行都涨价”。但她也坦承，袁诚家确实是全家最有生意头脑的，做事还拼命，基本是工作狂，她姐姐以前看上他就是这两点。事实上，袁诚家后来还把事业拓展到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多个行业。

但他的好运只持续到2010年，根据媒体报道，当年10月，辽宁省公安厅成立了158人阵容的“10·05专案组”，打掉了以袁诚家、杜德福为首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袁诚家及其妻子谢艳敏、儿子袁岐峰、外甥和两个连襟均涉案被捕，当时抓捕的犯罪嫌疑人超过百人，成为轰动一时的打黑大案。当时，辽宁省公安厅还查抄了袁家包括数十家企业在内的几乎全部家财，根据通报，袁诚家当时身家达到20亿元。

一夜财尽

出事后，谢艳波头几天还不相信，觉得不真实，“资产这么多？怎么看着就像演电视似的”。在那之前，家里的企业虽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谁也没提过分钱的事，所以也不知道家里的企业到底值多少钱。一家人感情也不错，搞新投资都是开会，能说到一块就搞，吵得不行就不搞。谢艳波有时候觉得自己家里挣钱确实挺快，但到底多挣钱，她没感觉，只是觉得赶上了好时候。“说白了农民出身，也没什么文凭，稀里糊涂这么干的，至于说有多少钱，大家都是出事后才知道的。”

之前，谢艳波从来没想到自己家里会出这件事。她说袁家的企业是标准的家族企业，袁诚家共8个兄弟姐妹，谢艳敏共9个兄弟姐妹，从袁诚家做生意开始，就陆陆续续加入，如今几乎全都在袁诚家的企业里工作，遍布重要岗位和普通岗位。车队扩大时，亲戚们也一起凑过钱买车。甚至，企业效益不好时，半年不发工资也正常，反正一大家人在一起，吃大锅饭，睡大通铺，工资都折合成本金投入企业，变成股份。

后来因为企业发展好，亲戚拿的工资依然比普通工人略低，不同的是可以挑轻松岗位，年底有分红，

婚丧嫁娶还有袁诚家付钱，肯定比普通人家办得好。袁诚家依然不允许大笔折算股份提现，因为生意做得好，几乎每一次家庭开会，家里都还在讨论扩大投资的事。

谢艳波觉得特别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想吃啥能吃得上，想穿点啥也能买得起，不就行了？”在谢艳波的概念里，也就比普通老百姓过得好点，总不至于出多大的事。

她平时住在鞍山，在一家厂里做采购，袁诚家的家和企业总部都在本溪，逮捕和查封是2010年10月5日晚上在多个地方同时进行的，谢艳波一点不知道，她第二天去上班，一看办公楼都贴了封条。别人跟她说：“你姐家被抄了。”谢艳波还半信半疑，“这事儿可不能开玩笑”。

那人还告诉她，袁诚家是在北京被抓的，谢艳敏已经跑了，嘱咐她别打电话。袁诚家在北京的事谢艳波知道，当时袁诚家准备去美国开一个级别挺高的会，一家人还挺乐呵的，平时袁诚家不管钱，卡里钱不多，那次特意打了上亿元，“大家都说这么高级别的会，别给中国丢脸，多带点钱”。根据警方通报，袁诚家正是在首都机场被逮捕的。但谢艳波当时得到的另一个情报是错的，她的五姐谢艳敏和外甥袁岐峰根本没跑掉，同样在当晚就被逮捕了。

随后，各个企业的财物查封、扣押和冻结也开始了。谢艳波还记得，当时公安人员都是自己带着开锁师傅，拿了东西就走，根本不需要厂里的员工带路开门，也没留下什么手续。甚至有一次查封已结束，一个公安人员又回到一间办公室取了一块玉走，厂里的员工希望公安人员开个手续，好跟老板交代，但最后也没拿到任何东西。谢艳波是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当时一点也不懂法律，很多人去查封、扣押财物的时候，连身份证件都没有出示，她也没敢询问。

谢艳波知道谢艳敏也被逮捕的时候，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当时她另一个外甥给她打电话，告诉她，可能袁诚家一家三口真回不来了，她才赶到本溪，发现袁诚家家只剩下高三的小女儿，在屋里哭得熊猫似的。袁诚家家地处本溪市中心的房子，虽然不在扣押财产之列，但谢艳波看的情景是，房子已经被翻了个底朝天，值钱的家具和装饰品都没了，连裱在墙上的画都用刀片割下来带走了。她心里一凉：“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谢艳萍是谢艳波的另一个姐姐，就住在袁诚家

对面，她知道三次查封家产的过程，第一次是逮捕谢艳敏和袁崎峰当晚，第二次和第三次同样是晚上，每次去都“咚咚咚”敲门敲得山响，后两次公安人员还分别带去了袁诚家厂里的员工和两名亲戚作见证人。其中一位当过见证人的亲戚告诉我，公安人员扣押东西时，他被关在了一间房子里，并没有见证全过程。而在后来的庭审中，袁家人发现，三次查抄中只有最后一次警方开具了扣押清单，而最后一次，家里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多了。谢艳敏后来在法庭上就此提出了疑问，公诉机关的答案是，清单外财物为非涉案财产。袁家人哭笑不得，“不是涉案财产？那你拿走干啥？”

因为没有扣押清单，企业账目被公安厅查封，袁家的人也算不清楚家里到底被查封、扣押和冻结多少财物。一审判决中称追缴、没收了袁诚家实际控制的22家企业及账户内资金，以及30余台车辆。但一大家人能够想起来的大宗财产起码还包括400箱茅台，价值500万元。当时，袁诚家的大儿子袁崎峰已经谈了女朋友，茅台就是为婚礼准备的。谢艳波说：“家里亲戚多，不是好个面子嘛。”除了这些茅台，在第三次扣押中，袁诚家家放在酒柜上零散瓶装酒也被带走。但很多东西既没有出现在判决书上，也没有扣押单据，像是凭空消失了。

蹲在公安局门口要财产

随着袁诚家被捕，辽宁省公安厅组建的专案组接管了袁诚家的所有企业，跟袁诚家有亲属关系的工作人员都很快被辞退，失去了经济来源，各家原本不多的积蓄很快耗费在打官司和给狱中亲友补充零花钱上。在辽宁营口市中院的第一次判决中，判决追缴、没收了袁诚家实际控制的22家企业及账户内资金，以及30余台车辆。

袁家随后发起上诉，2015年11月，辽宁省高院对袁诚家案二审判决，判决书明确称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袁诚家部分企业及账户资金与违法犯罪有关，追缴、没收不当，应该依法返还。此外，袁诚家及家人名下部分其他财产，包括存款、现金、入股银行的股金、查封扣押的300箱茅台酒等大量贵重物品，黑社会组织成立前已拥有的2000万元等，都是袁家的合法财产，同样应当依法返还。

同时，袁家人在法院得到答复称，法院也没有见过查封、扣押和冻结的财务，所有财物均由辽宁

省公安厅组建的专案组处理，同样应由公安厅返还。但谢艳波发现，和所有被逮捕过的亲戚一样，谢艳敏一开始“挺打怵的，非常害怕，觉得只要回来就好”。别说去公安厅讨还财产，甚至门都不出，只说自己能活着出来就挺好，不要什么财产了。最后是其家人

但谢艳波觉得“凭啥呀，这个社会不是越来越好吗？”并且，到后来不要也不行了，谢艳敏刑满释放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一分钱都没有，都是靠朋友救济生活，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

杨春江是袁诚家的连襟，也是公司副总。拿到二审判决后，他还挺高兴的，毕竟是法院黑纸白字的判决，感觉特别有希望拿回来很多东西。但他很快就发现，判决书只是一支画笔，画一个很大的饼，却兑现不了。

李晓斌开始陪着谢艳敏去本溪市公安局门口蹲着，专案组在那里办公。谢艳敏有时候能进门，但李晓斌铁定进不了，只能在外面候着，好几个月，公安局门口小卖部的阿姨都认识他了，跟他调侃“又上班来啦”。因为袁家人从来没有拿到过扣押清单，企业账本也全部被收缴，大家都只能靠回忆，搜肠刮肚想家里以前有些啥。接受采访时他们说最多的就是那数百项箱茅台酒，原因是当时公安厅声称茅台酒是假的，已经找袁诚家签过字销毁了。但销毁并没有录像，况且袁家人知道，酒是分批好几年才买齐的，假不了。

其次是车队45辆车，有些是公司名下的，有些是私人名下的，全都被收缴了。一审判决裁定没收30辆，剩下的应予返还，但直到二审判决生效将近半年后才返还了15辆。孙铭泽记得有一辆是他名下的私人车辆，出事时刚买的新车，拍了照片还没来得及开就被收缴了。他过去一看，已经跑了3万公里，底盘保险杠刮得稀烂，2012年还在高速有违章记录。孙铭泽不满，不想签返还单，但想到下一步还有事要办，还是收下了。

能要回来车，是重大收获的时刻，更多的时候，李晓斌和谢艳敏在本溪市公安局门口守上几天，能进门就很不错了，早晨8点多钟出门，中午在小卖部随便买点东西吃，下午工作人员下班了也跟着回家。取得成果是比较随机的事情，有时候俩礼拜人都见不着，针都拿不回家一根。有时候公安局也主动打电话叫他们去领东西，但不说是什么，让他们雇辆车去，结果发现挺高兴一去，只是几块手表、

几根金条。袁家人发现，这事儿比做生意难太多了，他们用“求”这个字形容跟公安厅打交道的过程。

迄今为止，到底领回来了多少东西，可能除了谢艳敏，没人真的有数，袁家的人虽然签了返还清单，但每次的两份清单公安局都收回去了。根据后来的计算，在二审判决后，袁诚家和谢艳敏提出国家赔偿前，辽宁省公安厅返还了袁诚家3.8亿元。

但除了还未返还的1.5亿元现金，袁家人更在意的是应当返还的17家企业及其本应该正常经营产生的收益。如今，距离当初出事已经7年了，亲属当中有些人迫于生存压力，开始重新找工作了，开出租的、养猪牛的、做点小生意的都有，另外一些人奔波打官司的事情，谢艳敏就给发点生活费。但大家都还是希望把原来的企业经营起来，李晓斌说：“原来就是在矿上弄车队，别的啥也不会，现在哪上班去？有个企业，亲属都有工作，也有口饭吃。”

为什么提出国家赔偿

其实，在提出袁家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之前，袁家的人去北京上访过，去拦过巡视组，还扯过横幅，有什么招全都试了，但要不回来的钱还是要不回来，因为被查封、扣押和冻结的企业和财产，公安厅在法院判决之前就处理了。比如在被判决应该返还的企业中，能盈利的早就在法院判决之前就被拍卖了，正在建设准备投产的则全停了。杨春江记得原来准备发展房地产的一块地，当时已经投资一个多亿，后来被政府拍卖类，如今楼也盖完了，却卖不出去。他有时候走过原来那些生产的厂矿，觉得很心酸。

国家赔偿是袁诚家的现任律师王殿学提出来的，王殿学则是谢艳波在看法制节目的时候发现的，当时王殿学接受电视台采访，分享了自己在吉林代理过的一个国家赔偿案件。和之前提出国家赔偿的“聂树斌案”“呼格案”等冤假错案不同，袁诚家虽未改判，但王殿学认为，申请国家赔偿并不需要等到无罪，因为罪犯的合法财产仍然受到法律保护。

今年5月15日，还在狱中的袁诚家和刑满释放的谢艳敏分别委托自己的律师，向辽宁省公安厅提出37.3亿元国家赔偿，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未返还的1.5亿元现金、17家企业及2010年11月至2017年5月企业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26亿元；袁诚家投资银行筹集款，共计2.8亿元，及其收益0.97亿元；包括手表、金条、书画、工艺品、玉器

摆件、茅台酒在内的其他物品。3天后，辽宁省公安厅正式受理该案，舆论哗然。

3个月后的8月11日，辽宁省公安厅做出《国家赔偿决定书》，决定对袁诚家返还扣押的转让企业款及支付利息（包括申请企业退股款及利息）2.62亿元；返还扣押钱款及利息4.12亿；返还243箱茅台酒、部分瓶装酒及不能返还的茅台酒折价赔偿70余万元等，共计6.79亿余元，创下了中国国家赔偿的纪录。但袁诚家和谢艳敏的代理律师王殿学依然向公安部提出了国家赔偿复议申请，共计6项内容，包括返还16家企业及企业正常经营所产生的收益26亿元、返还钱款的利息应从扣押之日起计算、1亿余元的银行募集款及相关利息等。

除此之外，袁诚家还委托王殿学为自己的黑社会罪名申诉。根据此前媒体报道，2002年，袁诚家因与人有债务纠纷，加之本溪矿产争夺恶化，袁诚家与刑满释放的杜德福走到一起，形成了“以商养黑”和“以黑护商”的犯罪链条，并造成包括2人死亡在内的严重后果。但袁家人坚称，各个矿上只是成立了正常的保安队巡逻，死亡案件则是另案处理过的其他案件，而杜德福也早在2006年就因其他案件再次入狱，直到袁诚家被逮捕之前才被释放，并随

即因为袁诚家一案再次被捕。同时，在二审和包括后来的申诉中，已有包括原本溪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副支队长张志伟在内的多名嫌疑人被改判无罪。

与黑社会脱罪申诉相比，讨回本就不涉案的合法财产看起来比较没有悬念。但迄今为止，我依然没能再次联系上谢艳敏，在与我约定见面的当天被拘留后，她还没有获得自由，并被冻结了1.4亿元存款。谢艳敏的涉案罪名依然是7年前的“抵扣税款发票”，办案单位也依然是2010年办理袁诚家一案的“10·05专案组”。而实际上，谢艳敏已经有7年时间没有经营过任何企业了。

现在家里为了这件事跑进跑出的依然是谢艳波，她说自己7年前跟警察说话都舌头打结，现在跑看守所跑监狱跑法院，已经跟走自家客厅一样了。以前她看电视剧，觉得真是胡扯，后来她发现，电视剧再精彩，都是来自生活。她的五姐又失去自由了，一大家人大多数都无所事事，而她自己，她觉得她一直都是那个买衣服超过1000块就会心疼的农村人，她也不知道事情怎么就落到了自家头上。有时候她想起，曾有人对谢艳敏说过，挣钱不要挣得太多，挣多了就不是你自己的了。现在她有点体会到了这句话。☑

《读书》2018年第1期目录

- | | |
|-----------------------------------|--|
| 王东杰 中国世界观最早的幻灯片 | 康子兴 《联合法案》与不列颠“法意” |
| 万曼璐 朱熹究竟懂不懂古音？ | 乐启良 法国绝对君主制的“阿喀琉斯之踵” |
| 周 漭 “另类右翼”与美国政治 | |
| 顾 昕 美国按揭型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 | |
| 杨念群 “新史学”十五年：一点省思 | 品书录 |
| | 语言的寓言：《拉比的猫》的文学传统（张怡）·关于马克思博士论文参考文献的考察（曾宪允）·歧异的文献 流动的文本（郭宝军） |
| 短长书 | |
| 家具传奇共劫波（方继孝）·潘天寿的嬗变（张晴）·漫长的等候（石厉） | |
| 韦 森 “改革没有完成时” | 高旭东、沈文慧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创新写作 |
| 王 宇 为什么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 | 吴晓东 让主体与历史彼此敞开 |
| 傅 谨 陈丁沙之问终究要回应 | 卜 键 朕亦一书生 |
| 元同惠 《世界人权宣言》里的中国元素 | 李庆西 “小水浒”与“大水浒” |
| | 范 可 困惑于“我们”与“他们” |



生活需要读书，
《读书》丰富生活

读者服务热线电话：(010)84050425, 84050451
读者服务部 E-mail: dzfw@lifeweek.com.cn
邮购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霞光里9号B座 三联生活传媒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25 国内代号：2-275





一场大火之后再看北京疏解：空间策略与空间权利

——专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主笔 / 贾冬婷

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大背景下，最近北京一系列“休克疗法”式的城市治理引发的震荡格外剧烈。由此浮出水面的是，城市的空间权利和空间正义由谁来参与，谁来决定。

激起震荡的第一颗石子是2017年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一起突如其来的火灾。事故发生在靠近南六环的大兴西红门镇新建村，一处聚居了400多人的集生产、仓储、居住于一身的“三合一”公寓里，造成其中19人死亡，8人受伤。大火之后，北京随即展开了针对隐患群租公寓的“大排查、大清

理、大整治”行动，而且限定“紧急清退，限期五天”，逾期不退则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强制措施，迫使很多打工者连夜寻找住处，或不得不举家离开北京。

清退之外，各种风貌治理也不断深入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比如为了“亮出天际线”，北京开始集中清理建筑物上的牌匾，甚至规定“3层以上只能安装一块牌匾标识”，以致有人无奈调侃：“没有了那块熟悉的招牌，迷路怎么办？”还有封堵“开墙打洞”，初衷是整治90年代遗留下来的“居改商”问题，但同时伴生着对一些自发形成的商业街区活力的损伤。

“把威胁城市安全的‘灰犀牛’关进笼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如此形容这一轮城市清退措施。



(视觉中国供图)

左图：北京最近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图为北京胡同

右图：北京“大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市场和行政的共同作用。图为骑车人夜晚穿越混乱的停车区(摄于2016年)

“灰犀牛”概念是古根海姆学者奖获得者米歇尔·渥克(Michele Wucker)在2013年提出的,形容一种大概率潜在危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相对于极其罕见、出乎意料的“黑天鹅”事件,在社会各个领域不断上演的危机其实大多在爆发前已有迹象显现,但却常常被忽视,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灰犀牛”那样——灰犀牛体形笨重、反应迟缓,离得远时看似毫无威胁,而一旦它狂奔而来,就会让人猝不及防。

以往人们认为,中国的“灰犀牛”风险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或者金融领域,而如今看来,社会领域尤其是城市领域的灰犀牛问题也不容忽视。尤其是在中国高速城市化的语境下,城市空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中立的物理场所,而伴随着城市持续性的拆迁和改造,背后是权力的介入、资本的渗透和利益的竞争,由此带来各种社会关系的解构和重组。当城市的粗放发展期过去,大规模政府干预更会触发新的空间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巴黎、伦敦、纽约等西方大城市中空间不平等的问题尤为突出,人们对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和交通空间等资源的争夺日

益激烈,也引发了旨在争取“空间正义”的都市社会运动的出现。英国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城市的正义应该包括社会正义和空间正义两个方面。他同时提出了“市民权”的概念,即一个人进入城市,居住在城市,以及平等地使用和塑造城市的权利。

在当今中国,“空间正义”问题更有现实意义,也更为复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在1967年曾经论述“中国盒子”问题,他指出社区层面的民主最容易实现,但这一层面享有权力的机会最少;越往上走,权力越大,但是民众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弱。在城市领域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治理都是在政府权力和资本主导下进行的,社会力量较弱,公众参与不够。在这样的背景下,容易造成城市中正义价值的缺失和损害,导致城市空间的不公问题,例如空间的剥夺与隔离、弱势群体的边缘化以及公共空间的过度资本化等等。

空间正义集中体现在如何对待“落脚城市”,或者说是城市里的“飞地”。在城市管理者眼中,这类飞地常常被视为健康城市的不良增生物,或者都市蔓



(黄宇摄)



1

延以及人口过剩的罪魁祸首，而没有纳入社会体系的一部分。但问题是，在世界各大城市“块茎型”空间体系中，城中村、地下室、桥洞等灰色空间，并不存在于繁华的城市中心之外，而是直接内嵌在城市中心内部的死角中，也是城市秩序最为脆弱的标靶。对于这些“落脚城市”，是直接暴风骤雨般地“一刀切”，还是寻求多方参与和共生的精细化治理，是对一个追求精明增长模式的转型期城市政府的一大考验。

城市里“有序”都是好的、“无序”都是不好的吗？OPEN 建筑事务所创始合伙人李虎的工作室就设在方家胡同里，他原本是被胡同生活的差异化和多样性吸引而迁入，近一年却目睹了封堵“开墙打洞”带来的颠覆性变化。以前他骑车穿过胡同时，可以碰上卖菜的、卖花的、剃头的、晒太阳的，现在那些熟悉的门脸都封上了，一切都干干净净的。“真干净啊！混乱的东西没了，有趣的东西也没了。”他提出，这些历史形成的“违章建筑”既然长期存在，就蕴含着合理性，能不能把问题变成答案——“向违章学习，向无序学习”？

某种意义上，在基于“落脚城市”的建设性实践中才能发现空间正义，并有可能实现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帕累托改进”。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周子书这几年一直针对北京的地下空间进行社会创新实验，在其中创立了“地瓜社区”。最初引起他关注的是当时还有几十万人居住在 1.7 万个地下室空间里，他想要探索如何为这些城市新移民改善居住环境，以及通过社区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获取发展机会。后来地下室不再允许居住，他转而探讨如何将它们变为公共空间，激发社会潜力，创建未来共享社区模式。他告诉我，基于景观猎奇意义上的地下室空间改造只是吸引人走进来的开端，更关键的其实是创造可持续的社区共享和空间消费。第一个“地瓜社区”位于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 19 号楼地下室，当他重新去看这一社区的居民时，发现每个居民背后都有不同的职业：有全国“三国杀”总冠军，有在戛纳拍电影得金奖的导演，有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有中央音乐学院的舞蹈老师，还有退休的故宫博物院管理员……这些不同身份的社区居民居



2



3

1. 周子书和他的团队在“地瓜一号”——改造前的北京亚运村安苑北里19号楼地下室
2. 周子书对地下空间的初期改造实验在花家地一间地下室进行
3.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

住在同一社区,就形成了高度重叠和混杂。他要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来激活社区。周子书描绘了一个在地瓜社区可见的具体场景:两个家庭在周末相约来到这里,爸爸们到健身空间健身,一个妈妈在阅读空间看书,另一个妈妈带着两家的孩子在游戏空间玩乐高,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在网上预订了一个麦当劳套餐,然后花40块钱租了社区里的电影院,两家人在这个电影院里一起看了一部动画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未来的社区生活模式。

“城市象限”创始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规划师茅明睿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告诉我,仍有上百万人居住在遍布全市各处的城中村和地下室中,他们被称为“蚁族”和“鼠族”,其实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建筑工人、快递员、厨师、保安、保姆等。“如果在政府不能提供对于这些人的居住权保护的情况下,以改善他们的居住空间或者以消除安全隐患的名义,把他们从地下室、从城中村当中赶走,其实也就抽掉了很多在北京的打工者的第一个台阶,那么这种改造到底是不是城

市的正义?封堵‘开墙打洞’,在恢复风貌和秩序的同时是否也伤害了街道的活力?”

放在更大视野来看,这一系列城市治理措施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新一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中一个目标是,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那么,这一收缩型空间策略的背后逻辑是什么?北京为什么要疏解?又将疏解什么、如何疏解?为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他同时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

北京“大城市病”是市场和行政的共同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十八大以来,在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的同时,还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收缩型战略。你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可否阐释一下背后的政策逻辑?

李晓江: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调整型、优化型的战略,甚至是一个减量型的战略。中央在其中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

王旭阳

明确地提出了两个核心任务：一是治理首都大城市病，一是优化人口经济密集地区的开发模式。

有人说“雄安新区是天上掉下来的”，真不是。在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里就很清晰地提到，要建设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同时对北京市的人口和机构的扩张作了严格规定。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北京核心城六区的人口开始下降，由此引来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用行政手段来限制大城市的聚集，是不是符合市场规律。

我认同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大城市也因此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同时，大城市又是最开放包容的，所以也是吸引人才聚集的空间。但是即便在市场完全有效的情况下，从供需关系来讲，核心城市或顶端城市也永远是稀缺资源。如果大家都往超级城市走，那么中国只需要两个城市就够了——北京和上海，但这不可能。一个健康的城市体系，应该是大中小城市各得其所，机会和成本相匹配，大城市可能是机会最多的，但成本也是最高的；小城市机会少一点，成本也低一点，人们在这样一个经济逻辑下选择适合的城市。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著名大都市，都曾经历过城市病

爆发的黑暗时期，而且度过黑暗时期不只是依赖市场的力量，都有行政力量的介入。更何况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面，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都在于市场，当然也就不能依赖市场去解决所有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大城市病的形成基于什么机制？

李晓江：我认为，中国大城市病的首要根源，在于我们是世界上少有的城市政府划分了不同的行政层级的国家，由此带来高度行政化的资源配置，再加上GDP的单一导向、财政税收制度、长期形成的土地财政依赖，这些是中国大城市过度聚集资源和机会的制度方面原因。

以北京为例，我记得2015年，在一份非常重要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督察报告中曾尖锐地指出，北京大城市病的问题关键在于北京滥用了行政和财政资源，导致非首都功能的过度聚集。

一个表现是财政资源的不合理使用。比如，北京的水电气暖价格居然比河北有些县城还低。2015年北京票价改革之前，公交票价才4毛钱。我算了一笔账，一个人在北京坐一次公交，能拿到3块8毛钱的补贴。类似这种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北京

成为华北地区的一个成本洼地。

二是非正规土地供给的滥用。北京有1400多平方公里的城市建设用地，是受到国家土地和城乡规划制度严格管控的。而除此以外，还有1500多平方公里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平均到260万农村人口身上，人均高达600平方米。这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本身是大城市非正规供给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被严重滥用了，以至于在这15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聚集了大量和首都功能毫无关系的产业，比如制造业、物流业，甚至整个华北地区的服装制造业和家居制造业的重心就集中在北京的五环到六环之间；此外，六环内外来人口约630万人，其中四、六环间就聚集了423万人，农村集体用地是主要承载空间，像是大兴西红门火灾的事故发生地，就是在一个农民自己建的2万平方米公寓里。

三是项目竞争。北京有四大汽车企业，其中两个是从天津、河北“抢”来的；此外2008年以后，北京通过大量优惠政策引进了很多央企总部，这都不是一种完全符合市场规律的行为。

大城市病的第二个根源，是资本和社会“两个流动性”都唯一地存在于超大特大城市这一层级。我们的资本流动性，要让钱保值，最有效的就是在大城市买房；社会的流动性也只在在大城市，逃入和逃离不断地循环往复。而与此同时，这两种流动性在大城市又出现了剧烈的矛盾，经济不景气以及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大城市的实际人口吸引力和容纳力下降。据我们观察，最近五年几乎所有超大和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速都在快速下降，人们开始考虑其他选择。除北京和上海的人口下降有管控的原因，其他超大特大城市这五年的人口增量也只是前五年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中国大城市病的第三个根源，是在城市高速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无法适应大城市如此规模和速度的增长。因为资源的错配，导致了空间的错配，北京聚集了那么多产业、那么多人口，但却提供不了相应的公共服务，陷入一个怪圈。

因此，中国大城市病的根源不仅仅是经济规律，还有大量的行政作用和政府干预。那么，反过来用政府的力量去改变，我认为存在合理性。解决路径在于两个方面：一个通过规划、行政和经济调控来缩减核心城市的功能；二是优化我们的区域布局，比如用北京城市副中心来优化北京市域内的布局，而通过雄安新区来带动河北，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三联生活周刊：从全球范围来看，应对大城市病有什么共同经验？

李晓江：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曾经专门研究过全球几大首都的经验。我们发现，世界上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发展，都是时起时伏的，都经历过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不同时间的调整期。比如伦敦和纽约这两个世界级城市，都曾出现人口下降，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回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当这些大城市碰到问题的时候，应用市场价格机制和政府行政、经济手段，适时、适度调控超大城市的供需关系是必需的。也因此，大城市问题和全球城市区域问题总是争论不休。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管控是需要的；经济不好的时候，都在抱怨管控过多。

比如伦敦，他们的城市规划是“二战”期间编制的。按照我们现在的逻辑，战后恢复应该是大发展，但英国在战争后期为伦敦准备的规划是限制性的，明确设定了一个边界“绿带”，绿带里面有特定的开发政策，就是防止日后过度增长。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伦敦政府又从工业、环境和交通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多轮调控，并且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优化整个区域布局，一是建设新城，二是在伦敦市中心区采取交通拥堵收费的政策。巴黎也是如此，既有非常严格的对工厂和办公建筑的管理，同时采取财政补贴政策来激励企业和机构的外迁，还有空间布局上的优化调整，从这几个方面来优化核心城市功能。东京则经历了两轮功能调整，第一次是50~60年代，第二次是80年代，把首都圈划分为不同类型，采取差异化的管制和限制政策。首尔也在2006年的规划中，把首都圈区分成拥塞抑制区、增长管理区和自然保护区三类政策区进行分类管理，而且都有非常严格的评估制度。总结几大城市的共同特征是，纽约、东京、首尔都采用了中心区和外围的税率差异化政策，以鼓励企业和机构外迁，优化区域布局。另外，采用行政手段对大城市病进行治理是一种阶段性的特征，一旦跨越这一黑暗时期，就不需要这么多干预了。因此，目前中国大城市病的有效治理，需要政策与资源在区域空间和城市层级上实现更加均衡的配置。

疏解功能，不是疏解人口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到2020年，要将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300万人以内。

左图：伦敦城市治理中，在市中心区采取了交通拥堵收费的政策。图为上世纪90年代的伦敦牛津街

右图：在北京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外来人口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图为2015年，北京郊区的农民工聚在一起吃晚饭



2300万的人口上限是依据什么提出的？为什么以往的历次城市总体规划都提出人口控制目标，但都一次次地被突破了？

李晓江：2300万是控制规模。目前北京总人口2100万，那就再稍微给一点空间，在目前阶段来看，2300万是一个合理的规模。

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城市的基本约束条件。环境承载力不是绝对的，不是简单的“1+1=2”算出来的，比如北京的水资源其实也是弹性的，首钢搬迁以后一天可以节省下来几十万吨水，此外还可以通过阶梯收费来控制用量。但完全忽略环境承载力也有问题，不能过度利用资源来发展，特别是人口和经济密集地区，其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更应该相互适应。

以前我们说控制人口，但其实只是一厢情愿地写一个数字，在实践层面并没有真正控制。在GDP导向下，地方政府并不把这个数字放在眼里，继续一种盲目扩张的发展模式，所以北京才会出现1500多平方公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三联生活周刊：新版北京总规提出了有效的规模控制手段了吗？具体要疏解什么？

李晓江：北京市这一次是下决心要控制规模的，在总体规划中也提出了具体目标，比如生产性用地减少、生活性用地增加，整个平原地区的开发强度降低等。

此外，这一版总规中明确提出要将北京城六区常住人口降低200万，这就需要很多政策和行政的联动。疏解对象包括一般性产业，特别是高消耗产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区域性专业市场等部分第三产业；部分教育、医疗、培训机构等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等等。具体到执行层面，包括严控在京高等学校招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严控新增事业性服务单位和社会团体；京津冀三省市制定各自产业准入目录等。

疏解的对象是非首都功能，不是人口。最典型的是批发业，它在首都功能里面属于“寄生功能”，其实买的人不在北京，卖的人不在北京，生产不在北京，消费也不在北京，可以放在区域内其他城市。另一个就是部分制造业，它们是之前被北京的低成本黑洞吸附来的。

三联生活周刊：但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外来人口感受到的冲击最强烈。很多人认为，是处于人口

结构“低端”的那部分人先被疏解。

李晓江：不能简单地这么划分，因为在产业和功能转移的过程当中，链条当中的高端和低端是一起跟着走的。

人人都知道，任何一个城市有高端就有低端，而且高端和低端需要保持一定配比，往往越高端，就需要越高比例的低端。当某些低端功能被疏解出去，还会有其他低端功能进来。当链条上的低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时候，就会带来价格上涨来调节供需，所以大城市价格上涨本身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如果想要降低成本，就要靠政府补贴，或者靠非正规渠道，比如“三合一”的群租公寓，但最后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近期北京一些功能疏解政策的具体落实，包括火灾后的清退、天际线恢复、封堵“开墙打洞”等，都让人感到“一刀切”式的缺乏弹性。

李晓江：这确实是政府要反思的，现在经常是只讲治理，却不讲治理的智慧。北京的群租公寓一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但治理一直是遮遮掩掩，这一次因为大兴的火灾，才下决心了。但一夜之间把所有的公寓都关掉，让大家天寒地冻地去找住处，就是用力过猛，最后引起社会反弹。包括封堵“开墙打洞”，应该适度留点生机，其实在一楼经商，在很多城市都是一种普遍行为；但是开餐馆就要干预，因为这意味着给楼上的邻居增加了安全风险。

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元的，有高端有低端，但多元中必须要有管理，有约束，有监督。可是我们的城市治理往往走向两极：要不就放，一放就乱；要不就管，一管就死。

城镇化开始出现多向多次的流动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中国城镇化整体在放缓。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已经出现聚集的边际效应递减了吗？

李晓江：据我们对中国7个千万人以上大城市的分析，确实出现了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人口占比在提高，但经济占比在下降。所以疏解大城市功能，一方面是治理大城市病，另一方面也是给中小城市带来增长机会。

这次大兴火灾，其实也是北京长期以来过度追求GDP的一个后果。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什么产业和服务都要，放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搞工业大院，导致大量违法建设行为，甚至监管也

无法覆盖。其实它们实际上是一种名义上的GDP，借这块地皮发自己的财，最多跟村长和镇长分一杯羹，对城市财政的贡献很少，但隐患却很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事了。2011年旧宫就发生过一起重大火灾，我当时就跟北京的规划同行说，这把火应该把北京烧醒了，该下决心调整了，没想到又搁置下来，一直到六年后的这场火灾。

如果任由北京这么发展下去，那么目前污染问题、交通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房价问题，都难以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逻辑也在于此。以往是北京用行政资源打造出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洼地，但也剥夺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机会，成了一个黑洞。北京有那么低的成本，又有那么好的公共资源，当然所有的企业和人口都要流进来。这么一来，就违背了大城市高成本、中小城市中低成本的经济规律。所以我一直说，京津冀发展的问题就出在北京走了天津的路，天津走了河北的路，让河北无路可走，最



（摄于中国铁建）

后河北就只能干一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因为除了水泥、玻璃、钢铁，别的产业它都没机会干。然后这些傻大黑粗的产业导致的污染，又将整个华北地区淹没其中，所以我们说区域的发展，尤其从环境角度来看，不能独善其身。

三联生活周刊：从城镇化的方向来看，开始向中小城市流动了吗？

李晓江：不能简单这么看。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增速减少，跟我们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有关。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是一次流动，而是多次流动、多向流动，然后逐渐稳定下来。因为我们城镇化的前半段发展很快，也就导致后面的调整期会更长。

在我国城镇化的初期，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少数城市，对这些城市来说人口流动的压力巨大。2000年以后，农村转移人口数量是最多的，但同时流入的城市也多了。2014年以后转移人口的总量开始下降了，流入的地方更多了。

目前城镇化的另一个趋势是，从长距离迁移转为近距离迁移。据我们对三大城市群的分析，周边省份的流动占到了70%以上，中西部地区开始出现回流，外出农民工的总量在下降，城镇化的整体格局倾向于更加平衡。这跟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度的城乡二元化都有密切关系。农民工的流动有这样一个现象，农民工20岁在服务业，30岁在制造业，40岁在建筑业，50岁返乡或就近就地城镇化。所以中国的城镇化是个极其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人人都要到北京，人人都要到大城市。

三联生活周刊：城市应该为流入的农民工负担市民化成本吗？

李晓江：我一直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是个伪概念。这个概念的一个根源是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税收的绝大部分是企业交的，不是个人交的，所以城市政府就认为农民工在北京没交税，如果他要落户，政府要额外花一笔钱。实际上农民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企业的雇主在替他们交税，他已经为城市做了贡献，但是没有被纳入计量。所以，“农民工市民化”无所谓额外成本，只是把他们缴纳的税收合理返还给他们，但政府不愿意承担这部分责任。像是我们家保姆，从我的孩子出生到现在，她在北京已经24年了，小保姆已经变成老保姆，还没有成为北京居民。城市不负担她的养老，她最终还是要回到家乡。

2014年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农民工市民化”之后，到现在也没有进展。诚然，大城市吸纳不了

这么多人，农民工的流动也开始多次多向，但重要的是，不管农民工在哪里打工，都应该有他的一份权利，这个权利应该跟着人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主要来自个人缴纳，于是联邦政府直接对个人负责，公民权跟着人走，不会出现今天在上海交，明天在北京交，回到家里就没人管的情况。

三联生活周刊：在城镇化的调整期，如何实现市民的空间权利？

李晓江：空间政策与城市治理中市民参与的缺失，是一个长期形成的问题。与西方不同，中国一直缺乏一种市民文化的传统。解放后，城市的基层治理体系一直不完整。后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大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人群阶层分化。再加上大拆大建的发展模式，也导致了城市中既有的社会关系瓦解、历史文化受到冲击、社区意识丧失。

而在我们的财税制度与土地财政依赖下，地方政府倾向于要企业，要税收，不要人；要高净值、高知识的人，要人才，不要人。相应地，企业对城市的话语权也远大于市民，政府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都指向企业，这又反过来导致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企业经济活动的社会与资源环境外部性被严重忽视。

对城市治理的重视近几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从管理到治理的重要创新。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而且特别强调了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在国家、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中，我们目前仍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单一化治理模式，以后应该转向政府管制力量弱化，市场机制在受约束和界定的前提下发挥重要作用，而新的社会结构应与政府、市场形成博弈关系。

市民的空间权利，或者说应对“人的城镇化”的空间供给政策，应该是城镇化中后期空间调整的一个重点。从城市规划的关注点来看，包括构建满足不同城镇化人口流向的城市体系；关注不同人群多元化需求的差异化空间供给；中等收入人群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中低收入、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老龄化、二胎化的需求；关切低收入人群赖以生存的非正规居住、就业、服务空间的合理存在；关切现代化目标下的城乡空间关系和乡村发展等。所以我个人认为，城乡之间、不同城市之间、城市内部的多元化、差异化的空间供给，是当前最重要的供给侧改革领域之一。■

（实习生洪铭宇、郑院鹭对本文亦有贡献）

【主办方】



生活 周刊

【战略合作伙伴】



请回答，



扫描报名购票

LIFE+ 生活家演讲

—— 年度专场 ——

2018年1月7日 14:00

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带着你的疑问，和时代算笔账



(张长海摄)



在餐桌上走向灭绝的禾花雀

记者 / 王海燕 黄子懿

禾花雀，一种上世纪 80 年代依然广泛分布于亚欧大陆的雀形目候鸟，在短短不到 30 年里，已经与野外灭绝只有一线之隔。如今，在中国的迁徙路上，它依然面临着天罗地网。

黄胸鹀的 20 年：从家常小鸟到濒临灭绝

作为一名观鸟爱好者，陆建树说，他真的不能接受，一个自己曾目击过的物种，突然有一天被别人告诉，已经“灭绝”。12 月 23 日下午 2 点，根据他的指点，我从天津西站地铁口往西，果然看到提着鸟笼的大爷陆续出现，再往前，密密匝匝的人群聚在西青道辅路上，把两车道的道路塞得水泄不通，间或有车辆通过，只能扭拐着从人群里挤出来。人群一团一团杵在路上，绵延了超过 300 米，包裹在

他们中间的，是沿街铺开的鸟贩子。

这里是天津最新最大的鸟类交易露水市场，每周六下午固定开市。清一色的中老年男人，笼着袖子，在评论笼子小鸟的叫声、羽毛，讨价还价，谈笑风生。小鸟大都被细棉线捆着翅膀或尾巴，撞笼、怕人、毛乱，在笼子里挤成一团，拼命往角落里缩。这样的鸟通常都是刚刚从野外捕回来的，还没喂熟。

问了一圈，没有黄胆，鸟贩子热情地推销，“黄巧（黄雀）也差不多，您看看这？”实际上，差得多了。黄胆就是禾花雀，学名黄胸鹀，2017 年 12 月 5 日，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一年一度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里，黄胸鹀的受胁程度刚刚从濒危升级成极危，离野外灭绝一步之遥。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更新那天，动物保护圈子炸开了锅。人们愤怒的原因很简单：一是黄胸鹀的受胁等级上升太快了，2000 年，这还是一种被认为“无



左图：黄胸鹀雄鸟（摄于江苏张家港沿江）

右图：2012年11月16日，在福建泉州境内发现的捕鸟网上密密麻麻地网住了许多候鸟

危”的普通候鸟；二是黄胸鹀受胁等级上升的原因，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分析，“来自中国以供食品消费的非法捕捉是最大威胁”。而在中国的舆论场上，人们还有一个指向更加明确的尖锐概述：“黄胸鹀被广东人吃绝种了。”

比起“黄胆”这个在北方笼养鸟交易市场上的名字，黄胸鹀在珠三角地区的俗名禾花雀更加广为人知。作为一种典型候鸟，黄胸鹀可能是起源于澳洲和美洲新大陆的古鹀，穿过白令海峡进入亚洲，进化后扩展至欧洲的种群。在没有国界的飞鸟世界，黄胸鹀的分布范围曾经极其广泛，光繁殖面积就多达1570万平方公里，西至芬兰，穿过俄罗斯，东到太平洋沿岸，日本北海道，南抵中国黑龙江和内蒙古，横贯欧亚大陆，是中国领土面积的1.6倍。据估算，上世纪80年代，黄胸鹀在全世界的总数量超过1亿。

繁殖季过后，黄胸鹀会从繁殖地往南迁徙，穿过中国，到达东南亚越冬，次年春天原路返回。雏鸟期的黄胸鹀吃虫，在迁徙路上则吃高粱、水稻等各种谷物，尤其喜欢扬花后刚刚灌浆的青稻米，这是“禾花雀”一名的来源，也是黄胸鹀最早在中国引起注意的原因。1956年，中国开展“除四害”活

动，一开始，麻雀因啄食谷物，与老鼠、苍蝇、蚊子并列四害，与麻雀身形相似的黄胸鹀也被重点点名。1956年，一篇题为《麻雀与雀害》的文章称“鹀类在我国境内最形繁多的，莫过于黄胸鹀”。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生态学博士朱磊告诉本刊，在麻雀被“平反”之前的1960年前后数年间，是中国学术界对黄胸鹀研究最集中的时期，根据这一时期的资料显示，即便除四害曾提倡捕捉雀鸟，但在其间和其后，黄胸鹀仍然数量极多。1958年夏秋和1959年夏，研究者者在武汉南湖地区统计到的迁徙黄胸鹀达数万只；1959年，在广东珠江三角洲的捕鸟网场，一张网一晚上就能捕到3000~4000只黄胸鹀。

到了80年代，1985年春，英国剑桥大学学生马丁·威廉姆斯造访北戴河，并从1986年连续5年秋天在这里观察候鸟迁徙，在马丁编写的当地鸟类名录中，对黄胸鹀的数量估计是常见且大量。另外，黄胸鹀在中国还有诸多别名，比如京津一带的“黄胆”，内蒙古和东北的“黄肚囊”“黄肚皮”“黄豆瓣”“烙铁背”，在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的“麦雀”“麦黄雀”“芦雀”，河北的“稻雀”、广西的“秧谷鸟”，也有地方直接将其与麻雀混杂。这些迹象都表明，黄胸鹀在中国曾经非常常见且分布广泛，正因为如此，使得黄胸鹀曾经鲜少为人关注，直至今日，当我们采访时，依然找不到对黄胸鹀有专门且深入研究的学者。

坏消息是从其繁殖地芬兰、俄罗斯和日本陆续传来的。芬兰和俄罗斯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就对黄胸鹀有过持续的数量监测。俄罗斯的两个站点在1979年和1990年环志过黄胸鹀，就是捕捉后套上脚环放归，两个年份的环志数量分别是10460和1346，呈断崖式下降。日本北海道的黄胸鹀则是从1997年开始直线下降的，直至在部分区域完全消失。2004年，英国东方鸟类俱乐部通讯上的一篇短文首次指出，根据中国内地的新闻报道，黄胸鹀正面临巨大的捕猎压力。

坐实黄胸鹀在中国被捕猎至濒危的研究，是2015年发表在美国重要学术期刊《保护生物学》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收集了全世界从1980年至2013年间跟黄胸鹀有关的所有数据，结果显示，1980年到2013年间，黄胸鹀的数量下降了84.3%~94.7%，其在欧亚大陆北回归线以北的繁殖范围，从西北到东南逐步且极其快速地收缩了5000公里。到2012年，俄罗斯的欧洲区域，西伯利亚中

西部、哈萨克斯坦，这种曾经遍地聚群而飞的小鸟已经完全绝迹，那些地方的人们再也没见过它们灵动而鲜艳的身影。

过去人们以为只有那些较小地理范围内的稀有物种会面临来自人类的危险，容易灭绝。分布如此广泛、数量如此众多的一个物种呈断崖式崩溃，在生物学界既罕见且出人意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设想了各种可能，比如栖息地收缩和环境污染导致死亡率上升，或者两种情况兼有，但都不能解释黄胸鹀种群的崩溃式下降。

另一种猜测是中国的捕猎导致了这一情形，研究者们设想了一个模型，以1980年的1亿为基数，第一年捕获总量2%，结合其繁殖特性，其后捕获比例每年增加0.2%，得出的结果是，黄胸鹀种群下降的曲线与实际情况几乎完美耦合。

为什么是禾花雀

研究者们结论有其数据根据，不是来自学术界而是新闻报道。以广东佛山三水曾举办过禾花雀美食节为例，根据公开报道，仅1996年，该节庆市场上黄胸鹀的交易数量就达数百万只。

很难追溯黄胸鹀最早是如何被选中的，来自广州的“70后”美食摄影师张无忌告诉本刊，禾花雀在广东算一种传统食品，尤其是从他的上一辈，政府宣传禾花雀为害稻谷，号召农民广泛捕捉。人们很快发现，和其他同样大小的雀鸟相比，禾花雀多且肥，采用焗、焖等做法，有大闸蟹的口感。国际鸟盟亚洲部主任研究员陈承彦是广东人，他小时候也听自己的父辈和祖父辈说，广东人过去抓禾花雀吃非常常见，只是很少贩卖。

真正让禾花雀身涉险境的，是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后来自消费市场的需求。根据《三水县志》，1992年10月5日至11月5日，三水县人民政府举办首届禾花雀美食节，“全县酒家宾馆名厨，各显身手，做出菜式众多的禾花雀宴席，以饗嘉宾”。三水县（今佛山三水区）西接高丘，东临广州，同时三江汇流，曾经每年晚稻扬花的20天左右，禾花雀会从这个狭长的地理区间里集中过境。

实际上，佛山三水地处珠三角西北尾端，相对落后，当时三水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举办了一系列各类营销类节日，禾花雀节即是其中之一。根据《三水县志》，最开始，当地人吃禾花雀只有“焗”

一种做法，经过大力推广，后来又发展出了数十种东南亚口味的新菜式，逐渐成为秋末冬初的时令进补食物。禾花雀个头小，处理后上餐桌的成品，有的全只不足一汤匙，一桌宴席消耗百来只也稀疏平常。但直到1996年的一篇文章里，一位广东的鸟类研究者在一篇名叫《天上人参禾花雀》的文章里，依然认为“它们明春返回北方繁殖出新一代，不用担心会造成禾花雀灭绝的危险”。

除了三水，广东从化、四会、清远等地，都是捕捉禾花雀的集中区域，每到迁徙季，这些地方捕捉的禾花雀会流入整个广东地区的餐馆酒楼。张无忌甚至记得，他在1996年左右上大学时，街面上有小吃推车，小贩们都乐于将乳鸽和其他鸟类标榜成禾花雀兜售。

在“天上人参”的美誉下，食客笃信禾花雀营养丰富，甚至补肾壮阳，消费市场对禾花雀的需求不减，随着禾花雀数量减少，甚至渐渐从平民食物发展成高端宴请补品，价格也逐渐逐年翻番。根据1981年就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协定》，广东省林业厅1997年5月17日就发函，取消了三水的禾花雀美食节。2000年，中国制定首批“三有保护动物”名录，其中包括黄胸鹀；2001年，广东省林业厅还将禾花雀列入广东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明令禁止下，庞大的地下交易市场持续存在，捕捉甚至早就扩散到广东省外。

根据民间环保组织“让候鸟飞”项目组的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5年，新闻公开报道的禾花雀盗卖案件，屡屡出现倒卖数量过万的大案。其中2001年8月广州韶关的火车上一次甚至查获了10万只禾花雀。随后，从2005年到2013年，交易环节上的禾花雀明显减少，但每年各地依然屡屡曝出单案过千的禾花雀查获数量，2013年11月，警方在安徽东至还查获过两万余只禾花雀。这种鸟儿依然在被源源不断地送上广东的餐桌，根据“让候鸟飞”志愿者的暗访，除了一些梅州、潮汕偏远地区之外，珠三角很多餐馆依然在用“荷花”“荷叶”等暗号代替禾花雀以供售卖。

但一个疑问是，为什么黄胸鹀繁殖区域如此广袤，还能被集中捕猎至极危？这跟黄胸鹀的迁徙路线有关。黄胸鹀虽然从西到东的繁殖区域跨度达数千公里，但从中东到中国新疆，从地图上看，都是土黄的干旱区域，不适宜黄胸鹀生存，再往东还横

亘着高耸的青藏高原。迄今为止的观测数据都显示，体形小巧的黄胸鹀可能主要都是从西到东，飞越数千公里，入境中国，再抵达华南和东南亚的越冬地点。

在入境中国的关口，燕山山脉一直逼近海边的秦皇岛，留下环渤海湾成为迁徙鸟类集中南迁的咽喉地带，黄胸鹀同样会密集地从这里入境南迁。再往南，黄胸鹀的迁徙路线更加分散，因此在华北、华中和华南都广有分布。但到达其越冬地点时，在云贵高原和太平洋的夹击下，黄胸鹀的迁徙路线会再次向两广地区更狭窄的范围收缩。

正是这样的迁徙线路，为大量捕猎黄胸鹀提供了“天时地利”。根据《保护生物学》那篇文章的统计，黄胸鹀非法捕猎被查获最集中的正是黄胸鹀每年春秋迁徙往返，入境和出境中国的“瓶颈”津唐地区和广东地区。捕猎从这两端向中间扩散。一名曾经的捕鸟人告诉本刊，北方最早捕鸟是从天津唐山一带开始，随后这种捕猎之风，随着黄胸鹀的飞翔一路向南扩散。另一边，2006年，《楚天都市报》登载过一则新闻，当时三名来自广东、海南的商人到湖北荆门梦溪镇，租用了三亩湖区，种植象草，声称造纸。后来当地村民却发现，三名南方人是在等着禾花雀迁徙过境，张网捕猎，因为黄胸鹀晚上喜欢在湿地象草丛里集群歇息。当地村民报警后，警察在捕鸟人的丝网上发现950多只禾花雀。这则新闻的背景是，当时广东本地的捕鸟人已经很难在春秋两季捕捉到黄胸鹀了。

积少成多的贸易链条

如今，出现在广东餐桌上的黄胸鹀几乎全数来自北方，尤其是天津、唐山一带。陆建树就曾是一名天津的观鸟爱好者，他终身难忘的一个场景是，2015年冬天，他随一位买家去到一个鸟贩子家里，那是一栋城中村的一七层小楼，大铁门，门口拴着两条大狼狗。进门后，陆建树看到，每层楼除了楼梯共有三间房子，鸟贩子一家住在7楼，而从1楼到6楼，每间房间都是栅栏门，铁纱窗，门里是密集的各种各样的鸟，在徒劳地扑腾，地上则堆满了厚厚的鸟粪和鸟尸。陆建树感觉自己到了一座“鸟类的奥斯维辛”。在那里，鸟贩子骄傲地对他说：“只要天津有的鸟，我这里都有。”最终，陆建树生平第一次在这里见到了成百上千的黄胸鹀。

陆建树知道，这些黄胸鹀不是一次抓起来的。陆建树从2012年开始观鸟，2013年，黄胸鹀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升为濒危级别，他开始注意这种原本平淡无奇的鸟类。在文献上，陆建树看到很多关于黄胸鹀喜欢集群的描述，还曾看到过一网捕捉上千只的记录，但在实际的观鸟过程中，他从没看到过30只以上的黄胸鹀鸟群，更无法想象仅仅20多年前，人们还可以见到的数百只巨大鸟群到底是什么样子。

陆建树说，在天津、唐山一代，捕鸟人分为三种：一种是无所事事的大爷，只要看到有块荒地，就像钓鱼一样，早上骑个自行车把鸟网鸟夹往那一放，没事过去看看，收到鸟儿了，有贩子收就卖掉，没人收就摔死或放掉。第二类是农民，冬天天地撂荒了，会有鸟贩子专门过来给他们发放粘网和录音机，粘网捕鸟，录音机则是播放鸟叫诱鸟的，鸟网5元、录音机20元，就算在捕到黄胸鹀后的价格里。这样的生意，不需要任何成本，农民都乐意干，发展到后来，所有农民都在自家的地里张网“等收成”。而黄胸鹀面临的情况，则是漫山遍野一层一层连接不断的鸟网，飞往何处都没有生路。第三种捕鸟人才是“专业”捕鸟人，会设计专门的机关捕捉猛禽。

黄胸鹀个小，无法专门捕捉，因此，市面上几乎所有的黄胸鹀都来第一类和第二类捕鸟人。除了繁殖季节，黄胸鹀喜欢集群活动，夜晚也喜欢聚群栖息在有水的植物丛中，受惊吓后容易窜落而非高飞，同时在一些迁徙时段，容易被同类叫声吸引。这些特征都使得捕鸟人不断开发出了更容易捕捉黄胸鹀的网捕手段。

如今在做反捕猎的志愿者刘伟就曾是这样的捕猎者，他从2008年开始捕鸟，2013年后洗手不干。他告诉本刊，捕鸟的网一般都下在芦苇沟子边、稻田、玉米地和高粱地里，一块地100张网的成本一般1500元，可以使用20天到一个月。而2008年，一个普通散户一天都能抓100多只，不光是禾花雀，还有朱雀、金钟（栗鹀）等，高峰时一天能挣1000~2000块钱，最高正4000~5000块的都有。“暴利，（赚回买网成本）不是一天就完事儿了？”他说那时候天津地区的养殖户非常多，有的庄子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养到2万~3万只规模的也很多。

在广东地区，一般野外捕捉的黄胸鹀就很肥厚，但天津、唐山一代秋天刚刚捕捉的黄胸鹀，一般都很瘦，因此养的意思就是催肥，用苏子、芝麻、小



被捕鸟网缠住小鸟拼命挣扎，精疲力尽后死去（摄于2014年10月江苏镇江市郊）

（摄于2014年10月）

米、葡萄糖、维C，还有一种叫“速达肥”的家禽添加剂饲料，养20天左右，到了达到6斤（100只）后闷死。催肥后的黄胸鹇胸前一吹毛看不到肉，全是黄色的油，行话叫“大油”，跟不催肥的个体价钱差一倍。采取闷死的办法一是省事，二是方便运输，三是为了带血，因为食客认为这样可以壮阳。闷死后的黄胸鹇连毛带屎，一般以100只为一个食品兜的单位装泡沫箱，一个泡沫箱能装10~12袋，用胶带封好，密闭保鲜，通过飞机运输销往广东。一只黄胸鹇养20多天的成本在1元左右，而2008年养户从捕鸟人手里收是15元一只，卖到天津25元一只，到广东40~50元一只，依然暴利。

2000年左右，刘伟还在当兵，有个朋友是蓟县地区的，在芦苇沟边下网，晚上拿杆子在芦苇沟里一轰，网上便全是禾花雀。刘伟的这个朋友一天曾逮过400多只，开车到天津卖，4元钱一只。但陆建树2014年开始跑鸟市时，跟养户聊天，说一个捕鸟人一次捕到的黄胸鹇，从来没有超过三四只以上的，小养户养到三五十只卖给大养户，大养户攒到成百上千只了再向广东发货。

天津向广东供应黄胸鹇的地下链条最早起码出

现在2000年以前，天津曾有一名叫袁良的中学自然课老师，从上世纪就开始关注黄胸鹇，根据他还未出版的手稿，他曾在1997年到1999年秋季的收鸟站，看到用麻袋运往广州的黄胸鹇，他还听说当时广州餐厅上，一餐禾花雀要四五百元。

在陆建树看到的贸易链条里，黄胸鹇主要走公路运输发货。而且，从天津进入远程运输贸易链条里的鸟类里，只有黄胸鹇、栗鹇、黄眉鹇，还有少量普通朱雀四种。这四种鸟天津本地人不吃，是为南方的餐饮市场专门捕捉的。根据陆建树的分析，最早贸易的可能只有黄胸鹇，随着黄胸鹇减少，与黄胸鹇体态相近的栗鹇进入视野，黄眉鹇和朱雀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发货时，几种鸟价格分明，分装清晰，这意味着无论捕鸟人还是鸟贩子，针对性都非常强。因此，如果没有针对性的保护和打击措施，捕猎情况不仅不会有所好转，相反，同样的种群下降趋势还会出现在其他鸟类身上。

拯救黄胸鹇？

志愿者们也组织过广泛的拆网行动，“让候鸟

飞”的志愿者曹大字已经连续三年拆网了，他在盘锦锦州交界地带，拆过很多网，一排100米长，一天都能拆20多排。他说最开始捕鸟人还跟志愿者聊天，告诉他们一些行规，现在看见志愿者就跑，有时候还起冲突。

除了拆网，志愿者们几乎没有别的办法直接挽救黄胸鹑。虽然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里，黄胸鹑已经连续升级，中国2017年开始施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也将野生动物消费者列入犯罪，但在中国，黄胸鹑的级别依然停留在和麻雀相同的“三有保护动物”，捕鸟人即使被抓住，也不会受到有效的责罚。“让候鸟飞”项目执行长刘慧莉告诉本刊，他们在暗访中发现，根据法律，非法张网捕鸟达20只以上的，捕鸟者将受到刑事处罚，鸟贩子就经常以19只的数量，分批运输卖给餐馆。

在陆建树看来，拆网很直接，但也最无用。“今天拆，明天又张起来了，最便宜的普通鸟网一张两元钱，拆10张20元，逮两个黄胸鹑32元，还赚了。”他最常使用的办法是报警，但主管捕鸟的是林业局森林公安，对黄胸鹑这种“普通”小鸟，森林公安只能当场放飞了事。而放飞的黄胸鹑遇到的依然是层层叠叠的鸟网，这是让陆建树觉得最恐怖的地方，“都是点点滴滴汇集起来的。”他曾和小伙伴讨论过，觉得只有打击取缔大规模养户，才能真正有效果。

但真正与捕鸟人、小养户和大养户长期接触，试图挽救这些被捕小鸟的，实际上是另外一个群体：放生人。陆建树是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群体的，放生人每到固定的日子，就会有领头人号召大家捐款放生，然后同时去捕鸟人、小养户和大养户手里购买活鸟。因为黄胸鹑的珍稀，放生人同样愿意购买黄胸鹑放生，光2015年，陆建树就见识过三次放生人放生黄胸鹑的场面。

两次在平津战役纪念馆前的空地上，一次就在鸟贩子家院子里，最多的一次，放生数量达到2000只，那也是陆建树真正见到黄胸鹑最多的时刻。陆建树用“惨烈”来形容那个场面：到了固定的放生时间，鸟贩子把鸟笼拉到放生人面前，放生人一手交钱，鸟贩子一手将小鸟一只一只从笼子里捉出来，报数放飞。放生的人兴致来了，也亲自上手，有时候还拨弄几下。放完生，放生人和鸟贩子都满足地离开。

但那些放飞的小鸟，能活下来多少？陆建树估计一半都不到。一方面，这些鸟本来已经受了巨

大的应激创伤；另一方面，同一种鸟类，突然密集地出现在一个区域内，不管食物、庇护、饮水还是人为扰动，都是致命的。陆建树曾在放生第二天去过现场，看到地上一片鸟尸。陆建树发现，很多放生人甚至没有基本的生物学常识，他甚至见过给猛禽喂小米的，猛禽不吃，就硬往嘴里塞。他告诉过这些放生人，小鸟能从捕捉活到放生的可能只有1/10，而这1/10放生后同样生死未卜。但放生人似乎无动于衷，他们更在意放生这个善念被实现的过程。

根据陆建树的了解，天津的放生市场是从2011年到2012年左右开始兴起的，算是横插进原来食品消费链条中的一环。如今，这一环同样在剧烈地影响捕鸟活动：一是放生交易周期更短，深受鸟贩子欢迎，并且数量需求极大，在整个消费链条里的比重已经相当可观；二是有鸟贩子曾告诉陆建树，如果没有这些放生人，他们捕鸟只针对性地捕捉固定鸟种，其他鸟要么摔死，要么放掉，但有了放生需求，所有的鸟都可以换钱。陆建树曾见过饭都吃不起也要放生的人，他理解这种心情，但实在无法认同，某种程度上，监管空缺下催生的放生市场正在让黄胸鹑乃至所有的野生鸟类处境雪上加霜。

现在陆建树在野外见到黄胸鹑时，心情特别复杂，他为自己感到幸运，“我竟然能够看到它们”；也为被看到的黄胸鹑感到幸运，“还能活到现在”。他说那是一种看一眼少一眼的心情。熟悉生物保护的人都知道“美洲旅鸽”的故事，当欧洲人刚刚踏上北美大陆时，这里生活着50多亿只旅鸽，随着人们发现这种鸽子肉味鲜美，开始大规模地工业捕猎，随后，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1914年9月1日，最后一只人工饲养的雌性旅鸽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中孤独地死去，这个物种从此彻底在地球上销声匿迹。

没人知道，黄胸鹑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旅鸽。中国观鸟记录中心在过去一年里，只在34个地方记录到了黄胸鹑的身影，而其中多达20个地方，观鸟人在数小时的守候里，都只看到了一个孤零零的淡黄身影。这个身影还会沿着古老的，而今遍布杀机的迁徙路线，跨河跨湖，一年往返两次，它无法述说它是否曾有同伴，它的同伴们都去了哪里。■

（感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生态学博士朱磊，新西兰奥塔哥大学自然影像科普博士朱雷，观鸟爱好者漆青山提供的资料和帮助）

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

记者 王梓辉

尽管因为种种原因谷歌公司与中国用户的接触并不密切，但在12月中旬它们宣布的一个重磅举措仍然吸引了业内的目光。在12月13日举行的谷歌开发者大会上，谷歌云首席科学家李飞飞宣布谷歌AI中国中心在北京成立。这让原本就竞争白热化的国内人工智能人才争夺战愈发难以降温。

从“特别好招”到“特别难招”

“比较难。”在听完我询问她今年招人是否容易的问题之后，龙梦竹略带苦笑地给出了这个回答，尽管他们今年年中才从阿里挖来了其iDST语音团队负责人、国内顶尖的智能语音技术专家初敏。

作为一家智能语音技术公司的高管，龙梦竹口中的“难”体现了这个行业的火热状态。在过去的两年，随着“人工智能”成为全民话题，整个人工智能产业也得到了飞速发展。麦肯锡全球董事合伙人唐睿思曾经透露，从2011年到2016年期间，大型公司针对人工智能的并购资金增加了7倍，创业公司的并购金额也增加了5倍。在我国，随着“人工智能”在今年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几乎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将人工智能列入了自己的战略发展目标中。

“除了像我们这种专业技术性公司以外，哪个公司不在提人工智能呢？”龙梦竹说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大家都在做这一块。”

另一家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第四范式的创始人戴文渊觉得，两年前AI的人才最好招。“那会儿没人重视这一块儿，只有少数的公司在做AI，AI的人才自己也没多少选择。”

转折点出现在2016年2月。AlphaGo横空出世，与李世石大战五番棋，震惊全世界，人工智能终于一跃成为行业重点。从那时起，与人工智能有关的人才就迅速变得炙手可热起来。“在AlphaGo之前，AI的人才特别好招；AlphaGo之后，不是AI的人就比较好招，AI的人就特别难招，因为是个公司都会来跟你抢一下。”

有数据显示，2017年前10个月内，AI人才需求量已经达到2016年的近两倍，2015年的5.3倍。

人才需求年复合增长率超200%。

市场的人才需求直接反映到了上游的大学校园中。现在正在浙江大学读博士的罗浩对此深有感触。两年多以前，也就是他刚刚本科毕业，准备开始自己的直博生涯时，想进入同一实验室的学生并不多。“那会儿一共就招几个人，可能也就报几个人”，所以根本没的挑。谁想到风水轮流转，他所在的模式识别方向因为与计算机视觉息息相关，也成了人工智能大潮中的一分子，结果现在的招收比例“远远超过三分之一”。明年将会从南京大学毕业的博士候选人魏秀参也向我们透露，他们研究所在他那一届的学生一共只有10人；而现在每年报考的学生超过200人，录取人数也上升到了30~40人。

一连串更激进的反应在今年新学年的开学阶段纷至沓来。9月，位于中关村核心区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宣布：在该校软件学院设立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专业，并与百度公司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办学的协议，该专业首届招收的122名研究生已报到入学。11月，教育部直属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这也是教育部直属高校中首个致力于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的实体性学院。而在更早前的5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发文成立人工智能技术学院，这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域首个全面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新型学院。

“人工智能”这个之前在我国大学中不常见到的名词在今年开始遍布高校。

理所当然，今年才种下的种子还要耐心等几年才能收获。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几年，我国的人工智能行业仍将处于人才极度短缺的局面。使用“极度”这个词并不是夸张。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周明此前向媒体透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500万”的说法也许只是一家之言，但百万级的人才缺口基本没人会否认。根据腾讯研究院与Boss直聘联合研究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人才白皮书》，我国2017年真正满足AI企业要求的人才供需指数仅为0.6，人才缺口至少在100万以上。同时，由于合格的AI人才培养所需时间要远长于一般IT人才，人才缺口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填补。

在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副



魏秀参



左图：旷视科技南京研究院负责人魏秀参

右图：人工智能创业公司第四范式的创始人戴文渊

理事长马少平看来，人工智能的需求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发展的。因为人工智能在 90 年代进入了低潮期，这几年快速扩张的行业规模、超高能力及素质的人才要求自然会导致很严重的人才缺口。

西安交通大学电信学院党委副书记史锋此前曾对媒体介绍，从今年 9 月开学以来，很多单位都来学校“抢”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机器学习等领域相关的毕业生，目前学校这方面的人才，还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

抢人从学校开始

尽管离毕业还有两三年时间，但还在浙大读博士的罗浩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实习经历，不过他找实习的经历足以让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都艳羡不已。“一面就过”“不会有人拒绝”“面试的所有 offer 都能拿到”……这些就是他和他实验室的同学们找工作及实习时的实际经历。“我记得很清楚，我刚投了（简历）半个小时，

阿里那边就给我打了电话，然后一面就过了。”

即使是在国内顶尖学府中，也不是所有的专业都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优秀的毕业生大家都想要。龙梦竹对本刊透露，“每年只要是那几个老师带出来的硕博，还没有毕业前各大公司就已经去抢了”。据知情人透露，为了争夺真正优秀的毕业生，许多公司的创始人与 CEO 都会亲自出动，“像王小川（搜狗公司 CEO）就去了好几场校招”。而这种态度就是为了让年轻的学生们看到公司对他的重视。

作为南京大学博导、“青年千人计划”学者吴建鑫的学生，明年才会博士毕业的魏秀参已经是一位业界新星，你很难想象还不满 28 岁的他已经被邀请担任了人工智能行业明星创业公司旷视科技南京研究院的负责人。与一般的毕业生不同，魏秀参就是龙梦竹所说的“还没毕业就被各大公司争夺”的头部人才，他根本不用自己投简历，大公司的负责人们就主动找上了门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公

司开始与他接触，但因为要出国，他就全部都婉拒了。今年10月回国之前，国内不少大公司从七八月就开始和当时还在澳大利亚的他沟通，最终他选择了自己发挥空间更大的旷视科技。

而更多的出身于非人工智能顶级名校的同学们虽然没有受到那么夸张的待遇，但相比其他专业的同学们，只要满足基本条件，他们的求职过程都堪称“零阻力”。

明年年初就要硕士毕业的王博来自更以文科实力见长的华东师范大学，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搞定了自己的工作问题。只投了五六份简历的他很顺利地拿到了华为、美团和触宝等几家互联网大公司的 offer，成功率极高。出于种种因素考虑，他选择了加入大数据团队在上海的触宝。

在待遇上，他们应该都算得上“人生赢家”了。硕士毕业的王博表示自己的薪资在20万到30万元（年薪）之间，他的同学基本都能拿到这个水平的薪资。而根据《华东师范大学2016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该校硕士毕业生的平均月薪为7432元。来自计算机强校西安交通大学2018年应届硕士毕业生邱熙也表示过自己的薪资大概能够达到30万到40万元（年薪）的水平。“我们学校AI领域的毕业生，据我所知大家好像都是30万起，一线公司至少是35万起，大家今年的待遇都会非常好。”

《2018年韦莱韬悦毕业生起薪及政策调研报告》数据显示，人工智能专业方向的毕业生大部分是博士学历，起薪水平约为25万~30万，比一般软件开发类博士毕业生的平均起薪（18.5万）高35%~50%。一名人工智能方向的技术类毕业生薪资相当于3~5年工作经验的普通岗位工程师薪资。

远高于其他行业的薪资水平令人艳羡，也引得其他专业的学生自发地向这个方向靠拢。罗浩就对本刊表示，放在两三年前他刚入学的时候，浙江大学内只有一些非常对口的专业才会有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但到了今年，“稍微跟工科搭上关系的都在学习这些东西”。

魏秀参前两周刚刚在南大和北邮等高校的BBS上发布了招实习生的帖子，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十来份简历，其中甚至包括了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一位博士，要知道南大物理学排名全国第一。

赤裸裸的挖人大战

人才缺口这么大，每家公司自然都会使出浑身

解数抢人。在市场上，这体现在三个方面：无死角的互相挖人，得到 offer 非常容易，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准的薪资待遇。

作为一个不懂技术的“文科生”，负责对外沟通的龙梦竹今年已经收到了20多个邀请，“连我们HR都接到过某家大公司发过来的 offer”。在今年云栖大会上，阿里云人工智能首席科学家闵万里也曾透露，自己曾在一年时间内收到过来自猎头700多封邮件。

来自猎头公司 Kelly Services 北京互联网猎头团队的负责人 Judy 告诉本刊，他们今年接到的人工智能案子“特别多”，尤其是今年下半年。此前，她刚刚帮助今日头条数据团队招来了一位数据工程师。

如果想要离职，一个“还算靠谱”的人才就能拿到至少15个 offer，这是戴文渊给出的数据。他对本刊表示，所有你能想到的公司都在招AI人才，甚至很多你想不到的传统企业也在招，所以他们想要拿到 offer 太简单了。

走出校园的各大公司在社招上的投入更是没有上限。此前彭博社曾报道今日头条方面试图开出300万美元的薪酬吸引人工智能方面的顶级人才加盟，而另一家创业公司触宝也开出了1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邀请技术负责人加盟。

这个过程中，头部人才自然人人都想要。要知道，据知情人士对本刊透露，今日头条的所有核心代码打印出来大概就是10张A4纸，如果你有这10张纸的话，你就可以重新做一个今日头条，“就像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因此几乎所有的公司在采访中都对本刊表示自己只招“最好的”，但真正能招到顶级人才的公司并不多。想要吸引真正优秀的人才，薪水有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了。

BAT 这样的大公司拥有天然的“Big Name”优势。作为一家创业公司，触宝公司创始人王佳梁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很无奈，“我们即使是薪水上面开得比BAT更高，但还是会出现这种人才，他就是要去那种Big Name的大公司”。

关注人工智能行业两三年的猎头王俊宏也有切身感受，他此前为人工智能创业公司做的三个案子都不了了之，很多候选人一听是创业公司都不会跟他进入互动阶段。他觉得这个原因是现在的创业公司都还没到产品交付阶段，许多人才就会觉得在薪水差不多的情况下，去阿里或腾讯这样的公司更稳妥一点。

当然，创业公司也有自己的优势，前提是他们本身得是一家带有“明星光环”的创业公司。仅以李开复口中人脸识别领域的“四只独角兽”（旷视科技、

商汤科技、云从科技和依图科技)为例:旷视科技的创始团队均来自清华大学“姚期智班”,都是当初的明星学生;商汤科技创始人为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教授及系主任汤晓鸥;依图科技的核心团队则都出自上海交大。一位人工智能行业的资深人士就对本刊表示,“技术人员最大的价值往往不在论文或技术本身,而在于他在业内外的影响力”。

旷视科技去年从微软亚洲研究院挖来了微软亚研院首席研究员孙剑博士,他是国内计算机视觉领域的明星人物,曾获得过麻省理工学院《科技评论》的“全球35岁以下杰出青年创新者”奖。去年年中,旷视科技花重金将其招至麾下,据传其年薪+期权超千万人民币。“我来这里就会考虑孙老师的因素”,魏秀参对本刊说道。而上文中还在浙江大学读书的罗浩也选择了去旷视科技实习,直接原因也是“听了孙剑老师的讲座”。魏秀参认为这就是头部人才的“羊群效应”。

而在此前20年一直是国内人工智能行业人才聚居地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则是人才流失最严重的地方,许多资深研究员被挖去其他公司之后立刻就变身“联合创始人”或被委以“CTO”的重任。比如前微软亚研院创新工程组成员杨帆就是计算机视觉领域创业公司商汤科技的联合创始人,此前分别在阿里iDST团队担任技术总监的初敏与视觉计算负责人的华先胜此前也都在微软亚研院工作多年。

据说在去年的一次活动上,微软全球执行副总裁沈向洋和同台的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开玩笑说“我微软的人都快被你挖空了”,结果马化腾接着就说“我们在美国西雅图的办公室就准备设在微软的旁边”。沈向洋也只能报之以苦笑。

从海外挖人

国内的AI人才本就极为有限,争夺已达白热化,于是不少公司早早就将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从前几年开始,此前在美国公司任职的华人科学家、工程师以及高校学生们纷纷受到了国内的邀请,上演了一出“人才西游记”。

2013年,当时还在谷歌公司总部任职的闵万里收到了猎头的邀请,他们告诉他阿里这边数据量非常大,数据种类也很丰富,“要比亚马逊+eBay+PayPal还多”。权衡利弊之下,闵万里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他做出了回到国内的决定,成为阿里云大数据孵化器团队的负责人。

从那之后,阿里方面陆续从美国找来了美国密

歇根州立大学终身教授金榕、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普渡大学终身教授漆远、前亚马逊资深主任科学家任小枫、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聂再清、前谷歌Tango和DayDream项目技术主管李名杨。最近的一位则是本月初加盟的前Polycom(宝利通)声学设计和信号处理首席工程师冯津伟。

在阿里不断招揽人才的背后是百度落寞的身影。但就在三年以前,百度才是全中国人工智能人才最集中的公司,其中要以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和电子工程系副教授、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吴恩达在2014年5月17日加入百度任首席科学家为最高峰。据某知情人士对本刊透露,在此之前,百度曾派出百度高级副总裁王劲和研究院副院长余凯前往美国,欲邀请另一位人工智能顶级科学家、多伦多大学教授Geoffrey Hinton加入,但“待遇没谈妥,觉得(Hinton)要得太高了”,最终被Google截和。于是他们当即决定转攻吴恩达,并成功邀请他来到了中国。尽管百度之后由于公司内部的战略问题,导致众多人才纷纷出走,另立门户,但他们成功挖来吴恩达的经验让不少国内公司相信,自己也能从美国吸引最顶级的华人人才回国。

“我们的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6年有海外(AI)教育背景经历的留学生,毕业之后回国工作的比例年均增长率超过14%。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曾经在海外企业工作又回国的人才年均增长率是10%,也就是说有越来越多有经验的人士流回国内。”领英中国技术副总裁王迪说。

对于人才回流的原因,蚂蚁金服首席技术架构师胡喜觉得是“浪潮起来了,需要更多的人才做事。背后的逻辑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舞台”。这个“舞台”则由三个因素组成:市场、数据以及资金。

华先胜就对我们表示,他离开微软回国加入阿里的原因就是想要把自己多年研究的心血应用到产品中。“我做图像搜索很多年了,但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技术落地场景,正好这个时候阿里巴巴找到我,要做电商图像搜索这件事,这正好跟自己的梦想非常契合。”

目前,全球的华人AI技术人才约占全球AI技术人才的6.5%,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今年7月20日,国务院印发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其中提到,要“加大高端人工智能人才引进力度。开辟专门渠道,实行特殊政策,实现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精准引进。”有了政策的支持,可以想见,未来两年中,国内人工智能人才争夺的战火只会被吹得更旺。■



LIFE+ 演讲现场



家，你变了吗？

每到年末的时候，人们总比往常更容易想到家。相比于几年前有关于思念家乡、思念亲人的主旋律，现如今人们对于家的观念正在经历巨变，演变出了无奈、焦虑、困扰……难道我们不喜欢家了吗？

世界变了，人们在时代的洪流里被推着向前走。社会单元越变越小，从前几十口人的大家庭正在消失；家族的凝聚力越来越低，个体的生活自由度变得越来越高；成立家庭是最落俗套的事情，家庭责任成为最沉重的捆绑；互联网绑架了空闲时间，人们情愿用虚拟社交代替家人间的沟通……家的结构、家的意义、家的价值，全都变了。

在松果生活联手链家举办的 LIFE+ 演讲：《家，你变了吗？》中，我们邀请来 7 位生活家，涵盖 7 个不同领域，从自身不同纬度出发，聊了聊家的变化。

陪伴

家是陪伴，无可否认。但如今的陪伴模式似乎来得更轻松和随意了。Yvonne 是一个家庭主妇，也是一个室内设计师。2014 年，她和先生孟奇、儿子之之搬进了北京国子监旁边的胡同里，室内面积大概是 65 平方，签了 10 年的租约，对老房子做了一个比较大的改造。

Yvonne 在米兰读的室内设计，回台湾之后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过着精英又时髦的生活。但是突然降生的之之，不得不让她先放下事业，将大部分的时间在家

里忙着照看孩子、做家事上。在老式公寓里照顾小孩让困难更加翻倍，打造一个完全和心意的自己的家，成了这一切美好的开始。

“我们为小孩之之做一些设计，去适合小孩使用的高度。” Yvonne 说，“其实小孩也是这个家的使用者，我希望他至少在自己的家里，生活上可以有多一点自由，少一点迁就。不用急着长大。”

在 Yvonne 看来，家庭生活本来就是很多平凡的小事组合起来的，如果用心对待，每个人都可以在生活的小事里寻找到很多美好的感受，累积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能量。“现在，我很乐于承认，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相比 Yvonne 一家租住的日式小屋，老极、小猪、和小孩辛巴三口之家，算是把新摩登家庭诠释得淋漓尽致：2014 年，老极一家子骑着三轮摩托车，历经 12 国、历时 185 天到达北极看熊。

“有人说我家无定所，的确如此。相比家作为一个容器的存在来说，我们更追求在精神和行为上的精彩和充沛。而我的家不是一个容器，就是我们三个人，走到哪，哪就是家。”

家的形态可以有很多，面临的挑战也正在发生。近年来，中国的离婚数字逐年走高：60% 以上提出离婚的都是女性；一半以上的婚姻都是因为外遇而解体。“为什么我们的婚姻质量变得如此糟糕？”心理专家、“十分心理”创始人王琄总结：一颗焦虑的心，是无法感受幸福的。



老板一家在旅行途中

社会形态的急速变化。这变化无疑也在加重着人们内在的动荡感，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给亲密关系带来了全面的冲击波。

“我们应该以谦卑之心觉察自身，以尊重之心体验每一个当下的独特性，学习更好地爱与沟通的能力，为更好的生活迈出每一步。”

牵挂

牵挂的方式有很多种，一封信、一首歌……摄影师马楠则以最经典的方式维系家的牵挂。他创办的传统胶片摄影工作室“如故照相馆”，用大画幅胶片拍摄，传统手工放大银盐照片。

马楠有一个“中国家族”艺术计划：为人数超过20的大家族免费拍摄全家福，但项目的进展却并不顺利。

大环境下，现在城市中超过20人的家庭真的不多了。保持联系的、生活融洽的家庭更少。为拍摄照片时，有些人甚至是从国外专门赶回来。“大家子人，在一个周六的大清早，从北京这个庞大的城市的各个方向出发，赶到胡同里的如故照相馆。互相等待、攀谈；互相整理衣服、简单画妆。然后一起拍下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这样的场景平淡而珍贵，散发出一种原始的生命力。

马楠说：“我们在做的，是让更多人还有机会拥有一张原汁原味的传统照片。即便这些照片平平淡淡的挂在你家里，几十年以后你就会发现它的魅力，那时候你也可能会庆幸，那张脸没被美化变形过，让你能看见曾经真实的那个你自己。”

除了一张家族照片，还有一种牵挂最稀松平常，却演变成人们对于家最诱人和生动的牵挂：家的味道。美

食作家田螺姑娘平时写一些家常菜谱，满足我们下班之后肚子瘪了、早上起床肚子饿了，或喝口小酒配点下酒菜的菜谱。

田螺姑娘从小就很好吃，上下学的时候我也不太喜欢买路边摊的零食，因为很着急地赶回家吃饭，虽然每天做饭吃饭都非常匆忙，但仍然吃得很饱足。独立之后开始有一些自己烹饪菜肴的经历，其中就有几乎没有人不爱吃的辣椒炒肉，田螺姑娘自己烹饪的秘诀。

奋斗

家是依靠，也是动力的源泉，很多人为了成就一个家，踏上买房的征程。也有人依靠买房卖房，让家更富足。社区专家徐东华从2001年开始做链家社区房产服务，见证了很多“安家”的故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1.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 每次换房子，目标要明确，需要在很多目标中选择一个最主要的目标。3. 房子换的多与少不重要，换的大与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直没有变的感情和亲情。

徐东华说，2005年以前，大家买房子，主要为了安家，去追求一份稳定和舒适。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房子成了奋斗的重要目标，手里拥有的房子数量成为衡量奋斗成功与否的标准。房子这事让太多人变得纠结、担心买高了、又担心以后不增值等等。但其实房子就是“家”的容器而已，变来变去其实只有这个容器本身在变、“家”从来没变过。我希望更多人能正确看待房子，看待家，房子最大的属性是居住，无论住在哪里，是不是自己的房子，心安的地方，即是家。

房子里有一个家，但家不能简单被一间房子取代。家还有更多、更广的意义可以呈现。农村走出来的龚立国2014年作为快递行业的代表，和马云一起在美国纽约完成了上市敲钟仪式。他做为家与家的一个连接者，所做的事比想象中更多。

小时候，龚立国看了《星球大战》，对外面的世界彻底着迷。后来，龚立国到城市里做保安、做快递，在不断的努力和奋斗中获得命运的回报。现在，他努力的途径和方式愈加丰富：搜集二手的图书和衣物捐助给需要的人。谈起他对社会的贡献，他却说，慈善终究是做给自己的，帮助了别人，最先开心的是自己。

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家的形态如何变化，家的地位从未被撼动，人类作为一个情感动物，对亲密关系和安全居所的需求从未改变过。

只是时代在变，我们看世界的方式也在转变。房子在变，对家的认识也需要更新，而家人间的有效陪伴最终会维系起一个完整的家庭。那些经受脆弱、承受孤独的时刻，是家，只有家，容纳一切眼泪、委屈和悔恨，浇灌被挤压的躯壳，让心重新富饶起来。



扫描二维码，观看全部嘉宾演讲视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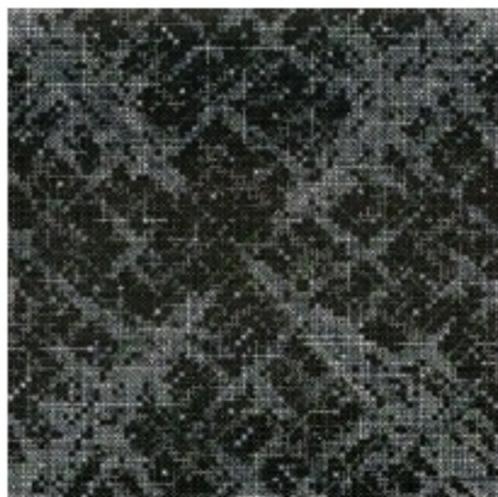


(李轶西摄 (Timothy Taylor) 供图)

1



(李轶西摄 (Timothy Taylor) 供图)



1. 抽象主义大师肖恩·斯库利在纽约切尔西的工作室举办他和丁乙的作品展，其中丁乙有四幅参展

2. 丁乙作品 从上至下：〈十示 2016-9〉，椴木板上综合媒介，240×240 厘米；〈十示 2016-8〉，椴木板上综合媒介，240×240 厘米；〈十示 2016-5〉，椴木板上综合媒介，240×240 厘米

3. 艺术家丁乙

2



(车铭拍摄)

3

丁乙：关在格子中的理性与情感

文 / 曾焱

走进一个画家工作室，调色板通常是引人注目的，上面堆挤的各色颜料像一件小作品，有的随意，有的规整，是观察艺术家个性的细节。但丁乙两种都不是。他说自己的画室里根本没有调色板，直接打开颜色瓶盖就用，“我不调色的”。

进门时候，看见丁乙正站在他那架高大的橙红色升降机上，为墙上一件巨幅作品绘画细部。见我们到了，他启动开关，让那庞然大物缓缓降落，将他从自己的“十示”世界送回到现实当中。

这是他的最新工作室，位于上海滨江西岸。龙美术馆、余德耀美术馆和西岸艺术博览会都离这不远，周边现在是上海当代艺术新贵之地。收藏家乔志兵的乔空间与他的工作室为邻，一墙之隔。2016年乔空间做了一个12位中国当代重要艺术家的“工作室”群展，张晓刚、刘小东、毛焰、严培明、曾梵志他们都是通过镜头或者作品，把各自工作室的状态带到了现场，唯有丁乙省事，他让人在自家工作室和展览现场之间的那堵墙上凿了一个形状不规整的小洞，观众可以直接从洞里参观他怎么画格子。

作为中国抽象绘画领域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丁乙的画格子是他个人的符号，也是中国抽象艺术的标志符号。准确地说，他画的是“十”字符号，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一画30年，作品系列亦命名“十示”。用的材料从画布丙烯到瓦楞纸板、木板，粉笔、铅笔、炭笔，画的尺幅从几十厘米到2米、3米、5米之巨，唯有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微小“十”字固着在画面之上，以不受制于时间和空间的状态坚定推进，仿佛植物生长连绵不绝。

一个为自己设限的艺术家却从局限中获得了前

所未有的自由。他的那根阿里阿德涅之线从哪里开始？

上海的腔调

丁乙生在1962年。他小时候家住控江路，隔一条马路，窗户对面正好是杨浦区文化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无论一座城市大小，文化馆都是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丁乙记忆中，就有几样东西跟文化馆特别有关联。一是电影海报，差不多两个星期放一部新电影，各个馆画的海报都不一样，那么总会有几个强的，供人品评议论一阵。另外文化馆门口总有个小广场，立着那种巨大的铁皮宣传牌，专业美工每半年被派过来画一次。丁乙最爱看人画宣传牌，成了最大的启蒙。“画画的都穿一种藏青色的长工作服，那是我对艺术家最早的印象。”丁乙说。

母亲是幼儿园老师，父亲是商店经理，对他搞艺术没有什么直接因果，但丁乙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受父亲的熏陶。他父亲是一个动手能力特别强的人，家里的家具、家人的衣服都是他亲手做。“最神奇的呢，是他有一次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那时候很难见到的油画原料，在家用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临摹了《红色娘子军》一张图画，就画在一块纤维板上。我跟同学吹嘘，说我爸爸也是画画的，人家不相信，

我说那你今天下午几点站到我家窗户下面来。我家住二楼，我跑回去站到窗口，拼命把画举出去给他看。”

幸运的是，丁乙高中毕业时重新有了高考，上海本地艺术专业的学校恢复了几个，好的像上海大学，接下来有轻工业专科学校、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和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结果他考上最差的美校。“那也不管了，总算开始了很专业的训练。我那个时候所有的梦想就是要做艺术家。”

他们那辈艺术青年心目中最好的艺术家，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超级偶像，是陈逸飞、魏景山这些在上海油雕室从事主题创作的专业画家，油画《攻克总统府》当时名扬全国。至于后来成为丁乙倾力一生的“抽象艺术”，丁乙说，他第一次知道这个词已经是考进美校之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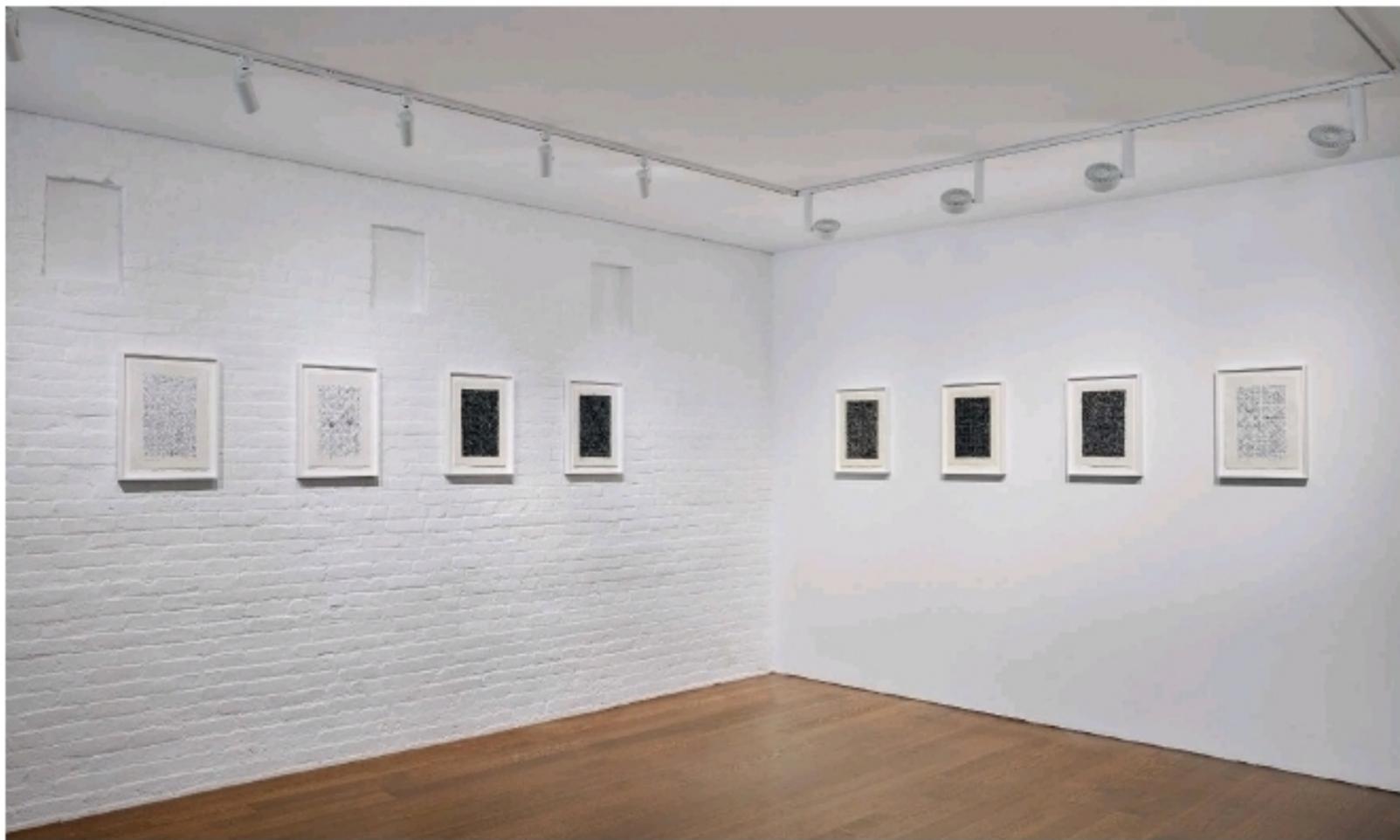
他在美校读装潢设计，就是现在的平面设计。那时候国家重视外贸，因为做产品出口要跟国外学，对设计类的学校就有一些鼓励政策，比如学校图书馆可以订阅国外杂志和画册。丁乙经常混到老师的图书室去，开始接触到一些西方艺术。“最早大概是1981年，我买到一本《西方绘画简史》，只有几张

彩色图，其他全是这么小的黑白图片。不过同时期国外来的展览在上海还蛮多的，比如‘法国250年绘画’，好多人从外地赶过来看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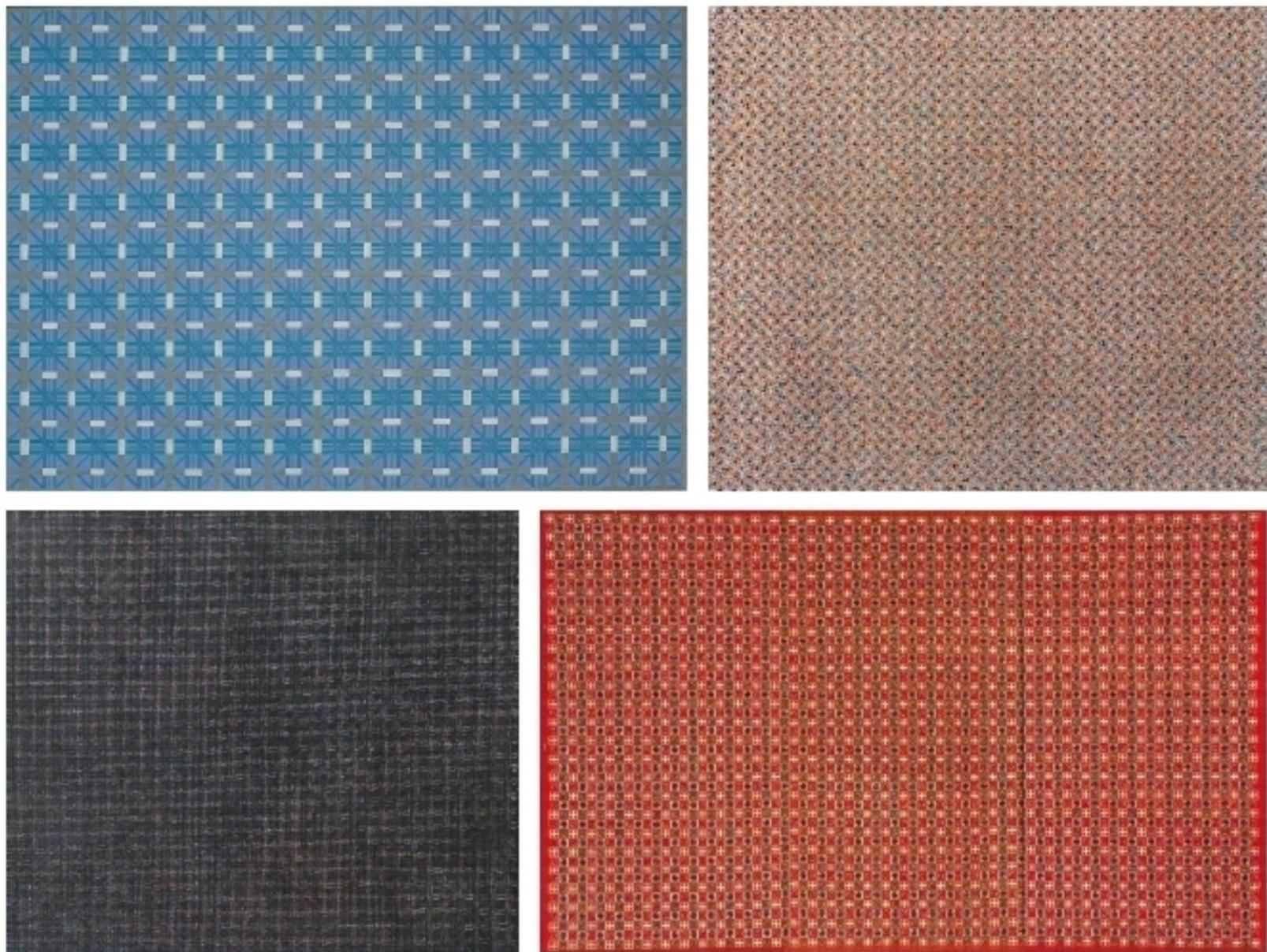
这个法国绘画展览对中国一代艺术青年几近文化启蒙，几个和丁乙年龄仿佛的艺术家都曾在我们采访时，提到与此展相关的难忘经历。曾梵志说他1981年17岁，一个人背个挎包从武汉到上海坐了三天三夜的船，为的就是赶去看这个展览。和外地艺术青年比起来，生活在上海的丁乙他们就颇为优越了。

丁乙印象中，80年代初的学画阶段挺混乱。“那个时候学印象派，余友涵给了我最大的启蒙。他那时候就研究塞尚，现在也是一个塞尚专家。他说你理解了塞尚就理解了现代艺术，如果塞尚这关过不了，就还是在传统的意识里。所以关于西方绘画，我实际上是从两个人身上学来的，一个是塞尚，还有一个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为什么呢？因为郁特里罗从来不画阳光，他都是画阴天的。学生时代年轻，很容易被这种情感打动。还有呢就是他画巴黎街景，我在上海能够找到很多相似性。”

余友涵后来是90年代中国前卫艺术运动中著



丁乙首次纽约个展“黑与白”现场



左上：〈十示 1989-6〉，布面丙烯，50×70 厘米
左下：〈1994-10〉，亚麻布上粉笔、炭笔，140×160 厘米

右上：〈1993-5〉，布面丙烯，140×160 厘米
右下：〈十示 2000-2〉，布面丙烯，260×420 厘米

名的“政治波普”艺术家，当时在丁乙就读的工艺美校当老师。余手里有一本郁特里罗画册，丁乙特别想借来临摹，有一次终于跟他开了口，他说那就借一个晚上吧。学校宿舍要按时熄灯，丁乙偷跑到学校食堂，一晚上没睡觉，临摹了三张画。后来他还常去余友涵家求看那本画册，拍成照片带到上海街上去找相近的构图。丁乙至今坚信是那本画册让他真正认识了西方艺术。“1982年我再去上海美术馆看本地创作展览，就觉得自己不要看了，哎呦那些技法太差了。”

丁乙对郁特里罗的追随，往内心深处，恐怕也不止于临摹街景。郁特里罗生活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早期，正是巴黎作为西方文化中心，各种艺术和主义如岩浆迸发的几十年。他是蒙马特女画家苏珊娜·瓦拉东的私生子，人们猜测他生父可能是夏凡纳、劳特累克或者雷诺阿当中某一个。因为从

小住在蒙马特，郁特里罗和“洗衣船”时期的毕加索等人一度厮混，但他对周遭变来变去的艺术潮流却毫无兴趣，几十年只画巴黎街景，落伍与否，成功与否，不以为意。在乱花迷眼的激变时代，几十年执着于一件事，这本身就有迷人之处。丁乙后来30年画“十”字，有一点郁特里罗的精神性。

《十示》开始了

1983年丁乙被分配到上海玩具厂设计科。白天做产品包装设计，下了班，还是想做纯粹的艺术，于是他在复旦大学对面租下平生第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工作室。说是工作室，其实就是一个能够独自待在那里画画的地方，“本地农民房，大概6个平米，有个小桌子，有张上下铺，下面睡人，上面放画”。

分配那时候基本就是定终身。丁乙清楚，如果自己不想放弃职业艺术家的梦，唯一出路是考学，否则一辈子就在工厂了。

1985年他去考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没中，第二年改考了国画系。“考国画其实是权宜之计。那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油画已经非常好了，根本看不上油画系那些老师的画，可是我又考不上。”他后来发现，反而国画系的老师资源好，学生上书法和篆刻课，全拉去上海中国画院，董衍芳教篆刻，韩天衡教书法，都是书画名家。

1988年，画出未来代表作“十示”系列第一张的丁乙，国画系刚读到第三年。他给那幅画取名《红黄蓝三原色》。“我就画了一个最简单的十字结构，最后像一张网一样。没有什么反响，周边同学都觉得看不懂你怎么这样画。”方法是用鸭嘴笔，把颜色一层层涂上去，像印刷品一样，很理性很冷静。在那以后，不管何种底色，他画面的组织结构都以“十”字为基本，“好似砖块之间的水泥、两根绳子打成的结、芦苇草编或是岔路口”。他将每一幅画都以标题“十示”连同创作年份的方式来命名，比如《十示2017-8》。

第一次见到丁乙作品的人，大都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画“十”字？和宗教有关吗？答案其实特别简单。他早年在美校学平面设计，进工厂后做包装设计，而印刷中标示尺寸的标记就是“十”，他每天都见，就有了想法。

“有点像是宣言式的创作。我做了很多草图，也写过一些札记，觉得一定要从西方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绘画中走出来，找一条自己的路。”他当年的宣言是这样表述的：“一、让绘画不像绘画，将与设计的结合作为一种突破；二、自动主义原则，对结构进行理性思考，对颜色不做理性选择，使绘画在最刻板的前提下有一定的自由度和偶发性；三、包括标题均不提供任何故事性，隔断观看者插图习惯的‘意象联想’模式，回到纯粹的画面欣赏。”

外面的时代大背景是“八五新潮”，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学习西方现代主义为特征的美术运动，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丁乙现在被视为中国内地抽象绘画的先驱者，前卫的“八五新潮”运动的一员。但丁乙自己对此不完全认同。在采访中他回忆，中国当代艺术那几年实际上是处于一种亢奋、骚动和无序的状态，而他不太喜欢“有点像运动的意识形态浓厚的艺术”。他想用自己所认为的理性方法，

来抵御外面的喧嚣和非理性——但事实上在“八五新潮”的思想主张中，“理性”恰好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运动给人的实际感受却走向了悖反。

不管如何，丁乙在他第二个小工作室里完成了这样一幅对他也对抽象艺术具有界石意义的画作。整个上海大学的四年，他也都在那个工作室里画画，在虹桥区古北路上。“很奇怪的一种过街楼，楼下过路，楼上住人，我必须要先通过楼下修自行车老头的地方才能上去自己的房间。那个时候能租到的也就这种房子，公房不可能有多余，每家住房都很紧张。”面积比早先大了一倍，12平方米，斜坡屋顶，坡下那块低矮空间只能放杂物，所以他画画的地方还是很小。租金15元并不便宜，当时一个人的工资普遍也就30元上下。

把想象和激情约束在一个个精确重复的“十”字中，丁乙开始了他这场事先设计、宣言并且长达30年尚未结束的艺术实践。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安静的漫长的被丁乙本人称为“工作”和“长跑”的绘画行为，可以当它是一种去除了全部意义的观念，也可以当它是一场表演。

精神来自精确

2017年10月6日，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当代艺术展“世界剧场”开幕。这个展览被解读为北美迄今最大规模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意图在中国当代观念艺术、全球艺术与历史语境之中做新的话语构建。从开幕前纽约动物保护群体对几件作品的激烈抗议，到开幕后对到底什么作品可以代表中国当代艺术30年面貌的议论纷纷，展览一直被置于各种话题之下，参展者和未能参展者都备受关注。

一个月后，沿着古根海姆著名的螺旋楼梯一路往上，我在展览中看到丁乙有两件早期的“十示”也在其中。之前读到的报道中几乎没人提到丁乙，他不在任何一个话题中。两幅1991年的作品，单独挂在一面白墙上，醒目但又很收敛。在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国际展览，或者所谓的历史性场合，丁乙总是那个既在场又不在场的人。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把自己和中国当代艺术之间这种奇怪的关系描述为：“我是一个品种”，但“我不是明星”。

1991年的丁乙刚被分配到工艺美校，离开工厂当上了老师。他也换了第三个工作室，这次是在上海延安路高架桥对面一个院子里：延安西路许家宅。

那几年,北京有了“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上海在华山艺校办过装置艺术展,身在美协体制外的艺术家也可以卖点作品了。丁乙和那些发誓以纯粹艺术为毕生追求的前卫艺术家们一样,经济条件略微好转。搬到许家宅没多久,他把先前租的一间15平方米换成两间15平方米,还加租了一个厨房。从决心做职业画家那天起,丁乙对拥有个人工作室这件事就表现出一种特别的专注和投入。即便现在,他还是喜欢去参观大艺术家工作室,他认为“通过工作室可以了解艺术家是怎么想问题的”。

许家宅阶段丁乙开始画比较大一点的画。没有画案,把两个长板凳拼在一起,为此被迫长时间保持弓腰绘画的姿势。生活一成不变就像他画面的“十”字一样。只要不去学校上课,都是早上11点起床,12点开始工作,直到晚饭时候。中间放松的方式是骑自行车去最近的天山电影院,碰到放什么就看什么,回去接着画,到凌晨四五点钟收工。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墙上的那两件作品,就是在许家宅以这种方式画出来的。

到今天已经是著名艺术家的丁乙仍然保持过去这种规律的工作习惯。他很少社交应酬,非去不可的展览开幕式尽量不留下吃饭。原则上每天早上10点到工作室,中午叫外卖,午睡后继续工作,晚上11点回家吃晚饭,12点开始画他的小尺幅纸上作品,凌晨2点收工。这些纸上作品并非大画的草图,而是另一种状态下的创作。“白天我在画室要站着工作11个小时,晚上回家可以坐在椅子上画画,就换了一种更加直觉的思考方式。一幅小件纸上作品,一般我可以用两天完成,如果有什么新想法,能随时看到实现效果。”

2017年9月29日,古根海姆美术馆中国展开幕的前一个星期,丁乙在泰勒画廊纽约空间(Timothy Taylor)的个展“黑与白”也开幕了,展的就是他近期16件纸上作品。像丁乙说的,小尺幅更能看见艺术家即时的微妙调整,以及更敏感的视角。

在丁乙看来,熟练是艺术家的敌人。“最早我的画注重精确性,所有我绘画的精神都来自这种精确。后来因为天天那样弓着,腰很快直不起来了,没有办法持续。我为自己找很多理由来化解,说精神的力量可能也不一定来自精确,然后就开始我说的‘口语式’阶段,不再精致地处理画面,有随意的东西进来。但没过多久我感觉到问题,一放松下来的状况就是我形容的高山滑雪一泻千里。过于熟

练导致画面腻味。为了阻止这种熟练,我开始用双线,比如本来一个‘米’字结构4笔解决了,我改用双线勾拓,把它变成8笔,每个单元都是小的笔触。”丁乙说起1992年相当关键的自我冲突和自我解决。另一种他用来阻击熟练的方法,是改用生布来画,即不做底的画布,这样迫使自己没办法快速和流畅,重新回到理性和精确。

对材料他变得愈发敏感,比如在布面丙烯里面,用上了粉笔、木炭、墨和铅笔。这个阶段的第一张画“红色”,在红底上用了白色颜料和黑色木炭来画栅格。他是晚上开画的,画到中间发现木炭和丙烯无法融合,用什么来替代?想到了粉笔,就是老师写黑板的那种粉笔。工作室里没有,他又着急验证新想法,情急中看到墙角有根药蟑螂的粉笔,拿过来就用上了。由蟑螂笔助力的这件作品他一直留在自己手上,没舍得转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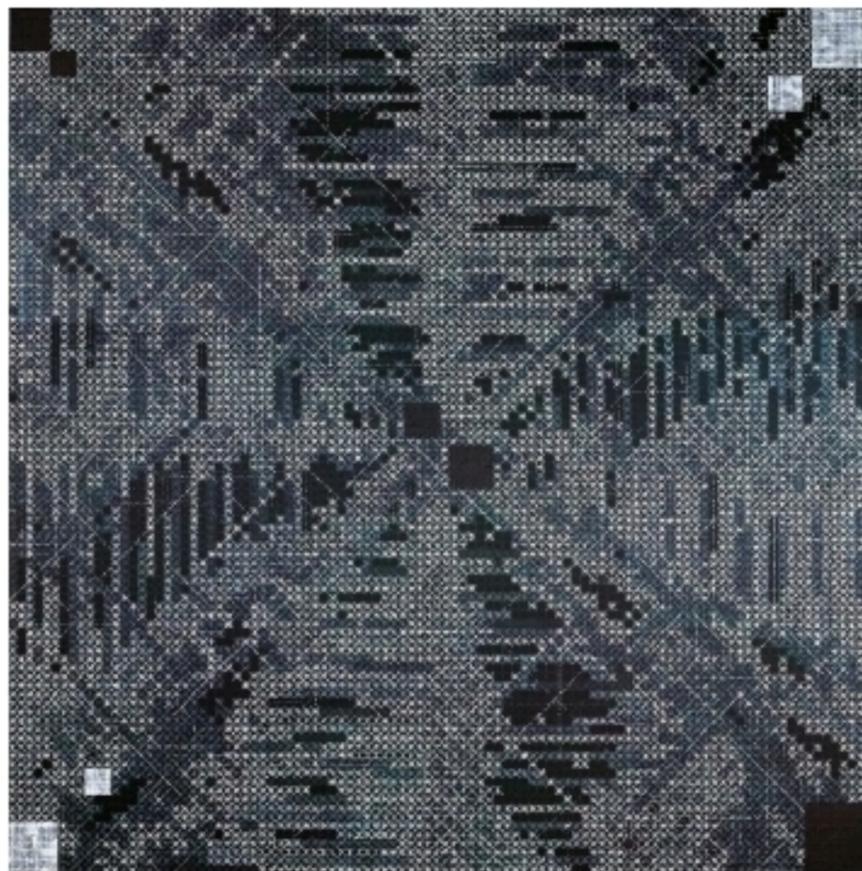
那时所有人都说他的作品像布料,于是有一个阶段,大约1997、1998年,丁乙就直接用苏格兰格子布作为画布,目的是利用布面已有的网格和十字。离他最近的一个大布店在天山路上,他差不多两周要去逛一次。营业员看熟了的脸,见了就打招呼,又来了啊?大概以为这是个生意不错的裁缝。

丁乙把找布比喻为找风景,要合适的颜色、厚度和门幅。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的作品画幅固定在1.4米×1.6米,那其实就是量体裁衣,因为成品布料的上门幅只有1.45米。为了画2米大画,他开始向工厂订制布料,工厂规定100米以上才能上机,他也咬牙下单。直到现在画室仓库里还堆了好多布料,都是当年剩下的。

十年读城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丁乙的第四个工作室换到了华师大附近的大渡河路,二室一厅,一直使用到1998年他结束租房生活。那年丁乙成了有钱艺术

到今天已经是著名艺术家的丁乙仍然保持过去这种规律的工作习惯。他很少社交应酬,非去不可的展览开幕式尽量不留下吃饭。



(本组图片：丁乙工作室供图)



左上《十示 2017-6》，椴木板上综合材料，366×244 厘米；右上《十示 2011-7》，布面丙烯，300×300 厘米；
左下《十示 2014-11》，布面丙烯，200×200 厘米；右下《十示 2017-10》，椴木板上综合材料，366×244 厘米

家，在上海大学附近的城乡接合部买下一幢三层独栋，这个商品房小区是上海最早推出的 Townhouse，每一层都有 60 平方米，丁乙把三楼做成了画室。他有了孩子，过上安稳居家生活，偶尔进趟城，几乎和上海市中心的市井繁华隔离开了。

有一天温哥华一位美术史教授来工作室探访，聊天中对丁乙说，自己看到的上海非常有力量而且充满生机，特别像 30 年代的巴黎，但是在你们的画里面看不到这些感觉，好像你们都在画自己的世界，和正在变化的时代没有关系。

“这话一下子就打击了我。”丁乙说。他有点惊慌，几乎是立刻决定了，要把工作室再搬回市区。1999 年他在苏州河边找到了一处老房，西苏州路 1131 号，原来是 30 年代英国人设计的仓库，他找来香格纳画廊、东廊艺术，还有艺术家张恩利、韩峰等人，一起把整栋空间分担下来。“那地方现在已经被拆掉，变成了地产楼盘。”他们随后都搬到了莫干山路，那里现在是上海有名的画廊艺术区。

每天从郊区的家进城到工作室，丁乙一路目睹上海城市最疯狂的增长和开发，他强烈感受到转型时期的城市对创作的刺激，于是形式主义画家不做了，由此开始长达 12 年的“荧光系列”。“那时城市在我眼里就是荧光色和金属色，就像夜景中的霓虹灯一样闪烁，混乱和无序，折射了物质化的时尚和繁荣。”

从决意要做研究型的形式主义画家，转而以艺术关注变化中的城市问题，视觉上愈来愈喧哗，对于过去那个冷静疏离的丁乙而言，可谓一次自我别离。

不过他的绘画逻辑还是留在“十”字系统之中。新作品数码感很强，但他并不用电脑做辅助草图，手稿也不再做，也不再使用尺子、胶布这类工具，所有东西都在他脑子里，以对角关系建立、繁殖、扩张，然后徒手对应画布之上。“数字化是现在的社会表象，我用它的语言，但我不用它的工具。”丁乙对自己的选择很确定。

2011 年的“黑白”系列可以说是他再次重新看待城市的结果。把画面的色彩转化为黑白或暗色，同时，也把画面里的组织方式放大。有些画面像在绘画星空和宇宙，艺术家显然想以无论心理或物理上都更远的距离来看熟悉的城市，哪怕有人看来难免“生硬”之感。

材料上的敏感还在延续。2014 年底，丁乙把画布和布料换成了木板，这个变化始自 2015 年他在上

有一天温哥华一位美术史教授来工作室探访，聊天中对丁乙说，自己看到的上海非常有力量而且充满生机，特别像 30 年代的巴黎，但是在你们的画里面看不到这些感觉。

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准备个展“何所示”的那段时间。近 3000 平方米，位于主入口处的展厅高逾 10 米，西岸馆高大的水泥巨制所形成的空间压迫对于架上绘画几乎就是一场“灾难”。看完场地，丁乙就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战胜它？他觉得还是用纯粹的绘画，不加入任何装置作品。灰色墙体冷冰而坚硬，用画布打不过它，他想到了木刻绘画，用木板对氛围与实体的影响，用平面之下隐藏的内容来控制场域。

这组作品使用了椴木密压板，每块长 2.4 米、宽 1.2 米，可以几块拼成正方或长方的巨大尺寸。质地硬朗，足以让他用深刻入里的方式与之对抗。木刻绘画和版画制作技法不同，在试验过程中，丁乙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消除木刻在画板上留下的白色痕迹。他试着为木板做基底，一层不够，就两层、三层……在木质表面堆积数层颜料，鲜橙、墨绿、大红和大黑，再以棱形、弧形和方形三种刻刀，运用不同的方法和力道在画面上划出线条，划过厚涂的颜料层，刻入底部木板表面，或深或浅，既开放也隐藏，最终由色彩控制画面进而自然形成他经典的“十示”结构。

6 个月后，10 幅高约 5 米的新作——《十示之 2015 1-10》被整齐排列在龙美术馆巨型展厅，这是他每天工作 15 个小时的成果。新作中有 5 幅为红色调，另 5 幅为绿色调，观众可以清楚看到两组系列如何各自由简而繁发展。

2017 年 5 月 12 日，丁乙又在伦敦泰勒画廊举办了她的最新个展，仍是探索木刻和绘画之间的微妙反应。丁乙表示他想在新作品中“塑造某种正在萌发的力量，而不是已经发散出去的”。英国艺术评论人赫蒂·朱达（Hettie Judah）则说，丁乙的近期体现出一种加速感，虽然他的创作速度并没有变化。

作品的超大规模和对木刻的使用，让丁乙在看似重复中又一次进入到新形态。没人知道“十示”最终会在哪里停步，丁乙说，他也不知道。■

我的画像一张网

——专访丁乙

“你这是什么，是花布吗？”

三联生活周刊：我还是比较好奇，就是你当初从对郁特里罗那种很具象的临摹，如何转换到了抽象？你最早看到的抽象作品是什么，给你什么感受？

丁乙：早年国内抽象作品有两个尝试方向。一是赵无极的路子，水性的流动的状态。1983年我专门去杭州看他的个展，他的东西其实比较好懂，和山水、意境都有联系。但是对美国抽象绘画的线条，那时候还是有障碍的。我受到的另一影响是结构性的，是和城市风景有关的画面构成。这也跟我学过设计有关系，设计的第一课就是平面构成。

三联生活周刊：但你开始画抽象后，第一幅《红黄蓝三原色》几乎就是赵无极的反向，他有中国意境的混沌感性，而你却彻底理性。

丁乙：1988年那件作品其实有很多思考，不是无缘无故的。我那时候在国画系读到了第三年，已经感觉到了国画的局限。而我对西方现代主义也很了解。所谓的现代主义从塞尚开始，到毕加索和马蒂斯，把塞尚的色彩和结构理论更概括化了。我就想把曾经影响我的塞尚理论和学校教的中国传统都扔掉。当时有一批老艺术家已经在探讨抽象，吴冠中发表了关于形式美的文章，刘迅也画有点赵无极路子的泼彩抽象，但他们的画里还是有意象在。我就想全部去掉，只留下结构，像一张网一样。我当时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三联生活周刊：会不会还有一种顾虑，就是从工艺美校出来的，现在又用平面设计的方法去绘画，会不会被人认为，你作为艺术家却摆脱不了工艺的语言？

丁乙：对的。但那个时候看到我画的人也不太多。我每次画出一批画，都会拿到工作室楼下有阳光的地方去拍照，邻居就经常会问我：这是什么，是花布吗？完全把我当成花布设计师。偶尔有同学老师来看画，也觉得你是不是走错路了。那时候绘画很讲究绘画性。我实际上是很懂技巧的，但正因

为如此，我要把它们丢掉。

色彩方面，我也有想法，要让色彩像本来世界一样无序，随手拿到什么颜料就用什么颜料，让色彩有一种随机性。基本我很多画的颜色都是直接打开瓶盖用，不调的。我这里一直没有调色板。

三联生活周刊：西方现当代艺术有不少专注画格子的人，对你有多大程度影响？

丁乙：早期对我影响最重要的两个抽象艺术家，一个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现代几何抽象绘画的先驱），就是结构；另一个是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美国战后极简抽象代表），尤其是他六七十年代的作品我觉得很感人，这么简单又这么明确的绘画语言。但我自己的绘画还是不一样。从开始到现在，我所有的方法，最大特点全部是线，用线来组织，这在西方几乎没有。西方人还是偏爱体积的塑造。

三联生活周刊：“抽象”这个词最早是怎么译过来的？和你交谈中，突然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特别准确，大象无形的概括。

丁乙：我没有深究过这个词的来历。和“抽象”相似的词，我们还用过非具象、构成绘画等等。说到构成，学中国画给我最大的体会，就是让我看到中国绘画里面始终意象的思维，从来没有过纯粹抽象和理性抽象。我们当时在国画系的学习和传统师徒相授的方式还是比较像，这和西方的条目设置完全不同。我们的老师今天教你画石头，明天教你画松树，画山总结几种皴法，画竹子就是风竹雨竹，这些东西到脑子里再组合。国画很难突破就在这个地方，它教会你所有的零件，等画一幅画时，这些零件再被取出来拼在一起。

“我好像没有什么困惑”

三联生活周刊：你9月份有个展览是在抽象主义大师肖恩·斯库利位于纽约切尔西的画室里，你有四幅作品和他的作品一起展示。你们也有过对谈。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看待抽象绘画的差异？

丁乙：我们的对话从蒙德里安开始，但并没有真正谈论抽象艺术本身，好像是关于更大的题目。实际上我觉得我和肖恩·斯库利之间的连接更多是从作品来感受，一个西方的抽象艺术家他在想什么，用什么方式作为他创作的基本灵感来源。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在谈论绘画的时候，更多时候谈论的是情感。但我们起步其实很相似，基本形态都从方格开始。我的方法可能更严谨一点，我用鸭嘴笔，他用美工纸贴上胶带刷完之后撕掉。

抽象艺术基本有两类途径，理性的必然从构成起步，感性的必然从无意识的表现性起步，蒙德里安和康定斯基在他们的时代都用自己的实践把这两条途径指明了。我现在仍然想要坚持住理性部分，但也觉得，自己感性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可能是年龄原因。在二十几岁的时候没有经历，我的情感是“假”的，有的是宣言和决心，也可以很彻底地用理性来实践这种决心。但现在，这么多年积累的情感的丰富性是年轻时候达不到的，肖恩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你无法抑制它在画布上出现。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画看似严谨规整，但实则每一个单元的色彩和笔触都有很多细微变化的随机性。这恐怕是助手无法完成的。但现在很多艺术家都用助手来做作品。

丁乙：我见到过两次基弗（Anselm Kiefer，德国新表现主义代表画家之一），两次他都跟我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我和你两个人不用助手创作了。他其实是想强调，他是自己创作。但去过他的工作室后，我不敢肯定。他的工作室原先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仓库，巨大，人在里面移动可能需要骑自行车。他差不多是一个区域一个主题几十张画，那么大的体量，一个人有点不可能。我觉得流水作业是肯定的，他经常一个主题20张画，同时开工。

三联生活周刊：你觉得为什么中国艺术家如此推崇基弗？

丁乙：我觉得他的人文精神和中国需要的人文精神很像。他所有创作的主题都是反思，反思纳粹，我们这一代人受他的影响是反思“文革”。烧焦的

土地，荒凉，苍茫，这些情绪我觉得有共通的东西。但年轻一代不一定有这种感觉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个人对他有强烈的共鸣吗？

丁乙：我对他是对半切吧。我这个人很喜欢去艺术家工作室，通过工作室可以了解艺术家他是怎么想问题的。在基弗工作室参观的最后，他跟我说，我带你去看一下我做给那些画廊看的一个画廊。我们走出工作室，进了另外一个大房子，私人飞机都可以开进去的那么一个高大空间。我一看就明白了，他其实是做给想要收藏他作品的机构看的，大画、飞机、雕塑……你要买就全部买去，一个非常完整的基弗收藏馆。

三联生活周刊：看过那么多大艺术家的工作室之后，还有谁留给你的感受比较深？

丁乙：去年我去了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丹麦著名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室，我为他捏一把汗，因为铺张得这么厉害，几乎是一栋大楼，像学校一样，每一层不同功能，这边做光学研究，那边做模型，顶楼还有大厨房，厨师在研究食谱什么的。我一直观察这样的明星艺术家，以多媒体方式创作，但技术革命太快，很容易今天有，明天没有。艺术一经商业的扩散，到处都有作品变异后的影子，艺术中令人崇敬的东西就全部没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你看来，什么是“艺术中令人崇敬的东西”？

丁乙：正，即艺术家对艺术热爱极其严肃严谨的态度，还有对作品品质的极致追求。没有投机、没有取巧、没有歪门斜道，只想着做出最好的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艺术家尤其成名艺术家会有类似的困惑，就是走到一定的程度走不动了。你有过这种感受吗？

丁乙：我好像没有什么困惑，都在工作中化解了。中国当代艺术30年起起落落，我们经历很多。我觉得中国的艺术家现在已经不再需要像从前那样看外面。我们可以在创作中把自己看世界的角度和力量充分表现出来，一头扎进去，而不是像以前浮在表面，做一个（西方艺术）谦虚的学生。■



(王磊摄/中新社/视觉中国)

上图：“谱系修辞”板块展览现场

下图：“首届安仁国际双年展”展览现场



张晓刚油画作品《舞台》

安仁，从当代艺术中“观看”历史

文 / 薛凡

从成都到安仁古镇很近，车程半小时，但目前的公共交通并不方便。如果不是自驾或包车，只能坐长途大巴前往，大概要开一小时。大巴启动的那一刻，车上弥漫的四川各地方言和招手就停的习惯，很快就会把乘客带离城市的氛围，送进乡镇上嘈杂、热闹的“熟人社会”中去。那么，一个被定义为国际性大展的双年展为什么会选在安仁小镇举办？安仁又是哪里？

为什么是安仁？

首届“安仁国际双年展”的主展场离安仁古镇很近。像许多在废旧工厂基础上改造的艺术区一样，这里原是宁良机械工厂的生产车间。在双年展的方案落地之后，建筑师刘家琨用48天完成了老厂房的改建工作，使之成为双年展的永久场馆，也完成了现代工业记忆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嫁接。

安仁镇隶属成都市大邑县，其历史虽可追溯至唐，但真正被人们记载是近百年的事。清代以来，安仁的社会结构以宗族为主导，目前仍存留27座公馆，都是民国时期达官显贵的私邸，这个数字甚

至超过南京现存的26座公馆。据史料，历史上最多有56座公馆同时在这个小镇上，见证着安仁最鼎盛时期的荣光。这些达官显贵并非来自五湖四海，而是大多出自清初从安徽徽州移民入川的刘氏家族。清末民国，刘氏在战乱中迅速崛起，出了一批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家族掌握着四川和西康两省的军政两界，实力雄厚。“大地主”刘文彩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故事也被渲染得最有传奇色彩，此外还有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刘湘、24军军长刘文辉等人。

近几十年来，安仁镇早已褪去当年的辉煌，但

特殊的历史地位让这里的底色依旧厚重。2005年，“建川博物馆聚落”在安仁建成开放：弃官从商的樊建川先以抗战、红色年代为主题建了24座民间博物馆，聚合在一起，与安仁的历史相互呼应，形成一个“主题公园式”的博物馆群落。后来，汶川地震博物馆的加入，又给这个群落的“疼痛感”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也与当代历史产生关联。

在安仁办双年展，一方面因为其历史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安仁与中国现当代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的刘文彩庄园里，仍然陈列着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创作于1965年的群像雕塑作品《收租院》，114个人物，以刘氏庄园的故事为原型，用写实和叙事的手法讲述地主收租的全过程，是当时阶级斗争下的艺术产物。刘文彩故事的真实性在改革开放以后已经受到很多质疑，这是另一个话题。而它之所以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一个符号，不仅因为一度引起全国轰动，更重要的是作品完成后很快就进入了国际视野。上世纪60年代，德国左派对《收租院》很感兴趣，也提升了这件作品在西方世界的知名度。1972年，第5届卡塞尔文献展邀请《收租院》参展，但由于正值“文革”未果。在种种历史际遇下，《收租院》用本土化的艺术语言引发了超越国界的关注。又因为有《收租院》的存在，安仁国际双年展在艺术层面也被认为有了文脉的依托。

最近的传统

在安仁双年展的展场，观众进入的第一板块就是“谱系修辞”。策展人杜曦云和蓝庆伟的意图庞大：以安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遭遇为背景，尝试梳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双年展总策展人吕澎则在展览前言中写道，这个板块的意义在于“探讨当下问题的历史成因，和最近的传统，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和推测”。

吕澎将展览主题定为“今日之往昔”，出自王

在安仁办双年展，一方面因为其历史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安仁与中国现当代艺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羲之语“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历史”是吕澎一直强调的，“如果不对历史问题很好地理解、思考和清理，怎么能走向未来？”他希望借由对安仁的观察，激发出艺术家和参观者对历史的审慎思考。

从展览的结构来看，一共分为四个主要板块——“谱系修辞”“十字街头”“回不去的未来”和“四川故事”。倘若稍微改变一下观看顺序，以“谱系修辞”“四川故事”“十字街头”“回不去的未来”这个顺序去参观展览，又是一个从地域性逐渐转向国际性的思考过程，即安仁、四川、全球、未来。“谱系修辞”基于安仁历史；“四川故事”以几件四川题材的传统作品为支撑，探讨戏剧和历史的关系；“十字街头”这个板块，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权力、战争、选择、变革，呈现出迷茫又挣扎的社会现状；“回不去的未来”里展出了更多年轻艺术家的作品，试图描绘未来，却发现怎么也逃不出历史。所以，“历史”“往昔”是所有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影射的概念。

第一单元“谱系修辞”不能免俗地汇集了诸多中国当代一线艺术家的作品以吸引观众的目光，陈丹青、方力钧、何多苓、隋建国、王广义、徐冰、岳敏君、张晓刚、周春芽……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被摆放在醒目的位置。据吕澎介绍，在这个单元里，大约70%的作品都是这些大牌艺术家为此次展览最新创作的。这些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艺术家个人风格烙印，但仍有新鲜的可看性，一是他们自身与四川或四川美术学院渊源颇深，二是他们几乎是同代人，有共同的时代痕迹，因此作品之间也可以形成某种对话。

张晓刚的《舞台》尺幅巨大，以他一贯冷静克制的风格来描绘一个魔幻的历史场景，艺术家这样描述这件作品：“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中，我植入了三个不同时代、身份的床、雕塑、浴缸、浴桶等物件，镜子中映射出一个扛着枪的少年。这些物件分别来自安仁的素材，也有个人和国家的记忆——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时间并共处一室。空间的两侧设置了两块幕帘，烘托出某种魔幻舞台剧的场景。”或许可以说，《舞台》是“谱系修辞”板块的一个缩影，象征时代趋势和个体轨迹交织成的复杂谱系。

这个板块中的不少作品，都有集体记忆的元素。比如徐冰的《蜻蜓之眼》，一个全部以网上公开发布的监控视频镜头来完成的影像作品；姜杰作品《向

前进向前进》中，象征红色芭蕾舞的舞鞋；陈曦的《中国记忆系列》用不同时代的电视画面来讲述时代记忆，艺术教育小组（张滨、叶洪图）用圆珠笔在画布上复制雪花屏幕影像。它们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产物，成为一代人的记忆，不同经验的观众对这些历史记忆都会产生不同的反应。

“四川故事”的策展人是意大利独立策展人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这个板块有意思之处在于碰撞——西方视角与四川往事的碰撞，戏剧与历史的碰撞。马可长期活跃在欧洲当代艺术领域，在他近几年策划的大型展览中，2015年的“太早太晚——中东艺术及其现代性大展”、2016年的“在围墙的那一边——东欧生态艺术展”、2017年的“白种猎人——当代非洲档案与影像”，都是聚焦于地区性社会生态的展览。

这个板块对历史的探讨以几部戏剧为依托，探讨“脸谱化的戏剧表达”。1940年德国剧作家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剧本《四川好人》是这个板块的一条线索，串联出魏明伦根据此剧新编的《好女人，坏女人》，以及与布莱希特有交集的梅兰芳在上世纪50年代出访苏联时的一系列史料梳理。在这条主线之下，策展人也尝试搭建一个“形而上”的剧场，当观众进入剧院后台式的展厅后，木偶、玩具、面具、戏服，这些道具进一步增强了展览的代入感，“让观众转变成单个或群体故事的叙述者”。马可更像是一场戏剧的幕后导演，他希望呈现的是一出结构完整、内容统一的戏，而不单单是一个拼盘式的展览。

从马可的这出大戏中走出，一进入“十字街头”展厅，会立刻被展厅内嘈杂、躁动的气氛包围，不自觉地感到焦虑和不安。这种感觉不是来自于直接的视觉冲击，而是首先来自听觉。“十字街头”这个题目取自1931年12月11日鲁迅与冯雪峰创办的杂志《十字街头》，策展人刘鼎、卢迎华希望借由这本杂志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来警示当下。大量影像作品，如香港艺术家陈佩之重新编排创作的《等待戈多》，意在提醒观众哪些东西是更值得被更新和重建的；斯坦亚·卡恩（Stanya Kahn）的《切莫回归沉睡》拍摄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因经济危机遗留的烂尾楼里，是一部让人产生不安感的实验性电影，隐喻国家暴力导致的国民创伤；《一个接一个的战争》讲述一个有多重国家背景身份的逃兵流亡的故事，影射爱国主义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究竟应该有怎样的关

系……在这些影像里，枪炮声、呐喊声此起彼伏，虽然每一个作品都有独立播放的小空间，但集合在同一个展厅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不安与疼痛感。

如果我们站在未来的视角，这种疼痛感是会增强，还是减轻？这是“回不到的未来”这个板块引发的思考。在这里，策展人刘杰和吕婧虚拟了一个自未来回望当下的场景，也恰好呼应了“后之视今，亦如今之视昔”的命题。

小镇与大展

在小镇举办国际性的大型艺术展，安仁并不是国内第一个。除了上海双年展、广州三年展等有影响力的展览之外，也有一些摄影双年展、建筑双年展选在不为人熟知、规模不大的小城镇举办。2016年3月，乌镇举办“乌托邦·异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引起广泛关注。但这个展览最终没有固定成“双年展”或“三年展”，主办方还在试探艺术展这种模式是否对小镇整体发展起到持续的良性作用。

双年展这种形式本身也经历过一个从边缘走向主流的过程。1895年，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虽由威尼斯市长牵头筹办，但从评委到参展艺术家和作品，都是脱离学院派传统的，他们主张更前卫的“现代精神”，为那些进不去美术馆办展的边缘艺术家打造一个独立的展览空间。而百年后的今天，威尼斯双年展已是国际艺术界的主流标杆。威尼斯双年展不仅是一个展示艺术作品的盛会，更重要的是带动了全球艺术产业链的转动。在第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参展的500多件作品售出了186件，总售价超过36万里拉（以当时货币计）。当这个为期半年的双年展闭幕时，参观人数总计22万余人。

在谈到安仁双年展如何保持旺盛的状态时，吕澎认为：“人文生态的搭建需要时间，要靠坚持和不断的投入来强化一个展览或某个地域在文化上的持续贡献。”安仁双年展主办方的负责人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更清晰的愿景，双年展是对安仁古镇规划改造的一个起点，进而开展艺术品拍卖、艺术品衍生品开发、艺术市集、艺术节等一系列产业链条。当双年展作为产业链中的一环存在时，该如何保持其艺术水准和学术水准，又如何兼顾在地性与全球性？这是抛给未来策展人的难题。■



《如梦之梦》何以照进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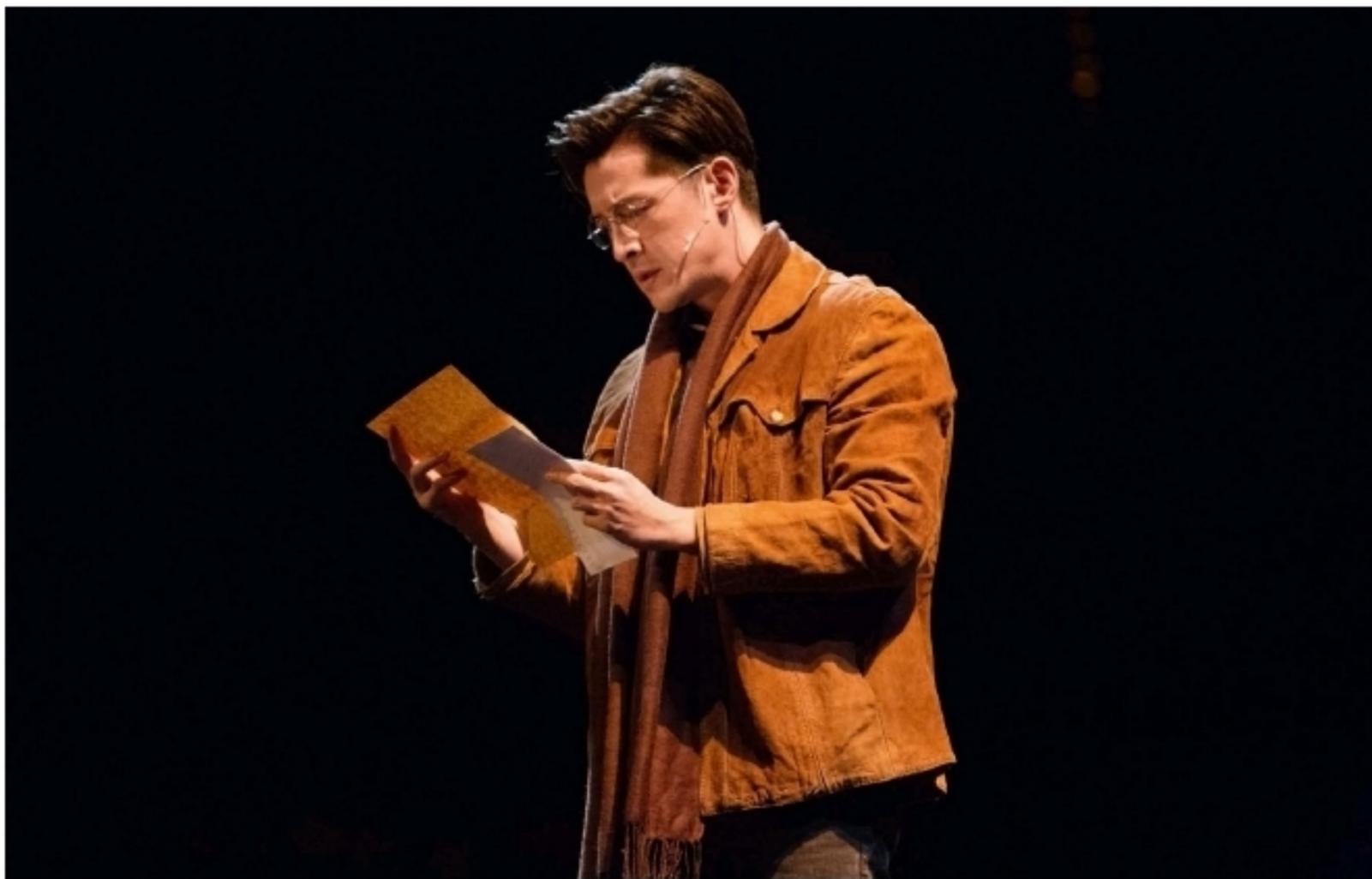
记者 / 驳静

大陆版《如梦之梦》今年演到第五年，逐渐成为一部成熟的商业戏剧作品。与之相关的新闻非常多，从8个小时到环形舞台，从30多位演员100多个角色再到胡歌、许晴等人的明星效应。值得关注的话题也许还有，赖声川戏剧近几年何以在大陆市场如鱼得水？

明星效应

2012年秋天，制作人王可然把李宇春这个名字推荐给赖声川时，这位台湾导演并不十分知道凭借“超级女声”出道的当红歌手是何人。赖声川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李宇春”三个字，看完跳出来的页面结果后哈哈大笑，他转过头问：“可然，你确定吗？”

李宇春后来扮演了医生小梅，从出场时间看，戏份非常多。王可然其实一开始第一反应跟赖声川差不多。但李宇春在陈可辛的电影《十月围城》里演过打女，这一角色又促使他改变主意。“打女恰恰是小梅医生这个角色，如果李宇春来表演小梅，她



左图：金士杰扮演的法国伯爵与谭卓扮演的顾香兰在后者房内发生的一幕戏，伯爵正劝说顾离开上海，跟他回法国生活

右图：胡歌扮演的5号病人重回巴黎，发现一封江红留给他的信

在台上不吃亏，对我们来说也合理。”

在剧组中，李宇春不是唯一一位缺乏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如梦之梦》演员选择模式是制作人推荐，导演做决定。“如果我认为某个演员合适，赖导不认可，那双方摆出理由来。”王可然告诉本刊记者。他陆续推荐给赖声川的演员包括后来扮演5号病人的胡歌，扮演顾香兰C的许晴以及顾香兰B的谭卓，在这之前，上述三位演员都从未出演过舞台剧。但每一位都符合王可然认定的“合适、得体，能给戏带来广告传播效应”这一法则。

2012年，胡歌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火，实际上2006年经历车祸后到2015年《琅琊榜》大热之前，胡歌处在相对平静的一个时期。王可然觉得他经历过生死，与病人这个角色有契合。至于许晴，早在制作第一部戏《陪你看电视》时，王可然就试图邀请过，这一回他觉得许晴就是顾香兰。许晴接到邀约后犹豫了半年。“我反复陈述她与这个作品的关系，帮她建立安全感，告诉她现在戏剧舞台是借助耳麦的，表演方式是接近自然的。”最后，许多人看下来的感受与王可然一致：这个角色太适合许晴了。

《如梦之梦》长约8个小时，分上、下两本，12幕90场共100多个角色，许晴扮演的顾香兰尽管直到上本结束时才正式亮相，下本演到三分之一才开始与环境有丰富的对手戏，这个角色却处在整部戏的“风暴眼”。

它讲述的故事既简单，又复杂。简单讲，一位绝症病人跟医生讲述他一生糟糕却奇妙的境遇，故事里有一位叫作顾香兰的女士，当年是上海天仙阁头牌名妓，后来嫁与一位伯爵并跟随他回了法国，她在巴黎学画、办画展，风光一时，又一度落魄。而复杂的是，故事不是倒叙、插叙，而是打破空间，跳接时间，同时，整部戏又有若干重要角色由多位演员扮演，他们时常同时出现在台上，这其中就包括三位顾香兰。

所以顾香兰几乎等同于整个故事的叙述动力。王德宝（顾香兰的爱慕者）为何一生只爱她一人，伯爵为何认识她后与原配妻子离婚，故事叙述者5号病人又为何一直在寻找这个他并不认识的人？这个女人必须有足够的魅力。在造型服装总监叶锦添眼里，“许晴身材好，线条感十足，穿旗袍好看”。

而赖声川对这位他笔下最复杂角色的感觉是：“许晴将对人生的体验赋予这一角色，她身上有种气场，最后‘占据’了顾香兰。”

这部戏花去制作费用上千万，但王可然说，每一场付给明星的报酬非常有限，“最后签约的演员，没有一个在费用上跟舞台计较”。但究竟是多少？“每个明星如果一场跟我要3万，我这戏就演不下去了。我把账算给他们听，最后他们看到这是一个能体现尊重的价格，就欣然接受了。”第一年，《如梦之梦》演了（30套）60场，当年就收回了成本。

是否有过分依赖明星人气之嫌？王可然说：“2013年首演后，李宇春的表演其实是被观众和专业欣赏者认可的。并且，第二年李宇春不再继续参加，票房并没有受影响，第二年甚至卖得更好，也更快。”就票房而言，其实2015年胡歌火了之后，明星号召力着落在他一人身上就足够了，但目前许晴、谭卓、金士杰以及90岁的卢燕仍然出现在《如梦之梦》的舞台上。

但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整个戏剧市场是否对明星过于依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陶庆梅观察话剧市场多年，她认为，明星的天然劣势是档期问题。“他们只能演这么几场，但话剧市场还是每天都要过日子。你看今年的《断金》，这三位大明星，我就想怎么凑这三人的时间。孟京辉小剧场话剧，没有明星，也过得挺好。”过去戏剧市场太小太不健全，也太依赖明星，但现在话剧对明星的依赖其实已经下降了，陶庆梅告诉本刊：“明星是过节放烟花，让观众知道我们这里还有个烟花，那下一步你看个小烟花行不行。所以长远来看，健康的话剧市场用明星扩展观众式，但不是常态。”

表演的难题

在看此戏之前，仍然会对这几位演员有无足够

整个戏剧市场是否对明星过于依赖？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院副研究员陶庆梅观察话剧市场多年，她认为，明星的天然劣势是档期问题。

舞台感染力心怀疑惑。导演、制作人以及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颇一致，他们都感到，演到第五年，胡歌、许晴和谭卓与角色越来越融为一体。

但前几年呢？作为《如梦之梦》制作经理的李雄告诉我，从第三年开始大家终于“没那么青涩了”，“一个角色上场，我会恍神，只知道他是5号病人，想不起来他叫胡歌”。但排练初期，没有舞台经验的演员仍感到焦虑，觉得无法进入角色。李雄注意到，许晴在排练厅甚至很少跟人说话，时常陷入沉思。

谭卓焦虑得更早。经纪人为她拿到这个角色时，她本人对顾香兰的戏份还并不知情。当时她在意大利，她主演的《小荷》入围2012年威尼斯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周”，在此之前，她在娄烨导演的《春风沉醉的夜晚》中担任女主角，这部电影在第62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获得两项提名。但即便在电影领域有此成绩的演员，第一次接触戏剧舞台仍会产生巨大的自我怀疑。谭卓说她在威尼斯收到剧本时还一点不担心，但打开剧本后越看越心惊，“我要扮演的角色也太重要了吧”。

谭卓主要戏份在下本。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戏发生在她的房间里。在这里，她跟金士杰扮演的伯爵需要完成一个决定。二人语言不通，但又一直在“对话”，这个沟通引向一个结果，即伯爵需要说服顾香兰离开上海，跟他去法国生活。

谭卓一再说她对自己的形体没信心，还没开始演就失眠，给跟她演对手戏的闫楠打电话试图缓解。毕业于中戏表演系的闫楠，能理解他们焦虑的来源，他觉得“舞台有生命”这句话的意思是，“它像个怪兽，会欺负你，如果内心不强大、没有信念和信心，上台就容易被吞噬”，所以所谓排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建立信心的过程。

100多个角色，演员却是30位。这意味着许多演员一人需要分饰多角。尽管大多数角色尽量保证一位演员只有一个主要角色，2013年首演时，闫楠除了扮演王德宝外，还有一半时间同时也扮演5号病人。这种时候，情绪调整就十分重要，闫楠告诉我，他的方法是“在头脑里设计一个虚拟场景”，每个角色等于一套衣服，事先的准备与排练相当于裁缝制作这件衣服，制作完了，挂进衣柜，扮演哪个角色时取出来穿上就好。

但这是对那些戏剧舞台训练有素的演员。赖声川告诉我，他在应对舞台感生疏的演员时，并不硬

性规定演员必须达到某个程度。“我更希望演员依据自己的经验进入舞台剧表演，大体来说并不困难，只有一些技术性问题需要调整，比如最开始排练，许晴会无意中背对观众，我提醒她这些技术问题。而谭卓的个性，会让她每天表演都有不同情绪，因为她习惯在电影中给出不同感觉的表演，让导演选择。但在剧场里，需要每天给出稳定的感受。第一年，我并没有要求她，慢慢她稳定下来，找到了自己的感觉。”

陶庆梅在赖声川多部作品的排练过程中进行过观察，她发现赖声川导演特点是“随缘”。“他不会在心里制定一个标准，让演员去够，并不要求演员达到他标准上那个100分，而是让演员达到每个人自己的100分，所以他让演员顺着自己的气息走，这也是那么多明星愿意跟他合作的原因之一。”

制作的难题

2012年，同为赖声川代表作的《宝岛一村》巡演到深圳。某一天演出结束，王可然跟赖声川上街溜达。王可然当时给该戏找的宣传语是“赖声川超越巅峰之作”。在那之前，王可然已经跟赖声川合作过《暗恋桃花源》，再往前还有《陪我看电视》。所以他觉得这句看着挺套路的宣传语，其实是对赖声川导演作品的认知。没想到赖声川听了不置可否，停了几秒钟，冒出一句：“可然，我还有一部作品叫《如梦之梦》。”

这是王可然第一次听到“如梦之梦”四个字。

最早，赖声川在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排过一次完整版，那还是2000年，100多位角色全部由26位学生完成。叶锦添告诉我，当时他在台湾，就已经听人讲起过《如梦之梦》，大约知道这部戏特别在何处。所以事隔十几年后，赖声川约他到台北诚品书店，二人坐下来只谈了半个小时工夫，叶锦添就决定要给大陆版《如梦之梦》做服装造型，那时距开演还有不到一个月。

整场戏下来所有演出服装有400多套，李雄记得当时时间太紧张服装太多，后期光是服装管理就有16人，平均一位演员有10套衣服。“太多了，保利剧院后台其实挺宽敞，但我们剧组一进入，大家都得侧着身走。”

《如梦之梦》改造了保利剧院，装台用了8天。



除了在《如梦之梦》扮演痴情的王德宝，闫楠也饰演了赖声川导演的另一部作品《暗恋桃花源》里的男主角江滨柳

装台复杂，是因为需要在原有舞台上搭起四方环绕舞台，东西两侧还另有两层阁楼，加上远、近景之别，这部戏的表演空间有近10处。由此下沉出一方观众席（被称为“莲花池”，是最佳观戏区，除此以外舞台北侧还搭有几百个座位的看台），里头放入几百条转椅，戏就在观众四周上演，而且可以跟随不断转换演出方位的剧情转动。

2002年，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毛俊辉曾邀赖声川为该剧团25周年排一出粤语版《如梦之梦》，其中顾香兰的扮演者是汪明荃。这算是该剧第一次由正式剧团制作，但仍然不是商业制作。赖声川自己当然也知道《如梦之梦》的难度，第一要改造剧场，这使得莲花池座位有限，票房受限；第二角色多、

演员多，剧组体量是个问题；第三演出时间长，又涉及生死这样的命题，对观众是个考验。

这些元素使得制作该戏在商业上等同于噩梦，所以他自己的“表演工作坊”只在2005年短暂排过一次全本，并且也仍旧借助了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的力量。换句话说，商业制作层面，还没有哪个公司敢去做一场“《如梦之梦》的噩梦”。所以赖声川写完《如梦之梦》，偶尔演过片段，时而在有艺术学院和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演出一两次全本，但从未真正有过商业制作的版本，直到他告诉王可然。

王可然说他第一次读剧本已是一个月后，在飞机上，读了十分钟就放下了，因为他觉得“好累啊，怎么还是没看到戏剧冲突”。第二次和第三次读仍然是在飞机上。“我慢慢发现这个剧本非常从容、自然，自然就是真实，它不像《宝岛一村》从一开始就是大开大阖的命运，也不像传统剧本，一开场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要么是阶级对抗，要么是血海深仇。‘如梦’不是，它是琐碎的生活，但又总有萃取和归纳。这就是编剧的排兵布阵。”

下了飞机，他给赖声川打了个电话，说他要拍《如梦之梦》。“那我们再讨论吧。”赖声川在电话那头回答。

戏剧市场的难题

2013年4月首演后，《如梦之梦》对大陆戏剧人和观众都产生了不小的刺激。陶庆梅说她当时看完首演，第一感觉是赖声川对剧场空间的把握。“这部戏里实现的剧场化气息我几乎没有在其他戏里看到过，我觉得他用肉体战胜了技术，换句话说，剧场里还能创作出电影蒙太奇，到现在我也没看到类似的玩法。”

最能体现陶庆梅这一个观点的场景发生在第五幕第二场，陪伴5号病人在巴黎度过一段时光的女人江红，做了一个“煎蛋的梦”。江红早晨醒来，去煎蛋，每当敲碎蛋壳，蛋液与油锅触碰那一瞬间，她会发现自己又趟回了床上。她不信邪，又试了一次，发现结果仍然一样，她连续试到第七次，那颗蛋才终于真正入锅开始煎，生活才得以继续。赖声川实现这一构想的方法是在舞台东西两侧二楼用光束隔出七个场景，每煎蛋失败一次，演员倒地，光束暗去，下一束光亮起，观众看到的是另一位演员又从头开始煎蛋。

从赖声川1998年冬天将《红色的天空》带到北京首演至今，以《暗恋桃花源》等为代表作的赖声川戏剧作品，已经成为大陆剧迷认可的品牌。陶庆梅分析赖声川这些年在大陆成功的原因，认为有两点：一是他毕业于伯克利大学，早期戏剧训练在体系完整的美国完成，这使得他在创作上对舞台节奏把控非常准确。陶庆梅看过赖声川的创作稿，注意到他在创作时就已经对剧情时间点有非常精准的设计。“观众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节奏感好会让观众感到舒服。”

另一个方面是赖声川来自于比大陆更早进入城市化的台湾地区。比如《暗恋桃花源》的主题其实就是一个都市刚刚建立起来，人们身处其中，对此感到不适。“80年代，大陆和台湾都在快速发展，越快速，人的不适反应越强烈。你不一定知道你不适应，但你会很难受。他就把这种落差作为主题。”

李立群、金士杰以及过世的李国修等演员，是戏的内核。早年赖声川许多作品他都说是“集体创作”。陶庆梅认为，当时看赖声川的作品，之所以觉得精彩和饱满，是因为那里面除了导演本人，还容纳了李立群他们一整代人的生命体验。“那一代台湾人的经验是乡土的、惆怅的，饱满度来自这些人，他们无私诚恳地把自己的生活经验贡献了出来。一个旧的文化在消失，新的文化在形成，这些东西我们来看，太有共鸣了。”

赖声川进入大陆市场后，他的夫人丁乃竺作为制作人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他的作品。“一个是家人，懂得他要什么，另一个就是王可然。”后者创办的“央华戏剧”过去十年几乎出现在每一部赖声川作品背后，“他们知道做《如梦之梦》不容易，要把它卖出去，必须集合优秀和关注度两大要素。”

陶庆梅的观察是，从文化品牌角度，戏剧作品相较于影视作品仍然属于“精英文化”产品，所以戏剧属性为赖声川在明星中间的号召力发挥作用。与此同时，赖声川在大众层面的知名度比较广，所以明星也更愿意加入。

陶庆梅觉得赖声川看人是准的。十多年前他在中戏排过《如梦之梦》一个小时长的片段，当时陶庆梅在场，她看到学生们开始试各种角色，赖声川就选了汤唯。■

（本文图片由“央华戏剧”提供）

中读专栏

三联
生活
传媒有限公司

陪孩子一起 听音乐

雪枫老师带来的
音乐故事

主讲人

刘雪枫

古典音乐理论学者，音乐评论家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曾任三联《爱乐》杂志、
《留声机》中文版、《交响世界》主编

为孩子精选180首动听迷人的经典名曲
订阅即享全年美妙的亲子时光



音频

图文

纯音乐

每周二、三、五、周六更新



《国家宝藏》火爆背后，博物馆与综艺娱乐

记者 / 张星云

豆瓣 9.2 分，Bilibili 网站单集点击量超过 224 万，央视制作的电视节目《国家宝藏》彻底火了。从节目效果看，它一改往日博物馆严肃权威的形象，引入诸多娱乐化的呈现方式，成功引起普通观众对博物馆、对文物、对节目背后延伸出来的传统文化的关注。但博物馆作为承载着文化脉络和历史记忆的重要场所，如何在年轻的互联网时代，既要与颇受欢迎的娱乐产业竞争，又要保证它为观众提供高质量的文化知识和精神内涵，却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挑战。



2



3

1. 王刚出演普侯乙编钟的故事

2. 在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故事中，撒贝宁饰演秦国安陆县的一名基层法官

3. 王凯演的乾隆皇帝梦中与王羲之、黄公望论争各种釉彩大瓶烧制

12月3日周日，《国家宝藏》节目在央视第三套综艺频道首播当晚，央视第二套放的是一档鉴宝节目。后者以及《探索·发现》式的纪录片是人们普遍印象中有关博物馆及文物的电视节目。如今已经播出四期《国家宝藏》获得了极大的反响，正是因为它完全颠覆了往日博物馆严肃权威的形象。

这档综艺感极强的节目，以舞台剧的形式讲述包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在内9家国家级博物馆27件著名文物的“前世传奇”，每件文物由一位影视明星“代言”：李晨“化身”宋徽宗和蔡京共赏《千里江山图》；王凯饰演的乾隆皇帝梦中与王羲之、黄

公望论争各种釉彩大瓶烧制，并被梦中父亲雍正吐槽“农家乐审美”；梁家辉“穿越”为司马光回忆家父司马池寻觅石鼓；段奕宏化作越王勾践剑的剑灵含泪告别越王勾践；作为北大法律系的学生，撒贝宁变身秦朝基层法官喜，为大家上演了一出秦朝版《今日说法》，用独特的方式科普了一次秦朝法律；蔡国庆则回到新石器时代，作为部落祭祀吹起贾湖骨笛以祈求上天。而在节目的后半段，则邀请了诸多文博领域的工作人员介绍文物的“今生故事”：中央美院教授冯海涛“揭秘”青绿山水杰作何以诞生；故宫志愿者集体亮相畅谈义务讲解心语；故宫南迁后



梁家辉“穿越”为司马光回忆家父司马池寻觅石鼓

人梁金生追忆先辈护宝人生；湖北省博物馆文保中心副主任江旭东博士则带观众了解越王勾践剑 2000 多年前腐蚀氧化前的模样；考古人郑振香回忆当年妇好鸮尊的发掘过程；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现场演奏编钟古乐《茉莉花》。此外平时难得一见的 9 位博物馆长们也在节目中一同现身，品评文物价值。

这档由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不仅在电视台播出，也上了 Bilibili 网站，并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B 站弹幕里笑称央视演绎乾隆到处盖章题跋和雍正批评乾隆“农家乐审美”成了“官方吐槽”，而在段奕宏、雷佳音的动情表演中，弹幕无不纷纷打出“泪目”来表达观众自己因节目传递的“民族自豪感”而引起共鸣和感动。第一期《国家宝藏》在 Bilibili 的点击量就达到了 224 万，而《我在故

宫修文物》在 Bilibili 上整季只有 300 万点击量，另外在豆瓣上，《国家宝藏》也得到了 9.2 的高分。

随着近两年国内博物馆的不断热潮的兴起，这档综艺节目则在电视领域将博物馆与文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九大博物馆“文物海选”

《国家宝藏》大受欢迎的原因，是节目一定程度打破了多年来博物馆与公众的距离感，而长久以来博物馆甚至对媒体也刻意保持着距离。节目正式筹备初期，制片人、总导演于蕾从 2016 年底开始联系故宫博物院，递交申请，到 2017 年 3 月份在故宫第一次见到单霁翔院长，用了 4 个月时间。

可以说，这档节目赶上了好时候。实际节目早在 2015 年便立项，当时于蕾和执行总导演汤浩在英国参加电视节目编导培训。其间项目计划一直在改，一开始只想做一档宣扬传统文化的节目，远远没有确定现在的雏形。但之后两年，国内博物馆突然火热起来，从故宫《石渠宝笈特展》引发的“故宫跑”开始，到妇好墓、海昏侯墓文物展，再到《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游人摩肩接踵、展区日日爆满，国人对博物馆展览乃至传统文化的追捧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数据显示，我国博物馆总数超过 4000 家，仅 2016 年一年接待观众数量就达 8.5 亿人次，增长 8.9%。

于蕾和汤浩也成了拥挤在博物馆人群中的一员。汤浩在故宫看展览时遇到了一位叫“杨姐”的讲解员。“我之前参观博物馆没有请过讲解员，一般都是自己去看，顶多拿个讲解器听一听。”汤浩对本刊回忆说，“杨姐”让他印象深刻，“她讲的方式特别生动，姿态特别低，不是高高在上讲博物馆怎么好，她讲的全是故事”。后来汤浩又把“杨姐”介绍给了于蕾，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用这档节目来做博物馆的“讲解器”，想让那些原本不去博物馆的观众开始对博物馆感兴趣，起名《国家宝藏》。

《国家宝藏》同样赶上了国家政策的助力。2017 年 1 月 25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一则《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通知，强调要塑造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则指令也反映到从去年延续至今的传统文化综艺热，从《中国诗词大会》到《朗读者》，再到《见字如面》，无一不是此背景下的产物。而《国家宝藏》也成了央

视和最具传统文化精神的博物馆的一场联姻。国家级博物馆背后代表着一种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就像最终节目呈现的效果一样，节目主持人张国立的开场白强调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这种强调中华文化强盛和引导民族自豪感的设置可以在节目中多处看到。

即便如此，说服国家级博物馆加入一档综艺节目，依然困难重重。“实际上国内考古文博行业与媒体的关系一直有些微妙，研究学者们对媒体大多保持谨慎态度，由于一些跑文博口的媒体人缺乏专业性，因此学者们会担心自己的观点并不能恰当地传播出去。”奚牧凉对本刊说道，北京大学公众考古方向出身的他后来一直从事媒体工作，笑称自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人”，此次他成为《国家宝藏》顾问专家团成员，负责检查节目是否存在“学术硬伤”。

因此《国家宝藏》最终成行，离不开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的点头。2017年3月份的第一次见面，曾担任过10年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给了于蕾一条建议，2010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曾公布“首批中央地方共建国家级博物馆”，一共8家，正好可以与故宫一同组成这档节目。

随后各大博物馆的联系工作一下变得顺利许多，但怎样从每家博物馆中选择3件国宝，则更展现出媒体与博物馆思维的天壤之别。

于蕾带着编剧团队去每家博物馆调研，博物馆的专家组会先从自己馆藏中推荐文物。“每家博物馆都想把自己特一级文物，最古老、最精美、制作工艺最强的文物推荐给我们，最初9家博物馆推荐的27件文物中，有19件都是青铜器，”于蕾对本刊回忆道，“专家们都觉得最老的文物最有价值。”但节目组并不认同这些选择。“我们其实想要不同年代、不同品类的文物，我们不会像鉴宝类节目一样谈文物的物质价值，而是想要寻找的是文物精神价值的表达，我们觉得博物馆文物最大的价值是它背后的人文精神。”于蕾说道。

等节目组文物选择接近尾声的时候，辽宁省博物馆还专门给予蕾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希望说服节目组可以不选鎏金木芯马镫这件文物。博物馆给出的理由是，马镫实际并不好看，由于年代久远，中间的木芯早就没了，只剩下包裹在外的铜片，博物馆觉得这件展品并不能代表辽博的水平，也达不到国宝级别。但于蕾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我们想告诉大家文物的价值并不是它值多少钱、多美精美，它最大的价值是代表了我们的民族某一重大历

史转折，或者某一文化鼎盛的见证。这副马镫是全世界最早的双马镫，很可能证明就是中国人发明的双马镫，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造就了欧洲的骑士时代。这是它的最大价值。”

同样的选择思考还出现在上海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之间。以书画著称的上海博物馆力荐展现竹林七贤的镇馆之宝《高意图》，但南京博物院首推的文物则是《竹林七贤砖画》，两件文物题材完全相同。最终节目组认为《竹林七贤砖画》年代在先，且后来《高意图》就是通过前者才确定了画中人物的身份，所以只留下了《竹林七贤砖画》。

“基于史实合理虚构”

“文物海选”的过程并不轻松，而编剧将文物转化成有趣的故事，由明星表演，还原文物“前世传奇”的段落，则代表着节目组希望成为博物馆“讲解器”的初衷。

剧本创作是由编剧组和专家顾问团共同完成的，曾经操作过历史类真人秀电视节目《咱们穿越吧》的编剧团队负责撰写剧本，顾问专家团则负责提出建议并“挑错”。顾问专家团的选择同样精妙，有别于传统的文博、历史、考古学研究者，节目组选择的是在网上很有影响力的知乎历史类“大V”张莞和周睿杰，另一成员奚牧凉则经营着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挖啥呢”，这些人有一定的专业背景，又知道怎么吸引年轻网民的注意力。

在“基于史实合理虚构”的前提下，节目组将这些文物的历史故事引向了另一个角度。

节目第一期从故宫博物院挑选的3件国宝中，石鼓“前世传奇”的段落最有戏剧性。有别于网红《千里江山图》和各种釉彩大瓶，文物界都知道其貌不扬的石鼓重要性，但一般观众却很难理解其内蕴。石鼓的历史故事非常多，这组10块如鼓形状的巨石，其上刻有战国时期秦王出猎的记功篆字。唐代以降，

实际上国内考古文博行业与媒体的关系一直有些微妙，研究学者们对媒体大多保持谨慎态度，由于一些跑文博口的媒体人缺乏专业性，因此学者们会担心自己的观点并不能恰当地传播出去。

石鼓历经沧桑，数丢数得，宋人为石鼓上的篆字镶上金，被金人掳走后，因为觉得金子更值钱，把镶金扣下。后来石鼓逐渐被文人阶层推至“中华第一古物”的崇高位置，韩愈、苏轼等历代文人都曾为这组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记功石刻赋诗。

“我认为石鼓展现的是一种文化象征。像韩愈、苏轼这些人，发现一块上千年的古物，他们感觉到中华文明是连续的。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国受到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比如说佛教，比如说北朝时期文化上的不确定感，所以古代文人通过金石学，重新树立儒家传统，并确定了一种主流价值观和人心凝聚力。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愿意自称中华民族，而非埃及、美洲一般已为另外迥异的文明所全然革新，原因之一即是有石鼓这样的文明见证，让我们与祖先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奚牧凉说编剧为了可视化的效果，将文化传统这种比较虚的概念落实到了石鼓所刻的文字上。最终节目选取了一个小角度来呈现的前世传奇故事，司马池在内心挣扎后，最终选择誓死寻找尚未复现的最后一块石鼓的下落，而这种传承中华民族文字、文脉的决心，又感化了未来编纂通史的司马光。严格来说这是一个未见于《宋史》的故事，司马池受命寻找石鼓下落期间，也未必是司马光砸缸之时。

“就像历史剧是为当下而作的，不是情景还原，而是为了表达作者想要在当下主题表达的想法。”奚牧凉认为诸如石鼓的故事选取就是为了强调它的当下意义，“从公众考古和文化遗产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文物的核心是价值，传统观念认为文物具有科学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但如今的时代价值早已多元化，不同价值判断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强调文物的精神价值，也是为了尊重每一位公众的文化权利，他们有权通过这个文物获得各种文化共鸣。”奚牧凉认为节目播出后对博物馆的影响也会出现，“我们博物馆很多时候还是在满足知识精英的文化权利，他们知道历史背景，在博物馆里也能看出门道，但很多人可能连朝代表都记不得，他们一想到博物馆就充满距离感，但这些人文化权利也应被尊重”。

诸如此类的文物“前世传奇”在节目中还有很多：云纹铜禁定格神才天工的英姿、云梦睡虎地秦简重讲勤政爱民的道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再现高逸自由的意境、长沙窑青釉褐彩诗文执壶铺展开海纳百川的图景。

参与节目的明星们，也是在这一环节各自发力。

在第二期节目饰演越王勾践剑剑灵的段奕宏一开始对节目组的邀请表示“我也不懂文物，我干吗来呢”，但录完节目后他很开心，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大事。节目组编剧于新玲记得，在《千里江山图》前世传奇中饰演宋徽宗的李晨是个很典型的北京人，他从来没见过《千里江山图》。那幅画很长很长，他和专家聊了半天，找庙、找小人儿。他很惊讶，在以往的认知里，这么长的画就只有《清明上河图》了。《千里江山图》的颜色特别漂亮，当天隔壁展厅有乾隆时期的复制品，李晨去看了，回来说：“单看那画（复制品）真的很好，但一比，也说不出来哪儿不一样，还是原品真。”

在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故事中，撒贝宁鲜活地饰演秦国安陆县的一名基层法官。戏剧导演朱峰记得撒贝宁加入了很多即兴表演，他蹦蹦跳跳地出场，将红头巾包头，开场那句“本官今天非常开心”，都是他自己加的戏，每一遍表演都不一样，苦了两位助演演员，要随时准备接撒贝宁的话。妇好鸮尊故事中饰演商超王后妇好的刘涛所拿的兵器钺非常沉，导演担心她一个弱女子拿不动，就只设计了一些小动作。她自己要求，“不，我演的是一个将军”，一定要做大动作，做完手都在抖，而且录了好几遍。第三期节目里，河南省博物院馆藏云纹铜禁的“前世传奇”是由雷佳音饰演楚庄王之子子庚与不慎跌入墓穴的明朝秀才之间一段关于楚国沉浮八百年的“演绎”对话，当得知楚国亡国后，雷佳音的表演极具爆发力，录了好几遍，每次他都能大吼一声，然后眼圈发红。

在石鼓故事中，饰演司马光的梁家辉需要先去故宫外景拍摄他见到石鼓的过程。梁家辉到了故宫很高兴，拍摄那天不是闭馆日，游客很多，拍他骑自行车时，很多观众都特别配合散开来，站在旁边静静地看着。“我在现场就觉得，梁家辉那种气场很奇妙。”编剧于新玲回忆道。

明星的流量更加带动的《国家宝藏》节目的火爆。在互联网时代，通过娱乐化的呈现方式，《国家宝藏》成功引起普通观众对博物馆、对文物的关注。随着节目的火爆，大家期盼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作为中国博物馆学方面的专家，宋向光教授曾担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谈了对《国家宝藏》的看法，以及在当今社会博物馆的身份。■

节目过后，再探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

——专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授宋向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物馆学教授宋向光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宝藏》这么火，是否对博物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有借鉴意义呢？

宋向光：节目对博物馆观念、伦理的冲击不可忽视。博物馆与综艺的交集，是相互支持和交流，综艺节目的一些做法很值得博物馆学习。比如《国家宝藏》节目录制现场的观众都是“90后”，以前“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观众是现实或潜在的收藏家。博物馆的影响力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公共分享及对公众学习活动的支持，而不是靠某件藏品的“珍稀”，也不是靠对藏品前世的“揭秘”。但在博物馆领域，必须谨慎回避影响观众准确认知、理解知识的娱乐手法。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人关注《国家宝藏》节目“前世传奇”部分对文物历史的各种演绎和解读，这在文博行业也产生了一些反响，你怎么看节目组“基于史实合理虚构”的原则？

宋向光：近年来，博物馆热传“讲故事”的说法，是对真实信息和科学知识表述逻辑的重构，是将科学术语口语化的转译。博物馆藏品的讲解、解说、解读、释读、戏说，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些词有着不同的意义。博物馆最基本的底线就是“真实”，物件要真，信息要真，研究结果也要真，不得虚构。很希望“基于史实合理虚构”只限于综艺节目。

三联生活周刊：但也有观众认为“前世传奇”部分为很多文物寻找到新的精神价值角度。

宋向光：节目组将文物分为“前世今生”，可能是参考了“生命周期”的说法。博物馆藏品是把藏品的“生命周期”划为两个时期的，一是物品从产生到废弃的时期，一是从征集到“注销”以及其实体灭失前的时期，这两段“生命周期”的内涵是不同的，且后一个“生命周期”并不是前一个“生命周期”的自然延续，而是另辟了蹊径，甚至是对前一个“生命周期”自然进程的扭曲。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会认为只有让文物“接地气”才能让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

宋向光：其实这里面反映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整个社会对博物馆价值的认识，博物馆不应仅仅是展示文物的地方。作为启蒙时代观念集大成的博物馆，要用作为自然人的身份和眼睛看世界，人遂成为合理性的标杆。

现代公共博物馆的基本精神是民主科学，是用人的眼光认识世界，不仅应该传播现代社会知识和基本理念，也应该探讨人和世界、和自然的关系。所以你看西方博物馆不怎么走通俗化、大众化路线，它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言而喻，它不光让观众去看文物，去学习知识，也是在让观众进行现代社会认知模式的培养，就是教观众怎么通过自己的感官和思维能力去认识世界，去追求真理，这很重要。

但在中国，很多博物馆依然被视为收藏和展示文物的地方，并给观众们营造出这些文物非常珍贵，一般人很难看得到的感觉。博物馆不能够为了取悦全体的人，来弱化自己的特点，或者是消解自己的特点。■

博物馆的影响力在于对科学知识的公共分享及对公众学习活动的支持，而不是靠某件藏品的“珍稀”，也不是靠对藏品前世的“揭秘”。



美剧《双面格雷丝》剧照：

上图：格雷丝在狱中 下图：帕金森家，格雷丝的第一段女仆生涯

《双面格雷斯》，难以接近的真相

记者 / 张月寒

经过艾美奖大赢家《使女的故事》的传播，很多人对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刻画女性的功力有了深刻印象。前不久热播的美剧《双面格雷斯》，同样改编自她的作品。

《双面格雷斯》(*Alias Grace*)以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女谋杀犯格雷斯·马克斯的故事为蓝本。

1843年，女仆格雷斯·马克斯被控和家丁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合谋，杀死了自己的雇主肯尼尔先生及他的情妇兼管家南希·蒙哥马利。经审判，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很快被施以绞刑，格雷斯却因为年幼（时年才16岁）、控辩律师的有力辩护以及“一群体面绅士的请愿”，被判精神失常，关押进精神病院。30年后，在各方的不停请愿下，她得到了赦免，被送至纽约州“安排好的一户人家”。之后杳无音讯，世上再无她的确切消息。

在女谋杀犯罕见于公开审判的19世纪中叶，格雷斯被当成一类特殊物种般看待。案发后，不光是加拿大当地，连美国、英国的新闻界都接连报道。每次开庭，现场都挤满了记者。大众对她好奇，精神科医生对她充满兴趣。再由于她本身容貌姣好、楚楚可怜，有不少人也认为她是无辜的。格雷斯最大的谜团在于她的两面性。通过报纸的描述、同犯的证供以及她自己的陈述，阿特伍德笔下的格雷斯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她究竟是一个手无寸铁、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可怜少女，还是阴险狡诈、擅用舆论对弱女子的怜惜而逃脱死刑惩罚的凶手？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剧中，都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她是否参与了对南希·蒙哥马利的谋杀，是不是麦克德莫特的情妇，她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还

是像很多人那样仅仅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而装疯，这些都是不得而知的。历史上的格雷斯·马克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至今仍旧是个谜。”阿特伍德在小说最后的“作者跋”中这样写道。

于是在《双面格雷斯》剧中，正如阿特伍德在原作中屡次提到的“缝被子”那样，导演用当时的真实史料、第三者的通信、格雷斯的自述、乔丹医生的旁观者视角，一针一线为观众缝补出一个精巧的故事。它多种解释并存，让观众/读者自己选择，究竟哪种解释，才更接近自己心中的真相。

剧的正叙时间发生在格雷斯入狱16年之后，因此，现在时态的格雷斯略显苍老、憔悴；回忆中的格雷斯才16岁，镜头里的她新鲜、美好，像刚成熟的李子般娇艳欲滴。故事从格雷斯全家于爱尔兰北部登船迁往加拿大的那一刻开始讲起。格雷斯·马克斯出生在爱尔兰，父亲是英格兰人，和当地爱尔兰人相处并不好。她母亲是个美人，但结婚后没多久就开始遭受丈夫的家暴。格雷斯还有一大堆弟弟妹妹，很小的时候，她就要分担母亲照顾家庭的重担。在海上的漫长旅途中，一家人身处恶劣的船舱环境，所有人都像吞拿鱼，吃喝拉撒睡憋在狭小船舱里。那时格雷斯才13岁。随后，她经历了母亲的病重和不治而亡。年少的格雷斯第一次感觉到“无力”，对于自己出身的无力、对于无法改变现实的无力。

轮船之旅这段情节，最重要的细节是“没有开

窗”。爱尔兰传说中，认为人死后必须立即打开窗户，方可使灵魂飘出、顺利转世。但格雷斯在母亲死后，忘记了打开船舱的窗户。从此以后她一直处于深深的自责中，认为母亲的灵魂将永远被困在这艘破败的轮船里，来来回回，永无超生。这一细节也成为接下来剧情发展的重要线索，是格雷斯日后性格悲剧不可忽略的成因。

到达加拿大后，格雷斯一家居住在多伦多一所破旧的房屋里。父亲整日酗酒，不去工作，家里的经济重担落在了格雷斯身上。很快，她被房东太太推荐去一个大户人家，也就是帕金森家当住家女佣。在帕金森家，格雷斯结识了善良活泼具有激进民主思想的女佣玛丽·惠特尼。她的第一条裙子，是玛丽帮她做的；她第一次来月事，是玛丽向她耐心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玛丽还教她如何保守贞操，提防男人，作为女佣如何注意和男主人之间的界限，警告格雷斯所有男人想从你身上得到的，都是同一样东西，得到后，他们便会扬长而去、再也寻不着。

可惜，聪明的玛丽自己却错信了帕金森少爷的表白，之后意外怀孕，少爷没有任何悬念地始乱终弃，抛给她五美元，让她去堕胎。玛丽在无良医生的粗暴手术后，于夜间失血过多死亡。这件事对格雷斯打击异常之大。她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听到了玛丽的声音，“让我进去”——让我进到你的体内。小说第22章出现的圣歌“多年的岩石，为我开裂，让我藏身于你……”再次暗示了这一点。

通过剧集的描述，再结合原著的分析，不难推导出格雷斯再次忘记了“打开窗户”，潜意识里以为玛丽的灵魂“附”在了自己的身上。或是，从现代心理学角度解释，格雷斯面对好友病逝的心理应对机制，是认为自己某部分应该“替”玛丽活下去。玛丽激进的民主思想、北美印第安人擅长狩猎的灵魂和她的悲惨经历导致的对男人的憎恨，某种程度上对格雷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原著中，格雷斯自己也说：“没有玛丽，我的故事会完全不同。”久而久之，格雷斯身上分裂出另一人格“玛丽”。这一人格在格雷斯受屈辱、受压迫时逐渐爆发出来，最终，惨案发生当天，一切达到顶峰。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作者跋”中解释，“性格分裂症”，又称“双重个性”，在19世纪早期就有描述，19世纪40年代开始被认真讨论，在该世纪的最后30年相关研究风行一时。阿特伍德为格雷斯·马克斯的谋杀提出了这一合理推测，但又没有

全然肯定，把“史料”和“真情”一并交给读者。

剧中涉及的另一心理学现象，是格雷斯身上体现了典型的“移情”“投射”心理。她生命中两次遭遇深爱的年长女性在自己身边死亡的经历，所以当南希再次出现时，格雷斯才会那么迅速地、充满渴望地答应她的工作邀约：南希长得很像玛丽，又比她年长，且第一次见面时分外友好。格雷斯以为自己和南希能像和玛丽一样，一起干活，成为彼此心灵的陪伴，谁知后来两人关系却日益破裂，最终南希和男主人肯尼尔先生被以不同方式谋杀，格雷斯也成为加拿大历史上著名的女谋杀犯。

《双面格雷斯》另一个比较深刻的主题是对时代的呈现。19世纪的加拿大，生活在底层的女性能够拥有的人生选择非常少。格雷斯从小被父亲虐待，长大后从事休息时间少、薪水微薄、地位低下的女仆工作。底层女性成年后，很可能逃不开被玩弄、抛弃的命运悲剧。剧中，未婚先孕的女仆玛丽因为流产而死，如果没死，她另一个选择是生下孩子，成为妓女。较“好”的上升之路——成为雇主的情妇，也是一种悲剧。女管家南希是肯尼尔先生彻头彻尾的玩物，并随时要做好被男主人抛弃的准备。南希因为怀孕后对自己日益发胖的身体没有安全感，开始嫉妒格雷斯并虐待她，这导致了后来悲剧的发生。

有一点电视剧中没有明确展现，但在小说中阿特伍德却通过诸多旁观者的描述，让人看到了19世纪社会对于女性的狭隘认知。在书中，遭受父亲虐待、被雇主强奸未遂，在精神病院被电击、捆绑、水淹以及遭受医生和狱卒的性骚扰等种种屈辱之后的格雷斯，还被舆论认为是“幸运的”。就像为格雷斯辩护的律师所说，他们那个时代的男性经常扮演圣乔治的角色——神话人物圣乔治相传本是罗马士兵，曾英勇地杀死一条龙，救出危难的少女——律师对自己帮格雷斯免受了死刑而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拯救危难少女的骑士，“差点要求她以身相许，这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

虽然阿特伍德一直不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但《双面格雷斯》中的男性形象确实都黯然失色。且不说作为掠夺者的帕金森少爷、肯尼尔先生，就连男主角乔丹医生，性格设定也是自恋、自私、懦弱，非常平庸。在聪明的格雷斯的诱导下，他的心智日渐混乱，最终精神失常，以躺在病榻上喃喃自语“格雷斯，格雷斯……”而终局。▣



荷兰工业设计师马塞尔·万德斯

在阿姆斯特丹跳舞

记者 / 黑麦

阿姆斯特丹的“舞曲音乐节”正在成为整个欧洲的“现代传统”。

在阿姆斯特丹一家名为“空气”的俱乐部里，DJ Bass Jackers 身后的投影打出一个舞动的机器人，那是新单曲的封面形象，作为今年在 DJ Mag 排行第 35 名的 DJ，Bass Jackers 的音乐被不少欧洲人熟知，现场的观众都跟着唱了起来，这让俱乐部突然呈现出一种摇滚音乐节的气氛。随着节拍逐渐加重和联排球灯效果的不断变化，舞池里的人开始跳起各异的舞蹈。

每年入冬时，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上随处可见黄色圆体的“ADE”字样，它是阿姆斯特丹舞曲音乐节（Amsterdam Dance Event，以下简称为 ADE）的缩写，

每到这一时间，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和数以万计的电子乐迷都会聚集在这个城市，等待一场与音乐有关的狂欢。

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和“节拍”的确有关系。1812 年，德里希·尼古拉斯·温克尔（Dietrich Nikolaus Winkel）在这里发明了音乐节拍器。然而，荷兰人并没有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对古典音乐表现出沉浸与痴迷，这个从巴洛克时期开始真正介入音乐的国家找到了一种“当代”的存在方式。特别是当阿姆斯特丹音乐厅（Concertgebouw）与荷兰皇家音乐学院出现后，荷兰出产的音乐总是自带一种类似“学院派”的融合气息。

今天的荷兰总被称作“电子乐国度”或“盛产 DJ 的国家”，也与自身的音乐进化相关。上世纪 50 年代，荷兰的飞利浦录音室成为彼时最具代表性的实验性电子录音室；60 年代，一群荷兰作曲家为了改



荷兰电子音乐人西德尼·萨姆森

革阿姆斯特丹封闭的音乐环境，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 STEIM 电子表演艺术及新乐器研发中心，而这个计划最终让这个城市变成了现代化的先锋音乐试验场。

每逢 ADE 开幕时，这座幽静的历史古都就会蜕变成一个狂热的音乐殿堂。从 1996 年诞生至今，这个音乐节的规模从最初的 117 人扩大到 2000 个演出嘉宾，如今，这个长达 5 天的活动，将上千场演出、35 万观众，以及讲座、放映延伸到了 115 个场地，其中包括位于城北的收容所 (Shelter) 聚乐部，它是阿城最新也是最为潮流的聚乐部之一，这个“极端地下”的场所便是 2016 年 ADE 开幕的现场。位于运河区 (Lijnbaansgracht) 238 号的“糖厂”，顾名思义这座建筑曾是一家制糖工厂，音乐也更加“工业”，自 2005 年复建至今，它已成为全城最为“古怪”的音乐朝圣地，新锐音乐人常聚于此。

年轻人对于电子节拍的追随像一种天生的能力，快速的节奏、浑厚的低音和刺激的音效组成了他们的听觉审美，这种简单直接的音乐几乎像极了青少年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当然，每一个 DJ 也试图寻找相似的表达，才能与台下的每一个人找到共鸣的音符。

荷兰人爱音乐是骨子里的，当你提到“喜力”

这个词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蹦出来的画面并不是啤酒，而是这里最大规模的音乐节。一直以来，ADE 的口号是“做世界上最大的俱乐部电子音乐节”。在阿姆斯特丹，俱乐部就像“披萨上的香料一样”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散发着不同的音乐气场，也聚集着有不同文化喜好的年轻人。

翁喻 (DJ Wengweng) 是中国第一批电子音乐人，他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名为“灯笼”的俱乐部，连续两年受邀参演了 ADE。对于翁喻来说，ADE 更像是一个“行业展”，“每个俱乐部都强调自己的属性、身份、定位，这些塑造了每家俱乐部的不同音乐品位，而这种无形的因素，几乎是一家俱乐部的‘最大卖点’”。

翁喻所提到的俱乐部文化，似乎对应着商业夜店，那些只播排行榜单曲目 (Top 50) 的 DJ 是他们嗤之以鼻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决定了一个地区的音乐生态。DJ 的工作是在现场放音乐，选择音乐，选择时机。“电子音乐是一个极其抽象化的语言，但是它的表达是清晰的，有情绪在里面，不同的层次给人的感受完全不同。”翁喻说，“我在两地放音乐发现一个不同，欧洲的观众往往更有耐心，这让大多数 DJ 可以自由发挥，而不是一味地迎合舞池。”

在 ADE 的场外，荷兰本土音乐人西德尼·萨姆森 (DJ Sidney Samson) 正在用英国品牌的 KEF 音响演出，当天的主持人来自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音乐调频“日落大道”节目，这个出生于 1981 年的 DJ 从 13 岁时便开始为音乐工作，直到成为 Matrixx 俱乐部的驻场。

“我年轻的时候玩嘻哈，那个时候流行嘻哈，后来我开始尝试作曲，想成为制作人，我发现任何音乐都有特定的界限，但是浩室 (House，一种风格) 和电子的容纳空间巨大，很多音乐都能被吸纳进来，有时候我们听电子音乐，其中不止一种风格。”萨姆森似乎对我说的“电子音乐是蹦迪用”的这一说法很不赞同，“在很多场合，跳舞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就是站着，心里可能在跳舞，但是很明显，我能看到每个人都站在音乐里”。

“从我转向制作人开始，电子舞曲 (Electronic Dance Music, EDM) 就是个很抽象的词。从几年前开始，舞曲有了很明显的变化，曾经的纯音乐舞曲现在都开始被‘歌曲化’了，人声变成了一种乐器，音乐里出现了比过去更多的唱词。这一方面是网络化的结果，人们开始喜欢一些具象的表达；另一方面，荷兰的文化就是摄入各种文化元素，音乐也不例外。”萨姆森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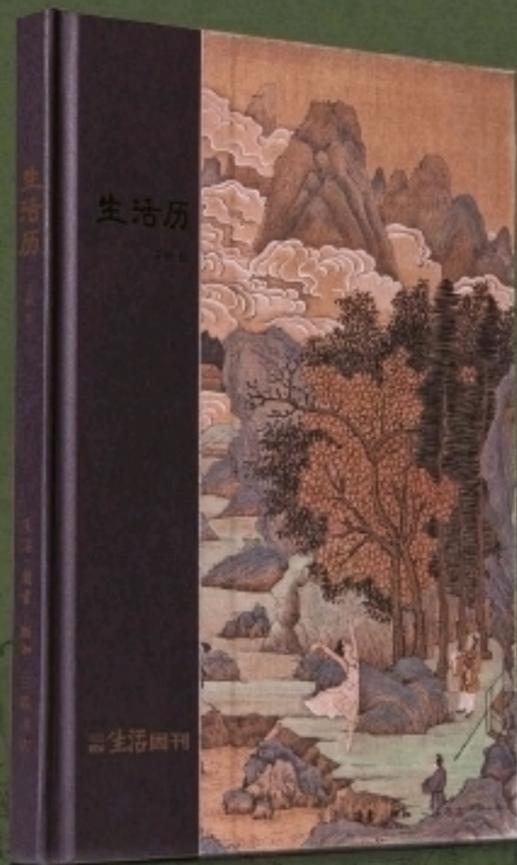
萨姆森曾经与马丁·盖瑞斯 (Martin Garrix) 合作,他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年轻的小马丁“代言”了荷兰今天的音乐。这个 1996 年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年轻人从 2016 年便成为了权威机构 DJ Mag 评选出的全球第一 DJ,萨姆森说:“小马丁是出生在电子音乐软件世代的年轻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对音乐有着先天的敏感。从赫尔曼学院 (Herman Brood Academie) 毕业后,他很快凭借着一系列单曲登上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排行榜,那时,他还没成年,在公众面前显得非常羞涩,他的年轻是他成功的最大原因,毕竟俱乐部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小马丁更懂得青少年的喜好。”

荷兰著名的工业设计师马塞尔·万德斯 (Marcel Wanders) 是 KEF 的合作者,在欧洲,他的称号是“荷兰的设计标签”。出生于音乐世家的他,却对音乐有一种“非传统”的认识,他用荷兰的建筑比喻当地多元的音乐生态。“当荷兰的建筑师开始在这里打破巴洛克式的‘霸权’时,荷兰的文化开始转入一种全新的风格。那时候,新艺术风格开始流行,直到今天,你都能在荷兰的艺术、音乐、文学作品中看到它的延伸,这种融合就像阿姆斯特丹的新老城区,都保持着装饰性艺术的延续以及阿姆斯特丹学派 (Amsterdam School)。如果你看荷兰的话剧、新

歌剧,包括流行音乐,你都能感觉到那种类似于建筑的结构感,奇特的门窗,华丽的装饰,其中容纳了工业、后工业以及科技成分,这种审美是荷兰独有的气息。”

“真正的 DJ 放黑胶唱片”似乎不再成立,万德斯说,在这个关于创造的行业,技术和手段都不是问题,音乐如同设计,都是一种语言。万德斯曾经努力摆脱自己的“艺术身份”,即便他热爱艺术,崇拜维米尔、蒙德里安、伦布朗、埃舍尔这些人,但是他不想被传统艺术所束缚。他觉得阿姆斯特丹“盛产”DJ 和设计师,是因为这两种行当是游走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没有边界感。

在阿姆斯特丹,似乎总也摆脱不掉节奏的“诱惑”。走出“空气”俱乐部,站在街上,依然能感到音乐的共振。场外,两个年轻人拿着手机在为 Dancetube (Youtube 栏目) 拍摄 ADE 的采访,他们逢人便抛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跳舞了吗?”在距离“空气”俱乐部不远的银河 (Melkweg)、帕拉迪索 (Paradiso) 以及“逃离” (Escape) 俱乐部,有上百个场次的 DJ 正在轮番演出,翁喻和他同行的中国 DJ 也在等待登台表演。拦住一辆出租车,电台里播放着司机偏爱的科技舞曲,偶尔冒出一条广告,还是某个公司研发的跳舞发电地板。■



古典画风穿越现代美学的雅趣



【接受团购及广告定制, 详情致电: 010-846 81051】

王赫 绘

生活历



《三联生活周刊》
天猫旗舰店



《三联生活周刊》
微信书店

博物馆和政治：从 4.5 亿《救世主》到阿布扎比卢浮宫

记者 张星云

一个月前在佳士得拍卖中以 4.5 亿美元成交、打破艺术品交易世界纪录的《救世主》，谜一般的买家身份直至近日才显露端倪：阿布扎比卢浮宫宣布《救世主》落户该馆。在这场世纪拍卖背后，是阿布扎比卢浮宫长达 10 年的馆藏规划，也是中东几个新兴国家在艺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投资中的外交较量。

神秘买家身份曝出

为竞拍者身份信息保密向来是拍卖行业的基本准则。11 月底，佳士得秋拍预展在香港举办时，诸多高管出席了与记者见面的媒体午宴，他们也都参加过 11 月 15 日那场万众瞩目的纽约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仍个个守口如瓶，没有人向我透露半点关于《救世主》神秘买家的消息。

12 月初，率先嗅到《救世主》神秘买家气息的是《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首先是《纽约时报》发布文章显示，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看到了有关此次拍卖的内部文件，文件信息指出《救世主》的神秘买家是沙特王子巴德（Bader bin Abdullah bin Mohammed bin Farhan al-Saud）。

紧接着 12 月 6 日，《泰晤士报》通过华盛顿的沙特驻美大使馆联系巴德王子，向他列出了一系列有关《救世主》拍卖的详细问题。随后三名中间人回复《泰晤士报》，请他们推迟发布有关买家身份的文章，等待巴德王子的进一步回复。6 日当天晚上，中间人向《泰晤士报》说明：巴德王子拒绝回复。也就是在同时，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官方推特账号发布了一条十分简洁的推文：“达·芬奇的《救世主》即将光临 # 阿布扎比卢浮宫。”随之《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发布文章，公布神秘买家是沙特的巴德王子。

但巴德王子并没有正式公开承认买家身份。12 月 7 日，他通过自己掌管的沙特媒体发布简短声明，质疑两家西方报纸发布的内容。同一天，《泰晤士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从“美国情报机构官员”处

了解到，沙特王储才是背后真正的买家，而具体操作由他的挚友巴德王子施行。

至此，沙特驻华盛顿使馆终于在 12 月 8 日发表声明，表示由于近期媒体针对《救世主》拍卖的报道，巴德王子办公室决定通过沙特驻华盛顿使馆发表公告：“这幅艺术品由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获得，以用于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卢浮宫展出。作为友好的支持者，巴德王子出席了 11 月 8 日博物馆的开幕仪式，并随后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请求作为中间人对这幅艺术品进行竞拍。”

这位巴德王子来自沙特皇室偏远分支，之前没有作为重要艺术收藏家被记录的历史，也没有被披露的财富来源。

根据《泰晤士报》得到的来自沙特内部的文件资料，巴德王子直到拍卖的前一天才作为投标人出现。佳士得公司的管理人员以最快速度设法确定这位低调人士的身份和经济能力。尽管对方提供了 1 亿美元的存款证明，佳士得的律师仍然对这位潜在投标人进行了调查，并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财富来源是什么？与沙特国王萨勒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的具体关系是什么？“房地产”，巴德王子简短回应称，他是沙特五千位王子之一。

而《纽约时报》的消息是，熟悉情报的美国官员以及熟悉拍卖细节的阿拉伯人士 12 月 8 日依旧重申，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才是背后的真正买家。对王储来说，如果这次收购以他本人的名义进行，难免非常尴尬，因为此时他正在进行全面反腐行动，已经扣留或冻结了至少十几个王室表兄弟以及其他数百名商人、官员的财产。

巴德王子出身的沙特皇室小分支叫法尔汗（Farhan），所以他其实是一位 18 世纪沙特统治者的兄弟的后代，与现代沙特王国的创始者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沙特（Abdulaziz ibn Saud）并没有直系血缘关系。但巴德王子是现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同代人，他们同一时期入读利雅得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 2015 年后担任诸多政府职务，巴



11月15日，纽约佳士得《救世主》拍卖现场

德王子由此更多参与到核心工作。

萨勒曼王室家族长久以来控制着沙特研究与市场集团，这家总部位于利雅得的集团其出版范围涵盖15种杂志和报纸，其中包括《泛阿拉伯日报》(Asharq Al-Awsat)。近30年来，该集团主席的位子从萨勒曼国王换到穆罕默德王储，如今则是巴德王子。而在2017年7月，巴德王子还被任命为奥拉地区旅游建设项目委员会负责人——奥拉地区是沙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石谷玛甸沙勒(Al-Hijr)考古遗址的第一站。此外巴德王子还是国际能源控股公司(Energy Holdings International)的董事会副主席，该公司在沙特拥有相关业务。而公开履历中，他是沙特大型垃圾回收和废物管理业务的创始人之一，“在近五年于沙特阿拉伯、迪拜和中东其他地区积极进行房地产项目投资”，与大型知名企业合作。

拍卖的蛛丝马迹

现在再回看《救世主》的整个拍卖过程，会发现很多蛛丝马迹。

在佳士得内部，战后与当代艺术部门主席卢瓦克·古泽(Loïc Gouzer)被称为“营销高手”。他为佳士得策划过多次主题拍卖，擅长用策展的方式组织拍品，此前曾策划过以“艺术家的缪斯”为题的拍卖。在那场拍卖中，上海富商刘益谦以10亿元人民币购得莫迪利亚尼的《裸女》。古泽此次从委托方那里拿到《救世主》后，大胆地将这幅古典大师作品放到了战后与当代艺术专场当中，除了吸引眼球，也意在打破并模糊传统拍卖的类别界线，让偏爱当代艺术的年轻藏家也能够接触到古典绘画。

自佳士得宣布将拍卖“达·芬奇真迹《救世主》”以来，这幅画的身世和争议便成为焦点。目前在世界上仅存大约15幅已被认定的达·芬奇真迹，均藏于博物馆，据牛津大学艺术史名誉教授马丁·坎普(Martin Kemp)谨慎估计，世界上有可能存在不超过20幅达·芬奇画作，而《救世主》是目前唯一一件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私人收藏。

鉴真派认为《救世主》是达·芬奇在1506年至1513年之间为法王路易十二所画，为20幅耶稣基督主题作品之一。这幅画最早著录于17世纪英王查尔斯一世的皇家收藏，之后经手白金汉公爵，最

在相持了数回合过后，双方竞价达到 3.7 亿美元，最终罗特所代表的这方一口气加价至 4 亿美元，直接将对手吓跑，成为最终买家。

终在世间湮没了两个多世纪，直到 1900 年才在市场上重现。1958 年，伦敦苏富比以 45 英镑拍出此画，之后它再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直到 50 年后的 2005 年，它又出现在美国一家小型拍卖行的拍品中。此时，这幅画已经因多次修复而损坏严重，看起来更像一幅复制品。有专家认为其络腮胡和嘴唇上的胡子，很可能是反宗教改革结束后为符合耶稣的官方形象添上去的。之后画作经历了更长时间的修复，络腮胡和嘴唇上的胡子被移除，专家做了长达六年的研究和鉴定，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的结论为“达·芬奇真迹”。然而学术界对此画真假的争议仍在继续。2011 年，伦敦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在特展《莱昂纳多·达·芬奇：米兰广场上的画家》中展出了这幅《救世主》，看起来站在了鉴真一派的阵营。2013 年，俄罗斯收藏家德米特里·雷波诺列夫（Dmitri Rybolovlev）通过瑞士艺术品商人伊夫·布维尔（Yves Bouvier）作为中间人，以 1.275 亿美元天价拍下了这幅画，而布维尔稍早时在苏富比拍卖行的一次私人买卖中仅以不到 5000 万美元的价格购得。由于布维尔抬价，雷波诺列夫在摩纳哥一家法院对其发起刑事诉讼，指控其索价过高。该案件导致摩纳哥当时司法部长菲利普·纳米诺（Philippe Narmino）辞职。至此雷波诺列夫才有了转让《救世主》的主意，希望“该拍卖能终结这一痛苦的风波”。

接下来就是时隔四年后，《救世主》出现在了 11 月 15 日佳士得纽约的拍卖现场。

竞拍开始后，至少有三名匿名买家通过电话委托现场工作人员叫价。根据《纽约时报》的分析，拍卖会当晚，巴德王子是通过佳士得战后和当代艺术联合主席亚历克斯·罗特（Alex Rotter）电话连线参与的竞拍。在拍卖开始两分钟后，竞价已经达到 2.6 亿美元。此时除了巴德王子，只剩下一名竞价买家，通过电话由身在现场的佳士得古典绘画部负责人弗朗索瓦·德·波特雷（François de

Poortere）代为竞拍。在相持了数回合过后，双方竞价达到 3.7 亿美元，最终罗特所代表的这方一口气加价至 4 亿美元，直接将对手吓跑，成为最终买家。

最后的结果我们现在知道了，《救世主》进了阿布扎比卢浮宫。

阿布扎比卢浮宫

4.5 亿美元收购《救世主》仅仅是阿布扎比文化投资及计划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计划早在 2005 年就开始了。

如今的萨迪亚特岛（Saadiyat Island）是阿布扎比展现自己文化实力的主要阵地，这座岛屿离本岛 500 米，面积 27 平方公里，上面除了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设计的阿布扎比卢浮宫之外，还有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海姆现代艺术博物馆阿布扎比分馆、日本人安藤忠雄设计的海事博物馆、前不久去世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以及英国设计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的扎耶德国家博物馆。据公开消息，阿布扎比旅游发展投资公司（TDIC）负责运营的项目预计为此总共耗资 270 亿美元。

海湾地区诸国如今面临的情况全都一样：在石油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何通过投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等“软实力”让国家的繁荣进一步延续。法国巴黎高师政治学者（Alexandre Kazerouni）专门研究阿拉伯半岛王国，最近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酋长的镜子，海湾地区的博物馆与政治》。他认为海湾地区的领导人早就清楚，在自己国家兴建博物馆、大学及各类文化机构，是笼络西方文化精英的有力方式。

这一点上，阿布扎比算是走得晚的。同在阿联酋的迪拜通过航空业获得了旅游方面的巨大增长，而邻国卡塔尔则通过半岛电视台起家，进而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创立欧洲连锁体育电视台 beIN，收购巴黎圣日耳曼足球队，并获得了 2022 世界杯的举办权。

作为世界上第一座通过外交条约产生的博物馆，阿布扎比卢浮宫从计划初始到如今建成开馆，也代表着一段文化全球化与艺术商品化的角力。

2005 年，阿布扎比通过外交信函的方式向法国外交最早提出了这一想法。最初时任卢浮宫馆长亨利·卢瓦雷泰（Henri Loyrette）是最坚定的反对

者,他不愿意让大量珍贵的展品进行长途旅行、外借,担心破坏国家馆藏的平衡。

但受各方势力影响,他的下属、卢浮宫常任行政主管迪尔·塞勒(Didier Selles)还是在2006年底率代表团去了阿布扎比与对方团队见面,开价10亿欧元,其中4亿欧元用于阿布扎比“卢浮宫”30年的使用权,1.9亿欧元用于法国博物馆馆藏为期10年的外借,1.95亿欧元用于总共为期15年的特展展出,另外1.65亿欧元用于从法国博物馆借调专家——圣日耳曼莱昂考古博物馆、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凯布朗利原始艺术博物馆、克吕尼中世纪博物馆、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奥赛博物馆、蓬皮杜艺术中心、罗丹美术馆、凡尔赛宫等一众法国最优秀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员,都会参与阿布扎比卢浮宫的对接工作。法国政府为此成立了专门用于法国博物馆与阿联酋的对接的独立机构“法兰西博物馆”(France-Muséums),正是这一机构在日后负责指导阿布扎比卢浮宫进行馆藏收购。

阿布扎比卢浮宫计划在法国国内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2006年12月,奥赛博物馆前馆长弗朗索瓦·加香(Françoise Cachin)、毕加索博物馆前馆长让·克莱尔(Jean Clair)以及法兰西学院艺术史教授罗兰·雷希特(Roland Recht)就曾在法国《世界报》联名撰写专栏《博物馆是不能卖的》,并随后发起请愿活动,获得了5000人的签名,其中大部分为法国艺术史学者、大学教授和博物馆研究员。但不是所有专家都反对这次联姻。如今的巴黎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时任卢浮宫伊斯兰艺术部负责人的苏菲·马卡列乌(Sophie Makariou)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项目,她后来表示,“要把它放在当时的背景里看,后‘9·11’时代,种族和政治已经成为全球主要问题。我同事们的成见是逐渐没有的,当时的西方博物馆刚开始转向全球化,而随着卢浮宫朗斯分馆的建成,也跟进一步让卢浮宫将眼光面向全球艺术史”。

六个月的谈判过后,2007年,就在法国举行总统大选一个月之前,阿布扎比和法国政府正式签订合同合建阿布扎比卢浮宫。法国政府开始分批获得阿布扎比10亿欧元的付款。

最初法国方面设想的是一座“在阿布扎比的法国卢浮宫分馆”。2011年底,时任卢浮宫馆长卢瓦雷泰还曾在阿布扎比卢浮宫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重拾法兰西共和国和法兰西王国的誓言”,希望这座博

物馆带来文化的交流和艺术教育的大众化普及。但阿布扎比的态度很明确:不想成为卢浮宫分馆。

两方的分歧更多集中在新馆的馆藏收购选择上。按照合约规定,“法兰西博物馆”机构提出收购建议,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局进行收购。而根据阿联酋政治体制的规定,阿布扎比卢浮宫的馆藏皆为私人馆藏,归阿联酋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所有。但当时4000万欧元的年预算显然捉襟见肘,阿布扎比相继错过了近几年拍卖市场上成交价上亿美元的塞尚《玩纸牌者》和蒙克的《呐喊》,只在2009年贝尔热、伊夫·圣洛朗的藏品拍卖中购得蒙德里安的一幅作品。“那次还是我们反复向阿布扎比强调不应该错过这件作品。”“法兰西博物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奥利维尔·加贝(Olivier Gabet)后来回忆道,“他们需要证明他们的野心。”第二年,阿布扎比卢浮宫又购得一幅高更在布列塔尼时期的《打闹的孩童》。

此时阿布扎比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邻国的竞争压力。卡塔尔公主谢赫(Sheikha Al-Mayassa 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被福布斯冠为全球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她每年花在艺术品上的预算就将近10亿美元。2011年谢赫公主花了2.5亿美元拍下塞尚的《玩纸牌者》,2015年花3亿美元买下高更的《你何时结婚》。2018年卡塔尔国家博物馆也即将开馆,其建筑师就是设计了阿布扎比卢浮宫的让·努维尔。

2014年,建筑施工尚未完工的阿布扎比卢浮宫已经很着急地另选一地展出了自己的首批馆藏,人们发现该馆已经悄无声息地购买了600件作品,其中包括毕加索《一位女士的画像》、马奈的《吉卜赛女郎》以及玛格丽特·赛扬·托姆布雷和保罗·克利的作品。

“阿布扎比卢浮宫的绘画馆藏也许不会像欧洲博物馆那样大而全,”现任卢浮宫博物馆主席让-吕克·马丁内兹(Jean-Luc Martinez)说,“它看似不平衡,但与法国博物馆外借来的300件展品放在一起,便会更有意义。”

如今看来,阿布扎比卢浮宫的野心不止于此。于是才有了此次4.5亿美元拍下《救世主》。《救世主》的到来,成了这座11月11日才开馆的博物馆最好的广告。2017年6月5日,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阿拉伯六国宣布和卡塔尔断交后,阿联酋与卡塔尔的这场艺术领域的博弈也许还将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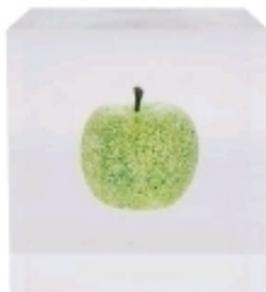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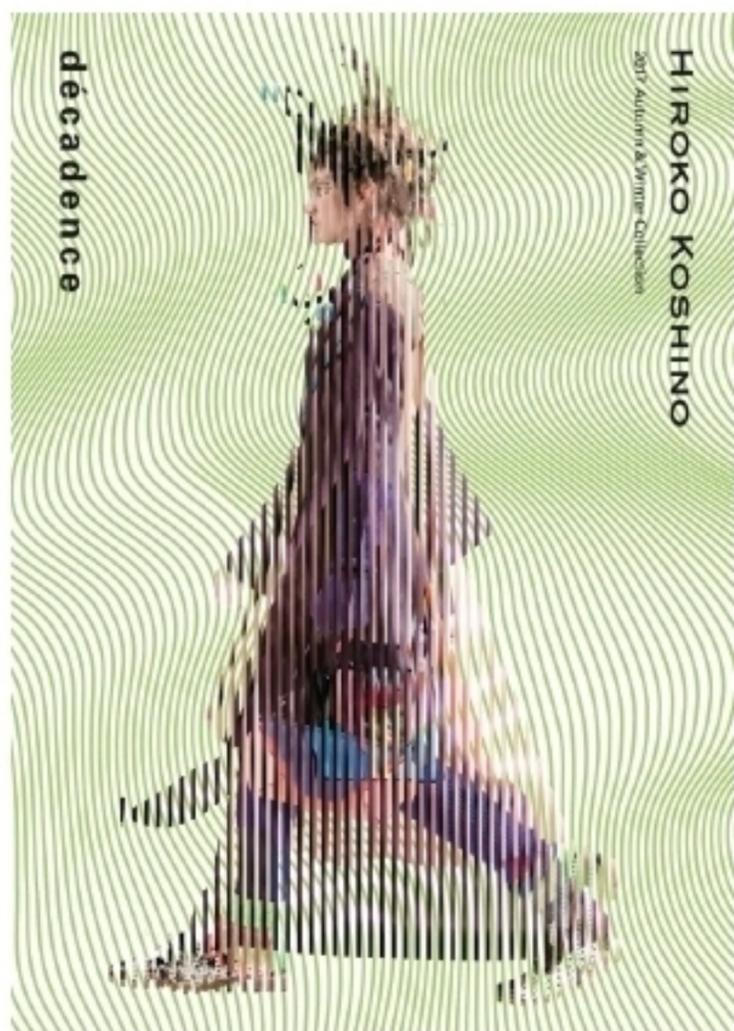
1

一只苹果引发的设计方法论

文 / 钟和晏 图片提供 MoCA 图片版权 ©Ken Mik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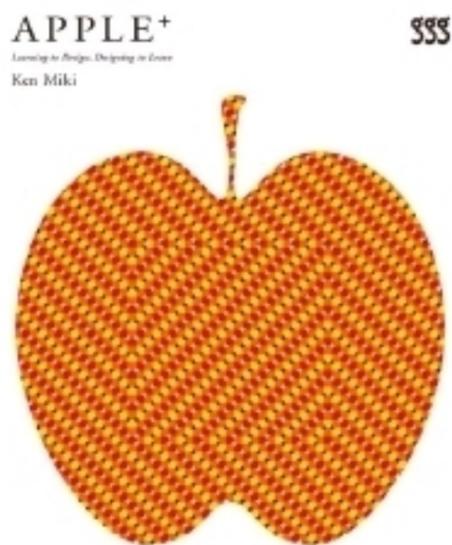
三木健的苹果研究让我们看到，比起表面化的色彩与图形的组合工作，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和概念的可视化呈现方式。

日本平面设计家协会颁发的龟仓雄策奖是日本平面设计界的最高奖项，自从1999年为纪念已故平面设计大师龟仓雄策（Yusaku Kamekura）设立以来，从田中一光、永井一正、胜井三雄、佐藤可士和到今年的渡边良重，只有19位设计师获得过这一荣誉。所以，去年当平面设计师三木健（Ken Miki）接到获奖通知时，他的反应是——“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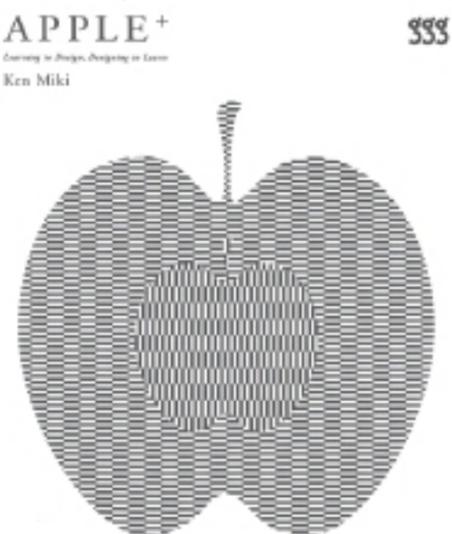


3

1. 日本平面设计师三木健的作品强调清晰的设计理念
2. 三木健为日本时装设计师小筱弘子 2017 年秋冬高级定制时装系列设计的海报
3. 用点画法表现的苹果
4. 三木健为“Apple+”展览设计的宣传海报
5. “Apple+”展览海报是第 18 届龟仓雄策奖的获奖作品



4



5

三木健仍然记得 1994 年第一次在龟仓设计研究所见到龟仓雄策时，对他而言犹如“设计之神”的龟仓雄策和他说的第一句话：“你给东京国际设计论坛设计的标识最终落选了，公共标识要经得住一切应用和解读，它们必须传达一个无比清晰的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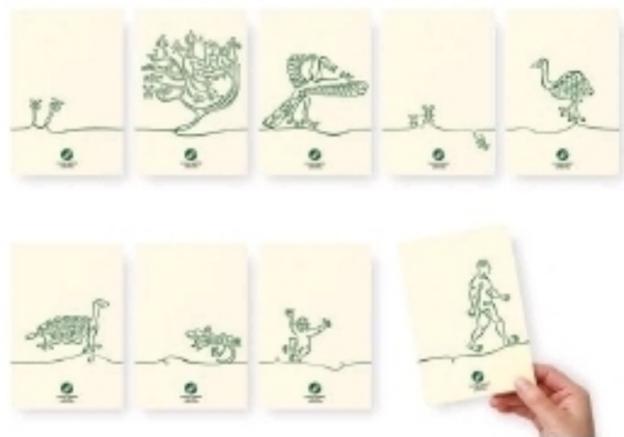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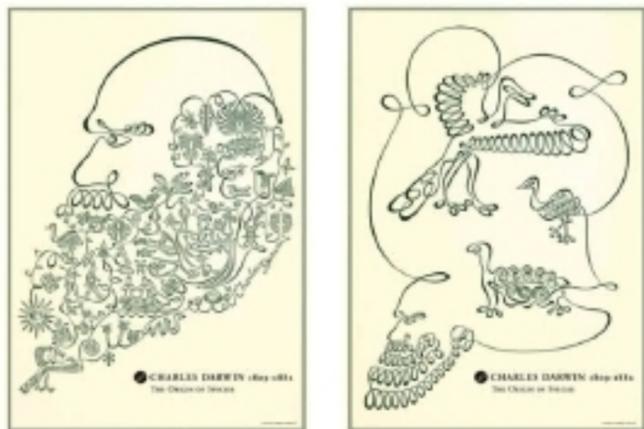
三木健这次的获奖作品是一幅展示视错觉的海报，黑、白、灰等彩度为零的颜色构成的条块填满一只苹果的剖面，大苹果的中心又套了一个小苹果。因为大小苹果的条块方向不同，随着视点的移动，静止的画面突然变得跃动起来。

与以往的获奖作品不同，它不是设计师受客户委托创作的，而是三木健为他的“苹果设计研究所”举办的“Apple+”展览设计的宣传海报。更为特殊的是，这不仅仅是一张海报，它的背后包含了一套

完整的设计思维与设计教育体系。如今，“Apple+”展览从东京银座 G8 美术馆巡回到上海当代艺术馆 MoCA，并以“学习方式的设计，设计的学习方式”作为副标题。

“苹果设计研究所”与乔布斯的苹果手机毫无关系，它所代表的是那个红彤彤的、世人皆知的水果。三木健现为大阪艺术大学设计学部教授，当他的设计事务所成立 30 周年的时候，他与大阪艺术大学设计学院共同策划了这一教育项目。以苹果作为观察和表现对象，希望学员通过体验对事物的深入观察找到自己的设计切入点，探究“设计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班级被戏称为“三木组”。

深入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这也是设计师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三木健选择苹果作为载体，固然是



三木健为纪念达尔文诞辰 200 周年创作的《达尔文计划》

出于它丰富的文化符号意义，但它终究只是一个研究对象，它所承载的方法论可以用于任何事物或课题。

上海当代艺术馆一层展厅里整齐地排列着 14 个鲜红展柜，分别展示把苹果作为观察和认知对象的 14 种方法和概念，如分解、长度、面积、颜色、涂鸦、联想游戏、拟声词、一笔画等。事实上，每个展柜对应的是三木健在大阪艺术大学设计学部的一堂课。

一些平常生活中面对一只苹果时难以想到的观察方式被展示出来，例如测量苹果的周长。先将双面胶贴在苹果上，然后用宽度为 2 毫米的红、绿、黑、白四种颜色的绳子把整个苹果包裹起来，松开绳子成为一根线之后就可以测量长度了。这样的测量思考因为信息量的变化，导致理解的变化。

还有思考测量苹果表面积的方法，把苹果皮削下来切成方形，让表面积变得可视化。几百块红色或绿色的苹果碎皮铺陈排列之后，被封存在正方形透明亚克力块中，把立体转换成平面使得原本的苹果表皮概念消失了，却还保留着几分似曾相识的感觉。

对苹果颜色的观察采用了制作色卡的方法，三木健要求每个学生从红苹果中获取 50 种颜色，从绿苹果中也获取 50 种颜色，这样总共取出 100 种颜色。全班 20 位学生汇集起来就有了 2000 种颜色，运用这些颜色完成一个“苹果色谱”的制作。在他至今为止的色彩教学中，总共提取了 2 万种以上的红色系和绿色系的苹果颜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丰富的红绿色谱了。

“小时候我对于能从纸杯电话听到声音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很想知道声音是如何通过线来传递的。

兴许就是这样一个疑问，让我对视觉传达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象力的发展不断催生新的故事，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中，这里产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是与喜悦相互联系的。”今年 62 岁的三木健这样回忆他的设计初心。

设计究竟是什么？对于三木健而言，观察与理解是所有设计的入口。一个设计需求来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通过各种媒介把思考之后的视觉构造形式表现出来。比起表面化的色彩与图形的组合工作，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思考过程和概念的可视化呈现方式。他的观点是——“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中，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具有清晰理念的。支撑这一理念的是哲学，作为活动尺度的则是思想”。

“三木组”的教学方式一直强调“察觉认知”的主题，就像“看着”和“看见”的区别，感知并不意味着认知。对于生活中人人熟悉的苹果，当被要求“画一个苹果”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画出心形、圆形或者红的、绿的苹果，当被问到“对苹果的印象”时，都会回答“红的、圆的、美味的”，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对于苹果的认知却很匮乏。14 个展柜所展示的方法，也是为了让人们察觉感知与认知之间的区别。

“我们记忆中的苹果，不过是长期形成的知觉再现。为了明确把握事物，我们必须在通过知觉获得的信息上增添更多信息，必须懂得如何将我们的认知提升起来。”三木健在同济大学包容性设计研究中心举办的“Apple+”展览研讨会上说，“所谓认知就是对实际的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对掌握的信息进行分析，记录变化的内容并从中找出变化的依据。设计师不应该只是制作者，而是要对所有关系进行全面认知，理解各自的立场，然后对事物进行有效

组合，这才是设计师的工作。”

“理解—观察—想象—分解—编辑—可视化”，这是三木健设计思维的六个组成步骤，理解与观察互相印证与启发，继而激活想象力，再有分解、编辑、可视化等后续方法。他说：“通常不被发现的东西，多半是由于你被日常知识和观念所束缚。当耳熟能详的东西在瞬间发现其不同之处的时候，就是发明和发现诞生的重要契机。‘原来还能这样做啊。’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创意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苹果的色彩、形状进行调查是一种定量观察，对苹果进行联想或分类则是一种定性观察，在这些过程中一些实用的设计方法也就变得清晰起来。把苹果用单色绳子缠起来之后，反而让包裹前的苹果的不规则外形以及品种差异变得明显了。所以，三木健教给学生的方法是一一之前的苹果具有丰富的色彩及肌理，其中包含了复杂多样的信息。设计不能把所有的信息都夹杂进来，必须学会干净地舍弃，必须要有什么该留下、什么该舍弃的判断力。

练习以苹果为联想游戏的“一笔画”也是为了信息的提炼，首先在纸张两端标出起点和终点，大家由此开始画出各自设定的故事，第一张的内容必须是苹果。画的时候一条线上不能引出另一条线，但是线与线之间可以重叠。一笔画如果选择形状复杂的描绘对象，画面上的线条也会复杂起来，故事概念就变得难以理解了。因此所画的造型特征和结构表现必须清晰明了，像是制作标识和符号一样，越是复杂的信息，越要进行简单的提炼。

沿着玻璃坡道旁苹果一笔画装置那根不断延展的红色细线向上走到二楼展厅，就是三木健30多年设计生涯中的一些代表作品展示了。为纪念达尔文200周年诞辰的“达尔文计划”也是采用了一笔画的概念。“如果地球环境因某种原因发生变化，生物的进化及灭绝也会随之大受影响。”他以《物种起源》为题材，用一根线串联起各种生物。同样，一笔画的卡片起始固定，而中间的部分观众可以发挥想象力自行组合。

三木健显然偏爱视错觉的表现方式，如同“Apple+”获奖海报所表现的，视错觉是察觉认知、思考设计的重要课题，每个人的视点和心理状态不同，看待事物的方式也各不相同。黑、白、灰等彩度为零的颜色初看之下冷静默然，奇妙的是组成条纹之后，突然间就会变得富有动感。在白色底色上用单一的黑色描绘标识和文字，整体的造型就会完

全消失。如果用色阶组成彩虹上面再覆盖黑色，就会发现黑色里面也有色阶。这就是色彩的欺骗性，善用素材和颜色的设计师会反复进行各种试验，用“视错觉”扩大设计表现的维度。

他为日本时装设计师小筱弘子(Hiroko Koshino)2017年秋冬高级定制时装系列设计的海报和宣传册，再次沿用了视错觉的方法，以“颓废”为主题。小筱弘子这一季的时装结合了戏剧元素、19世纪末巴黎艺术作品的抽象图样以及不过度设计的美丽线条。当带黑色格栅的塑料片覆盖在这些服饰上，模特就像皮影一般开始走动起来。还有一些模特和服饰被彩色线条覆盖之后变得虚化，逐渐消失在纸面上。

“商品是理念的孩子”，三木健对品牌推广的定义是“建立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果以人做比喻，可以分为造心(理念识别)、造颜(视觉识别)、造体(行为识别)这三大类。造心是为了让理念更好地渗透，也就是阐释思想；造颜是指将理念变成简单易懂的文字，再通过设计将这些文字形象化的过程，通常这是展现设计师实力的重要环节；造体则是以理念来引导架构，在商品开发、流通以及销售方式等环节制定新的系统和模式。

造心、造颜、造体的理念可以从他为“京都北山”(Malebranche)西点店设计的产品包装中清晰地体现出来：像展柜里摆放的宇治抹茶茶果包装盒，白色的纸盒如初雪般洁净，似乎触碰之下就会融化；盒盖上凸起的云纹围绕着中间的描金图案。简净而克制的设计诠释了日本设计的“干净”美学，还有对色彩与构型的精准把控。

按照三木健的自述，他是怀着“如果有这样的西点店就最棒了”的梦想去创作独一无二的商品，从食材到店铺设计，都是以要做就做到极致这一理念去塑造。所以，他的一个极致案例是为“京都北山”的“加加阿365”巧克力专卖店设计了365种巧克力图案，无论自然界的晴雨雪风还是花卉动物，每个月出售当月所有的巧克力图案。

“日日是好日”，这里包含了与大自然共生的四季变迁以及用“五感”来品味的丰富性，一种精致生活的文化。“加加阿365”京都祇园店是由花见小路一带瓦顶、木格长窗的町屋改造，门口挂着带有“京都北山”标志的圆形红灯笼，店里的天花板上就是三木健设计的那些巧克力图案，用的是黑底描金的传统漆器金蒔绘手法。■



设计师以新款气垫鞋 Air Vapor Max 为灵感来选择用料和设计时装

无时尚不运动

记者 / 杨聃

与其说运动品牌在时尚化，倒不如说时尚行业被运动鞋抢占了。

俄罗斯世界杯之争

2018 俄罗斯世界杯才刚刚定了 32 强球队和分组，营销爱好者们已经开始操心耐克和阿迪达斯谁将赢得这场世界杯了。相比于每四年一届为期一个月的足球比赛，“德国队”阿迪达斯和“美国队”耐克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阿迪达斯一直以足球场上的第一品牌自居。早在 1954 年世界杯，阿迪达斯研发的带有旋转式、可调节铁钉的防滑球鞋，就帮助前西德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伯尔尼奇迹”。1970 年，它的足球也成了世界杯的官方用球。风行一时的慢跑运动让阿迪达斯被彪马第一次在市场上压住了风头，谁想到随后

又杀出了“毛头小子”耐克。

自从耐克以 5 年代言费 250 万美元的价格签下迈克尔·乔丹，市场的格局开始改变了。1984 年，刚刚拿下奥运会冠军的乔丹既有亲和力又上镜，人们不仅关注他在接下来的赛季表现，还有他脚上不断换代的鞋，这才有了“air Jordan”系列和“just do it”的口号。当电视里传出甲壳虫乐队的《革命》搭配着扣人心弦的体育画面时，观众恨不得立刻放下手上的事情，奔到耐克鞋店。

不得不说，自从乔丹之后，一个易于识别并具有影响力的运动员面孔与运动鞋厂商密不可分。乘胜追击的耐克签下了一个又一个体育明星。1992 年，随着安德鲁·阿加西（Andre Agassi）赢得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男单冠军，耐克的对钩 Logo 变得无处不在。签下巴西国家队的耐克决定进军足球市场，可这一步走得并没有想象中顺利——1998 年世界杯决赛上，法国击败巴西夺去了大力神杯。

另一方面，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一些易主和收购



Yeezy Wave Runner 700



潮牌 Off White 设计师 Virgil Abloh 与耐克联名设计 Air Jordan 1



阿迪达斯 Y3



超模 Bella Hadid 为 耐克拍宣传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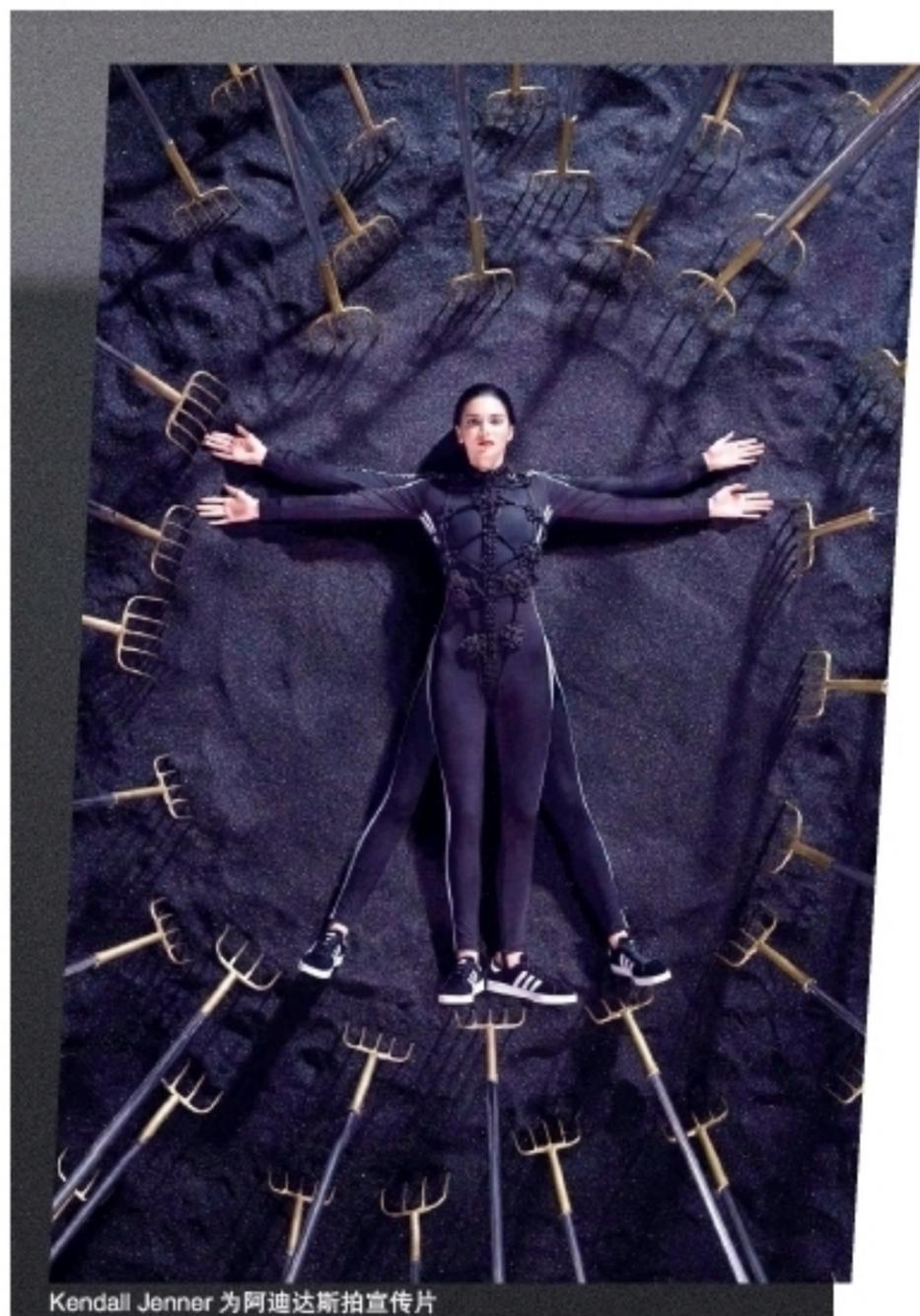


耐克 2014 世界杯宣传图

的风波后，重组的阿迪达斯把重点放在了三条杠的标识上，并重启了三叶草图案。除了专业运动鞋，它开始致力于以消费为导向的体育用品时尚化。山本耀司与其合作的系列 Y-3 就是这样一个嵌合体，它包括了慢跑鞋、服装、配件和泳装，整体看来这个系列是对复古运动装的时尚诠释。初见成效之后，阿迪达斯后来还和斯特拉·麦卡特尼 (Stella McCartney)、拉夫·西蒙斯 (Raf Simons) 等设计师纷纷建立了伙伴关系。

如此才逐渐形成了耐克“绝对运动”和阿迪达斯“多元运动”的印象。《华盛顿邮报》曾这样评论耐克的创始人菲利普·奈特：“他让运动员变得更富有，将运动鞋和运动服装带入奢侈品市场。”而阿迪达斯则选择了与大卫·贝克汉姆、蜜西·艾莉特 (Missy Elliot) 以及“野兽男孩”这类更具时尚与娱乐话题的人选合作，它还成立了“全球时尚娱乐市场部”，专门负责非传统品牌的营销。

不过，如今看来两者的标签区隔越来越不明显了。2014 年 10 月份在纽约举行的“女性创新峰会”上，耐



Kendall Jenner 为阿迪达斯拍宣传片



蕾哈娜的个人品牌 FENTY 与彪马合作系列

克发布了与巴西设计师帕特罗·洛伦索 (Pedro Lourenco) 的合作系列，请来了当红超模卡莉·克劳斯 (Karlie Kloss) 为其走秀，还顺势请她拍摄了 NikeLab x JFS 系列的广告，这是耐克绝无仅有地和体育明星合作的广告。

今年3月与TFBOYS组合队长王俊凯的合作贡献了耐克有史以来最火爆的一条微博，业内分析，这种从专业运动员到明星的变化可能是受到了来自阿迪达斯的压力。毕竟，三叶草系列的代言人是由吴亦凡、陈奕迅、范冰冰、杨颖组成的豪华明星阵容，它去年为阿迪达斯贡献了45%的业绩增长。

不仅是明星，耐克倾向时尚的营销还表现在“experiments in style”项目上，五位设计师以新款气垫鞋 Air VaporMax 为灵感选择用料和设计时装。从宣传照来看，模特的面部被弱化，每个设计都和不同颜色的球鞋搭配。

这一系列和阿迪达斯越来越相似的明星营销策略、走时尚路线的“反常”举动也并非没有缘由。根据零售研究机构 NPD 的统计，阿迪达斯 2017 年 5 月在美国运动鞋市场的份额扩大到了 11.3%，比去年同期的 6.3% 翻了近一倍。而耐克的份额则持续下滑，从去年的 35.9% 跌至 34.7%。

与此同时，阿迪达斯的压力也不小。虽然它和

国际足联 (FIFA) 保持着现代体育营销史上最长的合作关系，最新一份续约时间将持续到 2030 年，但显然 1994 年杀入足球市场的耐克来势汹汹。2014 年，阿迪达斯的足球业务收入约为 27 亿美元，耐克则达到 23 亿美元，几乎快追上老前辈了。

更让人“头疼”的是上次世界杯决赛上，对阵双方穿的居然都是耐克球衣。这是过去 30 年来，第一次没有阿迪达斯赞助的队伍进入决赛。回顾历届对决，场上至少有一队人身上的 Logo 是三条杠。难怪，阿迪达斯要用 6000 万英镑的重磅合约从彪马手中抢走阿森纳。

而此次俄罗斯世界杯从球队赞助数量上来说，阿迪达斯略微胜出；不过从球星的商业号召力角度来看，签下绝大部分“90 后”主流球星的耐克更胜一筹。

运动鞋现象

与其说运动品牌在时尚化，倒不如说时尚行业被运动鞋抢占了。上世纪 20 年代，“运动装”已经被收入时尚词典。在美国，此前只在网球和赛艇运动里穿的衣服，像法兰绒裤子、短袖上衣、针织运动衫，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衣橱。有闲阶级以此来显

示他们闲逸自由的生活方式。很快，香奈儿和夏帕瑞丽等品牌也推出了自己的运动服。现在恐怕没有哪个品牌没有运动系列了吧。不过，运动服饰品牌都是从运动鞋发展而来的。

鞋履专家伊丽莎白·森迈尔海克(Elizabeth Semmelhack)认为：“运动鞋是男人着装打扮中最具巴洛克风格的物品。”在研究了15年高跟鞋之后，她开始着迷于运动鞋。“高跟鞋和运动鞋都是普遍存在的，但人们通常不会去想，我们为什么对这种鞋子有情绪反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品牌推广概念让制鞋企业开始兜售形象营销。和常见的好莱坞式广告不同，运动鞋的形象多是教练和运动员。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运动鞋品牌都把球鞋与反时尚、另类文化、真实性和怀旧的想法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消费者灌输的想法就是用这双鞋来表达你是什么样的人。

1978年，导演罗伯特·克洛斯更改了李小龙未完成的作品《死亡游戏》的剧情，才让电影成功推出。李小龙最后的影像就是身穿黄黑相间的紧身衣和“鬼冢虎”(Onitsuka Tiger)运动鞋。这也是运动鞋第一次在电影中如此显眼。随后的80年代是运动鞋向大众文化转变的加速期，滑雪者、冲浪家甚至是技术宅都被卷入这场休闲风潮。

“你能看到穿着休闲的技术型人才在出席正式会议时仍然要求被尊重。”森迈尔海克认为，“一群具有科技背景并敢于冒险的人开始用这种着装风格，挑战传统的西装革履在正式工作环境中的排他地位。”同时，既然大部分买运动鞋的消费者并不打球，鞋子的外观自然比功能更重要了。

运动鞋真正开始被推崇，非裔美国运动员和音乐家功不可没。1988年，比兹·马基(Biz Markie)推出了专辑*Goin' Off*，封面照片上他身穿天鹅绒运动衫、脚踩运动鞋的经典形象成为Hip-Hop时尚的又一个标志。“当说唱明星和出色的运动员穿上运动鞋的时候，它再也不是让你星期日穿上洗车的那双鞋了。它们也多样化了男性的成功形象，这让传统单一的西装风格在90年代开始被淡化了。”

事实上，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运动鞋就是地位高级的商品。为了防止潮湿的沙子对硬底皮鞋的伤害，他们选择了这种昂贵的胶底鞋。“在着装上，男性把他们敢于挑战的最大勇气用在了鞋上。”森迈

尔海克认为，“他们的鞋变长了，可以有刺绣和亮眼的颜色。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感到不舒服，所以我认为男性的时尚是从脚上开始改变的。”当然这项成就也被女性享用了。如果看到一个人穿着装饰尖钉的金色Christian Louboutin运动鞋，不会有人觉得她要去运动。

在2008年以前，球鞋的第一次亮相都在传统的球场上，然而，“performance shoes”在第50届格莱美奖上，被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重新定义了。加之2014年巴黎春夏高级定制服装的秀场上，香奈儿让模特们脚踩球鞋，搭配长礼服、裤装以及正式的套装短裙，这让运动鞋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席任何时尚、正式场合了。

对时下的“复古风”和“丑流行”，运动鞋都没有缺席。球鞋网红摩根·威克斯(Morgan Weekes)认为，最早在时尚界发起当季热门“老爸鞋”设计的是拉夫·西蒙斯，Yeezy Wave Runner 700会是这一趋势的高峰。而这两位设计师恰好都和阿迪达斯有关。☑



潮牌 Off White 设计师 Virgil Abloh 与耐克联名设计 Chuck Taylor All Star



MSGM 2018



普拉达 2018

从光的本质到真实之辩

记者 苗千



1925年，爱因斯坦（右）与尼尔斯·波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本质，乃至关于真实本质的辩论

关于光的本质的辩论，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也可以看作一个全新的问题。

说起物理学界著名的辩论，可能很多人都会首先想到从20世纪初开始的，爱因斯坦与尼尔斯·波尔之间关于量子力学本质，乃至关于真实本质的辩论。这场辩论可谓旷日持久，几乎占据了两位科学大师的下半生。从后来的实验结果来看，似乎是波尔最终赢得了这场辩论，后来各种越来越精密的实验，结果大多都符合波尔的预测，爱因斯坦看似

站在了量子力学的反面。

两位科学大师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也留下了很多名言。爱因斯坦面对令他迷惑不解的新理论，曾经说过“上帝不是在掷骰子”，而波尔则针锋相对，毫不客气地说：“爱因斯坦，不要指挥上帝该怎么做。”这场争论也使爱因斯坦对于真实的含义感到迷惑。在晚年的一次散步途中，他问陪同自己散步的派斯教授，是不是相信月亮只有在我们看它的时候它才会在那里。

爱因斯坦与波尔之间的争论代表了人们对于真实含义的不同理解。爱因斯坦坚持认为物质的存在是一种客观事实，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而波尔则认为爱因斯坦对于真实的要求太过苛刻，他相信一个现象在没有被观察到之前，就不能被称为一种现象。

这样的争论固然是因为在20世纪初出现的量子力学太过于违反人的直觉，但实际上人类关于真实本质的争论则是从人类文明诞生之日就开始了的。在科学界一场更加著名的、持续时间更久的辩论该算是从牛顿时代就开始的关于光的本质的辩论。光究竟是什么？牛顿相信光是一种微粒，他用一个简单的三棱镜将一束白光分解为一条彩色的光带，以此来说明人们眼中的白光是由不同颜色的单色光组成。反方则认为光是一种波，这一方最大的胜利来自于英国医生托马斯·杨在1801年进行的双缝干涉实验。当光线展示出了波所特有的干涉性质之后，光的波动性质又变得不可置疑。

这场关于光的本质的科学界大辩论，从牛顿时代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持续了200多年的时间，若是向前，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哲人们形而上学的辩论，若是往后，在量子力学时代人们关真实的本质的辩论大约也可以看作是这场大辩论的延续。

关于光的本质所引发的旷日持久的争论，到了量子力学时代，人们终于得出了一个看似模棱两可的答案：光既是粒子，又是波。而且这样的所谓“波粒二象性”也并非只是缥缈的光子所独有，似乎一切微观粒子都有此特性，以前人们以为构成物质的基

本成分，坚实的颗粒，居然也会表现出波动的性质，而一些波则也具有粒子的性质。这样的—个结果，看似两全其美，可以让争论的双方都满意，实际上只不过是—将困扰了人类几千年的难题翻新一遍，而且引入了一个更令人迷惑的成分，那就是作为观测者的人类自身。

观测者在—个物理系统之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在此之前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人类作为观测者，只应作为旁观者来设计和记录实验，不应该对实验结果有任何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实验表明，原本应该进行旁观和记录的人类也会对于实验结果产生影响。换句话说，在—些量子领域的试验中，实验会取得什么样结果，似乎是取决于实验者想要观测到什么样的结果。实验者自身成为实验的一部分。

量子光学实验的结果成了“波粒二象性”最新的注解，而人类的意识，实验者的选择在—其中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则让人更加迷惑。为了说明人的选择对于实验结果的影响，乃至—于真实和因果律的本质，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了—个想象中的“延迟选择实验”(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

惠勒在1983年与波兰裔美国物理学家沃杰克·祖瑞克(Wojciech Zurek)共同发表了文章《无规则之规则》(Law Without Law)，在文中他首次提出了—个实验设想：光子在出发之后经过—个分光镜，根据量子力学的解释，此时因为光子的波动性质，它可以“同时”沿着两条路线前进，如果放置—个探测器来探测光子，因为波的干涉性质，光子被探测到的位置将呈现出条纹状的分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光子出发之后，实验者在光路上放置另—面分光镜使光线会聚，那么实验者探测到的光子位置又将呈现出粒子的特性，干涉现象消失了。

光是粒子还是波，它的本性究竟该由什么来决定？光子在出发之后是否会“选择”作为粒子或是波，它的性质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的？如果说人的观测对于实验也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人又何以成为实验的一部分？人的推测无关紧要，科学发展所信

观测者在—个物理系统之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在此之前似乎是一个无需讨论的话题，人类作为观测者，只应作为旁观者来设计和记录实验，不应该对实验结果有任何影响。

赖的是实验结果。惠勒所构想的理想实验早已被实验物理学家们实现，而且结果也正如惠勒所预想的，与实验观测者的选择有关。

这样的实验在更大尺度上，是否有可能依然成立？为了证实这一点，来自意大利帕多瓦大学、马泰拉激光测距天文台以及意大利e-GEOS公司的几位科学家，在太空中实现了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2017年10月25日，他们在《科学》杂志出版的在线开放获取期刊《科学进展》(Science Advances)上发表论文《将惠勒的延迟选择实验拓展到太空中》(Extending Wheeler's delayed-choice experiment to space)，报告了他们在太空中依赖人造卫星进行惠勒延迟选择量子实验的过程。

与此前在狭窄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光学实验不同，几位科学家在意大利南部的马泰拉激光测距天文台，利用天文望远镜充当接收光子的探测器，利用地球轨道上的人造卫星充当反射装置，在几千公里的距离上进行惠勒延迟选择实验。在这次太空级别的光学实验中，光子从地球出发，经发射后回到地球的路程需要10微秒的时间，而科学家们选择在光子行进的路程过半之后进行选择，而实验结果依然显示符合约翰惠勒的预测。

这个实验结果算得上是对于此前类似实验的又一次肯定，或许算不上惊世骇俗，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也算得上人们对于“真实”这一概念看似约定俗成的理解的又一次打击，也算是人类延续了数千年的关于光的本质的辩论延续。“实在”“因果关系”，这些看上去自从—个人出生之日起就约定俗成的概念如今受到了无比严峻的挑战。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人类该对它如何作答，关系着物理学的未来。■

喝酒会长胖吗？

文 / 袁越

一转眼又到年底了，这是节日扎堆的季节，圣诞节、新年、春节排着队等着我们去过。过节就意味着亲朋好友大聚会，免不了喝上几杯。喝酒会长胖吗？这是个问题。

酒的主要成分是酒精，这是酒的精华所在。人类常见的四种食物脂肪、酒精、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能量比大致为9：7：4：4，也就是说酒精仅次于脂肪排在第二位，可以说是相当高了。当然了，没人敢喝纯的酒精，所有的酒类都是酒精稀释后的产物。饶是如此，酒里面含有的热量也是很高的。

因为稀释方法的不同，每种酒的单位热量差别很大。其中白酒最高，一般40度的白酒每两大约含有100大卡左右的热量。红酒次之，一大杯普通干红含有大约150大卡的热量。啤酒最低，但一瓶330毫升的普通啤酒也含有大约110大卡的热量，不算低了。

不过，酒是个特殊食品，不能这么简单地计算。白酒度数太高，一般人只能按两喝，最多半斤到头了。啤酒则是对瓶吹，几个小伙伴一晚上干掉一箱啤酒是常事。算下来喝啤酒摄入的总热量往往会更高，所以才会有“啤酒肚”的说法。

酒精虽然热量高，但其代谢方式非常特殊，导致的结果很不一样，值得细说。酒精进入消化系统之后，经过几步简单的酶反应就会变成乙酸，这是一种热效率非常高的能量分子，极易被身体吸收利用。所以我们的身体一见到乙酸就会立刻如获至宝，将其作为主要的能量来源迅速消化掉，于是脂肪就被晾在了一边。

有人研究过一个人喝酒之后的代谢反应，发现酒精下肚几分钟之后脂肪的代谢率就会立即直线下降，说明人体对于酒精的吸收利用速度是相当快的。事实上，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的酒精绝大部分都会被立即消化掉，并不会转化成脂肪。喝酒之所以会长胖，主要是因为酒精代替了脂肪成为燃料，我们体内原有的脂肪被保护起来了。

相信不少人见过那种很瘦的酒鬼，这是因为他们嗜酒如命，只要有酒喝，饭都可以不吃。但是这种人大都营养不良，因为他们的能量来源几乎全部来自酒精，而酒精里除了热量外几乎没有别的东西。

不过，真正很瘦的酒鬼是很少见的，大部分酒鬼

都是胖子，因为他们只要一喝上酒，饭量立刻见涨。这件事同样值得细说，因为大部分富含热量的食物往往会抑制我们的食欲。比如，如果我们晚餐时吃了一大块大肥肉，肯定就不会再对饭后甜点那么感兴趣了，这是正常的反馈机制在起作用，防止我们一次吃得太多，对身体有害。

那么，酒精为什么反而让我们食欲大开呢？伦敦大学学院的莎拉·凯恩斯（Sarah Cains）教授找到了答案。原来，哺乳动物下丘脑中有一类名叫AgRP的神经元，其作用就是促进食欲。凯恩斯教授证明，小鼠脑袋里的AgRP神经元对酒精非常敏感，只要实验人员往小鼠体内注射一定量的酒精，立刻就会让小鼠食欲大开，吃个不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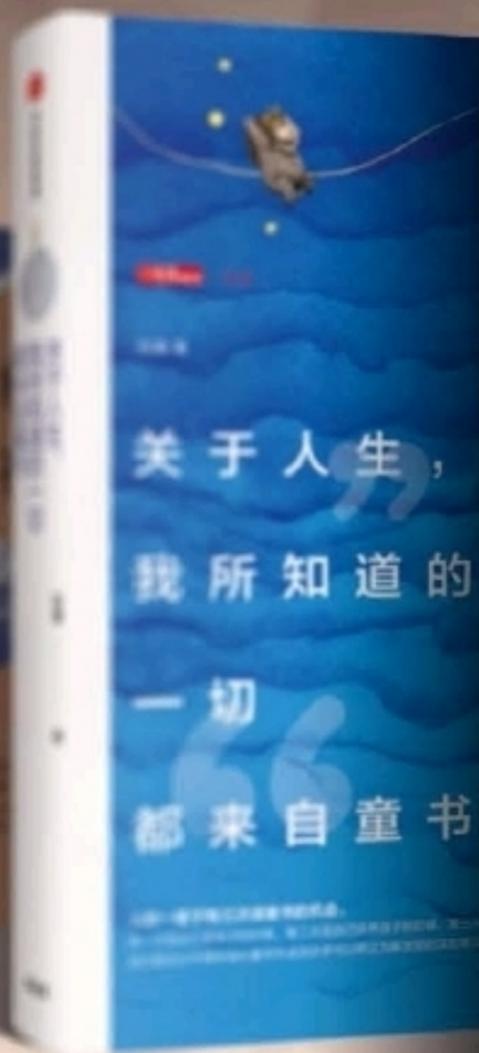
不过，人类的情况和小鼠有所不同。一般人在开派对的时候才会大量喝酒，这时候人的情绪肯定是很高的，会不会是因为酒精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才是促进食欲的真正原因呢？为了排除这个原因，凯恩斯教授在做实验时一直把小鼠关在单间里，避免它和同伴有任何接触。

不但如此，研究人员还对酒精处理过的小鼠的脑子进行了解剖，找到了AgRP神经元被酒精激活的直接证据。

凯恩斯教授将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2017年1月10日出版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专家们评论说，这个实验漂亮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一喝酒就容易贪吃，即使是一个人自己在家喝也会如此。☑

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三联生活周刊 专题集结

《穿越丝路： 发现世界的中国方式》

这是一部纵横 1500 年的中西交融史。《三联生活周刊》编辑部历时一年，足迹踏遍丝绸之路沿线，从历史、经济、文明、器物、现场几个角度，深度挖掘“一带一路”对中国未来的巨大战略意义。

《大学的精神： 教育是让一个人成为 最好版本的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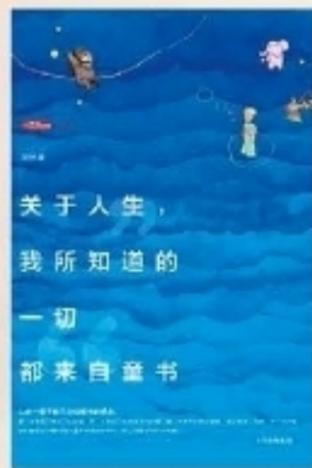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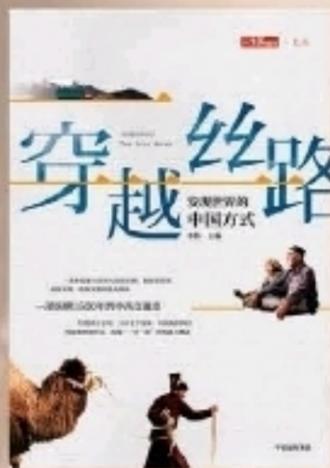
全方位了解世界名校，以及精英学生是如何生活和学习的，从中为你困惑的教育问题寻找答案。

《关于人生， 我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童书》

献给那些内心柔软、深沉爱着这个世界和孩子们的人，你的感受我们都懂得，只等你来读，其后的共鸣会让你感动到热泪盈眶。

《匠人匠心：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修故宫的人李永革、沉香雕刻大师郑尧锦、龙泉四老、紫砂徐门……本书介绍了近 20 位中国传统手工艺人及其他他们承载的手工技艺，传达出传统手工艺人的纯粹的精神之美。



微信书店



天猫旗舰店

康熙的雅克萨之“算”（一）

要害在雅克萨

文 / 卜键



《康熙帝读书像》轴

在清代诸帝中，如果不说唯一，康熙帝也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潜心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与数学知识的。亲政之初，14岁的他就关切哥萨克对黑龙江流域的袭扰，留心那里的山川地貌，15年后平定三藩，遂毅然用兵。他深信“多算胜，少算不胜”，在收复雅克萨之役中算无遗策，小处料敌机先，大处通盘谋划，从而驱除入侵者，签订和约，保障了东北边疆辽阔大地100多年的安宁。

清康熙二十年（1681）秋，随着三藩之乱即将最后平定，26岁的清朝皇帝玄烨开始谋算驱逐侵入黑龙江左岸的哥萨克，核心目标很清晰，那就是拿下雅克萨。

左岸乃至西伯利亚的广袤地域与中国的联系可谓悠久，元明两朝都曾在此设立都司卫所。而努尔哈赤与皇太极父子起事之初，兵员缺乏，想到的只是到这里抓壮丁与招徕移民，人烟越发稀少，俄国人乘虚而入。崇祯十六年（1643）冬，新崛起的清廷君臣注目于动荡纷乱的北京，而沙俄探险队悄然进入精奇里江和黑龙江。至此仅过去三四十年，哥萨克武装已建造了不少营垒堡垒：精奇里江沿岸有上结雅斯克堡、西林穆迪斯克堡、吉柳伊冬营、多隆堡，两江交汇处有结雅堡，而沿黑龙江向上有库马拉堡，向下有阿枪斯克堡等。罗刹堡垒甚多，其中有更靠近松花江与乌苏里江口的，康熙帝为什么只盯着偏在一隅的雅克萨堡？

该堡位于黑龙江上游极西处，入侵的哥萨克主要分为两路，一自雅库次克南进，一自叶尼塞斯克西来，以雅克萨为交汇点。哥萨克的目标是抢掠财富，流动性很强，离开后营寨即被清军或部族百姓焚毁，多数堡垒存在时间很短，徒有其名。而雅克萨堡背靠尼布楚，渐成为俄人入侵黑龙江的门户，长期派兵驻守和移民屯种。沿江向下形成一串殖民村落，安插流放人员和耕农大肆垦荒，还建了一座东正教堂，一副扎根我边疆闹革命的架势。实乃肉中之刺，焉得不拔？

雅克萨堡临水而建，本义为“江水刷塌了的湾子”，附近居住着许多达斡尔人，世代居住于斯，耕种渔猎，生活安定。第一个占领此地的俄国人，即大名鼎鼎的哈巴罗夫。顺治七年（1650）春，哈巴罗夫率队闯入，抢占了阿尔巴西城寨（故称阿尔巴津）。这位后来被追认的“俄罗斯英雄”，出身贫苦，年轻时热衷于闯天下，也发了一些小财，后带领一批乡亲抵达雅库次克，竟然从勒拿河畔的冻土上种出庄稼，加上贩卖食盐等商品，很快变身巨富，却不知怎么惹恼了督军戈洛文，没收其财产，并将之投入监狱。新督军来了，哈巴罗夫被释放，又成了

一个穷光蛋，听说南方有一条富饶的阿穆尔河，即请求自费组队前往。由于前面的波尔雅科夫探险队伤亡惨重，仅招募到70人。

哈巴罗夫带着这支哥萨克小队翻过外兴安岭，沿鄂尔多库勒河南下，成功抵达黑龙江上游，随即向达斡尔堡寨发起攻势。酋长拉夫凯知道罗刹火器厉害，主动率族人撤离，坚壁清野。侵略者闯进一座座空寨，虽也挖出些窖藏的粮食等物，所获有限。听说大队清军就在附近驻扎，哈巴罗夫有些紧张，留下斯捷潘诺夫等坚守营垒，赶回雅库次克求援。他带回的战利品使督军深受鼓舞，视抢掠为人生乐事的哥萨克更为踊跃，新队伍一下子就达到一百数十人，政府慷慨提供了武器装备、军服、船只器械，还有三门新式火炮。哈巴罗夫重回雅克萨，对该寨再作升级改造，作为四出抢掠的后方基地。

次年夏天，哈巴罗夫等顺江而下，黑龙江两岸部族饱受蹂躏。六月，哥萨克船队至呼玛，接连攻破三座达斡尔大寨，肆意杀戮，包括妇孺老人超过1000人被害。九月初，他们侵入瑷珲地区，诱捕了达斡尔头人托尔加，勒索贡赋不得，将城寨焚掠一空，托尔加悲愤自尽。下旬，他们窜至松花江口，大开杀戒，抢掠妇女与财物。十月，哈巴罗夫率队越过乌苏里江口，到了赫哲人居住的下江地区。天气已经寒冷，哥萨克又修造了阿枪斯克堡，准备过冬。当地部族趁多数哥萨克外出收税，堡内空虚，迅速聚集起来袭击敌人，却由于武器悬殊太大，进攻被击退，部民死伤惨重。这伙流寇占据村寨，强行征收实物税，当地人痛恨恐惧，呼为罗刹、老招、老枪、老羌。

此时宁古塔是三江流域唯一的东北边镇，梅勒章京海色奉旨率兵进剿，自带所部官兵六百，又征调满泾站士兵四百，达斡尔与赫哲人闻讯赶来相助。清军开始时以猛烈炮火给敌人很大杀伤，血肉横飞，连哈巴罗夫也受了伤，多处栅墙被轰破，堡内一片惊恐，海色却下令停止炮击，命士兵进寨抓活的。哥萨克得以喘息，组织火力反击，清军大量官兵伤亡，扔下大炮和枪械溃散。到手的胜利化为乌有，清军死伤惨重，海色也因贻误战机被处死。这是清朝官军第一次正式对俄作战，先胜后败，留下巨大心理

阴影。哥萨克也受到重创，十余人战死，数十人受伤，哈巴罗夫自知难以与清朝官军对抗，趁着江水解冻，率部溯江而回。

他们在途中遇到雅库次克派来的140名援军，一起到精奇里河口，在瑷珲修建结雅堡，意欲长期驻扎。未想到抢来的财富引发严重内讧，趁着主帅外出，有100多名哥萨克将财物装上三艘船，迅速逃往下游。队伍大减员，哈巴罗夫率领余部退至呼玛，营建库马拉堡。这里距雅克萨约五六百里水程，援兵与给养数日可及，是他选定的新基地。哈巴罗夫再次向国内求援，同时也派遣船只往下游抢掠，多次经过乌苏里江口，我国的内河黑龙江，已成为哥萨克纵横驰骋的水道。

正当哈巴洛夫的“事业”有声有色之际，俄廷派来了一个小贵族，擅自撤掉其职务，还将不服气的他痛殴一顿，命士兵押往莫斯科。接任的是更为凶残的斯捷潘诺夫，清军围攻库马拉堡失利，致使敌焰更为嚣张。顺治十五年（1658）春，宁古塔官军在松花江口设伏，恰溯江抢粮的哥萨克船队开来，总管沙尔虎达即命炮击，经过连续三天的激战，斯捷潘诺夫与近300名哥萨克被击毙，焚毁俄舰船10艘，仅有部分残匪逃往黑龙江下游。两年后，沙尔虎达之子巴海继任父职，率军扫荡沿江残敌，索伦总管也出兵相助，结雅堡、库马拉堡、雅克萨堡被次第荡平，黑龙江流域获得暂时的安宁。

仅仅过了五年，切尔尼戈夫斯基一股俄国逃犯又来到雅克萨。切氏乃胆大妄为之徒，纠众杀死俄督军，劫取国库钱财，辗转逃至这里。他们在原来的营垒废墟上，“建成一座方形城堡，城中建有塔楼、粮仓、防御工事，环城建有桩砦、壕沟”。这是旧堡寨的升级版，也是切氏长期盘踞的根据地。他们仍不改烧杀抢掠的本性，仍会窜扰黑龙江中下游，但始终不离雅克萨。俄廷接受了切氏呈上的贡品与税赋，象征性地作了一下审判，接着就加以赦免，任命他为阿尔巴津城管事。切氏由杀人犯一变而为沙俄命官，也还真的有些本事，在附近兴办殖民村屯，招募俄国流民，更主要的是诱迫当地部族民众归顺沙皇。■（待续）

球队中的牧师

文 / 张斌



凯瑟琳·塞勒是球队中的牧师，她专注于为个人提供心理疏导，只要有需要，球员随时会获得家庭般的温暖

随军牧师这个角色，似乎不算完全陌生，至少在电影里，我们似乎还看到过，弹雨中牧师匍匐到临终战友身边，用一段祈祷送其安然上路。那何为球队中的牧师呢？这是近35年来，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等地逐渐流行开来的运动文化，宗教机构和个人为运动队提供心理疏导和宗教引领。这与竞技体育机构原本聘用的心理医生不同，牧师们并不负责提升运动表现，只是专注于为个人提供心灵和世俗的心理抚慰，全程分文不收。

在美国，有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为各级别的运动队提供牧师服务，四大顶级职业联赛和职业足球大联盟的每支球队都有这一角色设置。原本牧师不随球队客场作战，但如果教练和球员们认定牧师不可或缺的话，那么自然会增加预算，让不可或缺的心灵抚慰一道同行。近几届奥运会，美国代表团中，牧师已成为标配。

2012年，在伦敦奥运会运动员村里，英国慈善机构一口气派出了160位牧师和志愿者为五种宗教信仰者提供周到的服务。与美国不同，英国的体育世界中世俗氛围更浓，从1991年开始才有了全国性的体育牧师慈善组织，义务为全国的体育俱乐部提供无偿支持。在伦敦奥运会运动员村中担任体育牧师团队负责人的博伊尔曾在曼联队持续服务超过20年，他不仅负责日常组织球员、教练和工作人员们例行祈祷，在复活节

和圣诞节来临之时，为众人诵读《圣经》。除了人们熟知的神职角色外，博伊尔更多的时间是在聆听，作一个忠实的交流者，听取俱乐部中每一位愿意敞开心扉的人讲述自己的生活艰辛，常常伴随的是泪水和抽泣。

多年来，博伊尔和分布在全英国的300多位同仁秉持“相信关系”的准则，静候陌生环境中的人们逐渐可以信任他们，让每一颗心灵有机会得到救赎。当下，英国职业和半职业足球俱乐部中大约有三分之二聘用了随队牧师，他们身着的统一队服上绣着REV或VIC，这是他们职业角色的标识。南安普顿队有着信任队中牧师的传统，巴罗曼在此服务多年，在他的意识中，球员其实是最脆弱的一批人，他们不过是伪装自己坚强罢了。而他所做的努力，就是让球员们不再伪装。

不仅是英超球队有常备牧师，半职业第五级别球队也有牧师常伴身边。以诺斯郡队为例，每逢赛季来临，牧师都会向俱乐部全员发出信函，阐释自己的角色价值，而且特别关切梯队中青春期的孩子和漂泊四方的短合约球员，让他们相信，只要有需要，随时会获得家庭般的温暖和支撑，驱走不安全感。牧师不仅尽责宗教事务，还充分包容不同的价值观共存，与无神论者真诚相待，同样为他们提供心理沟通的服务。

熟悉陌生环境，牧师们早有心理准备，最初的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安静聆听，自然而然地与周边建立关系。安吉牧师服务于雷丁女足，下车伊始，队员们郑重相告，全队上下团结一心，言外之意，咱们最好敬而远之。足足用了三年时间，球队的姑娘们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将不可能向教练倾吐的少女心事一一讲给安吉听，求得解脱和帮助。另外一位在查尔顿女足服务的牧师塞莱斯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原本每周只需要在队里出现一天，但她主动去治疗室陪伴治疗治伤的姑娘们，久而久之，球员们给她送上亲昵的绰号，彻底接纳了她。

球员人生路原本世人想象得艰辛很多，那些没有攀上竞技高峰或得到一份超值合同的年轻人，往往会面对终结职业生涯转换人生道路的艰难时刻，破产和婚姻变故时常发生。曾经在球队中感受过牧师温暖的失意者们即便离队了，也会在人生至暗时刻向牧师求助，求得新生。牧师们倾尽全力，让球员们找到新的身份认同，不再沉溺于往昔岁月。■

特朗普还会让美军“再忍耐”吗？

文 / 宋晓军

12月22日，特朗普满怀喜悦地签署了30年来最大的减税计划。同一天，《星条旗报》记者格里萨雷斯（Claudia Grisales）对此发表题为“议员们在新的一年里将面对国防开支的斗争”的报道。看了这篇报道的内容，再联系到一天前国会通过、特朗普签署的到2018年1月19日的临时开支“持续协议”（CR），我就想到了本期专栏的题目：特朗普还会让美军“再忍耐”吗？

简单说，美国的2018财年应从2017年10月1日开始，但直到12月12日特朗普才签署了国会提交的包括7000亿美元国防开支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为什么会晚了两个多月呢？其原因就在于国会两党在预算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从而导致特朗普执政后，通过了维持国防基础预算零增长的第三个CR。换句话说就是，特朗普政府承诺的约7000亿美元的2018财年国防开支目前还是个“悬念”。这个“悬念”的具体内容大致是：在7000亿美元中包括“受限”的6260亿美元基础国防开支加上80亿美元其他国防开支的共计6340亿美元，以及不“受限”的660亿美元“海外应急行动支持”（OCO）。所谓“受限”，就是2011年国会通过的“预算控制法案”（BCA）的限制。

再简单说，按照BCA的要求，在2018财年联邦预算中，除去社保、医疗和国债还本付息等“强制性

开支”外，留给“受限”的国防开支及政府非国防开支的“非强制性开支”额度就只有1.065万亿美元了。按此分配下来，“受限”的国防开支上限应为5490亿美元，“受限”的政府非国防开支上限应为5160亿美元。目前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要求“受限”国防开支提升850亿美元，即从5490亿美元提高到6340亿美元，而政府非国防开支不仅不能增加甚至还要减少。这样，民主党自然就不可能同意了。但其实民主党并不反对增加国防开支，而是要求“受限”政府非国防开支“对等提高上限”。而共和党中又有一批坚决反对增加联邦赤字“预算鹰派”，再加上特朗普刚签署的“减税法案”预期10年内可能增加1.46万亿美元的赤字，他们无疑是反对“对等提高上限”的。但提高BCA上限又须经参院三分之二票通过，所以民主党就以此为“条件”要求必须“对等提高上限”。这一僵局，就是造成美军在2018财年开始后忍受了三次CR的原因。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特朗普还会让美军“再忍耐”、在2018年1月19日后接受第四次CR吗？毫无疑问，特朗普显然不想让美军“再忍耐”了。正如他12月18日公布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时所说的：2018年，我们会在国防上进一步投资近7000亿美元，唯有超凡的实力才能带来长久的和平。当然，特朗普的承诺能否兑现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如果假设特朗普能借助目前美国经济基本面向好和减税计划的助推，在2018年1月19日后成功兑现了他的承诺，那接下来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呢？

现在可以知道的是，除了军方会在2018年1~2月期间拿出与《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接的2018财年《国防战略》报告（DNS）、《弹道导弹防御评估》报告（BMDR）和《核态势评估》报告（NPR），以及7000亿美元国防开支中的262亿美元采购14艘舰艇、101亿美元采购90架F-35战机等一系列军事装备的清单外，国防部在军人出身的部长马蒂斯率领下，一定还会陆续推出一系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规划方案去落实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原则重建美军的愿景。特别应值得注意的是，这刚好与中国军方落实十九大提出的2020年国防与军队建设目标是“同步”的。■



2017年12月22日，美国华盛顿，特朗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签署1.5万亿美元税改法案，此乃美国最近逾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行动

更多高清杂志免费下载QQ群：280594200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11）

文 / 朱伟



2012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上，莫言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蛙》是莫言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部长篇，写公司于2008年，在《收获》发表后，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莫言给这部小说写的后记标题是《听取蛙声一片》。这是辛弃疾西江月词中的句子：“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以这首词读这部小说，故事若放在词意中，会增添怅然悲伤。

这部小说写农村粗暴推行计划生育酿就的悲剧及时过境迁后的荒诞。莫言是以蛙写蛙，塑造了一个传奇的姑姑形象。他在后记里说，生活中，他确有一位妇科医生的姑姑，接生了数千婴儿，亦有“为数不少婴儿，在未见天日之前，夭折在她手下”。莫言借此姑姑承载计划生育这样的大事件，以蛙与女媧的“媧”为意象。蛙与娃，蝌蚪变蛙，蝌蚪摇曳

着尾巴，像精子。媧呢？女媧造人，人类始祖就像一个母蛙，这是小说中“小狮子”的说法。这个小狮子是姑姑的助手，在“我”的前妻王仁美死后，由姑姑作媒，成了我的续弦。

莫言的说法，这部小说原来篇名叫《蝌蚪丸》，是一个荒诞的结构。其荒诞，来自他看到1958年的报纸上，有一则男女行房前生吞14个蝌蚪便可避孕的报道。这应该是1957年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后的民间偏方。那时没有避孕药，也没有避孕工具。回溯我们的计划生育史，50年代初，毛泽东说“中国人口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生育多的母亲本是称“光荣妈妈”的，我母亲便是“光荣妈妈”。50年代中，因为粮食产量不高，不够吃，毛泽东才考虑到要控制人口，1956年把节育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马寅初因此才写了《新人口论》。1958年，莫言看到那则报道时，“大跃进”兴起，毛泽东又看到“人多气势旺”的好处，提出“恐怕还要发展一点”，他提倡“不要强迫节育”，“再多两亿人口，走到极点就走向反面了”。但“大跃进”的粮食亩产其实都是虚报，随后的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增长抑制。莫言这部小说里的说法是，饿着肚子，女人没了奶水，男人没了房事的力气。到1962年，人口恢复迅猛增长，1964年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但还是以宣传教育为主。到“文革”后，80年代，才进入“只生一个好”的强制执行时代，在农村搞粗暴的“围剿”。

莫言是否定了《蝌蚪丸》的构思，将其搁置，写成《生死疲劳》后，才重新结构了这部《蛙》。他以姑姑的传奇与蛙的意象来包裹强力禁止超生。小说分为五部，第一部先赋予姑姑复杂的、履历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其父是白求恩的弟子，八路军神医；她的第一个恋爱对象，是后来驾机叛逃台湾的飞行员，第二个恋爱对象是县委书记，在这一连串遭遇中，传神地赋予了她豪放、刚烈的个性。在这蓬勃的个性之上，才能承载悲剧的分量。

结构上，小说的前四部都以第一人称“我”与“杉谷义人”通信的叙述方法，最后一部是我寄给杉谷义人的九幕话剧剧本。这个杉谷义人是当时高

密日寇驻军司令的后代，这司令学医出身，当时因敬仰姑姑父亲的医术，曾以其母、妻女为人质，想招降他。“我”的笔名是变蛙的“蝌蚪”，真名叫“万足”。这“万足”有象征含义。这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经姑姑接生的“我”的同学与其父，都以身体器官命名：陈鼻的父亲是曾经的地主陈额，袁腮的父亲是曾经的民兵队长袁脸，王肝与王胆的父亲是车把式王脚，肖下唇的父亲肖上唇在“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头目，于老师的儿子叫李手，陈鼻与王胆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叫陈耳、陈眉……莫言的说法，以器官命名，是农村的“贱名长生”意识。我以为，这也是他包装故事，赋予黑色幽默的一种方法。

强制扼杀超生的悲惨故事在第二部与第三部。第二部先以“我”的视角，叙述张拳妻子跳进河里想逃生，在被姑姑的计划生育船追赶中，大出血死亡。后写“我”叙述自己的妻子王仁美因偷摘环受孕，藏在她娘家地窖里，被姑姑带着工作队，用拖拉机先拉倒邻家的树，再要拉倒邻家门楼时，挺身站了出来。结果，在引产中，也是大出血死亡，都是已经五六个月的身孕。第三部里，姑姑做主，我娶了小狮子，小狮子的良心已经被谴责。我看到，当姑姑的计划生育船追上逃跑的王家木筏时，为了让躲在木筏上的王胆把孩子生下来，小狮子故意掉进河里，拖延时间。因为陈鼻说：“生出来就是一条性命，生出来你们就不敢给咱掐死了。”结果，孩子生了下来，王胆自己死了，生下的还是女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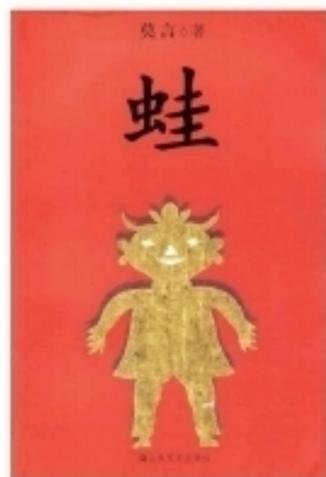
结构上的变化是，第四、五两部的“豹尾”，除了写时过境迁，姑姑被蛙哭包围、惊扰，更重要的是“我”被带进荒诞场景，成就了一部像《苍蝇》《脏手》那样的话剧。小说中，姑姑自己，有一段被蛙哭包围的叙述。她说，退休那晚，她喝了点酒，迷蒙中成千上万的蛙哭，像无数被她残杀婴儿的控诉。路上的泥泞像口香糖一样粘她的鞋底，每抬一次脚，“鞋底与路面之间就牵拉着一道道银色的丝线”。无数蛙跳出来，包围她，追赶她，撕食了她的裙子。最后是捏月光娃娃的泥塑大师郝大手救了他，郝大手专捏泥娃，姑姑就嫁给了他，将自己扼杀的孩子，一个个都让郝大手做成了泥塑，以此弥补她内心的罪过。

小狮子呢？她收养了王胆的孩子，精心抚养。孩子长大后，被陈鼻领走，她就迫切想要自己的孩子。她怨跟着姑姑引流了那么多婴儿，伤了天理，自己

就不能生养。90年代后，农村的计划生育名存实亡，我的同学袁腮以“牛蛙养殖场”为名，暗中开了个代孕公司，这小狮子就采了我的精液，去找代孕（当年就是这个袁腮，偷帮王仁美摘了环）。代孕者是陈鼻的女儿陈眉，陈眉在广东打工时遇大火毁了容，愿以代孕费替父亲还债。这后传故事中，就体现了我的同学史——同学们各显神通，陈额原是最富裕的，陈鼻现在是最悲惨的。

最后一部的剧本，写陈眉击鼓鸣冤，哀求“包青天”判回她的儿子，时间故意退回到民国，让时任高密县长高梦九来受贿判案。代孕带来伦理问题：孩子成了陈鼻的外孙，而高梦九按预先策划，判“大胆陈眉假冒人母”。剧本最后是姑姑的精神煎熬，她自语：“按说我这辈子也没做过恶事。”她追问：“那些事儿，算不算恶事？”最后她的台词是：“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利去死，她必须活着，像熬药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死。”

这小说是莫言获诺奖后，2013年由陈安娜译成瑞典文出版的。莫言的九部长篇中（不算系列小说《红高粱家族》与《食草家族》），五部译成了瑞典文。陈安娜译了《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与《蛙》，还译了《红高粱家族》，另两位汉学家译了《丰乳肥臀》与《四十一炮》。2012年，莫言以他30年辛勤累积的辉煌成就获诺贝尔文学奖。我计算了一下，从1981年发表第一篇习作到2012年获奖的31年，他写了约600万字小说，300万字散文、随笔、杂文，总计900万字，在中国新时期作家中，累积篇幅之多，题材面之广，整体所具之深度，获奖是他辛勤的馈赠。他在30年里走了别人可能要用50年走的路，实至名归。■（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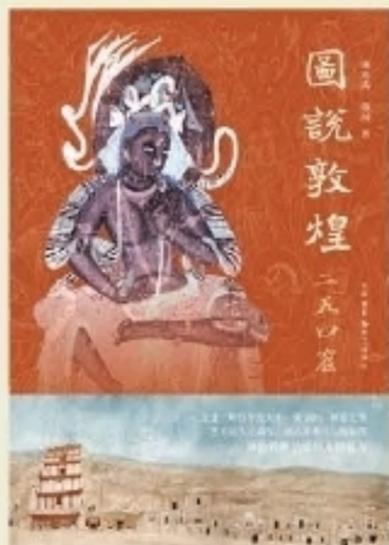
莫言的《蛙》
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新版

大家都有病



朱德庸





图说敦煌二五四窟

陈海涛 陈琦 著 定价：96.00元

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宝库，全书以北魏时期的第254窟为例，从细读南北两壁的壁画入手，有序地循着窟内空间展开，结合建筑形制与壁画、彩塑内容，对石窟的营建和构思做了整体解读。通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个案，可以超越一般的知识性介绍，使读者和观众更深层次地领会图像背后的精神与义理。

白沙宋墓

宿白 著 定价：98.00元

1951年，宿白主持河南禹县白沙镇的3座北宋雕砖壁画墓的发掘，并于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报告。这不仅是一份客观、忠实、完整的考古发掘记录，更以注释的形式提供了大量眼见之物以外的文献和图像史料，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宋代社会生活的原貌，为中国历史考古学开创了物质文化研究的典范，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的一日：1936年5月2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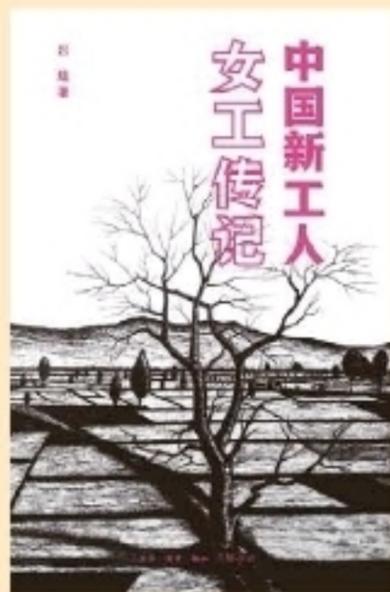
茅盾 主编 定价：52.00元

《中国的一日》初版于1936年，它记录下了1936年5月21日这一天里，全中国各个阶层、各种处境、各种职业的人们的“所见所闻、所做所感”。城市的慌乱、农村的崩溃、富有者的荒淫、饥饿者的挣扎、小市民的彷徨、求索者的奋勇……都活泼泼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

吕途 著 定价：56.00元

“中国新工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吕途通过访谈记录了34位中国女工的所思所想、生命故事。这些故事延伸出了两个历史：一个是时代变迁的历史，一个是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代中国的巨变深刻地塑造着每一个人，而不同年龄段女工的成长经历、谋生历程，也从不为人知的角落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

严安生 著 陈言 译 定价：40.00元

甲午战争之后，志士们大举到“同文同种”的邻国去寻求维新的范本。汉唐以来的文化宗主国与附属国，半殖民地化的旧帝国与明治维新成长起来的新帝国，进而是甲午战争之后的被害国与加害国，在时间纵轴上的古今恩仇与位置关系的变迁，作者将这种正负交错作用视为留日精神史的整个磁场。

土摩托看世界3：行走世界之巅

袁越 著 定价：79.00元

远涉南北极地，考察在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如何深刻地影响整个地球的未来；深入古巴、津巴布韦和斯里兰卡，去探讨政治制度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袁越用持久不变的好奇心、与时俱进的知识储备、巨大的热忱和勇气，探求那些不易去的风景和不易解的难题，分享种种独特的体验。



病友陈凯

文 / 徐蓉 图 / 陈曦



父亲在血液科，住过一天双人病房。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是一位大男孩，十八九岁，长得很帅，就是脸色特别苍白，显得眉毛又浓又黑，唇上的胡子大约还从没剃过，柔柔顺顺的，带着这个年纪男孩特有的青涩。他叫陈凯。

我们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吃着红提，胃口很好的样子。只是进了新病友，让他有些烦恼。因为他的病特别怕感染，前几日他发烧刚退，住进一个病友，又开始发热。这人走了，他刚松口气，我们又进来了，他很有些郁闷。

陈凯患的是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那天看白先勇《树犹如此——纪念亡友王国祥君》，王国祥君也是这个病，这个病的凶猛，我是在看了白先勇的文章之后才有所感知。他不爱和我父母聊天，我们却聊得不错，那时我以为他很快就会康复，所以心情轻松，和他东拉西扯。

其实，久病成医，他对自己的病很有些经验。他向他的妈妈抱怨，烧刚退医生就停了药，害得他又热起来，再挂就不管用了。妈妈安慰他，让他相信医生，他委屈地说：“你就不知道我烧得痛不欲生。”抱怨完了，他开开心心地看起电视，是一部青春校园剧，电视里的男孩住进了医院，有女孩去医院探望、照顾。电视里的病房，让在病房看电视的我们产生了特别的情境感。我不能不感觉到遗憾，在我们的病房，没有电视里那样年轻的女孩来看望陈凯。这个生病的孩子，在医院看着电视里的青春校园剧，兴致盎然。

晚上8点多钟，他的妈妈赶几十里路回单位上夜班，舅舅来替班，第二天妈妈再带上做好的饭菜继续陪护，他这样的病人特别需要补充营养，饭菜往往准备得特别丰盛。妈妈忙着买、洗、烧，只能在上夜班的时候略略休息一下。

第二天，陈凯又发热了，戴上了口罩。那天有了单人病房，父亲住进了单人病房。他的妈妈过来打招呼，说陈凯担心是因为他的缘故，父亲才搬走，一直问他的母亲“不会是因为我的缘故才调病房的吧”，让母亲跟我们解释。父亲对我说，这孩子虽然和我们没什么话讲，可和你倒是挺谈得来，这个病，又刚这么个年纪，孩子也真挺可怜。

后来，陈凯也住了单人病房，在我们隔壁房间，58床。他的母亲不去上夜班了，在医院里整天陪护。陈凯一直时断时续地发热，热度而且很高。在走廊上看到妈妈的脸色，就能知道陈凯今天有没有发热，陈凯不发热的日子好像是节日，陈凯妈妈的脸上是溢出来的喜色。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到他的病房门口，远远地和他打个招呼，尽管气色不佳，他仍然会开心地和我们打个招呼。

又一天在走廊上碰到陈凯妈妈，我知道陈凯又发热了，一发热，陈凯妈妈就茫然失措，眼睛里没有焦距，完全看不见任何熟人。我和她打招呼，她停下来，告诉我他们准备去苏州了，等陈凯不发热就走。主治医师也帮他们在苏州联系了医生，他们准备去换骨髓，已经向中华血型库申请配型了。“换骨髓要100多万，我们准备把房子卖了。我只有这一个孩子，也不可能再生孩子了，现在100万会觉得很多，过两年这些钱也不算多了。”

“陈凯换了骨髓就会完全好的，他的病不是恶性病，只要换了骨髓就不会复发。”妈妈讲的时候，很有信心，认定前面是一片光明的前景，我也相信一切都会顺利。我打电话给苏州一位认识的朋友，请她帮帮陈凯妈妈的忙，后来我们就匆匆而别。

陈凯转院到苏州那天我不在医院，我想他大约已经治好了。4月里吧，那天出医院下楼梯，遇见一位老太太，她40多岁的儿子也是再障，我说没事，这个病治得好的，有一个小男孩到苏州去看了，他妈妈准备给他换骨髓，换了就好了，以后也不会复发。那位老太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天有一位医生告诉他，有一位十多岁的姓陈的孩子，到了苏州后就没法治，现在人已经走了。

我一下子蒙了，好像是听明白了，又好像是完全没有听懂。说的是陈凯吗？他走了？不是都已经准备换骨髓了吗？我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向医生求证，只悄悄告诉了母亲。过了好多天，母亲告诉我，是的，就是陈凯，他已经走了。我们后悔当时没有向他的母亲要一个电话，可是，要了电话又能怎么样，谁又能安慰那样一位母亲。■



CHINA TEA LIFESTYLES
ANNUAL CONFERENCE

茶生活年会

2017

茶生活年会

获奖名单

中国茶影响力品牌

鼎白茶业 杭州龙冠实业
孝文家茶 雨林古茶坊

中国茶匠人匠心奖

陈海标 同容堂 刘峰
“斗记”茶业创始人 冰岛古树晒红复兴者 武夷岩茶新领军人物

王传意 杨丰
鼎白茶业创始人 降合茶业创始人

主办



承办



熊猫爱茶研究所